

平定縣裡不平定： 山西省平定縣文革史(上)

No Peace in a County Named “Pea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Pingding, Shanxi

郝志東、黎明 / 著





No Peace in a
County Named
“Peace” :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Pingding, Shanxi

當代中國研究（二）09

平定縣裡不平定： 山西省平定縣文革史 (上)

郝志東、黎明 ——著

謝 誌

本書起源於郝志東於 2004 年在平定縣開始進行的一個關於知識分子與農村發展的課題。在課題進行的訪談過程中，談到了「文革」的那些事情，決定增加一個分課題，做文革的口述史。於是 2005 年開始訪談，預計 2006 年出書，以紀念文革發動 40 週年。當然，訪談的越多，發現自己知道的越少，2006 年出書是不可能的了。所以，乾脆決定將訪談面鋪得開一些。於是在 2006 年夏天，郝志東請了山西大學的五位社會學的碩士生和一位本科生，來平定協助訪談了 20 多位文革的過來人，與此同時，又請一些文革的過來人寫了一些他們自己的回憶和感想。最後於 2009 年寫出了初稿，並散發給一些文革的過來人包括被訪談過的人看，並請提意見。

本書作者之一黎明就是在看了這個初稿之後，談了自己的看法，然後被邀請參加調研和寫作本書。郝志東和黎明是平定中學校友，在 1966 年文革開始時，黎是高中二年級，郝是初中二年級。黎是平定城裡人（但是城裡居住的農村戶口人、也種地），郝是平定鄉下人（西郊村）。文革後黎

回去種地，郝因為參加文革屬於「兵團」一派，而且戶口在學校屬城鎮戶口，所以被分配到河北電建做洋灰工。郝在當工人兩年後去南開大學讀英文系，工農兵學員，之後回河北電建教中學、到河北師大教大學、華東師大讀英文碩士、美國讀社會學博士，以後在美國、澳門教大學。黎當10年農民後又考學就讀，畢業後當了教師，又進政府工作。殊途同歸，研究文革的責任將我們聯繫在了一起。所以開始了我們的合作。

在初稿完成後，我們又做了更多的訪談。黎明又蒐集了不少資料，包括趙成秀的回憶錄、王增榮的回憶錄、關於岳增壽的媒體報導、楊志忠收藏的傳單、縣裡的一些檔案材料等等，並寫成了第二稿。兩人在幾次修改、補充、增刪之後，本書才終於可以面世了。

我們在書中絕大多數情況下都使用了真名實姓。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有些糾結：平定地方很小，大家低頭不見抬頭見。即使故去的當事人，人家的後代還有。我們不好指名道姓說長論短。但是，你又總不能見一個名字就張××、李××吧，那樣一本書就沒法讀了。這就不好寫。但是考慮到這是一本史書，應當留下真實的史料，我們決定除了一些涉及隱私或者人身攻擊的話語之外，都原名、原文照錄。雖然有些地方可能會令人不快，但是為了對歷史負責，只得冒昧，懇請諒解。我們對書中提到的所有人都表示感謝。

我們還要感謝所有參與了本書調研與寫作的人，包括最早來平定做訪談的山西大學的同學們。尤其要感謝那些給我們提供口述歷史或者寫了回憶材料的人。他們不避諱自己的經歷和觀點，給我們提供了活生生的個人經驗。在初稿寫成之後，其中的不少人還給我們提出來很多中肯的修改意見。這些人包括（以中文拼音排序）陳桂芳、董銀明、馮拉科、葛秉臣、郭旭明、郝鼎丞、郝忠德、賈正杞、荊履榮、李文元、劉玉榮、李守珍、李彥良、劉振傑、劉懷祿、劉振傑、牛增福、潘佩經、戎崇璽、王增榮、

王來金、岳萬壽、岳智明、翟全臣、翟治壁、張啟傑、趙成秀、鄭子英、朱存業等先生女士們。李俊瑞、耿忠榮、李永華、荊履雲等人為我們提供了照片或者實物等，我們在此一併表示感謝。

特別感謝那些被我們引用過文字的，如平定縣誌辦公室、縣檔案館趙成秀先生、朱存業先生、王增榮先生、岳柱明先生等。

感謝為我們提供第一手資料的已故楊志忠先生的家屬和李愛國先生。

感謝幫助我們撰寫「平定簡史」第一章但未署名的張考生先生。我們對第一章也做了不少修改，並增加了引文出處。

我們尤其感謝岳智明、劉振傑等朋友。他們在我們的調查、研究與寫作的過程中，一直在為我們出主意、想辦法。沒有他們的支持與鼓勵，也不會有這本書。劉振傑除了帶學生訪談之外，還撰寫了人物傳記的初稿。特此表示感謝。

我們還要感謝澳門大學為此書所提供的研究經費。

最後，我們要感謝思行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的編輯們為本書的出版所作的種種努力！沒有她（他）們的努力，本書也不可能達到如此專業的水準。

對於書中的所有不足以及可能的錯誤，責任全部由作者來負，尤其是第一作者，因為是他負責統稿並最後決定材料取捨的。

我們也希望讀者不吝賜教，以便於將來有機會再版時修改。

謹以此書紀念文革發動 50 週年，結束 40 週年，祭奠那些因文革而死去的人們。我們向所有那些受到文革衝擊的人們送去一個歷史的道歉，向所有的文革過來人道一聲「珍重」，向年輕的朋友們說一聲「小心」，千萬不要讓文革重演。

目錄

• 上冊 •

前 言 如何理解文化大革命及其對今人的啟發兼介紹本書各章	9
第一章 走過幾千年：平定簡史	59
第二章 文革的思想動員：學毛選、批「黑幫」	83
第三章 文革的組織動員：平定有了紅衛兵	119
第四章 練「兵」：破四舊、立四新、鬥牛鬼蛇神	147
第五章 「長征」：為紅衛兵充電	187
第六章 鬥「走資派」：文革掀高潮	211
第七章 「奪權」：文革高潮與平定第一次奪權	235
第八章 再「奪權」：文革高潮與平定第二次奪權	261
第九章 奪權之後：總站和兵團正式分派以及陳永貴和解放軍的作用 ..	285

• 下冊 •

第十章 武鬥初起：總站得勢、兵團敗走東鄉.....	337
第十一章 武鬥升級：兵團得勢、總站撤退昔陽.....	387
第十二章 武鬥的後果：多人重傷、三人致死.....	427
第十三章 貌合神離的拉郎配：大聯合與平定縣革委會的成立.....	445
第十四章 肇固革命成果：清隊、一打三反、清理三種人.....	489
第十五章 學大寨運動：一首唱走調的歌.....	549
第十六章 餘音嫋嫋：階級鬥爭的邏輯還未拋棄	597
結語 文革反思的困難與必要性	625
附錄 人物小傳.....	641

如何理解文化大革命及其對今人的啟發 兼介紹本書各章¹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

——唐貞觀十七年（西元 643 年），唐太宗李世民在魏徵去世後所作的感歎，出自《舊唐書·魏徵傳》

為了理解中國的今天「為什麼」（why）是這樣的，我們就必須理解文化革命中到底發生了些「什麼」（what）事情。

——麥克法夸爾和沈邁克所著《毛澤東最後的革命》的「前言」²

1 本書的前言和結語在撰寫過程中，徵求了文革研究的專家如宋永毅、魏昂德（Andrew Walder）、Lynn T. White 以及平定縣多位文革過來人的意見。各位都提了很好的建議，作者也對初稿作了相應的修改。我們在這裡一併向他們表示誠摯的謝意。

2 Roderick MacFarquar and Michael S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第 1 頁。作者的中文名字分別為麥克法夸爾（也名馬若德）和沈邁克。該書已經被譯為中文，題名《毛澤東最後的革命》，由香港星客爾出版有限公司於 2009 年出版了簡體版，臺灣左岸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在同年出版了繁體版。上面這段話為本書作者自己的翻譯。

「文化大革命」會不會再來？別看我們已經改革開放了，從我們的某些思維方式、社會問題上可以看到，「文革」長長的影子還存留着。

——白岩松，新聞記者，中央電視臺主持人³

關於文化大革命，人們可以問「十萬個為什麼」。但是由於篇幅所限，我們只問五個「為什麼」。我們的為什麼，既來自於我們對目前國內外對文革研究的理解，也來自於我們對本書所描述的山西省平定縣文革史的觀察。所以我們在問為什麼的時候，既會介紹別人研究的成果，也會介紹本書的內容，同時介紹本書的特點或者對文革研究的貢獻。我們會著重討論這些問題對今天中國社會與政治發展的啟發。這幾個為什麼包括：

- 一、毛澤東為什麼要搞文革？他是否有一個總體的策略、規劃，如果有，執行情況如何？他的文革思維對今天有什麼啟發？
- 二、紅衛兵是怎樣被發動起來的？他們為什麼會如此聽話？紅衛兵運動對今天的社會運動有什麼啟發？
- 三、文革之中為什麼會有兩派之鬥？這種派別之爭有什麼意義？兩派鬥爭對今天的政治與社會發展有什麼啟發？
- 四、文革為什麼會有暴力？如何理解文革中的暴力？這和今天政治和社會上的暴力有什麼關係？
- 五、為什麼說文革對個人的傷害、使人對社會失去希望才是最嚴重的傷害？

³ 見張英對白岩松的訪談，「我還在央視，我該幹什麼？白岩松的新聞長跑」，載於《南方週末》，2014年5月22日。

在本書的結語部分，我們會探討文革反省的困難與必要性，並和前言中的這些「為什麼」相呼應。在討論所有這些問題時，我們會力圖比較全面、公正地看待歷史。

在文革發生 50 年之後，無論是我們的被訪者，還是我們執筆撰寫書稿的作者，都希望對我們的後輩有個交代。與此同時，正如我們上面的引文所顯示的，無論是古人還是今人，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認為我們應該以史為鑒，認為只有知道歷史，才能理解現在；只有學習前人的教訓，才知道今天的人們應該怎麼做。不少研究者也都強調文革和今天政治與社會發展的聯繫。⁴這些也正是我們寫作本書的目的。

關於文革的研究或者回憶的書籍與文章，儘管已經不少，但是好多文革檔案還沒有解禁，需要研究的問題仍然很多，正如 Jonathan Unger 所指出的，尤其是對基層文革的研究，現在還非常缺乏。⁵從宏觀的角度來研究文革的著作有前引麥克法夸爾（馬若德）和沈邁克的書，以及其他如較早的高皋、嚴家祺合著的十年文革史，王年一、金春明、卜偉華等人的著作。⁶也有一些專題性的研究，比如宋永毅、孫大近關於文革異端思潮的研究、宋永毅關於地下讀書運動的研究、印紅標關於青年思潮的研究、Andrew Walder（魏昂德）的北京紅衛兵的研究、唐少傑關於清華大學武

4 如 Richard Curt Krau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第 4 頁。

5 見 Jonathan Unger 關於基層文革（城鎮、鄉村、工廠、少數民族地區、政府機關、中學、大學等）迫切需要研究的討論，“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Grass Roots,” *The China Journal*, No. 57 (Jan. 2007), pp. 109-137。關於文革研究現狀與問題，也參見卜偉華，「關於文革史研究的幾個問題」，《三味書屋的博客》載於《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cb51180100edp8.html，2009 年 8 月 1 日。

6 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六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

鬥的研究、Lynn White、蘇楊、鄭義各自關於暴力的研究等等。⁷關於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的研究就更不勝枚舉了，如齊慕實（Timothy Cheek）、Lowell Dittmer，高文謙、Ezra Vogel 等等。⁸也有研究一省或一市的文革史的著作，如高華和程鐵軍的內蒙文革史、王紹光的武漢文革史、Elizabeth Perry 和 Li Xun 的上海文革、Keith Forster 的浙江文革、唯色的西藏文革、石名崗主筆的山西文革等等。⁹另外還有無數的回憶錄，如閻長貴、王廣宇對文革小組等的回憶、鄭念的上海回憶、季羨林的牛棚雜憶、吳德的北京回憶、王力的反思、徐景賢的十年一夢、徐友漁所編的回憶錄，以及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的回憶錄。¹⁰

-
- 7 宋永毅、孫大進，《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香港田園書屋，1997；Song Yongyi, "A Glance at the Underground Reading Movemen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07, 16(51), May 325-333；印紅標，《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Andrew Walder,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唐少傑，《一葉知秋——清華大學 1968 年「百日大武鬥」》，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Lynn T. White, *Policies of Chaos: The Organizational Causes of Violence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9); Yang Su, *Collective Killings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蘇楊，「文革中的大屠殺：對湖北、廣東和廣西三省的研究」，載於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鄭義《紅色紀念碑》，華視文化公司，1993。其中，Lynn White 的書其實是很將文革看作一個暴力行為，並不是直接像蘇楊那樣討論暴力。另外他的書也可以看作是對上海的研究，因為他所使用的是上海的個案。
- 8 Timothy Cheek (齊慕實) (編)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Ma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蕭廷中《晚年毛澤東》，春秋出版社，1988 年版；厄洛爾·迪特默 (Lowell Dittmer)，《劉少奇》，華夏出版社，1989；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3；Ezra Vogel (傅高義)，《鄧小平時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
- 9 高華、程鐵軍，《內蒙文革風雷：一位造反派領袖的口述史》，香港明鏡出版社，2007；王紹光《超凡領袖的挫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Elizabeth J. Perry and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7); Keith Forster,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 1990)；唯色，《殺劫》(敘述西藏文革)，臺灣：大塊文化，2006 年；石名崗（主筆）《文革中的山西》，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15。
- 10 閻長貴、王廣宇《問史求信集》，紅旗出版社，2009；鄭念《生死在上海》，上海百家

回憶類的書籍和文章為文革研究澄清了不少事實，提供了很多素材。¹¹本書關於平定文革的研究，除了口述歷史之外，也引用了很多回憶的文字，這對瞭解當事人的經歷和感受，很有幫助。回憶錄、口述史、檔案材料等多種資料相互印證，對我們在較大程度上還原歷史，很有幫助。

但是上述研究，多為縣域以上城市和地區的研究。關於縣域的文革，我們看到的很少。我們現在知道的有關於湖南道縣大屠殺的研究，記述一個縣裡的大事件，還有 Dongping Han 關於山東一個縣在文革中的經濟與教育發展，但是主要集中在發展上面，而不是一個全面的縣域文革史。¹²所以像我們這樣的研究，一個縣域比較全面的文革史，還沒有看到。我們的書應該說是填補了一個文革研究的空白。

另外在研究文革史時，著重文革這個大事件對個人的影響的著作還不多見。通常都比較宏觀。而我們的著作則特別強調文革對個人、家庭、朋友的影響。這本是當今歷史研究的一個特點，也是本書的一大長處。

文革研究，通常也會涉及到我們上面提出來的五個為什麼。但是從縣

出版社，1988；季羨林《牛棚雜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徐景賢《十年一夢——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文革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黃正，《軍人永勝：原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將軍前傳》，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0；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第三版，香港北星出版社，2009；李作鵬，《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

11 比如涉及到江青和毛澤東的關係時，人們通常會引述所謂延安時期中共給毛和江約法三章，結果閻長貴通過多人的回憶，證明是以訛傳訛。毛澤東和江青在文革中的關係也不是中共官方後來認定的反對關係。見「歷史學者座談《毛澤東最後的革命》」，載於《往事》第 101 期，2010 年 10 月 18 日，座談會日期為 2010 年 6 月 26 日，地點為北京。

12 譚合成，《西元 1967 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第二版，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2；Dongping Han, *The Unknown Cultural Revolution: Life and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8.

域的角度來看這些為什麼，來看文革的發生和發展及其對基層老百姓的影響，來瞭解像白岩松所說的，人們如何仍然生活在文革長長的身影中，卻是其他人很少涉及的問題。希望我們的書能夠融合到文革研究的大範疇裡去，為文革研究提供一個縣域的視角，瞭解縣域文革和全國文革的同與不同，以及文革研究的現實意義，為方興未艾的文革研究添磚加瓦。

關於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在《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已經有了結論：

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在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根本不是「亂了敵人」而只是亂了自己，因而始終沒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在我國，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建立以後，尤其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以後，雖然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還沒有最後完成，但是革命的內容和方法已經同過去根本不同。對於黨和國家肌體中確實存在的某些陰暗面，當然需要作出恰當的估計並運用符合憲法、法律和黨章的正確措施加以解決，但決不應該採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方法。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所謂「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既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政治基礎。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設性的綱領，而只能造成嚴重的混亂、破壞和倒退。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其實我們這本書也是要討論為什麼說文化革命「不可能是在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十年動亂，所為何來？辛辛苦苦十幾年，一夜回到文革前。無論是老幹部還是造反派都重頭再來。這十年，對很多人來說，其實不光是辛苦，而是災難。所為何來？多少人因文革而死。逝者已矣，

但是所為何來？下面我們來看一下前面提到的幾個為什麼。

一、文革的起源：毛澤東為什麼要搞文革？他是否有一個總體的規劃與策略；如果有，那麼在基層的執行情況如何？毛的文革思維和鬥爭方式對今天有什麼啟發？

這一部分首先討論毛澤東關於文革的規劃以及本書所描述的平定文革的運行過程是否與毛的規劃相契合，然後我們來看中國共產黨以及國內外學者對文革起源的評價。在本節中我們可以看到，文革後中共對文革的評價儘管談到「嚴重性」時比較到位，但是談到「原因」時卻王顧左右而言他。國內外學者對文革起源的分析，多少和毛澤東自己關於路線分歧的說法有所契合，但是他們也指出了權力鬥爭的問題。這後一點是毛澤東語焉不詳的。他在談到和劉少奇的鬥爭時，都是有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很少承認自己是在和劉少奇爭權奪利。平定這個地方文革的發生和發展也基本是按照毛澤東的規劃所進行的，儘管毛澤東並沒有預料到文革開始後事情進一步演變的複雜性及中央試圖整合各方面力量、重新建立政權的難度。我們會著重強調文革思維對我們今天政治和社會發展的影響。

毛澤東對文革起源的解釋，對文革的規劃以及本書所描述的平定文革的實際運行過程

平定文革的歷程，似乎可以證明毛澤東搞文革是有計劃、有規劃、有策略的。當然他或許並不總能控制局勢，所以他的計畫也在變化，但是他搞文革並重新建立政權的初衷至死不渝。就是在今天，毛澤東的思想遺產，還在深刻地影響著當代人的思維方式。我們還面臨著選擇自己未來道路的困擾。那麼他搞文革的初衷，根據他自己的說法，是什麼呢？林彪在1969年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的政治報告，應該已經講得

比較清楚：¹³

毛主席曾經用簡潔的語言說明了這場大革命的必要性：「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

毛主席特別指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激烈的」。

所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消滅資產階級，至少打敗資產階級，建設社會主義。那麼，誰是這個資產階級的代表呢？林彪接著說：

現已查明，劉少奇早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就叛變投敵，充當內奸、工賊，是罪惡累累的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總代表。他有一條妄圖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使中國變成帝國主義、修正主義殖民地的政治路線。他又有一條為他的反革命政治路線服務的組織路線。多年來，劉少奇招降納叛，搜羅了一幫子叛徒、特務、走資派，他們隱暔了自己的反革命的政治歷史，互相包庇，狼狽為奸，竊取了黨和國家的重要職務，控制了從中央到地方許多單位的領導權，組成了一個地下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對抗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他們同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國民黨反動派勾結

13 林彪，「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69年4月1日報告，4月14日通過，載於《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7-10/11/content_6863297.htm，上網日期2015年7月28日。

著，起了美帝、蘇修和各國反動派不能起的破壞作用。

換句話說，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將劉少奇及其在中央和地方的代表揪出來，將權力從他們手上奪過來。之後，要建立革命委員會，清理階級隊伍，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總之是要建立起來一個新政權。林彪說：

這場上層建築領域中的大革命，同一切革命一樣，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是領導權掌握在哪個階級手裡的問題。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除臺灣省外）成立了革命委員會，標誌著這個革命取得了偉大的、決定性的勝利。但是革命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需要繼續前進，「認真搞好鬥、批、改」，把上層建築領域中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毛主席指出：「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員，工廠裡的鬥、批、改，大體經歷這麼幾個階段。」我們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一個一個工廠，一個一個學校，一個一個公社，一個一個單位，深入細緻地、踏踏實實地、合理地完成這些任務。

即使在建立政權之後，階級鬥爭也還會繼續，無產階級還要和資產階級繼續鬥爭。這就是所謂的「繼續革命」的理論。老的資產階級消滅了，還會有新的資產階級產生。所以鬥爭是長期的，不會停止的。林彪說：

一切革命的同志必須清醒地看到：思想政治領域中的階級鬥爭是決不會停止的。決不因為我們奪了權，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就消失了。我們必須繼續高舉革命大批判的旗幟，用毛澤東思想批判資產階級，批判

修正主義，批判各種違反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右的或極「左」的錯誤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批判「多中心即無中心論」。我們要繼續把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搞的那一套買辦洋奴哲學、爬行主義批倒批臭，把毛主席「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在廣大幹部和群眾中牢固地確立起來，保證我們的事業繼續沿著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前進。

那麼用什麼辦法來進行文革以及建立革命委員會之後的繼續革命呢？林彪在中共九大的政治報告中說：

正如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次談話中指出的那樣：「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現在，我們找到了這種形式，它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有發動億萬群眾，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才能把混入黨內的叛徒、特務、走資派揭露出來，粉碎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

這就是放手發動億萬群眾搞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首先發動的是大中學校的紅衛兵，然後是工人、農民與解放軍。而且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今後每隔七、八年就要再來一次。¹⁴

上面林彪所描述的文革的起源、方法與過程，既代表了毛澤東的思路，的確也正是平定文革發展的歷程。我們的章節安排，以平定文革發展

¹⁴ 關於毛的這個說法，見許成鋼，「我的文革十年」，載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主辦的民間歷史網，<http://mjls.h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1304>，上網日期 2015 年 10 月 17 日。

的歷程為線索。在書中，讀者可以看到文革的思想動員、組織動員、對紅衛兵的「鍛煉」、「訓練」和「磨練」、鬥走資派、平定的兩次奪權、兩派在奪權過程中的鬥爭包括武鬥、大聯合與建立革命委員會，以及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理三種人等鞏固革命政權的措施。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有組織、有計劃地摧毀政權然後再建立政權、鞏固政權的過程。當然這個過程並不順利，這也是在毛澤東的預料之中的，正如林彪所說的那樣，「思想政治領域中的階級鬥爭是決不會停止的」，走資派還在走，所以需要繼續革命。這個鬥爭「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

平定文革的歷程一方面從經驗上似乎證明了毛澤東對文革有個總體的規劃、計畫和策略，並且一直在不遺餘力地推行他的計畫，包括只有鄧小平承諾永不翻案才會重新啟用他。另一方面，平定文革的實際運行也說明毛澤東「用兵」並不是「真如神」。他應該沒有預料到全國各地的造反派都分成了兩派，並且似乎都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也許還真「有根本的厲害衝突」。正如我們下面要討論的，在平定乃至整個山西，由全國勞模陳永貴（大寨大隊所在的昔陽縣是平定的鄰縣）支持的一派和解放軍支持的另一派之間所發生的政治鬥爭也無法平息。對鄧小平的啟用，他也是後來才意識到，「永不翻案，靠不住啊」。當然他應該更沒有想到，自己的得力助手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在他去世後不到一個月，就被抓捕並被關在秦城監獄了。他所設想的自己死後資本主義復辟時，左派會打著他的旗號起來造反，也沒有兌現。儘管左派的確在打著他的旗號批判資本主義，但是批判和造反畢竟是兩回事。

另外林彪所說的發動群眾自下而上揭發我們的陰暗面的方式，其實在反右的時候已經試過了，而且是不成功的。那麼為什麼林彪還要說現在剛剛找到這種方式？毛澤東難道是從大鳴大放中得到什麼啟示，並且認為自己有信心這次能夠成功嗎？抑或他認為自己能夠控制運動的走向，不會像

反右那樣，引火上身？於是毛澤東或許也在走一步看一步，看步行步，他或許認為只要有解放軍的支持，事情就會朝著自己所設想的方向走。

資本主義似乎復辟了，左派有很多意見，習近平也在力挽狂瀾，試圖保住紅色江山萬萬年。但是要在政治、經濟、社會問題上完全走「老路」，可能性也不是太大了，儘管我們還要拭目以待。總之，毛預見到了資本主義復辟，但是他並沒有想到左派幾乎沒有力量完全扭轉乾坤。習近平似乎是他們的唯一希望，但是讓習近平完全走毛的路，恐怕也有困難。

我們還是回到平定文革的經歷和毛澤東的計畫上來。我們在第一章首先介紹了平定簡史，討論了在文革前平定的發展以及各種政治運動。這些運動應該說是為文革奠定了基礎。然後在第二章我們介紹了平定學毛選、學雷鋒、王傑等英雄模範，批「黑幫」等運動。我們可以把這些運動看作文革的思想動員。我們在第三章介紹了平定紅衛兵的興起，這是文革的組織動員。第四章介紹破四舊、立四新、批鬥牛鬼蛇神，這實際上一次「練兵」運動，因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四舊、牛鬼蛇神，是需要清理的，但不是重點。所以這些文革早期的運動或許是起到了一個毛澤東所講的「亂了敵人，鍛煉了自己」的目的。第五章介紹紅衛兵的長征，我們可以把這個運動看作是對紅衛兵的培訓與磨練。他們到各地去學習革命經驗，很多人步行到延安等革命聖地去緬懷中共的革命業績。最終的目的是我們在第六章講的鬥走資派和第七、第八、第九章講的奪權。由於陳永貴所支持的紅總站與解放軍所支持的兵团兩派相持不下，奪權以及建立新的政權就顯得比毛澤東想像得還要複雜得多。

原來毛澤東想像上述過程包括後面的建立和鞏固革命委員會三年就可以結束，但是文革還是搞了十年。或者像全山西包括平定的情況一樣，時

間更長。¹⁵這說明毛澤東儘管有個大的設想，但也是在看步行步。於是有了書中的第十章、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所講的武鬥初起、武鬥升級以及武鬥傷人、死人的嚴重後果。正如我們在第十三章所描述的，在解放軍的強壓下，兩派終於可以大聯合、建立革命委員會了。但是又如我們在第十四章和第十五章所描述的，之後在鞏固革命成果的過程中，也就是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理三種人的過程中，在學大寨運動中，人們看到的仍然是兩派鬥爭，清理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內奸、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等九種人，而且這個時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遠遠超過了武鬥時期。革命的隊伍一定要純而又純，階級鬥爭要進行，而且永遠不會到底，我們要繼續革命。這也正是我們在最後一章，即第十六章所討論的階級鬥爭的邏輯。階級鬥爭看來還是不能停止，還要繼續搞下去。這和毛澤東的設想是一致的。一切都在按毛澤東的計畫進行，但是一切似乎又飄忽不定。正如 Hong Yung Lee 所指出的，群眾被發動起來之後，運動就會以自己的邏輯、由自身產生的動力來運行。¹⁶

15 毛澤東在 1967 年 7 月 13 日召見林彪、周恩來、中央文革小組等人時宣布文革一年（1966 年）開張、二年（1967 年）看眉目，定下基礎，第三年（1968 年）結束。之前，他也說過半年結束、一年結束的話。這正好也應了他自己的話：階級鬥爭是不依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也能自圓其說。見胡鞍鋼，《毛澤東與文革》，香港：大風出版社，2008 年，第 257 頁。關於文革分期問題，本書採取十年文革的看法，至於山西在文革正式結束後仍然在搞文革式階級鬥爭，是文革思維的繼續的問題，也可以說山西還在搞文革，正如當今的中國文革思維仍然在主導著很多人的思維方式一樣。我們常說某某在搞文革。但這畢竟不是文革。所以文革還是應該以毛正式發動文革的 1966 年算起到毛去世為止。見周倫佐「觀察文革歷史的五種觀念視鏡及其他：讀《文革中的山西》前言隨感」，載於石名嵒博客 <http://shimg88888.blogchina.com/2615387.html>，上網日期 2015 年 10 月 17 日。石名嵒等認為山西的文革延續了十二、三年。在基本分期問題上，我們和周倫佐的觀點也即通常的十年文革觀點相同，儘管山西的情況可能確實比較特殊。

16 Hong Yung Lee,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第 1 頁。

毛後的中國共產黨以及國內外學者對文革起源的評價

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11屆中央委員會第6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全面否定了文革。如前所述，決議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決議所說的錯誤發動，是指毛澤東對形勢的錯誤估計。《決議》說，毛澤東認為：

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裡。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鬥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後還要進行多次。

這也正是前述林彪講話的實質。決議所說的反革命集團是所謂的「林彪反革命集團」和「江青反革命集團」，後者即「四人幫」——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好像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人都沒有責任。儘管毛澤東犯了錯誤，但他仍然是犯了錯誤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而這兩個反革命集團才是壞人，毛澤東被他們利用了。

但是，國內外的文革研究者認為問題並不是那樣簡單。換句話說，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確有路線之爭，就像林彪所說的那樣，儘管分歧並不

是像他們所說得那麼誇張。比如劉少奇等認為在大躍進失敗之後國民經濟的困難時期，的確應該發展一些私人經濟，如自留地、自由市場、包產到戶等，對其他一些社會主義和窮國家要減少援助，但是毛澤東認為這是發展資本主義，削弱中國共產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領導地位。在斯大林死後，毛澤東認為自己是可以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的。毛澤東也的確認為劉少奇控制了從中央到地方的領導權，多數幹部和劉的想法、做法一致，毛澤東有一種大權旁落的危機感。再加上看到蘇聯的赫魯雪夫在斯大林死後批判、清算斯大林的情況，毛也擔心在自己身後遭到劉少奇等人的批判與清算，所以意識形態、政策分歧和權力鬥爭交織在一起，導致他下決心搞文化大革命，將那些反對自己路線的人、可能在身後和自己算帳的人剪除。¹⁷而周恩來、林彪、江青等人則是毛的得力助手。所謂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利用毛的錯誤的說辭是無法解釋文革的。

在毛澤東的眼裡，的確有一個不同於劉少奇所想像的世界，這是一個他所認為的社會主義公有制、集體所有制的世界，而不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世界。從舊社會遺留下來以及新社會所產生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和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包括走資派，都在掃蕩之列。在他眼裡，到處都是階級鬥爭，到處都是你死我活的鬥爭。這就是我們說的文革思維。文化大革命在他看來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在這個理想的世界裡，毛澤東在 1966 年 5 月 7 日的指示中說（即「五七指示」）：¹⁸

17 見徐友漁，「文革研究之一瞥：歷史、現狀和方法」，華新民，「關於『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革』的研究述評」，載於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第 1 到 3 頁，第 173 到 185 頁，香港：田園書屋，2007 年出版。關於毛、劉的政策分歧，見麥克法夸爾所著三卷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香港：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2012 年出版。

18 余汝信，「『五七指示』：毛的理想社會模式及其破產」，載於《華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館通訊（758）》，第 926 期，2014 年 1 月 7 日出版。

〔軍隊〕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但要調配適當……。

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工農兵學商，除了做好自己本行的工作外，還要學習其他，尤其是都要批判資產階級。根據毛澤東烏托邦的設想，「我國七億人民就都會成為舊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設者和保衛者。他們拿起錘子就能做工，拿起鋤頭犁耙就能種田，拿起槍桿子就能打敵人，拿起筆桿子就能寫文章」。在此之前的 1958 年，他就津津樂道於將工農商學兵結合在一起的人民公社，似乎中國馬上就要進入共產主義了。這是一個沒有社會分工的社會、逐步消滅商品的社會、平均主義的社會。¹⁹ 幾年之後人民公社失敗了，共產主義社會仍未建成，毛便認為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作祟，於是要求搞文革。這個共產主義的烏托邦是毛為中國設計的社會模式，而文革則是這個龐大的社會工程中最重要的一環。這個烏托邦為什麼破產，則是我們必須思索的問題。

順著毛澤東的思路走，平定文革在其發生和發展的過程中，也的確掀

19 同上。

出了很多大大小小的階級敵人，五類分子，甚至九類分子。但是我們這些在基層的人們，除了個別人，如縣委領導之外，多數並不清楚有什麼路線鬥爭。一般人應該說連上層權力鬥爭的概念都沒有。只是毛澤東怎麼說，我們就怎麼信了。也正是這種「盲從」，使得毛澤東在林彪、周恩來、江青等人的幫助下，才能將群眾，首先是紅衛兵，發動起來。這正是我們下一節要討論的問題。

但是，在我們的被訪者中，也有一些人對毛的那個思路是持懷疑態度的。郝鼎丞原來是縣裡的一般幹部，也被安排為二三線人物，即如果文革第一線人物如縣委書記、縣長被衝擊後不能工作的話，這些人要去頂起來。他不認為有什麼走資派：

在「四清」時，我接觸了不少領導幹部，我看到，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是努力在按照黨的方針政策認真地為人民工作辦事，沒有一點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跡象。我想不透為什麼在「文革」中他們都受到衝擊，被打成走資派，沒完沒了地請罪，沒完沒了地被批鬥，沒完沒了地站隊。這也就是我在「文革」中被打成保皇派、被挖了二三線，沒有參加到兩派的任何一個群眾組織中的原因之一。

郝鼎丞談到了「文革」中他和縣長朱永的一次見面。朱永談到毛發動「文革」的動機時說，這是「毛澤東鞏固自己在中央的地位的方法。因為毛反覆講重上井岡山、黨內有派黨外有黨等等問題。說明中央已經有分裂的跡象」。朱永顯然是很有判斷力的。權力鬥爭是我們上面提到過的文革的起源之一。朱永作為一個縣一級的領導幹部，他的認知原始素材相對多一些，認知水準也高許多。政治敏感性強，這與他直接參與中央和省的各種會議有很大關係。

另一位幹部張啟傑則提到了文革的另一個起源，即路線鬥爭。他認為：

我相信毛主席，亂有它的道理，中央可能有分歧。一方面是毛主席的社會主義道路，另一方面是劉少奇的「三自一包」的資本主義。但是我們下面這些人，不管哪一派都是迷迷糊糊。

這一點和翟治璧的看法是一樣的，即認為毛劉之爭的確是路線之爭：

「文革」的前奏是「四清」運動，「四清」的指導文件「前十條」、「後十條」和「二十三條」，直至「文革」的「十六條」，都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以說毛澤東是站在國家和人民利益高度來提出搞「文革」的……。但是，什麼樣的問題就構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了，各個文件都不具體明確，這就給以後運動的發展帶來了很大隱患。

毛的文革思維方式對今天的啟發

其實，文革思維的表現之一就是罔顧事實。那就是大家誰都不要去問到底事實是什麼，到底有沒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沒有階級敵人。只要毛主席說有，那就是有。我們就順著毛主席說的到處去抓就是了。從平定文革的歷史來看，所有的冤假錯案，都是因為當時的人們根據階級鬥爭的邏輯、罔顧事實而主動製造出來的。

的確，文革思維的第二個特點是只有階級鬥爭的邏輯，沒有其他邏輯。幾十年來一直在輔助毛澤東幹革命的劉少奇、鄧小平們，尤其是那些

省、市、縣、公社、村的第一把手，怎麼可能在中共中央一把手毛澤東同志的眼皮底下，一夜之間反毛道而行之，全部變成了走資派？如果真是這樣的話，自己怎麼可能仍然大權在握？這既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邏輯。這個階級鬥爭的邏輯把人看作非敵即友、非黑即白，沒有中間地帶。我們在書中還會看到更多的在這種階級鬥爭思維方式指導下發生的既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邏輯的事情。

文革思維的第三個特點是鬥爭的方式只能是你死我活。對敵人要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不留情面。其實路線鬥爭以及權力鬥爭是政治生活中的常態。解決這些問題的唯一的辦法是民主。用你死我活的方法將一派壓下去，問題並沒有解決。按說在經歷了文革之後幾十年來，人們對這個問題應該有更好的理解。但是事實不是這樣。任何時候都有路線鬥爭和權力鬥爭。要求各級領導必須和中央保持「絕對一致」，不能「妄議中央」，就是在抹殺不同意見，抹殺人的創造性與能動性。和毛時代一樣，這只會造成更多的矛盾、更大的問題、更嚴重的不穩定。保持一個思想、一個領袖、一個政黨的格局，否則要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是文革思維的表現之三，需要深刻反省。

所以，罔顧事實、只有階級鬥爭的邏輯沒有其他邏輯、壓制不同意見並將有不同意見的人當作階級敵人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就是文革思維。這應該是我們從文革中學到的教訓之一，這是文革對我們的啟示之一。

於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從文化革命開始到現在已經 50 年了，這種階級鬥爭的思維是否還在影響著人們的言行，尤其是決策者的言行。資本主義是否真的像毛澤東預料的那樣復辟了，左派是否能夠在某種程度上推翻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文化革命是否還沒有在真正意義上結束，或者說即使形式上結束了，今後還有可能再搞第二次毛那樣的文革？

抑或習近平能夠在資本主義和毛式社會主義之間找到某種平衡，但是這可能並不是建立在憲政與普世價值基礎上的平衡，而是利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混合經濟，鞏固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儘管這個共產黨和早期那個力圖建立公平、公正、民主、自由的社會的共產黨似乎已經是風馬牛不相及了。或者說中國政治的發展，儘管有曲折，但是最終會融入世界發展的民主大勢，順著普世價值的思路，建立起來一個憲政國家。這些其實都還是未知數。但是無論如何，文革給我們的啟示，毛澤東的遺產在當今社會的作用，還是給我們帶來了很多的思考，對中國今後往哪裡去，有很多的啟發。可怕的是文革思維非但沒有破產，而且還在指導著當政者與很多普通老百姓的行為。

總之，對平定縣基層文革的研究，一方面讓我們看到毛澤東關於文革的路線鬥爭和權力鬥爭的思路如何在基層被貫徹了下來，而且相當徹底；另外一方面平定文革也讓我們看到基層文革在實際運行過程中的一些獨特性、複雜性與盲目性，如前述兩次奪權、大聯合的困難、陳永貴在平定文革中扮演的角色等等。畢竟，縣級文革不像北京、上海那樣會直接得到中央文革小組的指導，所以在很多情況下是根據中央對全國乃至山西文革的指示，然後自己再摸著石頭過河的。但是，所有這些，都是在上述文革思維的指導下進行的。這種文革思維在全國都是相同的。而且這種文革思維在當今的中國仍然在指導著很多人的思想與行為。下面我們看文革的第二個啟示。

二、紅衛兵是怎樣被發動起來的？他們為什麼會如此聽話？紅衛兵運動對今天的社會運動有什麼啟發？

發動紅衛兵相對而言是比較容易的，因為他們在建國以後的十多年來，已經被培養為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了。那麼這個接班人是如何培養的

呢？楊國斌在自己對紅衛兵的研究中列舉了文革前十七年的革命化教育。他說「教育的內容可分為三大類，即革命傳統教育、接班人教育和階級鬥爭教育」。他引述了一本英文著作對小學教科書的研究。該研究發現：

小學語文課本的政治主題，以出現的頻率來計算，依次為：(1) 對新社會的忠誠，(2) 新社會的優越性，(3) 毛主席的偉大，(4) 國民黨的罪惡，(5) 中國人民得到解放，(6) 人民曾經受過壓迫，(7) 警惕特務和壞分子，(8) 热愛人民，(9) 热愛祖國，(10) 舊社會的黑暗，等等。歸納起來，這些內容就是培養學生對新政權和領導人的認同，及對國民黨和舊中國的仇恨。²⁰

這正是我們上面所描述的文革階級鬥爭的思維方式。我們在書中的第二章，也介紹了 1965 年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英雄人物的熱潮，以及時刻警惕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時刻準備和階級敵人作鬥爭等等教育。我們這些過來人在文革前在腦子裡就已經被灌滿了階級鬥爭的思想。

楊國斌認為 1960 年代初期的革命接班人教育和階級教育是突出的話題，而且是非常有效的教育。正如我們在書中指出的，很多學生們也都認為資本主義隨時可能復辟，我們會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於是，當時的人們心中只有一個思想，就是毛澤東思想，階級鬥爭的思想，沒有別的思想。多數人們不知道如何判斷是非，而是單純以毛澤東的是非為是非。²¹

20 楊國斌，「紅衛兵一代的認同轉變」，載於上引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與集體記憶》，第 388 到 389 頁。所引英文著作為 Charles P. Ridley, Paul H.B. Godwin 和 Dennis J. Doolin 所著 *The Making of a Model Citizen in Communist China* (Stanford, Calif: The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1).

21 關於文革前的學校教育，也見卜偉華（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六卷，《「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出版，2008 年，第 141-44 頁。

於是，在毛澤東說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就睡在他的身邊，全國各地充滿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號召大家起來造反的時候，那種同仇敵愾、誓死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的決心就很容易理解了。正如 1966 年清華附中成立的第一個紅衛兵組織的誓詞所說：²²

我們是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黨中央毛主席是我們的靠山，解放全人類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毛澤東思想是我們一切行動的最高指示。我們宣誓：為保衛黨中央，為保衛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我們堅決灑盡最後一滴血！

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毛主席是我們最高的紅司令。在這裡，面對著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面對著我們敬愛的黨，面對著全中國和全世界的革命人民，我們宣誓，用我們革命紅衛兵的榮譽壯嚴宣誓：我們保證永遠忠於無產階級！永遠忠於毛主席！永遠忠於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我們要把全部精力和整個生命獻給人類最壯麗的事業——共產主義！對於人民，我們要無限忠誠！對敵人，我們要刻骨仇恨！生，為黨的事業而奮鬥！死，為人民的利益而獻身！「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我們絕對保證站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我們也要用鮮血和生命誓死保衛毛主席！毛主席，我們無限忠於您！堅決跟著您老人家，誓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22 下面第一段話來自《毛澤東正值神州有事時》，顧保孜（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 年 11 月第一版。轉引自《騰訊網》，<http://topic.qq.com/a/20140205/004670.htm>，上網時間：2015 年 7 月 29 日。第二段話來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第三版。兩個誓詞不同，似乎第一個是其他紅衛兵的誓詞，第二個才是清華紅衛兵誓詞。但是意義是一樣的。只是第二個誓詞殺氣更濃一些，包括了對敵人要有「刻骨仇恨」一句話。

忠於毛主席、忠於黨、仇恨敵人，這就是當時的紅衛兵們的真實思想，也是平定的紅衛兵們的真實思想。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我們在後面幾章所敘述的破四舊、立四新、鬥爭牛鬼蛇神、鬥走資派、兩派之間的鬥爭，甚至文革後期的清理階級隊伍等等，都是可以理解的了。大家都在誓死捍衛毛澤東思想、捍衛社會主義的紅色江山。何錯之有呢？不光沒有錯，還要和階級敵人拼一個你死我活，流盡最後一滴血。

當然上面這些可以看成是紅衛兵運動的思想基礎。我們在第二章用一章的篇幅講述了平定縣文革的思想動員。這裡不光包括紅衛兵的思想動員，而是對所有工農商學兵的動員，以便讓大家牢固地樹立起階級鬥爭的觀念。

關於紅衛兵的興起，學者們也作了種種分析，其中一個觀點，比如 Anita Chan 的觀點，就是紅衛兵之所以能夠發動起來是因為之前中共所培養起來的對毛的個人崇拜以及階級鬥爭的觀念。她分析了從小學到中學的教育，以及這個政治社會化對紅衛兵積極參加文革的影響。²³ 這也是我們上面所討論的楊國斌他們的觀點，這一點是有相當解釋力的。平定文革的發生和發展也可以證明這一點，正如我們在第二章所論述的文革的思想動員那樣。

還有一個觀點，即 Lynn White 的觀點，和上面的觀點相輔相成。他認為紅衛兵之所以能夠發動起來是因為中共在 1966 年之前就已經建立起來一套完備的管理政策和系統（administrative policies），比如誰是好人（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誰是壞人（地富反壞右），涇渭分明。大家都在某個單位工作、學習，都要接受黨的領導，上下級關係明確。1966 年

23 見 Anita Chan,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5).

之前的各種運動，也使得人們明白只有老老實實聽黨的話，跟黨走，才有出路，否則是死路一條（其實現在又未嘗不是如此，當然程度已經非常不同，不跟黨走不至於死）。²⁴ 用王蒙的話來說：²⁵

經過「反右」鬥爭的慘痛教訓，舉國上下，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明白，咱們這裡是不興反對領導的，關鍵在於聽領導的話，對領導要言聽計從，緊跟照辦。誰的胳膊擰得過大腿？哪一個個人抗得了組織？離開了領導，你活下去都很困難，一切生活資料，都是有領導地生產與分配的。你有什麼撇脫離領導？什麼叫向隅而泣的可憐蟲？背離了領導，被組織所拋棄，被班主任宣布「誰也不許與他玩」的孩子，就只能向隅而泣，死了也不過是臭一塊地。「一塊地」的說法來自「反右」中積極分子的發言，這樣的透徹可以叫做刺刀見紅。問題是咱們這裡，請問哪一個昏了心的膽敢向隅而泣？大家都歡欣鼓舞，而你小子向隅而泣，你是不是對人民進行新一輪的進攻呢？

的確，人們連「向隅而泣」的權利都沒有。像林昭、顧准、遇羅克、張志新那樣地捨身求法的人少之又少。所以說這個行政管理體系和政策的觀點是有道理的。這其實是文革的組織基礎。

郝志東在一篇文章中也指出文革的路徑依賴。²⁶ 換句話說，從思想

24 見前引 Lynn White, *Policies of Chaos*, 第 8-18 頁。Lynn White 隨後對其他觀點也做了討論。關於這些觀點的討論，也見魏昂德, *Fractured Rebellion*. 這種非黑即白、敵我分明的思維方式，也是 Tang Tsou 所說的毛澤東所慣用的階級鬥爭、你死我活的兩極化思維。見 Tang Tso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第 20 頁。

25 王蒙，「毛澤東為什麼非搞『文革』不可？」《人民網》文史頻道，<http://history.people.com.cn/n/2012/0720/c198865-18559404-1.html>，2012 年 7 月 20 日，來源於王蒙（著）《中國天機》，安徽文藝出版社，2012 年。

26 郝志東，《兩岸四地政治與文化剖析》第 7 章，「論毛、劉、周、等的思維方式及文革

上、組織上都有個路徑依賴的問題。他指出從二十世紀一、二〇年代的AB團到四〇年代的整風，黨內鬥爭的方式就已經形成。另外周、劉、鄧對毛的個人崇拜也是從1949年之前就逐步建立了起來，使得他們自己在後來也唯唯諾諾，失去了反抗能力。毛的領導就是黨的領導。毛就代表黨。毛就是黨。反毛就是反黨。反黨也是反毛。

我們在第三章討論平定紅衛兵運動的興起時，讀者就會發現所謂「官辦紅衛兵」，就是在黨組織的領導下搞起來的，而參加者就是紅五類（出身為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其他勞動者的人），尤其是黨團積極分子。正如我們在第二章和第三章所指出的，文革剛開始時批判彭、羅、陸、楊、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破四舊立四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運動都是省委、縣委及各單位的黨總支、黨支部所組織、領導並發動起來的。人們之所以起來搞文革，是在積極回應黨的號召。而且大家也知道，如果不響應黨的號召起來行動的話，可能會有不良的後果。如果沒有這個組織基礎，紅衛兵是動員不起來的。

有了思想基礎，有了組織基礎，接下來就是組織動員了。這正是魏昂德（Andrew Walder）所處理的問題，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第三個觀點。他在分析造反派為什麼分為兩派時，指出這和他們的政治互動是有關係的，與當時的情景、他們對當時情景的解讀是有關係的，並不是以出身劃分派別。²⁷但是，他關於分派的觀點，也可以用到紅衛兵的發動這個問題上來，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組織動員。的確，平定縣紅衛兵的發動，是和北京

的起源：從胡鞍鋼的《毛澤東與文革》談起」，澳門大學出版，2014年。本文原文為英文，發表於 *H-Diplo Roundtable Reviews* (美國), Vol. XI, No. 43 (2010), pp. 6-13。中譯本發表於《思想》雜誌（臺灣）2011年總第17期；應雜誌編者要求內容有所增加，個別地方行文有所調整。本文由王欣翻譯，郝志東校對、改寫。

27 見前引 Andrew Walder, *Fractured Rebellion*, 第13到14頁。也見 Andrew Walder, "Ambiguity and Choice in Political Movements: The Origins of Beijing Red Guard Fraction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2(3)710-50, Nov. 2006.

到山西、太原到平定來串聯的學生有關的。我們在第三章討論了當時平定縣從上到下都感到不知所措，是在來串聯的外地學生的鼓動下，大家才逐漸動了起來。這一點類似北京紅衛兵「三下江南」到上海「點火」，鼓動當地學生向市委開炮。²⁸之後的大串聯，就更是政治互動的進一步深化，是組織動員的一部分，也導致文化革命的進一步深化。不過，正如我們在第九章討論兩派成員的特點時所指出的，儘管出身不是劃分派別的唯一因素，和兵團的人相比，平定總站一派中的確有較多的人是有在原單位受壓的經歷，是與主流社會比較有離心力的一些人。

蘇楊在他關於集體屠殺的研究中，回應了魏昂德的觀點，提出了一個「社區互動模式」(a community model)，也即該社區，比如一個村莊，通過一個政治互動的過程，確定了建立在意識形態基礎上的敵人、朋友、加害者、受害者與旁觀者。這是一個發動群眾的過程，也是一個解除道德與法律約束的過程。這樣一個過程會直接影響到殺人與不殺人的決定，殺什麼人等等決定。²⁹

有了上面這三個觀點所討論的這三個條件：思想基礎、組織基礎、政治互動或政治動員，文革的發動就水到渠成了。當然這三點又是建立在兩項重要的歷史資源上面的，即在國共內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中共所積累起來的民心和幾千年專制主義的文化傳統。³⁰這些都是全國文革包括平定文革發生和發展的機理，這一點會體現在我們後面各章的敘述之中。

而文革發動的這三個條件，又何嘗不是任何社會運動發生和發展的條

28 見前引 Perry and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第 9 到 11 頁。

29 見前引，Yang Su, *Collective Killings in Rural China*，第 11 到 31 頁。也見上引蘇楊，「文革中的大屠殺」。

30 沈敏特，「什麼是『永不變質』的『質』？」，《共識網》，2015 年 7 月 24 日。

件？當前中國的民主運動，如果要想成功，必須有自己的思想基礎，如普世價值的理念，並創造性地轉化傳統文化，使其和現代文化相結合。而且這種現代化的思想又必須深植人心，還不能使用暴力的方法達到這個目的，這是有很大難度的。民主運動還需要有自己的組織基礎，但是不能像共產主義革命那樣好人和壞人涇渭分明、需要建立自己的組織但是又必須民主選舉自己的領導人、需要有激勵機制但是又不能使用暴力。民主運動要組織並動員別人來加入自己的事業，這就需要言論的自由與結社的自由，但是這些事情在中國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又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民主運動，何其難也！

而當權者如果要遏制社會運動，又何嘗不是從這三個方面下手：鞏固統治階級的思想基礎（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遏制異端思維（比如憲政、普世價值）；鞏固組織基礎（除了大中小學、國營企業之外，在私營企業甚至公民社會組織內部都要設立共產黨的組織）、將異議人士繩之以「法」並警告黨內黨外的各類人等不要不按「規矩」辦事；阻止政治互動與組織動員，嚴密控制人們在思想上的交流（這一點在網際網路時代有一定難度）、不讓人們相互「串聯」，更不能成立任何政治組織，尤其是不能成立全國性的組織。

所以從文革的經驗與教訓來看今天的執政黨和民主運動之間的博弈，前者由於有公權力，顯然處在優勢地位；而後者作為挑戰方，再加上民主本身的理念及其對實踐者的要求，顯然處於劣勢。但是，對文革中群眾運動的發生和發展的研究，對執政黨和對民主運動來說，經驗和教訓都是一樣的，只不過是角度不同而已。在這個博弈中，執政黨能否做出些許讓步，和公民社會組織一起，尋找中間道路，找到中國發展的方向與路徑，

我們還不得而知。³¹ 這是文革對我們今天的啟示之二。

對平定這個基層文革的研究，既讓我們意識到共產黨在基層統治的牢固性，使得紅衛兵運動比較容易地發動了起來，但是也讓我們看到基層的政治動員，由於地域的局限性，畢竟需要借助外力。對今天的政治和社會發展來說，也是同樣的道理。只不過在網際網路發達的今天，所謂政治動員，或許不太需要文革那樣的大串聯，只要開放網際網路就可以了。

三、文革之中為什麼會有兩派之鬥？這種派別之爭有什麼意義？

文革中的兩派鬥爭，其實也是社會運動中的正常現象，關鍵是政治與社會制度是否能夠接納不同意見，並讓代表不同意見的不同組織良性競爭，在約定的政治規則下來運行。這一點和前面的文革思維有很大關係。這是文革對我們的啟示之三。

關於文革中的兩派，通常一派被認為是造反派，另外一派被認為是保守派。就平定的文革來說，我們在本書的第三章介紹了官辦紅衛兵的興起，在之後的幾章裡，敘述了官辦紅衛兵的解體、其他民間組織的誕生，以及這些民間組織如何在整個山西省文革發展形勢下，分為兩派：一派是以平定縣的鄰居昔陽縣大寨大隊的黨支部書記、後來成為國務院副總理的全國勞模陳永貴為首的造反派，即紅總站派；另外一派以擁護解放軍為主要訴求的保守派，即兵團派。

在文革的研究中，始終有一些人認為有兩個文革。王希哲、楊小凱、鄭義、劉國凱、王紹光等人都支持社會衝突論。楊小凱認為文革中積極造反的人是對共產黨不滿的人。但是徐友漁認為這些人並不是對共產黨不

31 關於執政黨可以讓步的空間，見郝志東（編），《遙望星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困境與出路》，即將由思行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出版。

滿，而是對當地官僚的不滿，他們只反貪官、不反皇帝。³²至少在平定文革中，這兩個文革並不清晰。我們發現，即使兩派在某些具體問題上有不同看法，比如在解放哪個領導幹部問題上，但是他們都是毛主席忠實的衛兵，都是毛主席、黨中央的保皇派。在第十五章，我們討論了岳增壽的冤案，但是他只不過是對學大寨的一些具體做法有看法，對陳永貴有所批評而已。是只反「貪官」而不反皇帝的。

又比如，我們在鬥走資派一章（第六章）指出，平定中學的造反派對黨支部批判牛鬼蛇神有意見，進而焚燒了黨支部關於牛鬼蛇神的黑材料，但是他們那是認為黨支部在轉移鬥走資派的大方向。平定縣西郊村的農民也批鬥了走資派，認為他們在執政時有多吃多占的現象，對當時一件整人致死的案子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那也都是符合毛主席對文化大革命的要求的，不是自己起來造共產黨的反，是響應毛主席號召做事的。

平定分派在開始時也的確是由於一些學生不滿官辦紅衛兵的精英路線，認為他們只鬥牛鬼蛇神不鬥走資派，是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於是他們組織起來自己的紅衛兵戰鬥隊。有幾位被訪者都談到造反派中階級成分不好的、受壓的人多，有人加入紅總站是為了反抗、報復原來整他們或者他們的父輩的黨政幹部。他們是受壓者在反抗，在和主流社會相對抗，這無疑也是造反派形成的原因之一。

但是總體來看，儘管兩派的社會經歷有些不同，出身的分野其實並不十分明顯。後來儘管兩派在解放幹部、建立政權上有不同看法，但是在鬥走資派問題已經沒有了分歧。兵團一派也沒有說不要鬥走資派，但是兵團一派的確認為鬥走資派不應該太過暴力。在解放誰的問題上有分歧，但不

32 見前述徐友漁文章，「文革研究之一瞥：歷史、現狀和方法」；劉國凱，「論人民文革」，載於前引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

是什麼有意義的分歧。他們的分歧主要是在對待大寨與解放軍的態度上面：總站支持大寨，不能有一點批判；兵團支持解放軍，否則是反軍小丑。陳永貴是造反派，所以總站也是造反派。而解放軍代表著秩序，所以兵團便成了保守派。但是這似乎也不是什麼根本的厲害衝突。也很難說他們在搞另外一個文革。從武鬥的原因等等方面，也看不出來他們在搞另外一個反抗暴政的文革。雙方都有暴力行為，都是文革思維。

那麼，既然兩派沒有根本的厲害衝突，都是毛主席、黨中央的保皇派，為什麼兩派聯合不起來？為什麼以拳頭和兵器相見？兩派之間為什麼一定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毛澤東所講的用巴黎公社的方式選舉領導人，為什麼從來沒有實行？這就又強迫我們回到之前所討論的階級鬥爭的思維方式。哪一派都沒有檢討自己。難道大寨、陳永貴沒有問題嗎？難道全國就只能學大寨嗎？其他典型，比如平定縣的牛角溝村，也是平定縣自己樹立起來的模範村，是否也可以學習？解放軍沒有問題嗎？但是，人們並沒有這樣去質疑對錯，而是單純地認為只要說大寨、說解放軍不好，就是反大寨、反軍，就是反革命。這正是階級鬥爭的簡單思維方式。正如讀者將在第十三、十四、十五與十六章讀到的，解放軍主導的革委會成立後，在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運動中，對造反派及其他所謂出身有問題的人持續整肅，導致不少人自殺身亡；之後從昔陽來的幹部借清理三種人的機會，不光整肅了對武鬥死人有責任的兵團領導，就是將對大寨或者昔陽有所批評或者略有微詞的人都大力批判，有的甚至判了刑。這些都是以階級鬥爭思維的方式來進行的。是雙方都有責任的。在文革思維這個問題上，雙方都不遑多讓的。

本書對於平定縣兩派的成立與分裂的敘述，也符合魏昂德對北京紅衛

兵的分析。³³ 即這種派別劃分不像通常社會運動理論中、或者對中國文化革命紅衛兵的緣起的分析中所說的是建立在社會利益、社會階層的區別上面，而是建立在因時因地而異的社會事件、社會過程之上的。比如對北京紅衛兵來說，對工作組的態度會使學生分派。對平定縣的紅衛兵來說，對大寨的態度、對解放軍的態度，會使學生分派。以此類推，在全國各地的城市和鄉村，兩派的形成，也一定與本地的特殊矛盾有關。但是一派比較保守，一派比較激進，倒是比較符合事實。

關於兩派鬥爭的現實意義，我們認為分派是有積極意義的。首先，人們對任何事情的看法都不可能完全相同，所以因為不同的看法而分為不同的派別，是正常現象，就如美國政治由兩派分為兩黨一樣。也正如毛澤東所說（至少被認為是毛澤東所說），「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保守和激進是正常人的正常分歧。

其次，這些組織是跨縣、跨市的全省性質的組織。除了共產黨與政協的其他黨派如此之外，1949 年之後的中國還沒有允許任何其他組織這樣做，而且是自下而上、上下聯手的草根群眾組織。這是當時分派的第二個積極意義。這正映照著當代中國公民社會的艱難。如果那個時候都允許跨地區（非跨省）組織，現在都不允許，那麼社會是進步了呢，還是退步了呢？³⁴

當然，問題的關鍵是兩派如何能夠實現良性競爭。在我們所描述的平

33 見前引魏昂德，*Fractured Rebellion*，第 250 到 262 頁。

34 文革開始時的 1966 年 11 月 8 日，北京曾經成立一個全國性的工人造反組織：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全紅總），絕大多數成員為臨時工、合同工。之後湖南、黑龍江等省成立了分團。要造合同工、臨時工制度的反，查封了勞動部、全國總工會。並得到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的支持。但是，1967 年 2 月 22 日，即被中共中央、國務院通告取消，各地的頭頭被捕，合同工、臨時工制度繼續。見前引卜偉華（著）《「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第 314-20 頁。

定文革中，良性競爭沒有可能。最後的結果是只有一派壓倒另外一派，社會才能恢復相對安定。這是我們即使在當前的社會都需要深刻思考的問題。如何對待不同意見？是否要按照文革思維，將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打成敵人，關在監獄裡才能達到社會穩定的目的？社會應該創建一個什麼樣的機制才能保證人們有表達不同意見而又不被打成敵人且關起來的自由？公民社會如何建立？政治體制如何改革？這些都是我們需要深刻反思的內容。這是文革給我們的第三個啟示，即如何看待群眾中甚至幹部中的政治組織、政治派別，包括所謂的老鄉會、同學會、戰友會。平定的基層文革也告訴我們，任何一個地方都可能有派別鬥爭，其派別鬥爭的特點和當地的具體矛盾有關，是需要用合適的辦法來容納並協調的，而不是單純靠壓制就能解決問題的。這就需要政治體制的改革。

四、文革為什麼會有暴力？如何理解文革中的暴力？這和今天政治和社會上的暴力有什麼關係？

文革給我們的啟示之四，是如何看待暴力問題。這是貫穿在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嚴重問題，中國也不例外。在第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看到的暴力已經減少了很多，但是仍然處在一個文明社會不應該允許的程度上。我們需要瞭解暴力的成因。而瞭解暴力的成因也即是瞭解文革的機理，因為文革是以暴力為特點的。

胡鞍鋼在《毛澤東與文革》一書中，引述了中央文獻研究室所提供的資料，說「在文化革命中，受到殘酷迫害的幹部和群眾有 70 萬人，被迫害致死的達 3.4 萬人。全國因冤假錯案收到誣陷、陷害、株連的達一億人以上」。³⁵但是其他人研究中的死亡數字為 210 萬（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³⁵ 前引胡鞍鋼，《毛澤東與文革》，第 319 頁。

到 773 萬（美國夏威夷大學的 R. J. Rummel 教授）。³⁶ 魏昂德根據 1500 個縣公開出版的縣誌推斷出只在清隊期間，全國受迫害人數為 3,600 萬人，被殺數字為 75 萬到 150 萬之間。³⁷ 蘇楊和魏昂德的另外一個對非正常死亡人數（包括武鬥被打死者約 23 萬 7 千人）的估計是 172 萬 8 千。³⁸ 僅在中國首都北京於 1966 年 8 月下旬到 9 月下旬的約 40 天內，紅衛兵抄家 33,695 戶，打死或自殺人數達 1,772 人。³⁹ 北京郊區大興縣在 1966 年 8 月 27 日到 9 月 1 日的 5 天內，共有 323 名「階級敵人」被殺，年齡從剛出生 38 天到 80 歲不等。⁴⁰

湖南道縣所在的零陵地區，1967 年被殺的就有 9,093 人。⁴¹ 殺人的手段包括：槍殺、刀殺、沉水、炸死、丟岩洞（包括廢棄的礦井）、活埋、棍棒打死（含鋤頭、鐵耙、扁擔）、繩勒、火燒等等（如將小孩摔死）。⁴² 有的是全家被殺。比如興橋鄉橋頭村的周文棟一家。周是轉業軍人，縣裡的一名教師，1957 年被打成右派，開除公職，回鄉務農。他當時和妻子、兒子在地裡幹活時被村裡人在生產隊隊長的帶領下投入一眼廢窖，再投入柴火燒死、熏死。後來突然想到他家還有一個 8 歲的女兒和 2 歲的弟弟，然後他們就將姐弟兩人誑出來，投到同一眼枯窖裡燒死熏死。晚上回去，村裡人把周家的東西能吃的當場吃掉，把牲畜殺了、糧食農具分了，名曰

36 何清漣，「序五：為了中國不再淪為修羅場」，載於前引譚合成（著）《西元 1967 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

37 見董國強，「革命？還是帝王政治的迴光返照？：Mao's Last Revolution 評介」，原載《當代中國研究》2009 年第 3 期，又載《文革博物館通訊》第 558 期，見 <http://www.difangwenge.org/read.php?tid=5246>。

38 Su Yang, *Collective Killings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第 37 到 38 頁。

39 上引胡鞍鋼，《毛澤東與文革》，第 177 頁。

40 蘇楊，「文革中的大屠殺：對湖北、廣東和廣西三省的研究」，載於前引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

41 上引譚合成（著），《西元 1967 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第 630 頁。

42 同上，第 48 頁。

「吃死人飯」，也是當地的風俗。⁴³

廣西省靈山縣 1968 年至 8 月 1 日，全縣鬥打、亂殺、逼死 3,220 人，全家殺絕的 529 戶。文革中全省死亡人數有名有姓有地址的 8.97 萬人，失蹤 2 萬餘人，無名無姓的死者 3 萬多人。而且也像湖南那樣，殺戮完後，到被害者家裡大吃大喝，並將東西搶劫一空。⁴⁴ 賓陽縣與 1968 年 7 月 26 日到 8 月 6 日 12 天裡，全縣被打死或迫害致死 3,681 人，全家殺絕 176 戶。殺人手段有槍殺、刀刺、繩勒、叉戳、棍打、水溺、石砸、活埋、活燒、挖眼、剖腹、碎屍、用牛拖死等等。⁴⁵

蘇楊對廣西、廣東、湖北三縣的縣誌做了詳細的研究。他發現廣西省 65 個縣中，66.2% 的縣發生過集體屠殺（指一次死亡人數為十人以上）、廣東 57 個縣中 49.1% 的縣發生過集體屠殺、湖北 65 個縣中 6.2% 的縣發生過集體屠殺。其中廣西省全州縣的縣誌記載的一次集體屠殺是這樣的：

1967 年 10 月 3 日，東山公社三江大隊，以民兵連長黃天輝為首，將該大隊地、富、分子及其子女 76 人，集體坑殺於蛇形黃瓜弄。……七月至十二月該公社成立了所謂「貧下中農法庭」。全縣槍殺 859 名四類分子（地、富、反、壞）及其子女。⁴⁶

一個縣死亡人數最多的為廣西 2,463 人，廣東為 2,600 人，湖北為 115 人。蘇楊發現在三省發生大屠殺的時間為 1967 年末到 1968 年，即革命委員會成立之前或之後不久。集體屠殺的發生地往往為縣級以下地區，通常

43 同上，第 422-423 頁。

44 宋永毅（序），《文革機密檔案：廣西報告》，香港明鏡出版社，2014 年，第 12 到 18 頁。

45 同上，第 298 頁。

46 上引，蘇楊，「文革中的大屠殺」，第 687 頁。

發生在公社或大隊，也就是國家控制力量最薄弱的地方。受害人最多為所謂的「四類分子」及其子女、階級敵人，也有少量的貧下中農、幹部、市民、工人、學生。施害者通常為民兵、群眾組織的成員，但是都有政府的人從中組織。施害者在多年後的訪談中說他們大多數人在殺人時是在執行政治任務，而且這類行動還常常會得到政治獎勵：

據廣西省政府公布的一份文件，在文革期間的廣西，有九千多名殺人者被吸收入黨；在文革初期「火線入黨」的兩萬人後來都殺過人。另有一萬七千名黨員對殺人負有這樣那樣的責任。⁴⁷

屠殺事件的發生，和地方政府鞏固權力有關。這和本書所描述的平定文革史的情況是相吻合的。本書第十二章敘述了兩個人被打死的慘案。但是如本書第十四章所寫，平定死人最多的時候是革委會成立後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的時候。儘管平定沒有發生集體屠殺事件，但非正常死亡人數也達到了 70 人左右。其實，當時鞏固政權並不需要鬥人、關人、殺人，尤其是不需要殺地富反壞右，因為這些人對政權並不造成威脅。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在多次運動之後已如驚弓之鳥。只有在用階級鬥爭的方式來思考時，他們才會構成威脅（即「人還在，心不死」）。當然這僅僅是一種偏激的、不符合事實的思維方式。當然也不排除義和團式的無厘頭的、弱肉強食、不分青紅皂白、為殺人而殺人、殺人以取樂的起鬨心態。

從中央到省一級的領導幹部從來沒有允許過集體屠殺，而且一旦發現集體屠殺之後，他們會派軍隊前去恢復秩序。但是，這些打人的人，只有到上世紀七〇年代末才受到起訴。相反，當時的中央對施暴者是寬容的。公安部長謝富治在 1968 年 5 月的一個講話中說：

47 同上，第 696 頁。

反革命分子只要願意接受再教育，就不應把他們殺掉。打死人更是錯上加錯。但出現這種〔殺人的〕事是因為缺少經驗；所以就不必追究責任了。重要的是吸取經驗，認真執行毛主席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教導。⁴⁸

死人這麼大的事情，居然說得如此輕巧。其實，這裡對殺人者的縱容，除了公安部之外，毛澤東尤其難辭其咎。在號召要文鬥不要武鬥的同時，毛澤東說：

打就打嗎，好人打好人誤會，不打不相識；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

這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所傳達的毛澤東關於 1966 年 8 月北京發生打人事件的指示內容，並流行為當時的「最高指示」。⁴⁹ 1967 年，毛澤東在聽到張春橋彙報說 8 月 4 日王洪文率領數萬人攻打上海柴油機場，雙方死亡慘重的消息後，說「打得好」！他到南京後聽說一家最好的飯店幾乎被燒光後說，「這是亂了敵人，鍛煉了自己」。當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謝富治講話要全面否定公檢法三大系統、徹底打碎舊國家機器之後，毛對周恩來說，「我一聽到『砸爛公檢法，心裡就高興』」。⁵⁰ 在一次和自己信任的人談話時，毛說「希特勒這個人就很兇殘。越兇殘越好，是不是？殺人越多就越革命」。⁵¹

48 同上，第 703 頁。

49 胡鞍鋼，《毛澤東與文革》，第 176 頁。

50 同上，第 262-263 頁。

51 MacFarquar and S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p. 102. 英文的原文是：This man Hitler was even more ferocious. The more ferocious the better, don't you think? The more people you kill, the more revolutionary you are. 譯文來自本書作者之一。《毛澤東最後的革命》的作者在章節附註（見第 515 頁）中說，這段話的來源非常可靠，是該書作者之一親

如果說中央和毛澤東對暴力要負責任的話，那麼下面暴力的執行者呢？我們在上面提到施害者認為他們在殺人時是在執行政治任務。這讓我們想到了「平庸的惡」這個概念。這個概念是猶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漢娜·阿倫特在 1963 年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關於艾希曼審判的報告》中所提出的。當時，阿倫特是《紐約客》雜誌的特約撰稿人。她在現場報導了對納粹德國高官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 年 3 月 19 日—1962 年 6 月 1 日）的審判。艾希曼是在猶太人大屠殺中執行「最終方案」的主要負責者。被稱為「死刑執行者」。艾希曼對自己的辯護就是說他在執行一項任務，與道德無關。他「反覆強調『自己是齒輪系統中的一環，只是起了傳動的作用罷了』。作為一名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當時國家法律所允許的；作為一名軍人，他只是在服從和執行上級的命令」。⁵²

據此，漢娜·阿倫特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惡」概念。阿倫特以艾希曼的行為方式來闡釋現代生活中廣泛存在的「平庸的惡」，這種惡是不思考，不思考人，不思考社會。惡是平庸的，因為你我常人，都可能墮入其中。把個人完全同化於體制之中，服從體制的安排，默認體制本身隱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為，或者說成為不道德體制的毫不質疑的實踐者，或者雖然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憑藉體制來給自己的他者化的冷漠行為提供非關道德問題的辯護，從而解除個人道德上的過錯。這就是現代社會中、體制化之中個人平庸的惡的基本表現。⁵³

從這個意義上講，除了毛澤東和黨中央需要承擔屠殺的主要責任之

眼所見。

52 李秀偉，「何謂平庸之惡」，載於《中國社會科學網》，2015 年 3 月 23 日。

53 同上。

外，其他人也都應該承擔「平庸的惡」之罪。的確，大家都是那個齒輪系統中的一環，沒有打人，道德的責任不可以逃避；打人了，那麼責任就更不可以逃避。打死人了，是要受到刑責的懲罰的。⁵⁴即使是後來人，也不敢保證如果自己身處文革中，不會做文革中的人所做的事情，尤其是直到現在都不知道文革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都不知道需要對中國文化、中國的政治制度進行反思的話。我們不是有太多的人對明知的惡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嗎？不過，屠殺的主要責任，當然在毛澤東與黨中央那裡。正如譚合成在討論道縣屠殺時所說：⁵⁵

應該承認，殺人事件的責任人大多數都是貧下中農或出身貧下中農。他們與被殺者之間沒有什麼個人仇恨。而是誰點燃了他們是心中仇恨之火？是誰打開了人獸性之門？是誰發給他們刀槍，並賦予生殺大權？是誰灌輸給他們那麼多「你死我活」的理論？

那麼除了毛澤東、黨中央以及每個參與文革的人的責任之外，暴力還有哪些成因呢？我們在前面提到紅衛兵運動的思想基礎、組織基礎、社會或政治互動以及中國深厚的專制文化的基礎。這些同樣也是暴力產生的基礎。前述 Lynn White 和 Yang Su 也都是在討論文革暴力問題。Lu Xiuyuan 在關於文革暴力的研究中也討論了這些問題，並注重討論了意識形態如何被鞏固、感情如何被激發、價值觀如何被置換從而使得暴力可以產生的這樣一個過程。⁵⁶的確，如果沒有階級鬥爭的思維方式、沒有 1949 年後建立

⁵⁴ 關於暴力施害者的個人因素，蘇楊還提到了不少人，尤其是那些最冷血的、最殘酷的人，本來就是心理有問題的，或者平時在社會上就是流氓、混混、不合群、不受大家歡迎而希望借暴力表現來提高自己社會地位的。見 Yang Su, *Collective Killings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第 127 到 130 頁。

⁵⁵ 前引譚合成（著），《血的神話》，第 614 頁。

⁵⁶ Lu Xiuyuan, A Step Toward Understanding Popular Violence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起來的強大的組織系統、人與人之間相互給予的政治壓力，暴力也是不可能發生的。當然，中國的專制文化也無時不刻地在影響著人們的行為，包括對暴力的讚賞。本書作者之一郝志東在一篇文章中談到了中國文化中的暴力問題：⁵⁷

我們必須對中國文化中的暴力傾向有所反思。這一點，對那些每天在鼓吹「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中國模式將在世界普及、甚至統治世界」、「中國的王道將戰勝西方的霸道」的人們來說，就更是如此。其實，暴力至少在我們熟知的一些文化中、在歷史上，是家常便飯，包括中國文化。中國人的所謂「王道」，其實是「外儒內法」，也就是用「王道」掩飾「霸道」。傳統中國的「五馬分屍」、「誅連九族」，到現代中國還存在的「千刀萬剮」（如在土改和除奸反特時期所發生的）、「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文化革命）等等，都是中國暴力文化的例子。

但是對這些暴力，我們至今缺乏反省。我們對國共內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的歷史非常缺乏反省。國共內戰已經過去 60 多年了，但是除了張正隆的《雪白雪紅》（描寫遼沈戰役時長春被圍五個月、兵不血刃、幾十萬饑民被餓死）以及龍應台的《大江大海 1949》等少有的作品對這段歷史有比較深刻的反省之外，人們似乎已經基本忘記了內戰的殘酷。我們在電影中、在戲劇中對暴力仍然津津樂道。

一個沒有反省能力的民族的前途是堪憂的。難道我們還是梁啟超 110 年前口中的「少年中國」嗎？我們什麼時候長大呢？本人喜歡京劇，但對其暴力的內容很不以為然。幾年前，我在電視上看一位元京劇藝術家描寫

Pacific Affairs, Vol. 67, No. 4 (winter, 1994-1995).

57 見郝志東，《兩岸四地政治與社會剖析》一書第 11 章，「論暴力文化：五一國際勞動節澳門警民衝突反思」，澳門大學出版，2014 年，第 75 頁到 76 頁。

京劇的魅力。她說京劇的動作設計優美，比如在殺人之後，還要用一個優美的動作將劍上的血用兩個指頭輕輕地抹去。對暴力的讚美，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以此為甚。

對中國暴力文化的反省，可以說明我們認識到我們的民族其實還有很多黑暗的地方，需要面對，需要解決。如果我們想要真正地復興，就要在人權、民主等等普世價值上多多學習。無論是政府，還是社會，都需要在這些方面努力。其實，這都是再簡單不過的道理。世界上有人願意不要做人的尊嚴、不被別人尊重、長著嘴卻不能說話、長著腦袋卻不能為自己做主嗎？有誰願意被別人打壓、打殺嗎？……一個成熟的民族，需要摒棄暴力，學會用民主的辦法、用尊重人權的辦法來解決彼此之間的矛盾。

缺乏對傳統專制文化、暴力文化的反省、政府主導的對普世價值（如自由、民主、人權、憲政）的批判，是我們至今還會經常看到暴力的原因之一。這些暴力包括家庭暴力、校園暴力（比如網上可以輕易看到的多個初中女孩子被同學暴打的視頻）、警察暴力（刑訊逼供，太原警察將討薪的女農民工的頭髮踩在腳下的畫面——該女工最後慘死，有良心的國人恐怕都還沒有忘記）、其他國家暴力（將維權的女性、律師抓起來或帶走詢問警告、暴力拆遷、拆基督教的十字架、搗毀教堂）等等。這些似乎已經司空見慣，見怪不怪了。這難道不是很可怕的嗎？即使是對付恐怖主義，警察也要儘量避免使用暴力，不能以暴易暴，否則冤冤相報何時了？可是，對所有這些問題，我們缺乏公開的討論與反省。而對暴力的反省，對其成因的分析，包括個人的因素、政治的因素、制度的因素、社會的因素、文化的因素，正是文革對我們的啟示之四。如果不對暴力進行反思，譴責任何形式的暴力，並用制度去制止暴力，那麼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就會停留在一個低水準上，也就沒有什麼真正的社會和諧與穩定可言。

我們對平定基層文革的研究，也告訴我們個人的暴力儘管造成了一些傷害，但是公權力的暴力對人的傷害更大，無論是誰在掌握著這個公權力。這一點是在其他研究中沒有得到足夠重視的問題。

五、為什麼說文革對個人造成的傷害、使人對社會失望才是最嚴重的傷害？

文革對人的影響是誰都無法否認的事實。對那些在文革中失去性命、受到折磨的人和他們的家庭、朋友來說，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文革使人們放棄了理想，覺得世間的事情沒有對錯，也是文革帶來的傷害之一。所以文革的啟示之五，就是要深刻認識文革對人的傷害、對社會的傷害，以便使人們能夠繼續追求一個尊重人的理想社會。本書已經有很多個人遭到傷害的例子。不過在前言中，我們還是想舉幾個相對而言不太嚴重的例子，來說明上面這個問題。

當然，對那些在文革中受到衝擊的人來說，承受力與解釋力可能有很大不同。比如原平定縣委書記郭存華的兒子郭旭明就說，「總的來講，我還是相信黨的，對毛主席還是很崇拜的，對毛主席還是有深厚感情的」。「媽打錯孩子，孩子也沒啥怨的」。對於受到衝擊的革命幹部來說，因為他們本來就是政權的一部分，所以原諒政權，就是原諒自己。但是對於那近兩百萬被打死的人及其家屬來說，可能不是「媽打錯孩子」那麼簡單了。對那些被鬥來鬥去的「牛鬼蛇神們」來說，也沒有那麼輕鬆。他們畢竟失去的不光是自己的尊嚴，也是幾十年的生命。

紅總站的領袖之一荊履榮，談到了文革兩派鬥爭時，他自己的家庭受到連累的情況，但是他認為自己還是看得很開的。

我一輩子也沒有害過人，但我的妹妹翠花，老父親都跟著我受了害。妹妹曾對我說：「你不要搞這了，家裡還有孩子們了。」我說：「沒有辦法了，上有毛主席的指示，下有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這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

他談到了自己的妹妹如何受到他的牽連，被對立派打傷的故事。儘管妹妹對他說，「你不要再鬧了，全家跟你受罪了」，他還是認為自己無法不參加文革。他說他的父親也是因受到自己牽連，被調查，說老人是唱戲的「小把頭」，而連病帶氣而死的。

趙成秀是平師附小的教師，他參加了教育系統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後來，他在自己的著述《印象平定》中回憶了自己的親身經歷：

平定師範新成立的革委會和平師附小領導組不折不扣執行了縣裡的指示，不僅將文革初期揪出來的「牛鬼蛇神」，如關一之、吳覺民、王鐵夫等重新推上了審判臺，還揪出了很多現行反革命，如陳增清、張德光等，附小的史文華也被以現行反革命再次揪出。我因為日記也被列入他們的黑名單，剝奪了我工作的權力，要求作出書面檢查。

1970年4月24日，文衛系統學習班結束，所有學員都回到了各單位，我也回到了學校。我當時難以名狀我自己回到宿舍的心情，只覺得天十分暗淡，心裡恍惚、恐懼、忐忑，似乎所有的人都以一種鄙夷的目光斜視著我，我無地自容。學校領導派出多人，赴外調查我的家庭背景。高忠明還偷偷告訴我，領導組裡有人主張，要降低我的工資級別（天哪，我的工資是中教十級，是中教中最低一級工資，真不知再降一級是多少工資！）

儘管自己沒有錯，但是還是有一種自卑感、一種自責、一種恥辱感。

我和史文華被剝奪了上課的權力，參加勞動改造。當時，正在落實毛主席「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最高指示，在馮拉科的帶領下，附小的地地道從校內挖到了城牆根，還在操場的地底下發現了一個磚砌的大地窖，能容納三四百人，這被上級領導視為重要發現。我和史文華跟著馮拉科整天鑽在地道裡，刨土、運土，我從小沒有參加過重體力勞動，所以，搞這樣的地下掘進受苦不少，但一想到「改造」二字，一切都忍了。好在馮拉科心眼好，對我也特別照顧，心裡變得坦然多了。挖地道告一段落以後，我們又做起泥工活。父親年輕時當過泥匠，我也大體知道泥匠的做派。所以，我做大工，史文華當小工，修理學校院牆破損的地方。看到往日教過的學生，總是難為情地低下頭。上課時間，我會不自覺地朝教室裡瞅一眼，不由自主地回憶起我在講臺上授課的情景，眼濕潤潤的。

平師附小有一個粉筆廠，開工廠兩年多，已經具有一定規模，所產粉筆可供應全縣的學校使用。文革中停了一年多，不久才恢復生產。我們的勞動多數在粉筆廠碾石膏粉。在石碾房裡，我和史文華呼吸著充滿粉塵的空氣，推著石碾，轉了一圈又一圈，頭髮和眉毛變白了，粉塵落到沁出汗水的臉上結了痂。實在疲累的時候會想起臧克家的詩《老馬》：「總得叫大車裝個夠，它橫豎不說一句話，背上的壓力往肉裡扣，它把頭沉重地垂下！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它有淚只往心裡咽，眼前飄來一道鞭影，它抬起頭望望前面。」

當然還有繁重的勞動，以使自己能夠得到改造。

1971 年的春節快到了。我滿以為勞動改造就要結束，我可以和我的

父母和妻子兒女在昔陽相聚。沒想到，學校領導組決定，我和史文華繼續在學校裡勞動，碾石膏粉。他們扣了春節供應給我們的油。廚師放假回了家，我們只能靠自己的雙手在學校簡陋的灶房裡做飯。學校靜極了，教室和宿舍都貼上了封條，操場上卷起的黃毛風吹進空蕩的石碾房裡，石碾發出的吱扭聲，更顯得孤寂和淒涼。史文華多次表示過對這種非人待遇的不滿，勸我多歇一歇，不要賣死命地勞動，我卻心有餘悸，總覺得有好幾雙監督的眼睛在盯著我。

晚上，我躺在床上，想起遠在昔陽年邁的父母翹首盼望兒子歸來的殷殷目光，想起孩提時春節和元宵節的熱鬧和甜蜜，想起在爺爺、奶奶跟前繞膝、不諳世事的我可憐的兒女，我不禁潸然淚下。我想到死，但一想到他們，我就沒有了勇氣，我一個人死了，自己乾淨了，可父母由誰來養老送終，妻子由誰來共擔家庭和社會的責任，孩子由誰來撫養成人……最終，我沒有選擇自殺，而是咬著牙堅強地活下去，等待春天的到來。也許是我出身貧農，社會關係也都是貧農，也許是不少同情者真誠的善心，我沒有如左治貞〔當時的縣武裝部政委、縣革委會主任〕所斷言的「槍斃」。當然，我也不知道死亡曾多麼嚴重地威脅著我，如果知道，我將是另一種結局。

在想到自己家人的時候，那種痛苦就更不堪言。

記不得是 1971 年的哪一天，我接到學校領導組的通知，讓我參加學校師生大會。學校中院站著黑壓壓的人，我被叫到主席臺上，怯怯地望著隊伍整齊的小學生，不知將對我進行怎樣的宣判。

領導上臺了，喋喋不休地讀著對我的處理決定。我的心裡打著小鼓，竟然沒有聽清究竟上頭對我的問題是如何定性的，只是隱約覺得，並沒有

將我定為敵我矛盾，沒有給我任何處分，也沒有降低我的工資級別，還恢復了我的工作。我有點喜出望外，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句「毛主席萬歲」！無知的小學生們也跟著喊起來。

最羞辱的一幕終於落了下來，我像往常一樣站在講臺上，想不到的是，我仍然贏得了學生們的尊敬，我感謝純潔無邪的孩子們。

和我相反，就在這次大會上，史文華被宣布開除公職，遣送原籍勞動改造。

我終於有了一張安靜的辦公桌，我可以在上面看教科書、寫教案、批次工作。此時的我才真正覺得勞動的權利是多麼珍貴！「當你失去它的時候，才真正理解了它的價值」，這是我的切膚之思，肺腑之言。在此後的四年多歲月裡，我用自己辛勤的汗水，履行著一個園丁的職責，先後送走了三個初中畢業班和一個高中班。雖然捉摸不定的「教育革命」蹉跎了他們的學業，但是社會還是給了他們充分的就業機會，成為平定縣各行各業的業務骨幹。而我也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收穫喜悅和成功。每當同學聚會的時候，他們都沒有忘記與曾經的老師共進午餐，留一張甜蜜微笑的合影。作為一個教師，這就足夠了。

其實趙成秀所談的權利，就是人權。兵團有人被總站的人打成重傷，總站的人甚至被兵團的人打死。但是生命與人身的安全是任何人都不應該被剝奪的權利，這也包括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的權力。這樣的經歷，對一個普通人來說，很難說不是刻骨銘心。如果一個人能走出來，那麼是萬幸。正如我們在書中所描述的，很多人是走不出來的。很多人是連生命都失去了的。

在對個人發生影響的同時，文革也使得人們失去了對理想的追求，覺得世界上的事情沒有什麼對錯，進而放棄任何努力。其實這是文革最可怕的。

的一種後果。比如我們的另外一位被訪者戎崇璽便認為：

過去的事情沒有對錯，在「文革」剛進行一段的時候，張瑾瑤〔學毛選積極分子，兵團觀點〕被關在「八一火海」戰鬥隊，張謹瑤說這時候有什麼對錯，「壓倒葫蘆，瓢就起來了」。我在涉世之前經歷「文革」，使我受到了鍛煉，後來我發現真的無所謂對錯。我現在看穿了，開始享受生活。人生就是一場戲，演的好就是命好，演的不好就是命不好。把社會看透了，人類也是適者生存。

文革之後，我認定不在政府當幹部。1972年有機會當郊區團委書記，但得先入黨，我不願意，就沒去。我們下鄉時被填的檔案，說我「打、砸、搶，派性嚴重」，我後來在大隊發現了檔案，把大隊的抽屜撬開，把檔案燒了。所以我也不敢入黨，怕人家內查外調，就暴露了。我當時燒檔案時跟別人在一起，燒的時候說誰也不能說出去。

翟治壁認為「文革時間最長，是非被搞亂了」。牛增福的評價是：

其實都是上頭說了算，人家得了好處，下頭人倒楣。現在我覺得老百姓就是老百姓，什麼咱也不多想。我就願意當工人，現在特別喜歡幹些技術活，研製了正球型、鍋爐用吸附劑和吊裝加熱器等好多東西。

脫離政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也是一種經過文革之後看透世態炎涼之後所採取的態度。董銀明也感到很失望：

「文革」其實就是上層政權間的鬥爭，我們都成了人家的犧牲品了。「文革」損害了一批年輕人，迫害了一批老幹部。鬥郭存華的時候拉到臺

上掛了大牌子，還餵人家馬糞，可是慘了。再有啥運動，我都不參加了。

他寧願不參加運動，也不願意再當人家的槍子兒。即使是以前那些被鬥的老幹部，後來也感覺不到自己還能發揮怎樣的作用。原副縣長鄭子英說：

現在退休以後，給縣裡提意見，提也沒用。例如，一條街裡沒有公廁，去一個廁所要掏三毛錢，這些小問題提了也沒反應。上面來人看，城市建設不錯，但衛生很差，他們看不著。每年領導來看望。新領導來了，也請我們去吃飯、提意見，但沒什麼人提。就像廁所的問題一樣，提了也不頂事。

在風風火火了十年之後，無論是打人的還是被打的，被鬥的還是鬥人的，積極參加文革的，還是不願意參加文革的，都對運動感到失望，對運動後的結果感到失望，最後甚至決定退出對政治的關心。如果這種退出政治還有點積極意義的話，是對狂熱的抗拒。閻秀雲說：

有一回，有人帶我去傳銷那兒看了一回，看到了他們那股狂熱勁兒，我就想起「文革」那會兒我們的狂熱，和傳銷那股勁兒簡直一模一樣。我看了，覺得羞得不行。我告訴她，你們這股勁兒，我們那時候就有過。

大家至少感到我們不應該再有那種狂熱。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當然，在激烈的兩派鬥爭中，有時也能逆發出來一點人性的光輝。本書作者之一記得當時把平定縣武裝部的政委李金印「揪」到平定中學來，其實並不是要鬥他，而是讓另一派免去一次鬥他的機會，並且也給他一次

好好好喝的機會。荊履榮在訪談中也談到兩派的頭頭文革後期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故事：

其實後來兩派之間的鬥爭，就進入了一個特殊的時期。有的個人之間的關係還是不錯的，在大聯合時，紅總站的李守珍和兵團的魏德卿逗樂說：「穿著黑大衣，戴著黑眼鏡，寫著黑文章。」魏說李是：「黑心、黑手、黑思想。」二十年後，兩人一個是陽泉市的市長，一個是陽泉藝術學校的校長，兩人還是惺惺相惜，魏在藝術學校的教職工大會上說：「李校長是我多年的良師，他的知識淵博，我是非常敬重他的，你們選他當校長是一件很好的事。」我心裡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了。…… 魏家女兒辦事，我們都去了，大家有一種歷史風雲變幻中的苦澀，又到了人生的起點上了。

不知道這個人性中的善，能否帶領我們走出文革、走向未來？

缺乏對文革中對個人的傷害、對社會的傷害進行清算與反思，是我們今天繼續對個人和社會進行傷害的原因之一。因為政治的原因，不少人仍然被搞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比如六四及其影響就是一例。多少人死去了，而且該事件已經過去了近三十年，但是還有很多流亡人士不能返國與家人團聚，被害人家屬還是得不到賠償。更有甚者，更多的維權人士被投入監獄，造成了更多的人間悲劇。非要這樣不可嗎？這是文革對我們的啟示之五。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即對個人的影響和對社會的失望上來講，基層文革和大城市的文革，沒有太大的區別。無論是什麼時代，只要是受文革思維的主導，個人悲劇就無法避免。

本前言討論了五個問題，即文革的起源與階級鬥爭的文革思維，紅衛兵的發動，兩派之爭，暴力問題，以及文革對個人、家庭與社會的健康發

展所造成的傷害。我們一方面分析了文革發生及發展的機理，同時也強調了在很大程度上我們今天仍然活在文革的陰影當中。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清理，文革思維得不到糾正，不同意見得不到尊重，暴力的結構與文化因素得不到認識，人權問題沒有真正提到議事日程上來，那麼重蹈文革覆轍的可能性就會永遠存在。實際上，我們今天的政治與社會上發生的很多問題，就是文革思維的結果。希望本書能夠起到一個提醒的作用。

走過幾千年：平定簡史

地險山危氣勢雄，將軍從此建奇功。
興劉業就人何在，破楚名存事已空。
古壘帶煙餘殺氣，荒祠向晚動悲風。
功名蓋世今如此，讀罷殘碑思不窮。

——平定刺史趙秉文（1159-1232）題記平定縣西郊村韓信廟¹

在中國版圖上，平定縣位於山西省中部東側，與河北省接壤，是太行山腹地連接晉冀兩省及京冀魯豫的一個重要區域。歷朝歷代，無論京城是

1 轉引自郝志東、郝志剛（著）《西郊村：一個華北農在的歷史變遷》，澳門：澳門大學出版，2009年，第1頁。根據維基百科，「趙秉文（1159年—1232年），字周臣，號閑閑居士。金朝磁州滏陽（今河北磁縣）人。自幼好學，未嘗一日廢書，早年書法學王庭筠。十七歲時參加鄉試。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進士。大安二年出守寧邊州。次年，改任平定州。金宣宗興定初年，累拜禮部尚書。金哀宗時，擔任翰林學士。累官至翰林侍讀，『曆五朝，官六卿』，詔書、冊文皆出其手。又工詩畫，劉祁稱他『平日字畫工夫最深，詩其次，又其次散文』。晚年自稱閑閑老人。有《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傳世。正大九年（1232年）五月，病卒」。

設在黃河流域的豐鎬長安或者海河流域的大都北京，這裡都是連接京城與邊關的古驛道必經之地。這是因為，遠古的地殼變化，使黃土高原上的東部山脈太行山形成了一個縱貫南北的大斷裂帶，這就是有名的太行山大斷裂帶。在這個縱貫數百里的斷裂帶上，幾乎到處是石壁懸崖、百仞高牆，連野獸都難以攀援。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地方，才能容人勉強通過。於是，這些地方，就成為行師要衝，歷朝歷代均為重要的軍事戰略要塞。其中娘子關、故關等關隘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關隘之一，古稱「井陘關」。連接邊關和內地的，就是古代的「國道」——古驛道。現在，沿國道行走，還能不時看到古驛道邊烽火臺的遺跡。好多村名，例如「柏井驛」、「甘桃驛」，還保留著古代的名稱。至於一些古關隘形成的村莊，例如故關，那裡的村民就自稱是守關將士的後代。上述韓信廟就是紀念韓信在此屯兵、打仗，建功立業的故事。

平定古代歷史

平定在舊石器時代即有先人集居。二十世紀五〇年代在時歸本縣的棗園、大樑江等地的黃土地底層部，曾發現人工打造的石器、石片和石核，據考證為舊石器時代中期文化。之後，又相繼在本縣娘子關、亂流、水磨灣等地發現石斧、骨針、陶具等文物，表明新石器時代先民已遷徙到河谷地帶繁衍生息。夏、商、周、春秋戰國以至西漢時期，平定境內人口較少，尚未形成較大的村落，分屬於其他州郡管轄，但由於地理位置險要，常常有軍隊駐紮或出入。頻繁的軍事行為不僅在境內修築了許多軍事設施，也帶動了人口的集聚，為縣城的形成提供了充足的條件。

據清乾隆版《平定州志》記載：夏朝時，平定屬冀州之域，周朝為唐之東境，春秋戰國為趙。漢武帝建元元年（西元前 140 年），平定境內首次設縣治，名稱為上艾縣，縣址在今城南 20 公里的張莊鎮新城村。疆域應

包括今陽泉市郊區、城區和昔陽縣一部分，屬太原郡管轄。東漢建安十八年（西元 213 年），並、幽二州合為冀州，上艾縣屬冀州。三國魏黃初十八年（西元 220 年），上艾縣屬樂平郡。北魏登國元年（西元 386 年），上艾縣更名為石艾縣。北魏真君九年（西元 448 年），複稱上艾縣。²

隋開皇十六年（西元 596 年），境內娘子關設葦澤縣，縣址在今娘子關鎮河北村，管轄範圍應包括今娘子關鎮、巨城鎮及河北省井陘縣一部分。隋大業三年（西元 607 年），廢葦澤縣。唐天寶八年（西元 749 年），石艾縣更名為廣陽縣，徙縣治於廣陽，就是現在昔陽縣沾尚鄉的廣陽村。³

北宋太平興國四年（西元 979 年），宋太宗趙光義派兵討伐北漢，在廣陽縣成立「平定軍」。滅北漢後，改廣陽縣為平定縣，遷縣治於今平定上城，開始營造上、下城，至此，或縣或州，平定名稱一直沿用至今。⁴顯然，「平定」這個名字是和「平安、穩定」聯繫在一起的。但是這種「平定」也是和「軍隊」聯繫在一起的。其實文革時解放軍在平定支左、軍管，從道理上講，也是「平定軍」。不過，正如本書即將描述的，平定縣似乎很少平定過。

上城原為韓信榆關門舊址，縣治遷此後，板築雉堞，構築官署，城周圍修築文廟、武樓，經歷代不斷修葺擴建，至清代平定上城周長二里三百四十八步（古代一步為六尺，以清朝光緒末年所訂立的里制：一里為營造尺 1800 尺，一營造尺等於 0.32 米折算，約為 1820 米），下城周長六里三十八步（約為 3529 米），分設南門、東門、西門三座城門。⁵繁榮時

2 見乾隆版《平定州志》影印出版編委會會編《平定州志（乾隆版）》，平定縣圖書館重印，第一冊，第 98 至 101 頁。

3 同上，第 101 至 102 頁。

4 同上，第 104 頁。

5 見前引乾隆版《平定州志》第二冊，第 3 至 5 頁。

期，商店鋪面鱗次櫛比，號稱十里長街。金代詩人元好問曾作詩讚賞平定山城景色：

一溝流水幾橋橫，
岸上人家種柳成。
來歲春風千萬樹，
綠煙和雨暗重城。

平定縣治自宋代以來一直沿續至今，但在歷史上由於戰亂、兵禍等原因，幾經敗頽，幾經重修。據《平定州志》記載：元末戰亂，平定城基本毀壞，明初開始複修縣署，弘治年間，城內的天衢閣、聖廟、社稷壇、先農壇、山川壇等一批建築建成。清乾隆三十年（1756年），歷時兩年，費銀11200餘兩，對平定城又進行了一次大規模重修，奠定了縣城基礎。⁶

自宋至清，平定疆域面積大體上在今陽泉市範圍以內，曾有兩個歷史時期升為州治，管轄範圍有所擴大，第一次是金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平定縣升為州治，屬太原支郡，領平定、樂平二縣，歷史不長。⁷金代著名文學家、理學家、書法家趙秉文曾任平定州刺史。如本章注一所示，趙後來官拜禮部尚書、翰林學士。第二次是清雍正二年（1724年），平定升為直隸州，領壽陽、盂縣、樂平三縣。⁸直至民國初年（1912年），才改州為縣，這次設州時間長達188年。據《平定州志》載：「州境東西廣一百六十里，南北袤九十五里。東至直隸正定府井陘界一百里，南至樂平界三十五里，西至壽陽界六十里，北至盂縣界六十里」。⁹平定縣治戶

⁶ 同上，第52至102頁。

⁷ 見前引乾隆版《平定州志》第一冊，第104頁。

⁸ 同上，第106頁。

⁹ 同上，第107頁。

數人口記載始於宋代，「《宋史·地理志》載稱：宋崇寧年間，平定計戶 9,306 戶，人 28,607 口」；明代至清代前期，人口均未超過 3 萬人。清乾隆十六年（1751 年）以後，縣內人口急劇增加。「嘉慶八年（1803 年）為 27,704 戶，132,045 人；光緒五年（1879 年）為 29,049 戶，135,357 人。¹⁰

民國時期的平定

民國元年（1912 年）三月，平定直隸州改為平定縣，屬冀寧道，結束了州管縣的歷史。據民國十二年《平定縣誌》（手稿殘本）稱：「縣境所界最遠邊緣，東起西徑 2 度 26 分，西至西徑 3 度 8 分，南起北緯 37 度 45 分，北至北緯 38 度 11 分。面積約六千四百五十餘方里，為全國面積五千二百分之一，全省面積八十分之一」。¹¹全縣分 5 個區，主村 181 個，屬村 548 個。

抗日戰爭時期，原民國政權機構撤走後，日本侵略者在縣城建立了傀儡政權機構。除日偽占領石太鐵路線的縣城、亂流、上下磐石、娘子關以外，平定分為三個抗日縣政府，實行區村制。平定（路北）縣政府管轄鐵路以北的巨城、黃統嶺等區域，政府所在地為秋林；平西縣政府管轄今治西、冠山、昔陽的部分區域，政府所在地為廣陽；平東縣政府管轄今東回、馬山、古貝及河北省井陘縣一部分，縣政府所在地在測魚。民國三十六年（1947 年）4 月 27 日，平定縣城解放。同年，平定縣的陽泉鎮改為市，包括平坦腦、小陽泉、大陽泉、義井在區域內劃出；次年，平定縣的蔭營、河底等 68 個行政村劃入陽泉市；民國三十八年（1949 年）1 月，三郊等 26 個村又劃入陽泉市管轄。

10 見平定縣誌編纂委員會編《平定縣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1 年出版，第 66 頁。

11 《平定縣誌》（手稿殘本）（民國版），現存平定縣史志辦公室檔案室。

據《平定縣誌》統計，¹²「民國時期，平定人口驟增，基本保持在 21-35 萬之間，其中民國十九年（1930 年）達到 353,161 人，比民國元年增長 65%」，抗日戰爭八年間，「被敵人殺害 13,913 人，病死餓死 10,529 人，戰亂流亡 12,138 人，共減少 36,580 人。」

1949 年後、文革前的平定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從此起至 1966 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的 17 年時間裡，全國一盤棋，平定縣和全國所有地方一樣，經歷了土地改革、三反、五反、互助組、合作化、「一化三改」、人民公社等政治和經濟運動。從總的發展趨勢上看，相較於民國時期，國民經濟和社會事業發展較快，農業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工業規模逐步擴大，商業出現繁榮景象，財政收支大幅增長。但由於受「大躍進」「四清」等政治運動的影響，生產力發展受到相當的制約，貧窮、落後的面貌沒有根本轉變。

首先是縣境域界的變化。1947 年 5 月 2 日，陽泉從平定分離設市，沙江口平潭一帶由於是石太鐵路的一個大站而成為一個新型城市，脫離了古平定縣的管轄。1950 年 3 月，陽泉市的燕龜、河底等村劃入平定縣。同時，平定縣的松塔、落摩寺兩區的 27 個村劃入壽陽縣。1953 年 4 月，平定縣的白泉、黑土堰、東壠等 17 村劃歸陽泉市。1956 年 3 月，平定縣測魚、石門、南寺、白城、杜家莊、蒿亭 6 鄉 23 個村劃歸河北省井陘縣；壽陽縣的梁家莊、路家莊劃歸平定縣。1958 年 8 月，地都、王家岩、張家峪、岸地 4 村劃歸河北省井陘縣。1959 年，梁江、汪里等 5 個村劃入河北省井陘縣。

1953 年，平定縣實行區鄉制，全縣劃分 5 個區，即七亘區、娘子關

12 上引《平定縣誌》，第 66 頁。

區、岔口區、辛興區、城關區。1956 年，平定劃為 62 鄉，轄 326 村。1958 年，各鄉分別召開人民公社成立大會，實行公社化，政社合一、分公社、管理區（1961 年改為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三級，全縣計 23 個公社，324 個生產大隊，1302 個生產小隊。1959 年 2 月，平定縣改為陽泉市郊區。1961 年 4 月，撤銷郊區機構，恢復平定縣建制，屬晉中專區。同時，白羊墅、河下等 13 個行政村劃歸陽泉市。

根據《平定縣誌》記載，「1949 年，全縣有 6.46 萬戶，26.86 萬人。因 1949 年至 1959 年政區內變化頻繁，與周邊的壽陽縣，陽泉市、井陘縣有 7 次互劃政區，劃出 38,444 人，劃入 2,735 人，劃出大於劃入」，到 1966 年全縣總戶數 65,613 戶，26.534 萬人，比 1949 年略有減少。¹³「1949 年至 1959 年，全縣人口出生率在 10-17% 之間浮動，人口自然增長率在 1.6-6.2‰ 之間。1960 年至 1961 年，由於自然和經濟的客觀條件變化，人口生育處於低谷時期，1960 年人口死亡率達到 19.55‰，自然增長出現負數。1962 年至 1966 年人口大幅度增長，增長率達 20‰ 以上。其中 1963 年達 25.55‰，成為 40 多年人口峰值的極點。」¹⁴

1949 年，全縣人口密度為 171.68 人／平方公里，1966 年，全縣人口密度 157.19 人／平方公里（與政區變化有關）。¹⁵1964 年，全縣有文化的人口（小學以上）94,779 人，占總人口的 37.1%，每萬人擁有大學生 8.4 人，12 週歲以上的半文盲占總人口的 38.7%。¹⁶

平定是一個農業縣份。儘管農業的收成不足以維持全縣的消費，但是，農業的收入在全縣的財政收入中，一直占著大頭，這個狀況從建縣一

13 同上，第 67 頁。

14 同上，第 68 頁。

15 同上，第 71 頁。

16 同上，第 82 頁。

直到「文革」前，一直沒有大的改變。

1947 年遵照中共中央「五四」指示精神，平定縣境內的老解放區展開土地制度改革運動，在白泉、移穰、穀頭、東鎖簧等村試點成功後，運動在全縣展開。1951 年春，縣人民政府向全縣農民頒發土地房產所有證。在土地改革中，以 223 個村統計，共沒收、徵收耕地 103,902 畝，占總耕地面積的 25.84%，房屋 17,832 間，牲畜 1,217 頭，糧食 45,991 石，以及衣物、布匹、農具等財物，全部分給貧下中農，實現了「耕者有其田」。¹⁷

1951 年，農村開始實行經營體制改革，實行互助組。《平定縣誌》記載，「根據自願、互利、民主的原則，各自計工等價交換，實行以還工計價結算等相結合的管理辦法」，「1951 年全縣計有互助組 2,652 個，變工組 3,308 個，入互助組的農戶占到總戶數的 54%，占勞力的 53%。」「到 1954 年，入互助組的農戶達 47,622 戶，占總戶數的 73%」，1955 年，參加互助組農戶轉入農業生產合作社。「互助組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生產力的組合，1953 年互助組的畝產比上年畝產提高 21 公斤，比同年的單幹戶畝均多產 15 公斤。」¹⁸

根據《平定縣誌》記載，¹⁹ 1951 年，麻地峪村、朱會村出現了農業生產合作社，「實行土地作股入社，統一經營，勞力統一分工參加集體勞動，收益實行按勞分配和土地分紅相結合的生產經營體制。」由於縣委的大力推廣：

¹⁷ 我們另外一個關於這段歷史的初步研究發現，土地改革、鋤奸反特等運動造成的死亡人數也相當驚人。

¹⁸ 見平定縣誌編纂委員會編《平定縣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1 年出版，第 91 頁。

¹⁹ 同上，第 91-92 頁。

至 1952 年，全縣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到 37 個，參加農戶 898 戶，占全縣農戶總數的 1.47%。

到 1954 年，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為 483 個，23,229 農戶入社，占到總農戶的 84.9%，入社土地 426,534 畝，占全縣總耕地面積的 80%。

1956 年，中共平定縣委將牛角溝、麻地峪、東峪等 7 個村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轉為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土地無代價為集體所有，耕畜、大型農具等主要生產資料折價賣給集體，實行統一經營，按勞分配。

1957 年，全縣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會發展到 278 個，入社農戶 56,081 戶，占總農戶的 97%，入社土地 619,581 畝，占耕地的 90%，1958 年，全縣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已發展到 302 個。

1958 年 8 月，撤銷平定縣，併入陽泉市，改稱陽泉市郊區，一舉成立了 23 個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實行「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生產資料屬公社所有，生產實行統一經營，大兵团作戰，組織上實行工、農、兵、學、商五位一體，按軍事化要求，實行營、連、排編制，集中食宿，大辦集體食堂，分配上實行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制度，據 1960 年上半年統計，全郊區共辦農民集體食堂 2,059 個，80,449 戶農戶參加，就食人數達到 305,313 人。

1961 年 4 月，又恢復平定縣，將全縣調整為 22 個公社，316 個生產大隊、1,710 個生產隊，確立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三級所有制。以生產隊為基本相關單位，按照「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進行管理，1962 年，全縣又調整為生產大隊 364 個，生產隊 2,190 個。經營體制不變。

1949 年至 1966 年 17 年時間裡，平定縣的農業生產有了一定的發展，農村經濟開始復甦，1949 年，全縣糧食生產量為 4,291 萬公斤，平均畝

產 90 公斤，到 1966 年，全縣糧食總產量上升到 5,044 萬公斤，平均畝產達到 105 公斤。²⁰1949 年，全縣農業總產值為 765 萬元，1966 年上升到 1,784 萬元，比 1949 年增長了 233.3%。²¹但由於公社體制的平均主義「大鍋飯」和強調以糧為綱，農民平均純收入增長速度十分緩慢，1965 年，全縣農民人均收入僅 65 元。

新中國成立後，平定工業生產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1949 年，全縣工業總產值 147.3 萬元，占社會總產值的 11.5%。至 1966 年文化革命前全縣工業總產值上升到 3,134.2 萬元，占到社會總產值的 59.9%。其中全民所有制工業產值 468.5 萬元，占工業總產值的 14.94%；集體所有制工業 2,665.7 萬元，占工業總產值的 85.05%。²²工業的發展為平定縣經濟結構調整，增加城鄉財政收入發揮了重要作用。下面介紹幾個方面的具體情況，這些也是在文革中出現的人和事的背景。

平定各行各業的發展

根據《平定縣誌》記載，各行各業的發展情況如下。

國營企業：「1951 年 12 月平定縣人民印刷廠成立，為平定縣第一家全民所有制國營工業企業。」之後開辦了煤炭、耐火、化工、建材等企業。「至 1956 年底，全縣共有 5 個國營企業，職工 1,121 人，產值 61.89 萬元。」「1958 年至 1961 年，部分集體企業過渡為國營企業」，國營企業迅速擴大。「1960 年底，國有企業發展到 21 家，職工人數達 4,055 人。」「1961 年，根據中央『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共精減國營企業 12 家，職工 2,307 人。」「1965 年底，平定縣共有 5 家國營工業企業，

²⁰ 同上，第 101 頁。

²¹ 同上，第 95 頁。

²² 同上，第 152 頁。

職工 2,559 人，固定資產 187.5 萬元，工業生產值 641.3 萬元。」²³

二輕企業：平定二輕企業大多數是在個體手工業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主要從事的行業有農具、造紙、砂貨、紡織、服裝、鞋帽、木器、玻璃、食品、釀造等行業。「1950 年，縣供銷合作社成立，設工業股，組織和管理全縣手工業生產全作社。之後，燕龕鐵業生產合作社、立壁鐵業生產合作社、寧艾第一鐵業生產合作社相繼成立。」「1952 年，縣工業生產合作社聯合社成立，負責組織領導全縣手工業生產。至 1953 年，全縣手工業企業發展到 20 個，從業人員 1,137 人，工業產值 94.11 萬元，占全縣工業產值的 66.3%。」「1958 年，平定縣手工業管理局成立。至 1962 年度，全縣共有手工業社組 71 個，從業人員 1,735 人，總產值 866 萬元，占全縣工業總產值的 43.6%。」「至 1965 年，全縣手工業企業發展為 34 個，從業人員 2,132 人，工業產值 993.2 萬元。」²⁴

鄉鎮企業：平定縣鄉鎮企業在 1949 年至 1966 年 17 年時間裡，受國家政策的影響，波動較大。1958 年實行人民公社後，一度時期「受『大辦鋼鐵、大辦工業』的影響，各社隊辦起了一些小型企業，從事農機修造、農產品加工及礦產品開採，大部分企業設備簡陋，工藝簡單，1958 年從事社隊企業人數為 190 人，年產值 263.5 萬元。1961 年，貫徹中央『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社隊企業停辦，至 1965 年，全縣社隊企業人數為 72 人，年產值僅 37.5 萬元。」²⁵

個體聯戶企業：解放初期，平定縣商業發達，從事手工企業人數較多，據《平定縣誌》統計，「1953 年度，全縣個體手工業行業計 934 戶，從業人員 6,161 人，資金 23.54 萬元，產值 263.16 萬元，占到全縣手工業

23 同上，第 146 頁。

24 同上，第 146 頁。

25 同上，第 148 頁。

生產總產值的 33.4%。」1954 年以後，隨著國家政策變動，個體私營戶擴展為公私合營企業。至 1957 年，全縣個體工業僅 29 戶，從業人員 50 餘人。²⁶

平定商貿在解放初期至「文革」前這一時期較為發達，特別是解放初期的平定城關區商行林立，品種齊全，在陽泉地區較有影響。後經過公私合營改造，私營商業逐步轉化為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但商業設施較為完善，商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有較大的位置。商品零售總額由建國初期的 480 萬元（1949 年）上升到 1,817 萬元（1966 年）。²⁷商業、供銷、糧食、外貿等行業出現了欣欣向榮的局面。

私營商業：建國初期，平定私營商業出現了空前繁榮景象。據《平定縣誌》記載，1949 年—1954 年，私營商業快速發展。1953 年全縣個體商戶達到 1,012 戶，從業人員 1,027 人，全縣每平均 272 人中就有 1 個商人。「1955 年國家對私商實行政改造、安排相結合的辦法，使之納入國家計畫軌道，全縣大部分商戶改造為合作小組。」至 1958 年，全縣僅留私商 96 戶，計 96 人。1965 年度，全縣私商有 59 戶，資金不足萬元。²⁸

集體商業：平定縣集體商業創辦較早，早在 1940 年平定（路北）（路東）抗日政府就組織農民創辦合作社。「1949 年，縣供銷合作總社在縣城成立」，「1954 年，縣供銷社實行以鄉建社，村社合併，至 1956 年，縣供銷社設有 23 個基層社，共有從業人員 116 人，資金 120 萬元，其中社員股金 20 萬元，年商品銷售額 1,300 萬元，利潤 35 萬元。」²⁹文革前，實行供銷社員代表大會理事會、監事會制度，實行民主管理，對社員實行優惠

26 同上，第 151 頁。

27 同上，第 292 頁。

28 同上，第 281 頁。

29 同上，第 282 頁。

分紅，是農村商品流通的主要管道。

國營商業：平定縣國營商業在建國初期，由私營商業合併而成，由政府工商科（後改為商業科）領導，逐步開設百貨、食品、外貿、五金等批發業務，服務對象主要是城鎮居民及農村鄉鎮。1956 年成立平定商業局，逐步構建起國營商業體系，「1964 年，商業局下設有 9 個專業公司，50 多個經營批發、零售、加工網點，全系統有職工 2,363 人，實現利潤 36.9 萬元。」³⁰國營商業是計劃經濟時期國家實行高度統一，獨家經營的經濟模式，至上世紀六〇年代，這種經濟模式的特徵已經十分明顯。

糧食外貿：平定縣糧食行業在「文革」前根據國定政策實行統購統銷，由於生產力有限，除農民口糧外，全縣剩餘糧較少。如遇災年，連維護正常生產生活也較為困難。1965 年全縣糧食徵購僅為 820 萬公斤，糧食銷售僅為 209 萬公斤。³¹1961 年成立外貿機構，負責平定的外貿出口事宜。1961 年至 1966 年，主要出口品種有硫礦、羊毛絨、白瓜子、豬鬃、核桃、羊皮、牛皮等。出口商品總額為 382.6 萬元。³²

財稅金融：「文革」前，平定財稅實行國家的財稅政策，儘管政策幾經變化，基本上是高度集中的統收統支體制。隨著經濟的發展變化，財政收入逐年有所增長。1949 年，財政收入為 60.3 萬元，1966 年達到了 471.61 萬元。³³財政支出由 1949 年的 8.6 萬元，上升到 1966 年的 264.72 萬元。³⁴基本上處於收大於支的狀態。解放初期，中國人民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信用社等金融機構相繼在平定建立，辦理對企業、個人存貸業

30 同上，第 284 頁。

31 同上，第 300-301 頁。

32 同上，第 306 頁。

33 同上，第 249 頁。

34 同上版，第 251 頁。

務。「1949 年至 1952 年，為農民解決購買牲畜、農具等資金 74 萬元。」「1953 年至 1957 年，主要解決農民入社基金的困難，發放貸款 646 萬元。」到 60 年代，每年貸款金額達到 500-700 萬元，為農村經濟發展注入了活力。³⁵

社會事業的發展：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平定發展變化最大的。

教育：平定自古崇尚文化教育，建國後通過大力普及，一大批小學、中學相繼建成。「1949 年，全縣有初小、高小、完全小學計 285 所，學齡兒童 4,200 餘名，學生 22,153 名。」到了 1966 年，小學達到 329 所，在校生 46,032 人，適齡兒童基本入學。³⁶1956 年建成平定中學（其前身為清末與民國時期的官立平定中學堂），首屆初中生為 500 人，到 1966 年達到初中 8 所，高中 1 所（平定中學有初、高中），在校生達到 6,000 多人。³⁷教育的普及與推廣，使平定教育品質有了較大提高，湧現出了張瑾瑤等一批忠誠於教育事業，品德高尚的教職人員。

衛生：建國初期，為了改變平定醫療、醫藥條件較差的狀況，縣政府加大了對醫療衛生的投入，先後建立了縣人民醫院、中醫院、衛生防疫站、婦幼保健站等醫療機構。各鄉鎮和較大的廠礦、學校建立衛生院。村設衛生保健站（所），形成了縣、鄉、村三級醫療衛生保健網。院所由 1949 年的 1 所上升到 1966 年的 30 所，專職醫生 264 人，病床 133 張，每千人擁有醫生 1 名，擁有病床 0.53 張。³⁸

文化：建國初期至「文革」前，平定文化事業全面發展，文化館、文

³⁵ 同上，第 272-273 頁。

³⁶ 同上，第 455 頁。

³⁷ 同上，第 457 頁。

³⁸ 同上，第 493-494 頁。

化站、文化室、俱樂部、文化宮、職工之家等一大批文化設施相繼建成並開展活動，春節文化活動、傳統文化廟會、文藝匯演、陣地活動等層出不窮、花樣翻新。一批小說、散文、戲劇、曲藝、音樂、舞蹈、美術、書法作品見諸報端和上了藝術舞臺。戲劇在此一時期得到了較快發展，「1952年全縣農村業餘劇團就達 129 個，文藝宣傳隊 294 個，秧歌宣傳隊 109 個，說唱組 87 個。」縣晉劇團先由 50 多個民間藝術人組成，後發展成專業演出劇團，演出的《打周仁》、《審子辯奸》、《蝴蝶夢》等傳統劇和《巧姑娘》、《紅色娘子軍》等現代戲。³⁹

城建：建國初期至「文革」前的十七年時間裡，平定縣城及農村集鎮因經濟發展等因素，建設規模不大，縣城房屋基本保持在不足 20 萬平方米左右，但基礎設施有所改善。1957 年，縣城主要街道安裝路燈，1958 年，開始建設自來水及下水管道，新建建築主要有人民法院、電影院、新華書店、汽車站等。集體建設主要集中在集鎮中心，此一時期，主要建設為辦公用房、倉庫、飼養院、戲臺等，學校用房多數用村內廟宇和祠堂，大型建築較少。⁴⁰

郵政電信：1952 年平定縣郵政局與電信營業所合併為郵電局，承擔全縣的匯兌、報刊發行、通信、電報、電話業務，以後業務逐年擴大，較大的鄉鎮均設郵電支局。「1964 年，縣內郵路走到 29 條，全縣 22 公社和 35 個生產大隊可逐日到達，314 個生產大隊可隔日到達，全程 1311.5 公里。」⁴¹1953 年，安裝 50 門人工磁石交換機一臺，市話單機 74 臺。「1958 年實行鄉鄉通電話」，1963 年，基本實現村村通電話。⁴²

39 同上，第 530 頁。

40 同上，第 222-229 頁。

41 同上，第 214 頁。

42 同上，第 217-218 頁。

道路運輸：「文革」前，平定縣由於經濟不發達，交通運輸發展不快，境內主要依靠石（石家莊）太（太原）鐵路，太（太原）石（石家莊）公路，平（定）黎（城）公路及等級較差的鄉村路運輸物資。1958年陽泉市公共汽車通達平定。交通工具主要有膠輪馬車、膠輪小平車。1962年以後，平定汽車公司成立，「1966年，全縣汽車發展到30輛，連同6臺拖拉機，303輛馬車和2,898輛小平車，年完成貨用量4.86萬噸，貨物週轉量達到96萬噸公里，是1949年的6倍。」⁴³

電力：建國初期，平定用電主要依靠陽泉市供給。1956年之後，逐步增加電力設施，相繼建成東回、寧艾等配電線路100多公里。1962年，開始向平定周邊的洗馬堰、鐵廠、冶西等地送電。1966年，巨城、娘子關部分村莊開始送電。⁴⁴1966年，全縣線路總長350公里，配電變壓器438臺，全縣用電819.6萬度，其中工業用電占64%；農業用電占34%；生活用電僅占1.7%。⁴⁵

平定的政治運動

本節介紹的運動包括鎮壓反革命運動、三反五反運動、反右、大躍進，以及四清運動。

鎮壓反革命運動：1951年3月，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平定縣委決定，鎮壓反革命運動在全縣開展。運動採取群眾路線的辦法，實行全黨動員，群眾動員，公安、司法機關同廣大群眾相結合，檢舉和揭發反革命分子，鎮反運動很快在全縣形成高潮。運動貫徹「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即「首惡者先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使

43 同上，第200-203頁。

44 同上，第170頁。

45 同上，第171-172頁。

罪大惡極者受到嚴懲，有悔罪立功者得到寬大。到年底，根據《平定歷史記事》記載：全縣共打擊反革命分子 517 人，對認為是殺害了偵查英雄趙亨德的兇手周滿、勾結閻軍組織復仇隊殘害革命幹部 4 人的奸霸鄒林壽、勾結日寇，破壞地下黨組織殺死黨員的特務分子賈道孩等 24 名罪犯判處死刑。⁴⁶同時，開展政治攻勢，取締反動會道門組織，對 114 名道首進行集訓改造，包括點傳師 4 人，指導師 4 人，壇主 78 人，其他 28 人。通過改造、揭發、打擊、瓦解等措施，全縣 13,000 名道徒退出會道門。⁴⁷城鄉社會秩序好轉，中共平定縣委書記成建發向毛主席呈送了《平定縣鎮壓反革命運動情況報告》。報告稱：

1950 年，平定農村社會秩序混亂，群眾思想波動，區村兩級組織癱瘓，敵人氣焰囂張，為迅速扭轉這種局面，縣委縣政府從 1950 年 11 月開始，以抗美援朝運動和參軍運動為契機，兩次召開全縣幹部會議和各界群眾代表會，廣泛進行政治宣傳和思想政治工作，控訴日、美、蔣罪行，大張旗鼓鎮壓反革命分子，經過五個多月，全縣情況發生根本好轉，群眾階級覺悟普遍提高，人民優勢基本確立，人民武裝力量迅速壯大。⁴⁸

「三反」「五反」運動：1952 年 1 月，中共平定縣委作出決定，召開動員大會，貫徹中共中央《關於實行精兵減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汙、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和《關於反貪汙鬥爭必須大張旗鼓地進行

46 對打擊反革命等運動的評價，仍然需要更多的研究，尤其是不知是否有冤假錯案及其程度大小。根據之前的土改與鋤奸反特等運動的情況來看，冤假錯案可能是少不了的。故我們採取了「被認為」等字眼。

47 見前引《平定縣誌》，第 413 頁。

48 關於鎮反的記載，也見平定縣黨史方志辦公室（著）《中國共產黨平定縣歷史》（中共黨史出版社 2015 年 3 月版，第 215-216 頁）。該書給出的資料是，在 5 個多月的運動中，「全縣抓捕反革命犯 296 人，判處死刑 69 名，判處死刑緩期 2 年的 6 人，判處有期徒刑 76 名，教育釋放 20 名，回村管制 75 名，其餘收審」。

的報告》，動員大會針對本縣幹部隊伍中「貪汙不少，浪費嚴重、蛻化傾向普遍產生，官僚主義麻木不仁，一部分已經嚴重脫離群眾」的問題，闡述了中央指示，剖析了部分幹部「革命到頭、艱苦奮鬥精神已經過時」，「應該享受」的錯誤思想，決定全縣「大張旗鼓，雷厲風行開展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⁴⁹

運動分三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學習教育，端正思想；第二階段，自我總結，檢舉揭發；第三階段，落實處理，總結成果。在運動過程中採取主要幹部層層帶頭，重點發動人民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等措施和辦法。在方法上，動用回憶對比，啟發自身覺悟，開展「交、算、查」活動，即交關係（經濟關係、社會關係），查思想（自私思想、蛻化思想），查作風（官僚主義作風），算貢獻，從而達到教育目的。至 1952 年 5 月，全縣共揭出犯有貪汙的幹部 266 人，貪汙金額 15 億 7 千餘萬元（舊幣），其中，嚴重和較嚴重貪汙的幹部 68 人。

「五反」運動反對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1952 年 1 月開始 9 月結束。運動對象為平定城關工商戶。運動初期「把請吃飯、婚喪事的正常往來算作行賄，把機關修桌凳、裁縫（成衣鋪）取布頭，以次貨頂好貨算作偷工減料，把機關幹部將錢糧存入商號者計算利潤，算作盜竊，把商人已知行情漲落大量購置貨物的商業行為算作盜竊經濟情報」。後期反覆認證後發現「全縣偷稅漏稅在 200 萬元以下者，計 440 戶，共偷稅漏稅 7,390.48 萬元，全部免於補繳；偷稅漏稅在 200 萬元以上者計 24 戶，總額為 1,396.84 萬元。（舊幣：1 萬元相當於人民幣 1 元。）其中，酌情減免三分之一的 1 戶，三分之二的 1 戶，二分之一的 2 戶，全部減免的 1 戶，其餘 19 戶應全部補繳超過部分。關於交

49 關於「三反五反」運動，見上引書，第 222-223 頁。

款期限，工作組與商戶民主協商，定於 12 月前完成，大部分商戶均提前補繳。」⁵⁰

反右派運動：1957 年 6 月，縣委召開了鄉社幹部擴大會議，到會 584 人，縣委書記處書記作了「關於鳴放中必須劃清界線，辨明事非」的報告，宣傳部門編印 600 份宣傳題綱，分發各鄉政府、農業社，為開展反右派鬥爭作準備。7 月初，全縣召開反右派鬥爭運動，次年春運動結束，有 66 人被立案定為右派分子。1961 年 10 月，根據中央指示，決定給 9 位錯劃「右派分子」摘帽改正。1978 年 5 月，根據中央指示，對原立案定處右派分子全部核查，除 6 人因所在村鎮已劃給陽泉外，對原立案定處之中的 51 人進行復查，其中 45 人為錯劃「右派分子」，作了改正結論，其餘 6 人也摘了右派帽子。⁵¹

大躍進運動：1958 年，根據中央的號召，平定縣進入大躍進時期。2 月，縣委公布了《關於農業大躍進方案》，並分片召開了 4 萬人參加的「農業生產大躍進進軍誓師大會」，全縣大躍進拉開帷幕。8 月，經國務院批准，撤銷平定縣建制、轄區併入陽泉市，郊區人民委員會成立。同月，郊委按山西省委緊急電話會議精神，號召人民大煉鋼鐵，要求一切人力、物力的調配和使用，都要以鋼鐵為中心，為鋼鐵讓路。要求保證完成 1958 年生產生鐵 80 萬噸，鋼 55 萬噸任務。至此，境內「小土群」大煉鋼鐵運動開始，郊區以維社為主要基地，全民動員，家家上山挖礦，村村土法煉鐵，戶戶獻出廢鋼鐵，有的甚至砸碎日用鐵製品獻送。當年全縣共挖出鐵礦 5,400 噸，煉出次品鐵 1,200 噸。⁵²

9 月，郊委遵照中共中央北戴河會議《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

50 同上，第 222-225 頁。

51 同上，第 255-257 頁。

52 見同上，第 258-263 頁。

議》精神，掀起了人民公社化運動。郊區一舉成立 23 個人民公社，平均每個公社擁有農戶 1.3 萬戶。新建的人民公社是由工、農、商、學、兵聯合組織起來的社會基層單位，將原來的經濟條件不同，貧富懸殊的各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併起來，一切財產上交公社，社員自留地、家畜、果樹收為公有，分配制度實行工資制、供給制。群眾從事工農業生產勞動，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產集體化，採取大兵团作戰的方式。農村社隊普遍建立公共食堂。由於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經營管理過於集中，分配上存在嚴重的平均主義，制約了農民生產勞動積極性，致使農業生產發展受到嚴重影響。⁵³

「四清」運動：1964 年 1 月，中共平定縣委向全縣各公社發出通知，學習祁縣東觀「四清」經驗，並把材料印發到公社，其主要內容有「正人先正己，自己不正就無法領導別人」；「公社『四清』必須上下左右動手，邊整邊改作出榜樣」。5 月，成立「四清」專案組。專案組主要任務是：審核貪汙盜竊，投機倒把等八字問題和多吃多占腐敗墮落，官僚主義和教條主義等非八字問題的案件；審核申訴、控訴案件和違法違紀案件；貫徹政策、教育幹部和群眾，劃定階級成分與四類分子的評審工作。⁵⁴圖 1-1 和 1-2 是平定縣西郊村四清工作組的報告。我們可以看到當時被清理出來的一些村幹部貪汙、多吃多占的問題。

1965 年 1 月，縣委總結「四清」工作，全縣有 369 個大隊全部開展「四清」，有 155,000 人參加，占應參加人數 95%以上，已經結束「四清」的有 29 個大隊，正在整頓組織建立制度的 113 大隊，正在處理退賠 181 個大隊，正在甩「包袱」的 46 個大隊。甩完「包袱」的 246 個大隊，涉及 7,380 名幹部。據統計，全縣甩出經濟「四不清」和政治「四不清」的

53 見同上，第 263-266 頁。

54 見同上，第 283-287 頁。

理，不動態度，不戴大帽，不挖苦人。八隊付隊長齊群誠，原來只承認私念 300 斤糧食，就真結不統。在開小組會時，貧農郝鴻恩說：“我亲自給你扛上送去一麻袋玉米穗，你壯保管給了我十斤小豆，十九年還欠，你說是不長。”在事實面前，就承認了。②在貧下中農開展幫助三帮一拉運動。由於在干部交待開展了三自覺運動，交待出了大量問題，群眾興訶紛紛。他們高興的說：“老天爺開眼了”，“見了青天白日了”，“毛主席這件事又辦對了，95%的人滿意了”，“這場暴雨下的真適時”。但還有少數群眾發生了偏激情緒，他們說：“過去餓肚子，不應當主席的政策，是干部吃喝的了。”有的去找干部算賬，有的主張把干部全部換掉。我們發現了這些問題後，在貧下中農中開展了三帮一拉運動，即是幫助干部挑擔子，解除顧慮，放包袱，從水里拉起來。這樣就開展幹部帶幹部，黨員帶黨員，階級兄弟帶階級弟兄，放包袱的運動。使貧下中農認識“四清”不是單純整幹部，使幹部認識貧下中農對自己是親切的誠懇的。支委趙玉堂帶來兩件解脫顧慮，放包袱，由於兩個人是从小一起長大的階級弟兄，經過兩次談話起了很大作用。二隊貧農賈桂深幫隊長郝有春放包袱，賈桂深說：“咱倆過去都給地主任打過長工，現在你犯了錯誤，只要放了包袱，改正錯誤，你還是隊長，我當老农，一定能把生產搞好。”這兩個人傷了感情，也交待出了問題。

自覺運動的作用是很大的，自覺的好運動就搞得快，組上沒有做自覺交待出來了，群眾不知道的自覺交待出來了，這樣幹部和群眾的对立面也削弱小了。

經過自覺運動，交待出來的主要問題是：①貪污盜割糧食 1800 余斤，貪污受賄現金 2145 元。有貪污盜割糧食行為的 55 人，其中貪污盜割 500 斤以上的 5 人。②有找機會招惹幹部的子帶 3 人，爭取暴利 7

圖 1-1 平定縣西郊村四清工作組報告第 20 頁

資料來源：見前引郝志東、郝志剛（著）《西郊村》，第 154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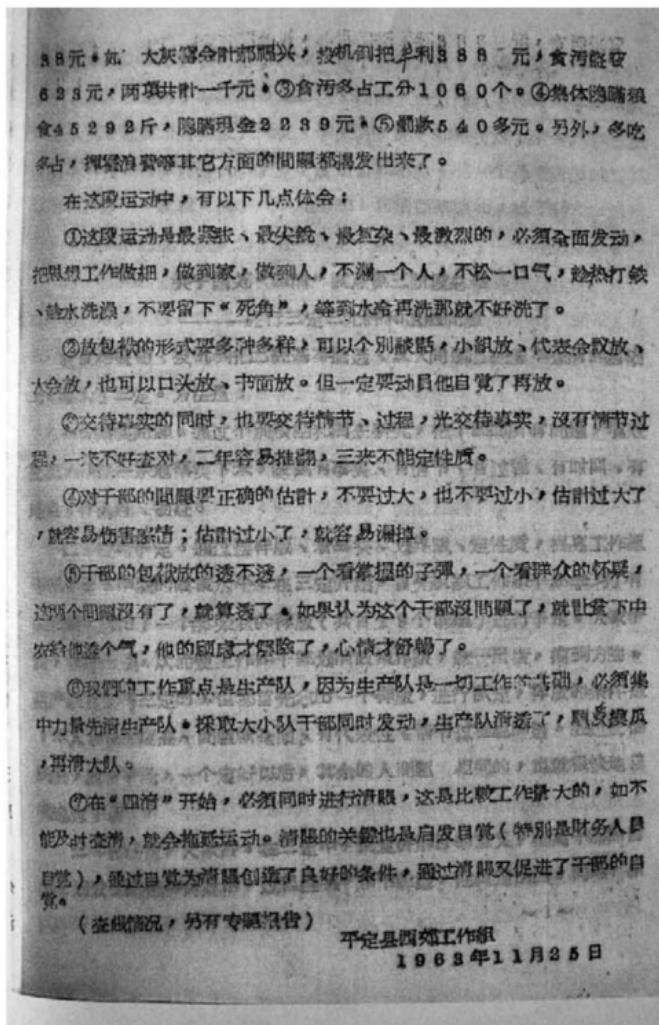


圖 1-2 平定縣西郊村四清工作組報告第 21 頁

資料來源：見前引郝志東、郝志剛（著）《西郊村》，第 154 頁。

包袱 52,300 個，經濟總值達 305,000 元，隊均 1,300 元，其中多記、亂記勞動日 24,074 個，歷年欠稅和多占、貪汙現金 178,929 元，多吃，多占糧食、糧票 89,007 斤。⁵⁵



圖 1-3 平定縣西郊村韓信廟趙秉文題詞碑記

資料來源：見前引郝志東、郝志剛（著）《西郊村》，第 3 頁。

總之，古代的平定多有兵荒馬亂之時。民國時期，山西曾經是省級自治的模範省，但是好景不常，緊接著日本的入侵、土地改革、國共內戰等使得平定縣無法平定。中共在 1949 年建政之後，如上所述，在工農業生產、商業、縣政、鄉政、村政等等問題上都做了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不少成績。但是合作化、公社化、公私合營等等公有制的發展也帶來了諸如大躍進、大煉鋼鐵、大饑荒等等問題。同等重要的問題是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在多大程度上是必須的，在多大程度上是過火的，都還需要再審視。關鍵的問題是，所有這些運動都為文革埋下了伏筆。政治成了頭等重要的問題，政治運動成了人們生活中的頭等大事，生產、民生等都要為之讓路，而且這種政治鬥爭又是非常殘酷的，不講人性的，如前言所說，是對人和

55 以上平定縣的資料來自《平定歷史紀事》。

社會造成永久傷害的。

最後，讓我們回顧一下本章開始時提到的金代平定刺史趙秉文（1159-1232）所作的一首詩作為本章的結語。趙秉文當時在瞻仰平定縣東面的西郊村韓信廟時，看了廟中殘碑序文後，作詩留念。「古壘帶煙餘殺氣，荒祠向晚動悲風。功名蓋世今如此，讀罷殘碑思不窮」。千百年來，殺氣猶存，民國以來的國共內戰、土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都充滿了殺氣。這在本書下面的文革敘述中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文革只不過是前面各次政治運動的繼續。直至今天，碑中的繁體「殺」字依稀可見，儘管現在的「殺」，基本上已不是肉體上的消滅。這首詩也可以看作是我們對平定縣千百年來，包括文革中那些叱咤風雲的英雄們所作的評價吧。

趙秉文的回顧與反思，也正是我們今天應該做的回顧與反思。還要這樣繼續「殺」下去嗎？

文革的思想動員：學毛選、批「黑幫」

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於滅亡，他們總是企圖復辟。……在這些情況下，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就闡明了的一條歷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是很激烈的。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1962 年¹

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林彪，1966 年²

1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公報」，1962 年 9 月 28 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0/65353/4442078.html>，上網日期 2015 年 10 月 9 日。

2 林彪，「再版前言」，載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編印，《毛主席語錄》，1966 年，第

其實我們在第一章所介紹的各種政治運動就已經為文革奠定了政治與思想的基礎。經濟上的發展，也為文革提供了物質上的支撐。比如縣裡的幾十輛汽車，在文革中就為運送造反派提供了方便，儘管走路仍然是人們從此地到彼地的主要方式。本章將具體介紹文革之初的政治運動，尤其是學習毛主席著作、批判鄧拓、吳晗、廖沫沙等所謂「黑幫」，以及紅海洋等運動。學毛選和批「黑幫」緊密結合。現在看來，學毛著、搞「紅海洋」等，提高了全民尤其是青年學生的思想覺悟、提高了大家的階級鬥爭觀念，是保證文革可以發動起來並進行下去的關鍵。

學毛選、提高階級鬥爭的覺悟

1960 年代初，在三年大饑荒之後，國家經歷了一個短暫的經濟恢復過程，使得人們剛剛能夠勉強獲得溫飽，野菜不再是餐桌上的主食。正當人們在慶幸又能比較平靜地過日子的時候，政治運動的潮頭就又一個接著一個地席捲而來：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又驟然緊張起來。1964 年，全國開始掀起一個學習毛主席著作運動的高潮。這個運動的初始階段，人們學習熱情高漲，具有學習自覺性，出現了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先進典型雷鋒。他的事蹟宣揚開以後，毛澤東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在學習雷鋒運動中，又出現了王傑、劉英俊、歐陽海、麥賢德等一批解放軍英雄，他們的日記被刊登在報刊上，被發行單行本，供全國人民學習。隨後，一大批全國的學毛著先進典型如大慶、32111 鑽井隊、焦裕祿、王進喜、草原英雄小姐妹等陸續被披露。全國開展大學解放軍的運動，《解放軍報》刊載《毛主席語錄摘編》供大

2 頁。這四句話最早由林彪（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於 1960 年 10 月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提出，1963 年作為學習雷鋒的題詞，和毛澤東等領導人的題詞一起登在 1963 年 3 月 2 日的《中國青年》雜誌上，1966 年見於《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

家學習。為了批判「資產階級靡靡之音」，在全國又開展了學習「拒腐敗、永不沾」的南京路上好八連的運動。總之，政治運動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占據了巨大的分量。

學生在學習文化課的同時，也在努力地「學毛著」。平定中學（現平定一中）高四班學生李金田在一篇回憶文章（未發表）中說：

那時候，我還在讀初中。有一天，課外活動時間，學校讓我們停止課外活動，搞了一次考試。我記得考試題都是學校以前佈置的有關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內容，裡面有一道題是背誦毛主席的《反對自由主義》。我平時各門功課都很用心，但是，由於不太重視政治內容，沒防住考這個，只記住一個大概，沒有記住原文。我只好把我記著的大意磕磕絆絆地寫上去，心想這下要歇菜，考個不及格咋辦。還好，那次考了以後，就沒了下文，既沒有判卷子，也沒有在記分冊上記成績。我才鬆了一口氣。

1964年6月，中共平定縣委批轉了文教黨組關於「青年教師王振梅學習毛主席著作的事蹟」的報告，這是在學毛著運動中平定縣委推出的第一個本縣先進典型。王振梅是鎖簧公社梨林頭小學教師，她18歲參加工工作，工作認真負責。她的事蹟材料《在毛澤東思想哺育下成長》以鉛印材料下發基層，以「再讀《紀念白求恩》和《為人民服務》」、「學校的好管家，教師們的好同志」、「活學活用主席思想」、「越學越愛學、越學越堅強」作為事蹟記錄標題。事蹟材料相對比較樸實可信，較少隨意拔高。³

本書作者之一郝志東，總結了自己在1965年在平定中學初中一年級下學期和二年級上學期時寫的34篇日記（每篇幾十個字到幾百個字不

³ 見平定縣檔案館存縣委檔案卷640。

等），發現基本上都是關於如何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心得與體會。在 4 月 9 日的一篇日記中，他描述了學生會召開的宿舍舍長會議所擬定的發展方向：第一，「大學毛主席著作，進行宿舍革命化」。要在週一、三、五學習，針對自己的問題，理論聯繫實際。第二，「大講革命故事，各宿舍要培養兩個善於講故事的人」，在吃飯時間或其他規定時間講故事。另外三項任務是開展文娛活動、講衛生、貼標語。在其他日記中，他用在不同的毛選篇章中學到的毛主席的話，來檢討了自己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比如和同學關係、自己當班主席時有哪些不足、和團支部的團結問題、不願意和壞人壞事做鬥爭的自由主義行為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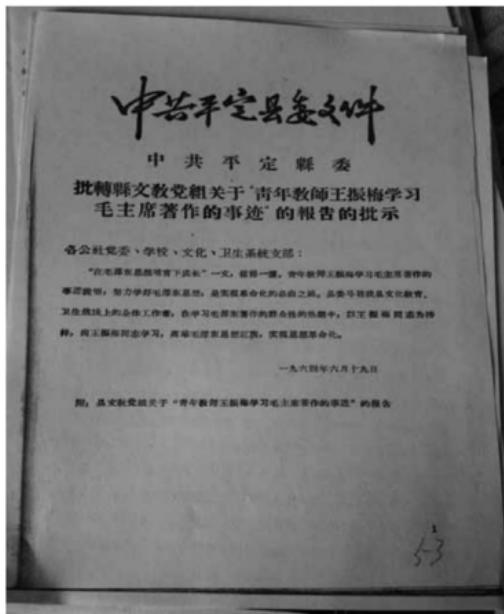


圖 2-1 中共平定縣委關於學習王振梅的文件



圖 2-2 郝志東日記扉頁毛澤東和王傑剪報肖像

當時郝志東只有 13 歲，但是在第一篇 1965 年 2 月 2 日的日記中，已經記錄了春節在村裡的團拜會上，村裡人揭發了地主李廷佐認窮人家的女兒玉花為乾女兒，試圖拉攏腐蝕革命接班人、反攻倒算的故事。之後，他還描寫了民兵的刺殺表演。他寫到：「在表演時，民兵們精力集中、全神貫注，帶著有力的刺刀，就像敵人、牛鬼蛇神在面前站著，恨的怒不可遏，狠狠地刺了上去」。可見這種階級鬥爭意識，已經深深地紮根在小孩子的心靈當中來了。小孩子們可能並不知道或者不理解暴力可能會帶給人們怎樣的痛苦，但是如果暴力是對待敵人的，也許這個痛苦就更不會感覺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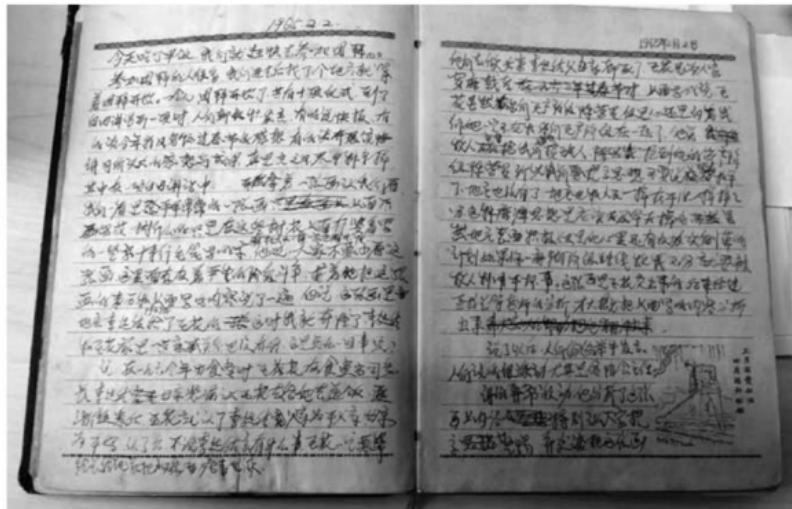


圖 2-3 郝志東關於「圓拜」的日記

這時的學毛著運動，也正是響應了林彪所發出「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的號召。林彪 1966 年在《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中說：

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面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強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強大的思想武器。毛澤東思想是全黨、全軍和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

因此，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用毛澤東思想武裝全國人民的頭腦，堅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澤東思想掛帥，是我黨政治思想工作的最根本任務。廣大工農兵群眾、廣大革命幹部和廣大知識分子，都必須把毛澤東思想真正學到手，做到人人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為了把毛澤東思想真正學到手，要反覆學習毛主席的許多基本觀點，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反覆學習，反覆運用。……

現在我們偉大的祖國，正在出現一個工農兵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新時代。毛澤東思想為廣大群眾所掌握，就會變成無窮無盡的力量，變成威力無比的精神原子彈。……⁴

這些話語，對那個時代的人來說，尤其是青年學生，都耳熟能詳，並深深地印在了自己的腦海裡。《毛主席語錄》先前只在軍隊內部下發。現在，擴展到全國各個單位和部門。同時，為了適應不同的人群學習，還發行了《毛澤東著作選讀》甲、乙兩種版本。

在學「毛著」熱潮中，中共平定縣委設立了專門機構「學毛著辦公室」，領導工作，觀察動態，樹立典型。1964年11月，中共平定縣委、平定縣人委會（政府）指示，全縣開展以貧下中農講習所為中心的群眾性的冬學運動，指定學習《毛澤東著作選讀》（乙種本），並強調「在居住比較分散或婦女文盲較多的大隊，將在鄉知識青年組成掃盲隊，由共青團和婦聯幹部擔任隊長，採取一幫一、一帶二的辦法，包掃一批學習條件差的

⁴ 林彪，「再版前言」，載於《毛主席語錄》（第二版），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出版，1966年。

文盲」。⁵1965年，中共平定縣委批轉黃統嶺公社神峪大隊黨支部關於「怎樣組織幹部社員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報告，批示說：「他們的事實再次證明，用毛主席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民群眾是戰無不勝的，教育人的作用是立竿見影的。」

1965年5月24日至29日，平定縣召開了全縣各條戰線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經驗交流會，樹立了以張瑾瑤為首的一批學毛著積極分子，其中包括前述青年女教師王振梅。1965年，娘子關公社城西大隊一支婦女突擊隊生產勞動的模範事蹟在縣報《平定小報》公開報導，題目為「娘子軍學毛著」。時隔一月，又發表後續報導「娘子軍在前進」，還報導了黃統嶺公社西頭嶺大隊「十姐妹」學毛著增幹勁的事蹟。1965年，平定縣推出一批學毛著先進典型，並印發他們心得體會的文字材料至全縣，其中包括鎖簧公社立壁大隊婦代會主任李美文、南陽勝公社北陽勝大隊女社員李蓮籽等。

1966年1月，中共平定縣委號召，「在全縣範圍內開展突出政治、大學毛主席著作宣傳月」活動。1966年2月，平定縣召開了「平定縣農村政治工作會議」，會議推出了一批學毛著積極分子標兵，包括黃統嶺公社黨委、黃統嶺公社神峪大隊黨支部書記段銀鎖、陽勝公社北陽勝大隊學習毛著輔導員韓有倫、娘子關公社代社長兼武裝部長任芝、南陽勝公社北陽勝大隊社員李蓮籽（女）、黃統嶺公社神峪口小學教師張瑾瑤、黃統嶺公社神峪大隊羊工段福壽、古貝公社郭家山大隊社員翟維貓等。1966年12月，中共平定縣委發文，推廣山西絳縣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經驗，並下發絳縣學毛著積極分子典型材料。平定縣的學毛著運動以「學絳縣」運動的形式進入一個新階段。⁶

5 見平定縣檔案館縣委檔案卷590。

6 見平定縣檔案館縣委檔案卷645。



圖 2-4 黃統嶺公社神峪口小學教師張瑾瑤背學生過河（1973）

資料來源：李俊瑞《一方水土：李俊瑞攝影作品（資料）選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平定縣委員會出版，第 120 頁。

「海瑞罷官」和文革的發動

1965 年 11 月 10 日，時任上海《解放日報》編委的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發表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矛頭直指北京市副市長吳晗。之後在半年內他又發表了批判北京市委副書記鄧拓、宣傳部長廖沫沙的評所謂「三家村」的文章，揭露他們的「反動本質」。

1966年2月，毛澤東的夫人江青在上海「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上，首先提出了文藝黑線的說法。該座談會紀要提出在文藝方面，有一條與毛澤東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這條黑線專了我們十七年的政，現在我們要專他們政。這個講話，作成紀要，以林彪的名義報中央政治局，後又經毛澤東親自修改三次後，4月1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下發。⁷

看來，中共中央高層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分歧已經相當嚴重。毛澤東曾經說過：「那個時候〔指1965年〕，我們這個國家在某些部門、某些地方被修正主義把持了，真是水滲不進，針插不進。」⁸1971年，中共中央下發文件，公開了毛澤東與美國記者斯諾1970年的談話：

斯：我有一個問題想提出來，即你什麼時候明顯的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

毛：那就早囉。1965年1月，二十三條發表。二十三條中間第一條就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在那以前，他出的書黑《修養》不觸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國民黨。⁹

1966年4月18日，《解放軍報》發表社論，宣布「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經到來」。這是權威媒體首次提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說法。同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

⁷ 「中共中央批發《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及附件，1966年4月10日。載於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大學服務中心出版，2014年（第三版）。也見卜偉華（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六卷，《「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出版，2008年，第40-52頁。

⁸ 毛澤東會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談話，轉引自閻長貴、王廣宇《問史求信集》，北京：紅旗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23頁。

⁹ 毛澤東，《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載於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號召批判「文藝黑線」。《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迅速轉載了這篇社論。5月8日《解放日報》發表江青的寫作班子「高炬」署名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同日，關鋒以何明的筆名在《光明日報》發表〈擦亮眼睛，辨別真假〉。兩篇文章對「三家村」的批判極大升級，矛頭直指北京市委。5月10日，《解放日報》、《文匯報》同時發表了姚文元的長文〈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第二天，全國報紙紛紛轉載，對「三家村」的批判發展到了高潮。5月11日，《紅旗》雜誌發表戚本禹的文章〈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至此，以批判「三家村」為導火索的摧毀「文藝黑線」的運動在有組織的推動和引導下迅速展開，全國各地到處「憤怒聲討」，向「三家村」猛烈開火。各地緊跟政治形勢，聯繫當地實際，也揪出了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店」，由此開始了社會政治領域的全面震盪。

這樣，「文化大革命」便從原來人們認為的「學術界論爭」，開始轉向政治領域，而且鬥爭鋒芒直指北京市委和市委書記彭真。5月11日，北京市委被改組，彭真被罷免了職務。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正式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宣布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宣布由陳伯達任組長、江青任第一副組長、康生為顧問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成立，並成為文化大革命的直接領導機構。

《五一六通知》說：「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經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任，被培養為我們的

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正睡在我們的身邊，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¹⁰這一段話，是由毛澤東親自撰寫的。

《通知》對當時整個意識形態領域的形勢和基本情況的結論是：「對於一切牛鬼蛇神卻放手讓其出籠，多年來塞滿了我們的報紙、廣播、刊物、書籍、教科書、講演、文藝作品、電影、戲劇、曲藝、美術、音樂、舞蹈等等，從不提倡要受無產階級的領導，從來也不要批准。」¹¹

《通知》的這些提法，已經把文化革命的意義上升到奪權與反奪權的高度，並且不指名地確定了要被打倒的人，矛盾已經從意識形態領域擴展到了政治領域。

乘著《五一六通知》的「東風」，北京大學哲學系黨支部書記聶元梓等在 1966 年 5 月 25 日貼出了全國的第一張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麼〉，矛頭直指北京市委大學部和北京大學黨委，並間接指向以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毛澤東在 5 月 31 日下令公布聶元梓等 7 人的大字報。

之後《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引用林彪的話說，一場如暴風驟雨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高潮已經在我國興起。此刻，黨和國家的領導層也發生了變動：先是羅瑞卿（原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副部長、總參謀長、軍委秘書長）被批判、撤職、軟禁並不堪受辱而跳樓自殺未遂。在 1966 年 5 月的政治局會議上，又撤銷了文化部部長陸定一和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的職務。彭、羅、陸、楊四人被定為「反黨集團」。這些中央高層的人事變動，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開

¹⁰ 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1966 年 5 月 16 日），載於前引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¹¹ 同上。

始，也標誌著毛澤東對持有不同意見領導幹部新一輪清洗的開始。

中共山西省委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決定成立「學術批判領導小組」，並發出《關於開展學術批判運動的通知》。《通知》指出了批判的重點代表人物，同時強調要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並分別召開教育、文化、出版、衛生、體育等座談會，對「學術批判」作了部署。從這個部署裡，可以看到，山西省的領導層還把這場運動局限在「學術批判」的範圍內，並沒有揣摸透毛澤東發動這場運動的意圖和用意。¹²

這時候，平定中學的「文革」運動，還是按照以往運動的慣例，由校黨支部按照上級的部署，自上而下地指揮著，按部就班地開展。據被訪者之一高三班學生岳智明回憶：

1966 年前半年，學校的運動是批判反動學術權威，在整個過程中，學校有組織地按照中央政策對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的權威人士展開批判。學生的任務除了平時的學習外，主要是學文件，寫文章，批判「三家村」「四家店」，還寫一些批判舊的教育路線的大字報。後來，在縣委的號召下，5 月份下鄉參加支農抗災。

本書作者之一郝志東在 1966 年 5 月 18 日的日記中寫到：

今天下午，全校開了「聲討鄧拓等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大會」。在會上，先後有 20 多位教師、職工、學生都講了話。他們講話時都對鄧拓等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憤慨萬分，充滿了深厚的階級感情，用鐵的事實回擊了鄧拓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

12 見平定縣檔案館縣委檔案卷 653。

〔大家〕都表示要積極參加這次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把文藝戰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都統統趕下我們的文藝戰線去，徹底革命，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捍衛黨、捍衛毛主席，把文藝戰線上的革命進行到底！最後，全校同學老師都呼了口號。

他在 6 月 8 日全班同學參加裡社大隊的抗旱活動結束後回到學校時寫的日記中說：

一到學校，〔就發現〕到處貼著大字報，聲討以鄧拓為首的一夥壞東西，歡呼黨中央改組北京市委的決定和撤銷北大書記陸平、副書記彭佩雲的職務的決定。可見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今後一定要像貧下中農囑咐我們的那樣，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他在 6 月 24 日的日記中寫到：

在短短的幾天內，大字報貼得滿校園都是，揭露一切牛鬼蛇神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揭露資產階級的「權威」老爺們的反動本質，等等。搞得迅猛異常，把那些牛鬼蛇神打得落花流水，威風掃地。

當然，這些大字報基本上都是荒唐的指控。比如在當天的日記中，郝志東寫到了大字報揭發出來的所謂「北京團」的問題，即說李鵬（中文老師）、李淑琴（生物老師，和李是夫婦）、陳元才（音樂老師）、陶予（歷史老師，和陳是夫婦）、楊乙榮（物理老師）、杜鵬泉（職工）、張家浩（歷史老師）、黃徑秋（英語老師）等人在北京某地策劃反黨反人民的計畫等等。我們將在第四章更詳細地敘述後面的發展。

這種批判活動在縣直機關也同樣展開了。據當時的縣團委副書記劉懷祿回憶：

我是 1957 年參加工作的。剛開始參加工作是在平定縣委文教部，1966 年又調到平定縣團委。文化大革命最初是以揭批《武訓傳》《海瑞罷官》開始的，當時的好多運動都是由團委具體組織的。「文革」開始的時候，群眾對於參與運動不太熱情，縣委出面進行動員，後來，群眾就陸陸續續參加到運動中來了。

當時的機關幹部王迪林也說：

1966 年，文革開始時，平定縣委也做了相應的安排，進行了傳達，但並沒有引起重視，作為基層的幹部和群眾，認為上邊在搞政治運動，和以前的「三反」「五反」「四清」差不多，看的沒有那麼遠，那麼深。直到後來中央不斷發文件，《人民日報》等宣傳工具大造聲勢，批判反動學術權威不斷升級，平定的幹部群眾才逐步認識到這場運動和以往有所不同。特別是在領導幹部階層出現彷徨心理，開始擔心黨和國家的命運，猜測中央已經有了政治風波。但更多的是在不斷經受政治運動之後，擔心自己的前途和命運，擔心受到政治衝擊。由於言論不自由，上下級之間、同事之間、親朋之間很難交流思想，互相的關係處於一種微妙的狀態。應該說，當時領導幹部待遇不高，又經常搞運動，很多人害怕當領導，不願當領導，特別是農村選擇幹部很難。當然，也有少數人對運動表現出了興奮和狂熱，認為自己可以施展本事了。當時，在領導階層思想其實是很複雜的。

根據上級安排，平定縣的宣傳部門、文教部門、團縣委等也進行了安

排，特別是對學校進行動員，正常的學校秩序已經被打亂。但總體上看，平定縣的各級領導幹部並沒有感覺到一場特殊的政治動盪即將到來。不管是理解，作為最基層的平定縣黨委和人委（政府），還是在努力地貫徹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文件顯示，時任縣委副書記（書記缺任）、縣長的朱永，詳細地在規定的範圍內傳達這些指示和講話，包括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講話、林彪關於政變的講話、中共中央關於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處理決定等。

與文革同步的學毛選、學英雄、學大寨、「紅海洋」、提高階級覺悟運動

1966年7月24日，突來暴雨襲擊燕龜公社（時屬平定縣轄）北莊大隊，山洪暴發，洪水衝擊山谷中隊辦小煤窯的煤炭和坑木。時年只有十三週歲的本隊社員梁換果與一幫女孩欲涉水過溝搶險，不幸被洪水沖走身亡。《平定小報》以整版篇幅報導此事，並披露梁換果學習毛著的心得筆記：「學深思，多請教，學用一致最重要，嚴格要求不含糊、思想改造第一條」。平定縣婦聯發出「向梁換果同志學習的通知」，要求「廣大婦女不僅自己本身要向梁換果同志學習，做梁換果式的英雄，而且要把自己的子女培養成為梁換果式的革命接班人，教育他們像梁換果同志那樣無限熱愛黨、無限熱愛毛澤東、無限信仰毛澤東思想；像梁換果同志那樣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像梁換果同志那樣學英雄的榜樣，走英雄的道路，創英雄的業績，使他們真正成為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

梁換果落水犧牲時，尚未未成年，且尚在讀書年齡。囿於當時經濟條件與辦學條件，未讀初中的未成年人尚有相當大的數量。他們在戶口所在大隊（村），參加農業勞動，身分已成社員。上世紀六〇年代，也沒有未成年人保護法律法規。



圖 2-5《平定小報》關於梁換果的報導

與此同時，平定縣的學毛著運動，和學習大寨、學習陳永貴運動緊密聯繫。大寨所在昔陽縣緊鄰平定，同屬晉中專署統轄，關係緊密。1963年，當大寨剛被樹立成「奮發團結、自力更生、以國為懷、顧全大局」的農業先進典型時，平定縣就邀請陳永貴來平定作報告。1964年，石門口公社遭遇洪災，陳永貴前往並發表講話。當平定縣推出學毛著先進典型「紅色山鄉教師」張瑾瑤時，陳永貴曾與張瑾瑤合影。平定縣還樹立本縣學習

大寨的標杆人物「陳永貴的好學生」趙綱，種谷模範趙三虎。在 1966 年 2 月召開的本縣農村政治工作會議上，「陳永貴同志談抗旱鬥爭」是大會重要文件。在毛澤東號召「農業學大寨」的形勢下，學大寨運動成為本縣學習毛著運動的一個重要內容。¹³



圖 2-6 張瑾瑤帶領學生參觀大寨時和陳永貴合影

資料來源：李俊瑞《一方水土》，第 117 頁。

13 見平定縣檔案館縣委檔案卷 636。

在此期間，平定縣發生了白生雲犧牲事件。白生雲是平定縣維社公社牛王廟溝大隊（後改名為紅衛大隊）人，擔任該生產大隊長，平時生產勇於帶頭，樂於助人。當時各生產大隊自辦的小煤窯是社員收入分紅的主要來源，牛王廟溝大隊也開辦小煤窯。小煤窯生產設備差，安全沒有保障。是年 7 月 13 日，該大隊小煤窯發生滲水。白生雲為了排除積水、儘快生產，同坑長岳成同去冒險排水，被強壓下的窩水沖倒，窒息而亡。岳成僥倖逃生。後來，縣委認為白生雲之死係岳成所害，在追悼會現場逮捕岳成，並判刑。

白生雲的事蹟被發掘出來之後，中共平定縣委為宣傳他的事蹟，下了很大力氣。1966 年 8 月 17 日，縣裡組織 2 萬人追悼會，會場設在東關舊奶奶廟的職工俱樂部，有一個很大的戲臺，及一個巨大的露天廣場。為了布置會場，調用縣商業系統的大量商品白布，請來舊時的紗彩藝工，從平定中學調來一個班的學生搭下手，歷時十餘日，將職工俱樂部舞臺從外到內全部用白布遮裹。當時在平定中學高四班讀書的李金田回憶說：

我們那時候每個學期都有一週的停課勞動。這一次勞動，我們被派到東關職工俱樂部去布置白生雲追悼會會場。為什麼布置會場會用這麼多人這麼長時間呢？因為那次會場布置的特別排場，整個臺全用白布裹起來，吊著白布做的繡球。臺頂上那些繡球，一個繡球用整整一匹白布。那些白布，都是從百貨公司用車拉來的，可多了。後來，會開完了，我們去拆卸的時候，看到那些繡球下雨淋濕寫了水的都漚黃了。我心想，多可惜。因為那時我穿的鞋，都是媽媽拿破布摞起來做的鞋底。我所以記得這麼清楚，是因為那次勞動，我們跑校生學校也管飯，而且沒交糧票。那位負責布置舞臺的工匠我認識他，和我是一個大隊的，叫劉肇慶，還是個管理區（生產大隊）的幹部。後來我返鄉勞動，聽隊裡的人說，他在舊社會就是

幹這一行當的，叫繁彩。



圖 2-7 白生雲事蹟展覽介紹

資料來源：李俊瑞《一方水土》，第 116 頁。

開會當日，縣長朱永等縣領導悉數到會。會場戒備森嚴，圍牆周圍和兩個大門口都由民兵持槍站崗。縣長朱永代表縣委、縣人委（即政府）致悼詞，省委、省政府派員參會，並代表國家民政部向其家屬頒發《因戰因火犧牲人員家屬光榮紀念證》。縣委副書記鄭忠華宣讀縣委關於學習白生

雲的決定，晉中地委代表講話，白的父親、愛人和生前戰友講話，相鄰各縣代表宣讀弔唁函。

《西郊村》一書記載了該村民兵參加這一活動的情況：¹⁴

「文革」期間，西郊村民兵聽從縣人民武裝部領導指揮，多次參加縣裡的各種活動。1966年8月17日，縣委縣人委組織召開萬人大會，追悼白生雲（牛王廟溝大隊黨支部書記，因在本村煤窯排險犧牲），公審有故意謀害白生雲的嫌疑犯岳成。西郊武裝基幹民兵40多人，全副武裝持槍在會場周圍執行警戒任務，維持會場秩序（基幹民兵是民兵中18-30歲的基本骨幹民兵，31-45歲為普通民兵）。

8月28日，縣委、縣人委在職工俱樂部舉辦白生雲事蹟展覽，到9月4日，共有356個單位的11,700多名幹部群眾參觀展覽。10月10日，晉中地區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1,700多人，來平定參觀白生雲事蹟展覽。10月20日，晉中文化工作隊220餘人，在中共晉中地委宣傳部長劉松青、副部長王水帶領下，來平定參觀展覽、瞻仰陵墓、慰問烈士親屬。文工團和晉劇團排演了節目。10月25日，縣委舉辦白生雲事蹟報告會。¹⁵

1966年8月11日，中共平定縣委擬定了「關於請求批准嚴懲謀害革命英雄人物的現行反革命罪犯岳成的報告」。¹⁶「報告」敘述了原牛王廟溝大隊大隊長白生雲因小煤窯坑下排水犧牲的過程，稱其犧牲原因是「岳成蓄意謀殺」所致，並列舉了岳成此行為的動機與原因，認為「應當予以重

14 見郝志東、郝志剛（著）《西郊村：一個華北農莊的歷史變遷》，2008年澳門大學出版。

15 平定縣檔案館存《平定小報》，1966年8、9、10月。

16 見平定縣檔案館縣委檔案卷743。

處」，認為最少應判有期徒刑二十年，剝奪政治權利十年。本來岳成與白生雲之死的關係，應由公檢法部門經過調查核定，依當時法律查處，縣委不應干預。縣委擬文上報，並且提出處理意見，本是以黨代法的行為，即使在當時「左」的形勢下，也是越權的。

現在看來，岳成的事情應該是一樁疑案。當地下水湧來時，白生雲沒有來得及跑，而岳成僥倖逃了一命。但是，需要製造一個階級敵人，然後才能樹立一個英雄形象。這無論在文藝界還是現實生活中，都是當時的事實。¹⁷ 由於岳成家屬沒有追究此事，這個案子在本書成形時，在外人看來仍是一樁懸案。

1966年8月16日，中共平定縣委作出「關於學習毛主席的好學生白生雲同志的決定」，並向省委、省人委、地委、專署上報「關於白生雲同志英雄事蹟的報告」，撰寫了「共產主義的新——白生雲」的專題長篇通訊。1966年9月27日，中共晉中地委批轉並上報了縣委報告，號召全區學習。在全縣開展的學習毛主席著作運動中，此事件是濃重的一筆。¹⁸

與此同時，社會上的「學毛著」運動在縣委的領導下，正搞得風生水起、如火如荼。原平定縣糧食局局長王增榮在他所著《糧食工作回顧》的「工作日記」中記錄了本單位「學毛著」的情況：¹⁹

1966年11月13日，縣長朱永傳達了省委在絳縣召開的會議精神。他說，看絳縣，想平定，差距更大。縣委找出五個差距，即：毛澤東思想紅旗不如絳縣舉得高，學毛著的位置沒擺上去，縣委思想革命化亮的不透、

17 見韋君宜（著）《恩痛錄》中「編輯的懺悔」一章中關於文學作品必須塑造一個階級敵人才能出版的事情。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52-160頁。

18 見平定縣檔案館縣委檔案卷642。

19 王增榮，《糧食工作回顧》，平定縣誌編撰委員會審定並出版，1992年。

抓的不准、鬥的不狠，私字解決的不透，依靠貧下中農大搞群眾運動搞的不好，沒有把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尖子提到各級領導位置上來。

縣委採取六條措施，口號是：大幹一百天，誓將平定變絳縣。六條措施是：召開三千人的大會，會期四天；組織六百人的長期工作隊，發動群眾，實現處處紅、人人紅、家家紅、全縣紅；發動群眾，吃憶苦餐、憶苦思甜，訴階級敵人的苦；層層大搞思想革命化、大評比、大樹標兵；層層條條大搞講用。縣委還作了三條規定，即：不學毛著就是不革命，學不好毛著就是不稱職；領導不好好帶領群眾學毛著就是失職行為。1966年11月15日，中共平定縣委召開了四級幹部會議，貫徹了上述精神。

這次會後，縣局（指本縣糧食局——轉錄者注）又進一步組織了職工學毛著、背語錄，做了不少標語牌，辦公室的內外牆壁，都掛上語錄牌，大塊的牆壁上寫了大幅標語，大幅標語的四周用十公分寬的木板做邊，內用水泥沙漿抹光，紅底黃字，然後用油漆油刷。在門窗的玻璃上、文件櫃上都寫了毛主席語錄。真是一派濃厚的學毛著氣氛。

向絳縣學習的內容之一，是搞「紅海洋」。「紅海洋」運動在山西，是由絳縣的縣委書記周明山首倡發起的（見圖2-8周明山和陳永貴等人的合影）。當時的流行說法是，「紅色象徵革命，白色象徵反革命，粉紅色象徵資產階級思想」。在這種思想推論下，付諸實際的是以紅色充斥視野。許多街道的街門全部被漆成紅色，牆壁用「小紅土」這種廉價顏料刷成醬紅色。這也是朱永講到的「處處紅、人人紅、家家紅、全縣紅」的來源。

在學毛著、學絳縣的運動中，平定縣在全縣農村開展「雙五好競賽」運動。「雙五好」為「五好生產隊」和「五好社員」。「五好生產隊」的條件是：(1) 政治思想好；(2) 生產建設好；(3) 經營管理好；(4) 幹部作風好；(5) 生活安排好。「五好社員」的條件是：(1) 政治思想好；(2)

集體勞動好；（3）學習技術好；（4）愛護公物好；（5）勤儉持家好。縣委在 1966 年 2 月召開的「農村政治工作會議」上，總結 1963 年以來「大學解放軍、大學大寨」的運動，隨之開展以五好為目標的比學趕幫競賽運動，統計出全縣的五好生產隊 600 餘個，五好社員 16,700 餘人，並且安排了下一段的競賽運動。²⁰



圖 2-8 陳永貴（左二）、王進喜（右一）、張瑾瑤（左三）、周明山（左一，帶頭搞「紅海洋」的絳縣縣委書記）等於 1964 年全國人大代表會議時在一起合影

資料來源：李俊瑞《一方水土》，第 117 頁。

1966 年 5 月，縣委召開擴大會議，對「突出政治」作了進一步的安排。會上，黃統嶺公社黨委書記岳有祥作了題為「突出政治的關鍵在於公

20 見平定縣檔案館縣委檔案卷 640。

社黨委的思想革命化」的重點發言。東回公社黨委代理書記張瑞智作了「東回公社進一步開展群眾性學習毛主席著作運動的體會」的重點發言，北陽勝大隊蹲點工作組史章鎖作了介紹該大隊建立共產主義夜校、探討會、五好日活動的經驗，牛角溝蹲點工作組張維智介紹了該大隊經營管理經驗「以勞定級，評等計酬」，介紹了立壁大隊黨支部「小整風」的經驗。在會上，縣委農村政治部主任趙生堂通報了本縣「突出政治、大學毛主席著作的情況」，介紹了「絕大部分生產大隊都建立健全了共產主義夜校、探討會、五好日等三項制度」的情況，學毛著自覺性越來越高的情況，「農村中政治空氣更加濃厚」的情況，「精神變物質，思想變了，生產和工作面貌也就變了」的情況，強調了下一階段要加大此項工作力度。縣委組織部長張鐵鎖作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以大寨為榜樣繼續深入開展黨內小整風運動」的發言，強調黨內整風。縣委常委賈正杞作了「關於推行大寨經營管理經驗的情況和今後意見」的發言。²¹

在學習毛澤東著作的運動中，1966年6月，縣委又推出了先進典型鎖簧公社立壁大隊一隊隊長趙三虎。趙三虎以種穀子高產聞名全縣，畝產達690斤。他的經驗材料裡說：「以生產抓生產是搞不好生產的，是立腳於不鞏固地位的。比如風調雨順的1964年穀子畝產750斤，而經不起1965年159天大旱的考驗，降為380斤。原來認為是天災，沒有從人的因素是第一來認識減產的原因。通過學習主席著作，認識到天固然有災，但不是決定因素，決定因素是人，而不在天。從人來檢查，主要是沒突出政治，沒學好主席著作，人的思想不過硬。」²²

縣委還推出鎖簧公社立壁大隊婦代會主任李美文的經驗介紹材料《腳踏實地地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材料裡說：「鄧拓、吳晗一小撮黑賊惡毒

21 見平定縣檔案館縣委檔案卷629。

22 同上。

地攻擊毛澤東思想，指責我們種地運用毛澤東思想是『庸俗化』、『實用主義』，真是胡說八道，比狗屁還臭。」她介紹了自己如何在學毛澤東著作中認字學文化、背誦「老三篇」、帶頭搞生產等，說：「我要讀一輩子毛主席的書，聽一輩子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幹一輩子革命。不僅我要學，還要動員更多的人學，讓我們的兒孫後代學，使主席思想代代相傳，一脈不斷。」在推出的東回公社東回大隊婦女代表穆蟬鳳的學毛著經驗材料《讀毛主席的書，捍衛毛澤東思想》裡，用「發階級憤，起來鬧革命」、「活學毛著，向黑幫開火」為標題，敘述她學習毛澤東著作為集體多幹活等事情。縣委在大力培養和宣傳舊的先進典型的同時，樹立新典型。他們的典型材料，都鉛印下發至基層。²³



圖 2-9 田間地頭學毛選

資料來源：李俊瑞《一方水土》，第 133 頁。

23 同上。

1966年8月6日，李素文、王二貨學毛著展覽在平展出，中共平定縣委副書記鄭忠華、縣長朱永、監委書記曹黑小等領導參觀並留言。展出3天中，有3,600人組織參觀，860人留言談觀感心得。9月15日，以晉中榆次石油站工人王二貨為團長的晉中地區學毛著積極分子講習團東山分團來平作巡迴報告，全縣6萬餘人分4片聽報告。9月，晉中地區召開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會議。會議規模龐大，僅平定一縣，就有116名代表出席會議。縣學毛著積極分子張瑾瑤、趙崗、任芝等悉數到會。會上，鎖簧公社官道溝大隊、黃統嶺公社、神峪口小學被評為先進集體，張瑾瑤、岳有祥、趙崗、任芝等9人被評為先進個人。會後，平定縣分片召開2萬人大會，貫徹晉中地區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精神。縣委創辦「學習毛主席著作簡報」，10天1期，刊出學毛著先進典型材料。²⁴

1966年9月7日，中共平定縣委組織本縣163個大隊及城關鎮共532名學毛著輔導員進行集中培訓，培訓時間為15天，至當月21日結束。培訓中，聽取縣委副書記鄭忠華的報告，學習中央關於「文革」的文件，學習「老三篇」，參觀白生雲展覽，請晉中地區學毛著積極分子作報告，聯繫自我用階級鬥爭觀念分析，然後讓他們回到基層進行輔導和示範。同時，縣委還系統細緻地傳達了晉中地區學毛著積極分子代表會議的詳細情況，要求「對照會議找差距」，把我縣學毛著運動推向一個新的高潮。同月，縣委印發《大寨黨支部的十九年》下發基層，宣傳學習。²⁵

1966年10月，縣委轉發了縣委鎖簧工作組關於鎖簧公社工作情況的報告。縣委所加按語說：「縣委鎖簧工作組提供了一個比較好的經驗，就是千條萬條，突出政治，大學毛主席著作是第一條。在整個工作過程中，貫徹抓革命，促生產的精神，是根本的根本。」縣委鎖簧工作組38人，是

24 見平定縣檔案館縣委檔案卷640。

25 同上。

由參加介休縣「四清」後返回本縣的幹部組成，至「報告」產生時已入駐該公社 40 餘日。「報告」中用不少例證來證明其「用毛主席著作改造人的思想」的效果和成績，其中不乏形式化、表面化的東西和「左」的東西，如「無數事例，都雄辯地說明：毛主席的書，一讀就靈；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²⁶

如談到立壁大隊第十隊隊長張銀海有一眼半多餘窯洞，十二隊計畫用 650 元買下給集體做馬棚，張不願賣。後學習《紀念白求恩》，就自願交給集體，購買者僅付 300 元。文中披露了該公社「廣大幹部和群眾……退出出墾種小塊地和侵占集體地 303 畝」。該「報告」還說：²⁷

不少幹部群眾用革命的口號批判了資本主義的思想，用革命的手砸碎了封建主義的遺產，用革命的筆寫滿了社會主義的新風，特別是隊、院、戶、家寫滿了毛主席的話。目前為止，新購毛主席著作 7,530 本，新買毛主席畫像 3,890 張，新貼毛主席語錄 4 萬多張，新建大小黑板 6,400 塊，經常參加學習的人數已達 9,817 人，占成年人數的 65%。……學習比較好的官道溝大隊和各大隊的部分生產隊，參加學習毛著的人數竟達 90% 以上，而且實現了毛主席著作人手一冊，毛主席畫像戶平兩張，毛主席語錄家均三條。

該「報告」列舉一個學毛著的事例說：前鎖簧大隊大隊長郝永山在破「四舊」立「四新」運動中，把大門上的封建遺產「環秀邑翠」削平，寫上「突出政治」；把二門上的「為善最樂」挖掉，寫上「敢於鬥爭」；把院內的土地廟壘住，變成語錄牌，並分別寫上「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

26 同上。

27 同上。

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的語錄。把家裡的祖宗像、神主也燒了，貼上毛主席的像。把地主流傳千載的葛家院改成「革命院」，現在全院 8 戶社員成立了一個學毛著院鄰組……。這些事例，一方面反映了縣委下鄉工作隊不遺餘力貫徹上級意圖大力學毛著、學絳縣、大搞「紅海洋」、大破「四舊」的工作力度，同時也反映出在極「左」思想的作用下，農民被強制捲入「文革」洪流，家庭和個人極狹小的一點私有空間被強制剝奪的狀況。²⁸

1966 年 11 月，中共平定縣委就「貫徹林彪指示和晉中區學毛著積極分子代表會議精神」給地委發出報告。這年 10 月 10 日，《人民日報》發表林彪指示「把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群眾運動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縣委在「報告」中談了自己對這一指示的認識，並彙報了自己「大張旗鼓地開展學習宣傳林彪指示和晉中代表會議精神的活動」。報告說：宣傳形式有以下四種：²⁹

(一) 召開不同會議，大造聲勢。即（10 月）13、14 日全縣分五片召開了兩萬人大會；18 日下午召開了赴外地四清隊伍和留縣幹部聯歡誓師大會；25 日縣委又召開了各公社黨委書記、大隊黨支部書記、下鄉工作組長電話會。與此同時，赴晉中學毛著代表會議的 90 多名代表分別在本村、本社及附近村、社召開群眾會、地頭會、座談會等不同會議，大力宣傳了林彪同志的指示，傳達了代表會議精神。(二) 縣裡統一翻印了 1 萬份林彪指示單行本和 5,000 份大字報發至全縣各地。(三) 縣、社兩級組織了千人宣傳隊，深入到群眾中廣泛宣傳，並選調了 30 多名參加赴晉中學毛著代表大會代表，組成 10 個講用團，深入到山區……。(四) 充分利用電

28 同上。

29 同上。

影、劇團、小報、廣播、黑板報、大字報、標語牌等各種宣傳組織和宣傳工具，集中力量宣傳……

在另一份給地委「關於貫徹華北區絳縣現場會議和省委第三次農村政治工作會議精神的報告」中，縣委在談到「主要收穫」時稱「對高舉不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是革命不革命的實質問題有了進一步深刻的認識」、決心學好「老三篇」，徹底改造世界觀。縣委報告中說：

與會的 3,000 名幹部匯成一個聲音：決心學好「老三篇」，徹底改造世界觀，「完全」、「徹底」為人民，攻掉「我」、「私」兩座山。在整個會議期間，同志們的決心書貼滿了會場牆壁，讀書聲，唱紅歌聲，到處可以聽見。按規定時間早上應六點起床，但與會的所有同志都是四點多就起來了，有的為了抓緊時機學習毛主席語錄，一時一刻都不放過。據不完全統計，會議期間背會「老三篇」的有 699 人，背會兩篇文章的 714 人，背會一篇的 412 人，學會五首以上紅歌的 1,705 人，三首以上的 903 人。

「報告」甚至例舉一些特殊事例來說明人們學習熱情：東回公社稅務所幹部翟子惠，因為把全部精力集中在背「老三篇」上，早上到廁所被石頭絆倒摔了一跤，爬起來拍了拍身上的土繼續在背，晚上散會回宿舍時，由於思想過分集中，碰到了牆上，腦袋被碰下一個疙瘩，用手摸了摸還在不停地背誦。「報告」說，這個大會「會內會外相互結合，互相促進，有力地推動了全縣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和當前的生產鬥爭」。「廣大群眾聽了大會的消息後，人人精神振奮，鬥志昂揚，賀電、賀信、喜報、決心書如同雪片一樣飛來。東回中學還專門派了兩人星夜回城向大會送決心

書。臨動身前，學校全體師生敲鑼打鼓送到汽車站。」³⁰

城關各機關、廠礦、商店的職工們連夜苦幹，刷牆漆門，寫標語、貼語錄，兩三天時間就把整個城關變成了紅色海洋。市民們還向大會報來決心書，表示要變消費者為生產者，割掉資產階級的貪圖享受觀念。縣委機關三天推廣了絳縣機關革命化的經驗，把原來的十三個部室，合併為一部、一委、一隊，在原有編制 130 人的基礎上減少到機關只留 13 人工作，其餘的都下鄉蹲點。塑膠廠的職工們聽了大會的消息後，三天時間，全廠 33 人全部背通了「老三篇」，老工人荊常生為了儘快背會「老三篇」，把他的兒子叫到廠裡和他一起睡覺，給他當輔導員。縣文化館聽到大會精神後，及時給河南解放軍部隊拍電報聯繫，訂購了 1,000 冊「老三篇」發給社員學習。雙目失明已 21 年的黃統嶺大隊劉二旦，不僅記下了 30 多條語錄，而且把主席語錄編下了十幾個快板，買下了胡琴，學下了十幾支紅歌，走到哪裡就把毛澤東思想宣傳到哪裡。「報告」對下一段的工作安排是：「不論機關、廠礦、學校、農村，都要實現人紅、家紅、字紅、院紅、街紅、路紅、處處紅、全縣紅。要求百天內全縣出現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 30,000 名，其中能擔當中層領導骨幹的 5,000 名，出現了 117 個標兵單位。」³¹

同年 12 月，縣委向省、地委再次作了《關於推廣絳縣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經驗的情況報告》。《報告》在說到「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更加廣泛深入」時說：「現在不論男女老少，識字的、不識字的、睜眼的、不睜眼的、聾的、啞的都捲入了學習運動。參加學習的人數由會前的 162,000 人增加到 181,000 人，占到總人數的 70%。其中背會『老三篇』的 45,000 人，背會一至兩篇的 80,200 人。」《報告》在列舉學習中的

30 同上。

31 同上。

典型人事時說「床泉公社床泉大隊 51 歲的老貧農穆拉會，由於他嘴不離嘴叨念毛主席的話，曾拿勺攬撒拿成了碗，拿籬篩面拿成了簸箕」，³²娘子關公社西塔堰大隊十二歲的兒童石環和十歲的石愛昌，當看到群眾急切買毛主席著作時，就坐上火車到河北井陘縣台頭村給村裡人買毛主席著作，當他們往回返時，誤了晚上十點鐘的火車。車站工作人員讓他們住下明天再走。他們說：「不能住，早拿回一時毛主席著作，群眾就能夠多學習一時。」於是，兩個小孩深夜冒著嚴寒，嘴裡念著毛主席「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最高指示，步行 30 餘里，在第二天早上四點中趕回了村莊，村裡人無不為之感動。南坳公社西鎖簧大隊老貧農竇蓮（女）因為念毛主席的書，沒揭鍋蓋就下米，結果撒了一鍋蓋。

在這一時期，縣政府第一把手朱永參加了中共華北局組織的學習毛主席著作絳縣現場會。絳縣縣委書記周明山是早期響應號召自願上山下鄉的插隊知青。在「文革」初期，他創造了「紅海洋」，曾經風靡一時，在全國「破四舊」運動潮中成為樣板。朱永這次參會，歷時 8 天，回來後作了專門的大會傳達。朱永的傳達報告詳細而具體，有不少他看到的具體生動的事例。

趙成秀當時是平師附小的教師，他在回憶文章〈我的文革歲月〉裡寫道：³³

早在一年之前，〔指 1965 年——轉抄者注〕平定這座小縣城曾掀起背誦「老三篇」的熱潮，早請示、晚彙報也成為一種宗教似的儀式，特別是轟轟烈烈開展的紅海洋運動，更是聲勢浩大。縣城街道絕大多數的門窗都塗上紅油漆，所有大塊的牆壁都經過粉刷寫上了毛主席語錄，紅色的字

32 「撒」是平定人吃的玉米麵粥。

33 載於趙成秀，《印象平定》（第 5 卷），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14 年。

跡透著莊重和熱烈。為了配合形勢，學校的大部分教師都抽調到鄉下，幫助工作，複製縣城的「盛景」。我們附小被派到馬山公社，我有幸接觸了木槽大隊的黨支部書記，他樸實、幹練，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對毛主席充滿著出自內心的熱愛。我連明徹夜為他們在油漆的三合板上用美術字抄錄了〈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三篇文章，裝飾到隊裡的公共場所。主要街道的大塊牆壁上也都寫滿了毛主席語錄。能看得出，書記對我們的工作很是滿意。現在看來，紅海洋運動把對毛澤東的崇拜推上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正是在為毛主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做輿論準備吧。

於是，文革的後續活動，也就順理成章了。正如趙成秀繼續指出的：³⁴

1966年8月8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了《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決定中指出，當前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並強調，資產階級雖然已經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裡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對於黨中央的決定，我們學校立即組織教師們學習，還結合學習姚文

³⁴ 同上。

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進行了討論，雖然理解十分膚淺，但總覺得上邊發生了什麼事，只是離我們這些小人物太遠，心裡十分淡然。令人想不到的是，持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就這樣在我們身邊悄然開始了。

儘管文化大革命的風潮已經刮到平定，但是，文化大革命搞誰、怎麼搞，看起來自上而下都是一本糊塗帳。就連時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也在大會上說：「怎麼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太知道，你們問我們，怎樣革命，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³⁵因此，各級黨委其實是按照「四清」運動的模式來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據我們的被訪者之一、當時被抽調在晉中地區擔任寫作工作的平定中學教師晉如祥說：「山西省有內部文件，指示怎樣搞文革，要分左中右反四個等級，反了右派的人，要升格成反，就是反革命。」這時的各級領導，都還仍然在如何「運動群眾」上動腦筋。

按照以往的慣例，要領導一場群眾運動，必須得首先組織群眾中的骨幹力量。正當學校領導層在為組織這樣的骨幹而思索時，紅衛兵應運而生了。

總之，用今天的眼光來看，文革前的那些政治運動，以及 1965 年和 1966 年一直在貫徹著的學毛選、紅海洋、學英雄、提高階級鬥爭觀念、和階級敵人作鬥爭，似乎都是在為更深入地進行文化大革命做思想準備和輿論準備工作。而那些不遺餘力地執行上面的指示，領導群眾學毛著、樹英雄、整壞人，把這些運動搞得如火如荼的縣委以及各級領導們或者做夢都沒有想到他們會成為文革鬥爭的對象，一夜之間他們變成了壞人。這些活動使得人們對革命、對毛澤東變得更加虔誠、更加癡迷。他說的話，比如

³⁵ 見平定縣檔案館縣委檔案卷 645。

資產階級就在黨內，如果不把他們打倒，資本主義隨時可能復辟，我們隨時可能吃二遍苦、遭二茬罪等，也更容易讓大家相信，使大家更願意按照他的意志辦事。但對底下的領導來說，被自己發動起來的群眾現在要鬥自己，自己修的監獄現在要被用來關自己。而且這些群眾還有自己的組織，紅衛兵。這真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下面我們先來看看紅衛兵運動的興起，看看事情是如何一步一步地發展的。

文革的組織動員：平定有了紅衛兵

你們在 6 月 24 日和 7 月 4 日的兩張大字報，說明對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聲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凡是同你們採取同樣革命態度的人們，我們一律給予熱烈的支持。

——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信」，1966 年 8 月 1 日¹

在上一章所描述的文化革命運動逐漸成形的情況下，在《五一六通知》後僅僅十幾天時間的 1966 年 5 月 29 日，北京清華附中學生首先建立了文革的戰鬥組織「紅衛兵」，其他學校學生也相繼成立紅衛兵組織。如本書前言所述，他們的誓言是：「我們是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黨中央毛主席是我們的靠山，解放全人類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毛澤東思想是我

1 見前引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們一切行動的最高指示。我們宣誓，為保衛黨中央、為保衛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我們堅決灑盡最後一滴血！」²很快，「紅衛兵」這個新的青年組織，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就風靡全國。平定中學也在黨支部的組織領導下，組織起了本校的紅衛兵組織。

「官辦紅衛兵」的出現

平定中學「紅衛兵」的出現，除了運動的客觀需要外，也是外地學生發動的結果。當時，原高中一班、二班考入外地的學生中，便有返回母校參與發動的。我們的被訪者之一曹克倫老師回憶說：「山西大學的趙玉寶、劉成福（原本校高中學生）回來說，外地都搞起文化革命了，咱學校不動不行，讓我們組織學生成立紅衛兵組織。」另一位被訪者、政治教師張福林則從另一個側面證實了學校紅衛兵的成立過程。他說：「昔陽有個姓王的，叫王×衛記不清了，他父親是咱們縣的一個幹部，他來咱們學校串聯的比較多。」這些串聯者，都來自省城太原。

在各方面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官辦紅衛兵」便根據各班在下鄉時選出的人選，組織起來了。據當年高四班的女同學閻秀雲回憶，當高四班在寧艾下鄉一個月後，就已經選人當紅衛兵了。

所謂「選紅衛兵」，就是由學校出面組織的紅衛兵組織，為了與以後眾家蜂起的戰鬥隊相區別，可稱之為「官辦紅衛兵」。當時官辦紅衛兵由各班推薦，一共 60 多人。當時選紅衛兵的條件是「紅五類」子弟，即家庭出身為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工人、貧下中農的學生，尤其是在平時政治上比較激進的擔任班團幹部的學生。成立大會是在 1966 年 7

2 見顏保孜（著）《毛澤東正值神州有事時》，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 年 11 月第一版。轉引自《騰訊網》，<http://topic.qq.com/a/20140205/004670.htm>，上網時間：2015 年 7 月 29 日。

月或 8 月份開的，黨支部書記蔡守惠還講了話。這也是學校領導回應中央號召，積極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具體行動。一旦有了組織，運動就變得容易了。

其實不光是平定中學，平定師範也成立了紅衛兵。趙成秀當時是教師。他在〈我的文革歲月〉中回憶道：³

《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發表不久，紅衛兵應運而生了。最先成立紅衛兵組織的是平定一中〔當時叫平定中學〕，緊接著是平定師範。這些組織都是在學校黨支部的授意下建立起來的，其中的骨幹大多數是班幹部、團積極分子、三好學生，頭上有著各種各樣的光環。所以，後來被人戲稱為「官辦紅衛兵」。他們點燃的第一把火就是破四舊、立四新。

當然，在趙成秀講的破四舊，也是一個發動紅衛兵的過程。1966 年 8 月 8 日，中國共產黨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員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俗稱的「十六條」，進一步將文化大革命的性質轉化為政治大革命。這個消息，通過官方報紙和廣播傳到平定中學。8 月 13 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登了《學習十六條、熟悉十六條、運用十六條》的社論，全國上下掀起慶賀「十六條」頒布的熱潮。平定中學根據學校領導層的安排，舉行了慶祝「十六條」的全校大遊行。遊行隊伍以彩旗和軍樂隊為首，「官辦紅衛兵」臂帶紅袖章、手捧「紅寶書」走在全校隊伍前頭，全校師生緊隨其後。遊行從東關學校所在地三官廟開始，進入城內，並沿西關—南關—上城的路線再返學校。紅衛兵們唱著流行的《紅衛兵戰歌》：

³ 見前引趙成秀，〈印象平定〉，第 367 頁。

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大風浪裡煉紅心。

毛澤東思想來武裝，橫掃一切害人蟲。

敢批判，敢鬥爭，革命造反永不停。

徹底砸爛舊世界，革命江山萬代紅。

其實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除了通過《十六條》之外，在前幾天的 8 月 5 日，毛澤東還在中南海貼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說：⁴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指聶元梓等 7 人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但是五十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它不是可以發人深省嗎！

由於這張大字報和《十六條》的共同作用，文化革命鬥爭又要上一個臺階。中共山西省委為了貫徹中央的「文革」部署，採取了一系列措施。8 月 12 日，省委發出通知，允許本省高校在校與校之間串聯。此時，北京高校紅衛兵已串聯來到省城。在毛澤東 8 月 18 日接見首都「文革」遊行隊伍和紅衛兵之後，8 月 20 日，省城 15 萬人在五一廣場舉行「慶祝文

4 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見前引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化大革命大會」，省委、省人委、省軍區、駐晉部隊主要負責人出席，省委第一書記衛恒講話。這個大會上，有 1000 餘名「紅衛兵」的隊伍參會，並在會上宣讀「聯合聲明」。8 月 24 日，《山西日報》刊登太原機械學院「紅衛兵」《致全省「紅衛兵」戰士、廣大工農兵、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幹部的公開信》，倡議大破「四舊」、大立「四新」。25 日，《山西日報》發表社論《向英勇善戰的「紅衛兵」致敬》，對破「四舊」行動大加讚揚，稱「紅衛兵小將們幹得好！」⁵

在中央發出大串聯的通知後，《山西日報》發表文告〈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歡迎赴京參加取經歸來的紅衛兵戰士和革命師生〉。在這篇文告中，強調以「十六條」為指標，「凡是符合《十六條》的，我們就堅決擁護，堅決貫徹；一切違背《十六條》的，我們就堅決抵制，堅決反對。」⁶這一文告，反映了中共山西省委在日趨混亂的形勢下希望控制與領導運動的意願，當然他們也認為自己是在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搞文化大革命。

但是 10 月下旬，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關鋒在接見北京赴山西串聯的學生時說：「山西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希望你們去煽風點火。」⁷同月，太原的幾個「紅衛兵」造反組織聯合成立「山西大中學校紅色造反聯絡站」（簡稱「紅聯站」）。

紅衛兵戰鬥力的培養

於是，光有組織還不行，這個組織需要戰鬥力。1966 年 9 月 9 日，當

⁵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著），《中國共產黨山西歷史》（第三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年出版，第 450 頁。

⁶ 同上。

⁷ 同上。

時的平定縣委機關報《平定小報》發表了董成科的文章「努力學習，認真執行，堅決照辦」。董成科是「官辦紅衛兵」的學生領袖。文章說：⁸

我們是紅五類的子女，我們是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的紅衛兵。毛主席就是我們的最高統帥。在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一定要聽毛主席的話，學好用好十六條，以解放軍為榜樣，把我們紅衛兵鍛煉成非常無產階級化、非常戰鬥化的革命戰士。

十六條是毛主席親自主持下制定的，它是毛澤東思想最新的發展，是我們進行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行動綱領。我們要徹底的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必須條條照辦，句句執行。鬥爭越是深入、越是激烈的時刻，越要努力地學習十六條，運用十六條。是否按照十六條辦事，這是區分真紅衛兵還是假紅衛兵的重要標誌。我們紅衛兵的戰鬥武器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我們一定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南，認真地、全面地、徹底地、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十六條。誰要違背毛澤東思想，我們就堅決和他鬥到底！

我們紅衛兵是天生的造反者，是革命的閻將！我們敢想、敢說、敢做、敢革命、敢造反、敢於鬥爭，敢於勝利，敢於砸爛舊世界，打出個嶄新的世界來！我們紅衛兵要成為像解放軍那樣的謙虛謹慎，具有三八作風，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敢於革命，善於革命的勇敢部隊。我們要用文鬥，不用武鬥，武鬥只能觸及其皮肉，文鬥才能觸及其靈魂，只有文鬥，才能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反革命真面目，徹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它鬥倒、鬥垮、鬥臭，使他們永世不得翻身！

⁸ 董成科，「努力學習，認真執行，堅決照辦」，《平定小報》，1966年9月9日，第3版。

文化大革命的航船在乘風破浪，跟著毛主席所指引的正確航線勝利前進。讓我們紅衛兵拿起十六條這個銳利的武器，大破「四舊」，大立「四新」，造帝國主義的反，造修正主義的反，造資產階級的反，造封建主義的反，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一反到底，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在董成科的心裡，文化革命不過是反右派、破四舊、立四新而已。但是無論如何，這個組織要敢想、敢幹、敢革命、敢造反。不光學校的學生，其他各界也是如此。當時的《平定小報》連續刊載各界代表的表態文章。1966年9月9日的《平定小報》刊登消息：

9月6日晚上，縣裡召開了廣播大會。會上，有中共平定縣委機關、人委機關、平定師範、平定中學、耕讀中學、東關、西關、南關大隊和城關鎮的紅衛兵代表分別向全縣紅衛兵和革命群眾倡議，立即在全縣紅衛兵和革命群眾中廣泛深入地宣傳學習十六條。……縣委機關紅衛兵代表連振玉同志說：十六條是偉大的領袖毛主席主持制定的，十六條是毛澤東思想的新發展，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能不能認真地不折不扣地學習十六條，熟悉十六條，掌握十六條，運用十六條，是執行不執行毛主席最高指示的大問題，是聽不聽毛主席的話的大問題，也是對毛澤東思想真信仰和假信仰的大問題。咱們紅衛兵戰士，是毛澤東思想的忠實信仰者，咱們一定要認真地學習十六條，熟悉十六條，掌握十六條，運用十六條，宣傳十六條，這樣才能更好地貫徹執行十六條。平定師範紅衛兵代表馬占山、西關大隊紅衛兵代表和儉等都作了表態發言，中共平定縣委副書記鄭忠華代表縣委向九個單位紅衛兵熱烈祝賀，並積極支持紅衛兵的革命行動。

同一天的《平定小報》還刊載了神峪口小學教師張瑾瑤的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革命的小將們致敬〉：

正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在全國更加廣泛開展的時候，你們在最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在首都紅衛兵小將們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鼓舞下，連日來紛紛走上街頭，擂著戰鼓，擎著紅旗，對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進行大洗滌、大清掃、大討伐、大改造。一切散發著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思想臭味的習慣、街名、村名、牌號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隻腳！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正在建立起來！這是大快人心的事，使革命的人們揚眉吐氣，使革命的人們精神振奮！你們幹得對！幹得好！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我最堅決、最熱烈地支持你們！我為你們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歡呼！向革命小將致敬！

毛主席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我們無產階級是天生的造反者，我在神峪口小學工作十四年來，造反了十四年，造資產階級的反，造封建主義的反，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我們神峪口小學的小將們既是舊世界的批判者，也是新世界的建設者。在一九六四年過春節，我們打菩薩、燒神像、移風易俗，在過春節那天，三個村出現了「紙船明燭照天燒」的動人景象。毛主席的教導，提高了大家的鬥志，擦亮了眼睛，你們充當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鋒。你們這種破「四舊」、立「四新」的革命行動，充分顯示了在毛澤東思想哺育下的青少年一代的革命精神、革命氣魄、革命智慧、革命威力。我熱烈歡呼你們這種革命壯舉，我滿腔熱忱、全力以赴要帶領全校師生同全縣的革命小將一道，充當破「四舊」立「四新」的急先鋒，高舉革命的千鈞棒，把舊世界打個天翻地覆，打個人仰馬翻，打個落花流水！

毛主席號召我們，要向解放軍學習。我們應當向解放軍那樣，永遠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認真學習十六條，熟悉十六條，掌握十六條，運用十六條。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當毛主席的好學生。要把毛主席的指示，當作一切行動的指南，堅決地、徹底地、全面地、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偉大的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在張瑾瑤的眼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內容也就是破四舊、立四新，而且他自己在 1964 年就已經有了類似的經驗。1966 年 9 月 13 日，《平定小報》刊載了川修、福棟的通訊「維社公社紅衛大隊抓革命促生產奪取革命和生產雙勝利」，還刊登了耕讀中學紅衛兵郝戰生的文章〈堅信文鬥、堅持文鬥〉、平定師範紅衛兵的文章〈我們誓做解放軍的後備軍〉、西關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文章〈堅決按十六條辦事〉、塑膠廠紅衛兵梁惠榮的文章〈兩條戰線打衝鋒〉。一個學習貫徹十六條的運動在平定這個小城展開了。看來群眾是真的發動起來了。⁹

平定縣委對紅衛兵表示熱烈支持

《十六條》的頒布和中共山西省委的安排，也使中共平定縣委不得不把政治運動的中心轉移到「文化大革命」的軌道上來。

⁹ 上以上內容見平定縣檔案館存《平定小報》，1966 年 9 月。

在通過《十六條》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 8 月初召開時，平定縣組織了群眾遊行，3000 餘名群眾給縣委送喜報，表決心。9 月 7 日，全縣各地的「紅衛兵」和群眾 3 萬餘人上街，宣傳《十六條》。平定中學是本縣規模最大、教學品質最高的學校，也是平定「文革」的發源地。在平定中學組織的宣傳《十六條》大遊行中，在紅旗和軍樂隊之後，「官辦紅衛兵」佩戴「紅衛兵」袖標，佇列整齊，走在師生遊行隊伍之前列，顯示了其地位和分量，也成為日後「破四舊」批鬥教師的主力軍。

縣委在本縣《平定小報》上刊登了上面這些文章顯示了縣委對學習十六條的重視與組織。在縣委工作安排上，在強調生產的同時，對「文化大革命」運動也作了表態性質的安排：「根據黨中央的十六條規定，當前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重點，是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單位和領導機關，在搞四清運動的地方要結合進行。我縣因為今年不進行四清運動，所以當前主要是學習十六條，熟悉十六條，掌握十六條，運用十六條，宣傳十六條，捍衛十六條，以十六條為綱，向四舊開火。」¹⁰縣委的表態性安排也同報紙的宣傳口徑一樣，強調了「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強調了「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打擊的重點，是鑽進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強調了「要用文鬥，不用武鬥」，並且對這一規定用相當的篇幅作了原因上的分析和闡述，顯示出縣領導層對運動可能出現的暴力傾向的預測和隱憂。

這時候，北京的中央領導在地位上發生了很大變化。林彪由於突出地宣傳「學習毛主席著作」而成為重要人物。在他的指示與號召下，毛澤東的四卷著作被大量印行，而且編選了《毛主席語錄》。在北京的各大學，學生們免費得到了《毛澤東選集》四卷本。在平定中學，學生們也免費得

10 平定縣檔案館存縣委檔案卷 649。

到了《毛主席語錄》人手一冊。根據本縣編輯的《中國共產黨山西省平定縣組織史資料》記載，¹¹這個日期是 1966 年 9 月 29 日。這是由縣委組織的中等學校革命師生授書大會兼歡送第一批赴京革命師生代表去北京。《平定小報》第 649 期刊登報導說：¹²

9 月 29 日上午，縣委和縣人委召開了中等學校革命師生大會，舉行了隆重的授書儀式，授予全縣中等學校革命學生《毛主席語錄》，並熱烈地歡送我縣第一批赴京革命師生代表赴京參觀。

上午 8 時，平定師範、衛東一中〔即平定中學，文革時改的名字〕、耕讀中學全體革命師生及來自全縣各中等學校的革命師生代表，懷著無限喜悅的心情，抬著毛主席的巨幅畫像，高舉紅旗，鑼鼓喧天，唱著《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革命歌曲，喊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等口號，整整齊齊地步入會場。大家時時想、日日盼的革命寶書——《毛主席語錄》，就要拿到手了，怎不高興！怎不激動！

在熱烈的掌聲中，縣委副書記、縣長朱永同志講了話。在一片歡呼聲中，縣黨政領導同志，把紅光閃閃的《毛主席語錄》發授給每一個革命學生。

手捧金書心向黨，齊聲歡呼毛主席。學生們雙手捧著《毛主席語錄》，歡欣若狂，有的流下了幸福的淚水。「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他們高舉金光閃閃的《毛主席語錄》，放聲高呼，盡情歌唱，全場一片沸騰，猶如紅色的海洋。

赴京革命師生代表，各校紅衛兵和革命師生代表，在大會上表達了他

11 中共平定縣委組織部（編），《中國共產黨山西省平定縣組織史資料》，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2012 年。

12 平定縣檔案館存《平定小報》，1966 年 9 月 30 日。

們無限熱愛黨、熱愛毛主席、熱愛毛澤東思想的激動心情，發出了他們永遠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毛主席、忠於革命的誓言。他們說：「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們永遠讀您的書，聽您的話，朝著您開闢的革命航道破浪前進！」

官辦紅衛兵佩戴紅衛兵袖標，多多少少「整齊劃一」地走在遊行隊伍當中。大家手捧毛主席語錄，熱淚盈眶、高呼口號，人心激動，一片沸騰。現在似乎是想幹什麼就可以幹什麼了。同一天的《平定小報》上，還刊登了朱永的講話全文：

現在我首先向大家宣讀兩段毛主席語錄：

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於應用。

到會的全體革命師生，紅衛兵戰士們，赴京的革命師生代表同志們：

今天的大會是向全縣中等學校的同學贈送《毛主席語錄》的大會，贈送金書、寶書的大會，同時也是歡送我縣中等學校第一批赴京革命師生代表的大會。

贈送《毛主席語錄》，歡送赴京革命師生代表，這是我們大家的兩件大喜事，也是全縣人民的大喜事！

現在我代表中共平定縣委、縣人委向赴京革命師生代表，紅衛兵戰士，與會的全體革命師生同志們，為這兩件大喜事，表示最熱烈的祝賀！

赴京的代表同志們，紅衛兵戰士們，同學們，在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在我們天天想、夜夜盼，做夢也想有一本《毛主席語錄》

的時候，省委給我們贈送來了寶書、金書，這是黨對我們革命同學們的最大關懷，最大支援。今後，我們一定要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永遠把毛主席的書當作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行動的指南；永遠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學生，好戰士；把全縣所有學校和各行各業都要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要永遠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毛主席，忠於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把毛主席的指示印在腦子裡，融化在血液中，落實在行動上；要向解放軍學習，在革命鬥爭的大風大浪中，把我們鍛煉成為堅強可靠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紅色接班人。

我們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是毛澤東思想的最新體現。我們一定要學好十六條，要認真地、全面地、徹底地、不折不扣地貫徹十六條。抓革命，促生產。堅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使我們的千秋萬代永不變色。讓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在全中國、全世界的一切陣地上高高飄揚，永遠飄揚。

讓我們高呼：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從這位縣領導這段全無實際內容的講話中，可以隱約感覺到縣領導階層對這場運動的謹慎和惶惑。但是他肯定沒有想到他會成為鬥爭對象，自己的權力會被剝奪。

因為這個大會是兩個目的：發紅寶書和歡送學生代表，所以，學生代

表也挨個發了言。《平定小報》同日同版也刊載了他們的發言。衛東一中代表戎崇喜的發言是「把毛澤東思想真正學到手」：

今天，我們以無比興奮的心情，拿到了期望已久的寶書——《毛主席語錄》，我們感到無限的幸福，無限的光榮。

我們最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是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太陽。

毛主席的書，是革命的寶，是我們革命的金書，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革命人民的靈魂、是糧食、武器、方向盤，是我們革命的命根子。

我們革命的學生最熱愛毛主席，最愛讀毛主席的書，我們一定要響應八屆十一中全會的號召，把毛澤東思想真正學到手，把毛主席的指示印在腦子裡，溶化在血液中，落實在行動上。

黨和毛主席把希望寄託在我們身上，我們絕不辜負黨和毛主席的希望，一定要緊跟毛主席，永當革命的左派，永當革命的閻將，將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建設和保衛社會主義的鐵打江山。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

也是些宣誓性的話語，沒有實質的內容。其他人的發言也類似。赴京革命師生代表馮占山發言的題目是「到北京去學習革命鬥爭經驗」：

紅衛兵戰士們、各位首長和全體革命同學們：

我們受大家的委託，將赴紅色首都北京去參觀，這是我們的最大幸

福、最大光榮。為此，我們全體赴京代表衷心的感謝。

我們這些大部分出身於貧苦農民家庭的苦孩子，今天能夠榮幸地到我們的偉大革命首都——北京，到我們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的身邊，這是在舊社會根本做夢也夢不到的事，今天實現了，這實在是我們最最大的幸福，我們自豪，我們驕傲，我們光榮，讓我們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

紅衛兵戰士們，各位首長全體同學們：你們有什麼要求，有什麼希望，請你們提吧，我們一定要盡最大最大的努力，滿足大家的革命要求，如果我們能見到最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我們一定代大家向他老人家問好，祝他老人家萬壽無疆！

今天，我們領到了黨中央毛主席贈給我們的革命金書——《毛主席語錄》，我們一定要帶著毛澤東思想，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北京去學習革命鬥爭經驗，做到多聽、多想、多看、多記，學回經來，取回寶來，遵循毛主席的教導，關心國家大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我們向大家保證：到北京一定要遵守紀律，聽從指揮，向解放軍學習，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都要做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員，當好人民的勤務員。

中國共產黨萬歲！

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一定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抓革命促生產，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我們最最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平定師範紅衛兵代表李愛枝的發言題目是「讀一輩子毛著，幹一輩子革命」：

盼！盼！！盼！！！幸福的日子終於來到了。

今天我們懷著無比激動的心情，飽含著幸福的熱淚，接過了黨贈給我們的《毛主席語錄》，我們高呼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黨送給我們的不是一本平常的書，而是給了我們幹革命的最強大的思想武器，是革命航船的方向盤。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向解放軍學習，認真地、全面地、徹底地、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十六條。誓死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保衛無產階級專政。我們一定要像解放軍那樣，努力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永遠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我們一定要聽毛主席的話，徹底砸爛舊世界，創建新世界。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萬歲！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移穰中學學生代表王國華發言的題目是「讀一輩子毛主席的書」：

今天，我懷著萬分激動的心情，拿到了久久盼望的革命寶書——《毛主席語錄》，我們深知，這是偉大的黨對我們青少年一代在政治上的莫大關懷。我們絕不辜負黨對我們的期望，堅決遵照林彪同志提出的「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的偉大號召，活學活用毛

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把毛主席著作當作我們一切工作的行動指南。像劉英俊同志那樣，努力學習最高指示，忠實執行最高指示，熱情宣傳最高指示，勇敢捍衛最高指示，堅決地學一輩子毛主席著作，為人民服務一輩子，在當前這場史無前例的、觸及人們靈魂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們一定要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當好革命的紅色闖將，堅決徹底砸爛舊世界，不把一個通紅的無產階級新世界建立起來，絕不瞑目。最後讓我們高呼：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圖 3-1 原平定中學大門口

資料來源：耿忠榮同學提供。

書到學校，平定中學——那時已經隨著「文革」的時髦，改名叫「衛東一中」——在學校前操場由學校領導給學生挨個發書。在全校發「紅寶書」大會上，學生們唱起剛從喇叭上學會的歌曲《毛主席語錄發給咱》：

毛主席語錄發給咱，捧在手裡心中甜。
 好像到了那北京城，毛主席就在咱身邊。
 毛主席語錄發給咱，領袖跟咱把話談，
 叫咱一心跟黨走，叫咱接好革命班。
 毛主席語錄發給咱，領袖教導記心間。
 革命路上大步走，紅心向黨永不變。

紅衛兵得到毛主席、黨中央的加持

毛澤東為什麼要接見紅衛兵呢？從上面敘述的紅衛兵運動發動的情況來看，紅衛兵已經可以是一支毛澤東指到哪裡就可以打到哪裡的隊伍了。難道他還怕紅衛兵對他不忠嗎？如果他想有什麼更大的動作，比如打倒劉少奇，打倒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走資派，難道紅衛兵會不支持嗎？或許是毛澤東還不放心，所以在北京安排了八次接見紅衛兵，為他們加油打氣，包括從平定去的紅衛兵。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北京首次接見紅衛兵，一千五百名紅衛兵代表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大會並同毛澤東一起檢閱「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的遊行隊伍。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的宋彬彬將一個紅衛兵袖章佩戴在毛澤東左臂上。從此，揭開了大規模接見紅衛兵的序幕。1966年9月30日的《平定小報》在頭版頭條刊載消息「《毛主席和百萬文化革命大軍在一起》大型彩色紀錄片十月四日起在我縣隆重上映」，並刊載毛澤東和

紅衛兵握手的照片。

當時，中共中央為了點燃「文革」的運動之火，專門下發了關於組織外地革命師生來北京參觀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通知說：高等學校學生都可以來北京參觀，教職工可按每五十名學生選出革命教職工代表一人參加；中等學校由於人數很多，所以只能按每十名學生選出革命學生代表一人，教職工按每一百名學生選出革命教職工代表一人參加，每批來京逗留時間為四天。¹³

平定縣赴京的學生代表，又是紅衛兵中出身更純的學生。時隔四十年後，平定縣誌辦出版了紀念建國六十週年的《走過六十年》一書。¹⁴我們從中摘錄當時刊載在 1966 年 11 月 14 日和 15 日《平定小報》上包括董成科在內的一些學生的口述：

我見到了毛主席

1966 年 8 月 18 日到 11 月 26 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門城樓先後接見了一千一百萬全國各地赴京紅衛兵。其間，中共平定縣委先後在各中學和平定師範組織兩批紅衛兵代表赴京接受毛主席檢閱。這兩批赴京紅衛兵分別是：1966 年 9 月 30 日，縣委、縣人委召開中等學校革命師生大會，向師生贈送《毛主席語錄》，歡送第一批紅衛兵乘火車赴京，10 月 1 日接受毛主席檢閱。11 月 1 日，平定縣組織第二批紅衛兵代表 409 人乘火車赴京，11 月 3 日接受毛主席檢閱。

13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組織外地高等學校革命學生、中等學校革命學生代表和革命教職工代表來京參觀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資料庫》。

14 平定縣史志辦公室（編），《走過六十年：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0 週年》，平定縣史志辦公室出版，2009 年。

董成科：我們是平定縣第一批赴京接受毛主席檢閱的革命師生代表，到北京後，在國慶日那天登上天安門觀禮臺，見到了毛主席。

10月1日上午7點鐘，我們就上了觀禮臺，心情非常激動，兩眼不住地往天安門城樓上望去。我仰著臉望著，望著，不一會兒奏起了東方紅樂曲，在「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歡呼聲中，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向百萬革命群眾招手致意。這時，我的心早已飛到了天安門城樓上，好像自己就站在毛主席身邊，心中充滿了無限幸福，兩眼流出了激動的熱淚。看著毛主席那紅光煥發的面容，看著毛主席指揮千軍萬馬埋葬舊中國、建設繁榮富強新中國的巨手，心裡有多少話要向毛主席說啊！此時此刻，千言萬語也難以表達我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無限熱愛，無限忠誠，無限信仰，無限崇拜的心情。（董成科，時為衛東一中即平定中學紅衛兵代表，本段選自1966年10月14日《平定小報》，有刪節）

王秀珍：我們受全縣人民的委託，到北京去，取革命的寶，感到無尚光榮。在10月1日這個偉大的日子裡，我們親眼看到了我們偉大領袖，我們心中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毛主席他老人家身體非常健康，這是全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大的幸福。（王秀珍，時為岔口中學紅衛兵代表，本段選自1966年10月14日《平定小報》，有刪節）

李喜林：11月3日下午3點半，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我見到了我們最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我看見了天安門上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紅光滿面，精神煥發，微笑著連連向我們招手。我們含著幸福的熱淚，揮舞著鮮紅的《毛主席語錄》，千遍萬遍地縱情高呼「毛主席萬歲，萬萬歲」。（李喜林，時為衛東一中即平定中學紅衛兵代表，本段選自1966年11月15日《平定小報》，有刪節）

馮文龍、白玉崗、葛民益、王蕊芳、趙鳳蓮等：11月3日啊，幸福的時刻，難忘的時刻。今天，我們見到了我們最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這是

我們一生中最最難忘的時刻。（馮文龍等，時為平定師範紅衛兵代表，本段選自 1966 年 11 月 15 日《平定小報》，有刪節）

平定縣根據中央文件，接連派出幾批學生代表赴北京，參加接見。平定一中高三班學生劉振傑是本縣第一批去北京的。他於 2010 年撰寫文章〈難忘的日子〉（未刊稿）回憶說：

1966 年 10 月 1 日是新中國成立十七週年的大喜日子，也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接見全國革命師生和紅衛兵代表的日子。自毛主席 8 月 18 日第一次在北京接見全國革命師生和紅衛兵代表之後，這已經是第四次了。去北京之前，由學校各級選出代表，並由縣委統一組隊，屬晉中地委組成的一個代表團去北京參加接見的。我們是班裡選的，我和董鋼被選上。高四班的賈俊傑也是那次去的，他也是紅衛兵。初中同學中還有 55 班的郝志東、59 班的趙衛剛等人。

1966 年 9 月 29 日下午，在縣委大院集中之後，由縣紀委書記曹黑小和工作人員康雨春帶隊，乘車到陽泉火車站彙集，6 點鐘坐上火車，開始了北京之行的征程。一路上，同學們有說有笑，不時地唱起了革命歌曲。我們的心情十分激動，恨不得一下子飛到北京去見毛主席。我們徹夜難眠，一直沉浸在無比歡樂之中。

30 日早晨 5 點多鐘，太陽還未露出笑臉，火車到達北京車站。有關部門工作人員把我們接到了預先安排好的北京外國語學院住下來。在短暫的休息後，30 日晚上 10 點，發了牛肉和雞蛋，然後徒步向天安門廣場進發。10 月 1 日凌晨三點多鐘到達了天安門廣場東側列隊等候。十月的清晨已是寒意漸濃，然而我們的心裡卻是暖融融的。太陽升起來了，蔚藍的天空上不掛一絲雲彩，節日的天安門格外顯得雄偉壯觀。觀禮臺上、天安門

廣場和東西長安街人山人海、紅旗招展，高音喇叭裡高唱著《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毛主席語錄歌等經典革命歌曲，人們在歡呼，在歌唱，等待著那激動時刻的到來。

上午 10 點整，毛主席、周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健步登上天安門城樓，慶典儀式開始，周總理用洪亮的聲音作了國慶講話，隨之宣布國慶遊行開始。遊行隊伍按照預先安排的行列，手挽著手，依順序漸進。天安門城樓上，毛主席不斷地向遊行隊伍群眾和學生、紅衛兵招手致意，不時地喊著「人民萬歲」「你們辛苦了」。遊行的人們高舉毛主席語錄，不停地高呼著「中國共產黨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口號，聲音響徹天安門上空。人們歡呼雀躍、情緒高漲，心情無比激動。此情此景，真是難以用語言表達。我所在的第五路在城樓的一側，所以看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和中央領導人很清楚。

從東長安街到西長安街，經過兩個多小時的行進，我們到達了解散位置，並由晉中代表團領隊統一帶回到住地。那一夜真是無法入睡，眼前浮現著白天毛主席接見時的情景，心裡有說不出的高興，感到無比的榮幸。接下來的十幾天裡，我們由縣裡的領導帶隊去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參觀學習，看大字報、抄有關內容，聽批判會，目的是學習首都學生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我們還見了在北京〔工作〕的〔原〕高二班同學張富槐。完成預定目標後於 10 月 15 日乘火車返回了學校。

半個月的北京之行非同尋常。過去能見到偉大領袖毛主席雖是一生中夢寐以求的，但我作為一個普通的中學生能親眼目睹毛主席的雄姿，親耳聆聽他老人家的教誨，是不敢想的。然而，在這次運動中卻親身接受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接見，真是夢想成真，是我一生中難以忘懷的欣慰之事。

文中提到的張富槐，原平定中學高二班學生，曾任學生會主席，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在北京某國防工廠工作。

另一位同學岳智明於 2010 年撰文〈激動人心的毛主席檢閱紅衛兵〉（未刊稿）回憶毛主席接見時說：

我是 1966 年 11 月 3 日，經學校和縣選派的紅衛兵代表接受毛主席檢閱的。記得同一次受檢閱的還有同班的李喜林、插隊青年竇先、鎮簧中學的代表，由縣文革辦公室的康雨春帶隊。出發前，由縣組織歡送隊伍，縣委主要領導參加，列隊馬路兩旁。我們從縣政府出來，歡送的人們熱烈鼓掌，把我們送到汽車上，到達陽泉一中校院內，和晉中東六縣的代表匯合於操場，組成了一個代表團。而後，地委副專員苗楓作了重要講話，由地委領導帶隊坐火車去北京。

當時，心情非常激動。一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去首都——北京，二是縣選派的紅衛兵代表多麼光榮，尤其是要見到偉大領袖毛主席，那種心情是何等的激動啊！

在火車上一夜難眠，當火車進入豐臺站後，看到一輪紅日冉冉升起，我們唱著「東方紅，太陽升……」感到心情非常激動。

播音員用標準的普通話說：「紅衛兵戰友們，我們的首都、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北京就要到了……」下火車後，坐公共汽車，當路過天安門時，第一眼看到的是天安門城樓，真如小時候書本上說的那樣：紅牆、黃瓦、高大、美麗……多麼雄偉壯觀啊！

我們住在天安門西邊的鐘錶大樓，11 月 2 日晚上 10 點突然接到通知，說明天毛主席要接見我們啦！

這是毛主席第六次接見紅衛兵。

當時給我們每人發了三兩牛肉、兩個雞蛋，晚上沒睡，第二天凌晨兩

點起床從鐘錶大樓出發，繞到地安門，走路兩三個小時，從南池子出來又繞到東長安街，匯入到東長安街的檢閱大軍中去。那時已經是早上 8 到 9 點了。

十點時，我們 36 人排成一排，向天安門進發。路兩邊有解放軍手挽手，維持秩序。我們唱著「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來個毛澤東……」。太陽出來了，毛主席也出來了。主持人在廣播裡高呼「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口號聲響徹了整個天安門廣場。在場的紅衛兵激動萬分，情不自禁，熱淚盈眶。天安門廣場人山人海，紅衛兵越來越多，人潮湧動。

當我們行至天安門城樓前時，紅衛兵大軍幾乎擁著不動。毛主席拿著帽子從城樓東邊走到西邊，向百萬紅衛兵招手，後面跟著林彪、周恩來。劉少奇當時也在城樓，但沒有和毛一起走。手舉毛主席語錄的檢閱大軍齊聲高呼著「毛主席萬歲」，歡呼聲響徹雲霄。那種場面激動人心、難以忘懷，深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毛主席一個人在城樓上走動時，向大軍揮手致意，高呼「紅衛兵萬歲」。前面的紅衛兵不願走，要多看毛主席一眼。好多外地的紅衛兵聽說毛主席接見，也都趕來了。激動人心的場面直到下午五點多，周恩來拿著毛主席語錄走在話筒前說：「毛主席從早晨 8 點到現在，已經很累了，我們要向前進！」讓紅衛兵向西前進，並帶領大家唱《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紅衛兵才逐漸撤去，這時已經晚上 9 點多鐘了。最後清理廣場，光人們被踩掉的鞋子就載了幾卡車。

回到平定後，縣委在戲院召開了歡迎大會。會上，紅衛兵代表作了彙報發言，我們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和極大的鼓舞。

回想起來，毛主席的這次接見和檢閱，在我的一生中產生了深刻的影响，對毛主席的崇拜達到了頂峰，一是誓死保衛毛主席，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二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風大浪中鍛煉成長。三是沒有共產黨就沒

有新中國，堅信共產黨的領導。

幾十年過去了，多次夢見過毛主席，回味無窮，令人難忘。

他們的回憶，與我們的被訪者之一、高四班學生閻秀雲的回憶相吻合，說明當時赴北京受毛主席檢閱的榮耀，仍舊限於學生中的激進分子。閻秀雲回憶：

當時推選去北京，要求是根紅苗壯、「四面見線不帶闊的」（讀「河」，平定方言，指成料木材未剝盡的零星樹皮，此指瑕疪）。咱班（高四班）是賈俊傑和張素英去的。

當然，紅衛兵去北京，不光是受到毛主席的接見，得到一種政治待遇，還要學習革命經驗。本書作者之一郝志東的日記記錄了各種學習活動，包括參觀「北京世界革命大學」（即北京外國語學院）革命造反戰果展覽並抄錄展覽內容；參觀「新北大」並抄錄大字報，如毛澤東共產主義青年團新北大特別團小組（暫定）宣言、熱烈歡呼北京大學紅衛兵成立的宣言、介紹陸平黑幫統治下的北京大學的大字報、北京公社宣言等；參觀北京石油學院，抄錄該學院革命師生與員工學習毛主席著作、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體會；參觀了大慶展覽館，抄錄大慶人的豪言壯語；參加「全國在京革命師生向資產階級反黨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1966年10月6日），聆聽了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周恩來的講話並作了記錄；參觀了中國人民革命戰爭館；抄錄了周總理在十月三日給全國紅衛兵代表的報告，等等。其中周恩來的講話包括如下字句：

你們放假搞革命，首先是搞你們學校的，然後再到社會上搞黨政的領

導，搞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你們的時間多，就得運動。你們要關心這個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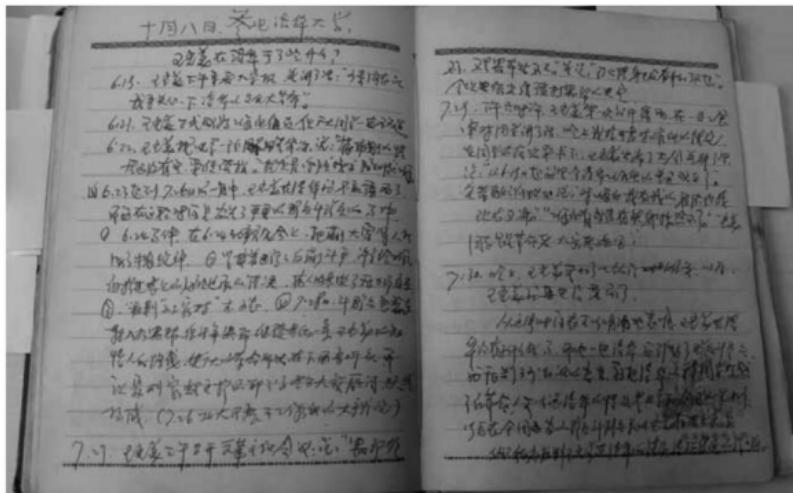


圖 3-2 郝志東參觀清華大學抄錄的大字報內容：「王光美在清華幹了些什麼？」

當然周恩來畢竟是周恩來。在講話結尾部分，關於炮打司令部中的司令部的定義，他又說：

司令部指的是黨政機構。是不是所有的領導機關都是黑幫呢？我們、你們沒有一個人是這樣看的。對於任何問題，都要一分為二。黑幫指的是反黨集團。有的領導機構是，有的不是。像彭真、劉仁那樣的就是。但是是極少數。絕大多數不是這種性質。屬於路線方向錯誤的這種可能性大。

除了已經揪出來的彭真、劉仁之外，周恩來無法確定哪些屬於極少數、哪些屬於大多數，具體如何拿捏那就是紅衛兵們自己的事情了。這似乎是周恩來代表黨中央給紅衛兵們派發的任務。平定的紅衛兵們在接受了毛主席和黨中央領導的接見之後，在領取了黨中央的指示之後，在學習了北京紅衛兵的經驗之後，回到平定搞文革，平定文化大革命的火也就越燒越旺了。

練「兵」：破四舊、立四新、鬥牛鬼蛇神

紅衛兵戰士們，……你們的革命行動，震動了整個社會，震動了舊世界遺留下來的殘渣餘孽。你們在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的戰鬥中取得了光輝的戰果。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資產階級的反動「權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蟲，都被你們搞得狼狽不堪。你們做得對，做得好！

——林彪，在毛澤東第三次接見紅衛兵的天安門廣場大會上的講話，1966年9月15日¹

在紅衛兵被發動起來並且達到狂熱的程度之後，如上所說，那就沒有什麼他們不能夠做的事情了。不過，儘管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是要「炮打司令部」，鬥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是正如我們在前兩章所指出的，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在開始時還是由當地黨委與政府來主導

1 林彪，「在接見全國各地來京革命師生大會上的講話」，1966年9月15日。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的。所以除了在表面上應付所謂批判文藝黑線、「三家村」等似乎是中央層次的問題之外，在實際上他們把精力放在了「破四舊、立四新」、批判當地的所謂「牛鬼蛇神」上面。這也可以理解。第一，當地黨和政府的領導不可能發動群眾鬥自己。鬥牛鬼蛇神則政治最正確也最安全。第二，正如我們在前面所指出的，他們也吃不透中央的精神。第三，如上述林彪講話所言，中央的確也有「破四舊、立四新」、批鬥「牛鬼蛇神」的精神。如果文革的本意是鬥走資派並奪權，那麼現在的破四舊和鬥牛鬼蛇神或許只是練練紅衛兵而已。當然這種「練兵」，對文化和社會的破壞性還是巨大的。本章敘述文革早期的這兩個發展。

「破四舊、立四新」

官辦紅衛兵成立後的第一次大的動作，便是「破四舊、立四新」。「四舊」按照首先宣導的北京二中紅衛兵的提法，指的是「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北京二中紅衛兵在「向舊世界宣戰」的大字報中這樣說：「我們是舊世界的批判者。我們要批判、要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所有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理髮館、裁縫、照相館、舊書攤……統統都不例外。我們就是要造舊世界的反！」「我們要徹底剷除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溫床和苗子……」²

按照當時流行的理論，「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所以，「破四舊」也要「立四新」。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報》頭版大字標題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捲首都街道」，並發表兩篇社論，題目分別為「好得很」和「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人民日報》

² 北京二中紅衛兵，「向舊世界宣戰」，1966年8月26日。原載於1966年8月26日《人民日報》。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在「好得很」這篇社論中寫道：³

北京解放已經十七年了，可是，在修正主義的前北京市委長期把持、壓制下，許多地方的名稱、商店的字型大小，服務行業的不少陳規陋習，仍然散發著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腐朽氣息，毒化著人們的靈魂。

千千萬萬「紅衛兵」舉起了鐵掃帚，在短短幾天之內，就把這些代表著剝削階級思想的許多名稱和風俗習慣，來了個大掃除。這是破舊立新的革命行動。閃耀著無產階級革命精神的新名稱、新風俗、新習慣，為我們偉大的首都，為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心，增添了無限的光彩。

8月29日，《人民日報》又發表社論「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社論說：⁴

紅衛兵上陣以來，時間並不久，但是他們真正地把整個社會震動了，把舊世界震動了。他們的鬥爭鋒芒，所向披靡。一切剝削階級的舊風俗、舊習慣，都像垃圾一樣，被他們掃地出門。一切暗藏在暗角裡的老寄生蟲，都逃不出紅衛兵銳利的眼睛。

這些吸血鬼，這些人民的仇敵，正在一個一個地被紅衛兵揪了出來。他們隱藏的金銀財寶，被紅衛兵拿出來展覽了，他們隱藏的各種變天帳，各種殺人武器，也被紅衛兵拿出來示眾了。這是我們紅衛兵的功勳。

3 《人民日報》社論，「好得很！」，1966年8月23日，第一版。見「八九點鐘的太陽」網站，<http://www.morningsun.org/chinese/library/19660823.html>，上網日期2015年9月30日。

4 《人民日報》編輯部，「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人民日報》，1966年8月29日。載於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如前所引，9月15日，在毛澤東第三次接見紅衛兵的天安門廣場大會上，林彪在講話中對紅衛兵「破四舊」進行了充分肯定和讚揚。於是，當全國這股「破四舊」的狂風暴雨衝擊吹到平定時，這個小縣城也掀起了。一陣狂瀾。領頭的除了平定中學的學生之外，還有位於縣城西南面的縣耕讀中學和縣城西面的駐縣學校平定師範。趙成秀當時在平定師範附小當教師。他在回憶文章〈我的文革歲月〉裡回憶說：

在這些〔破四舊、立四新〕理論的鼓動之下，紅衛兵便開始砸古建築上的龍頭獸瓦，磚雕木刻，焚燒家譜、古書。平定師範的原址是清乾隆年代建立的冠山書院，所遺留的牌樓、影壁被拆毀，碑刻被損壞。竇璡是清乾隆時期駐守湖廣的提督，他在東關街的故居也被紅衛兵視為破除的對象，四合院因有居民居住，未受到破壞，大門前矗立的兩根旗杆卻被推倒燒掉了。紅衛兵還逼著竇璡的後人交出竇璡的畫像，遭拒絕之後，硬是從一個煤堆底下挖了出來，一尺多長的布制畫像就這樣付之一炬了。⁵

縣耕讀中學的學生，由於他們同縣直中學學生相比，似有另類學生之嫌，因而造反的能量更大。「四舊」中的一些習俗打扮，比如女人梳長辮子、帶手鐲耳環、燙頭髮，大都由他們在街上攔截行人，強行剪辮子、掠手鐲、摘耳環。他們成立的「戰鬥隊」名稱也很另類，叫「專摸老虎屁股戰鬥隊」。在以後的歲月裡，這個長而拗口的名稱被簡化，人稱「專摸」。

據平定中學高三班學生戎崇璽的回憶，母親把自己的家譜也燒掉了。平定中學的學生們，更著重於砸爛「舊文化」。高三班的團支部書記劉振傑也回憶了查抄竇璡家的情況。他說，紅衛兵組織「把竇璡家門前的旗杆拉倒燒掉。我們找到竇璡的後代，要找竇璡的像片燒掉，但是人家不給。

⁵ 前引趙成秀，《印象平定》。

經過一番逼問後，才從煤堆裡翻出來燒掉了。那像有 1 米大，是畫在布料上的」。也有一說是把人家的相片本拿走了。竇璡的故宅在平定東關，他生於 1715 年，卒於 1802 年，是清代一名武官。⁶「竇大家」是平定城有名的宅院，氣勢宏大而威嚴。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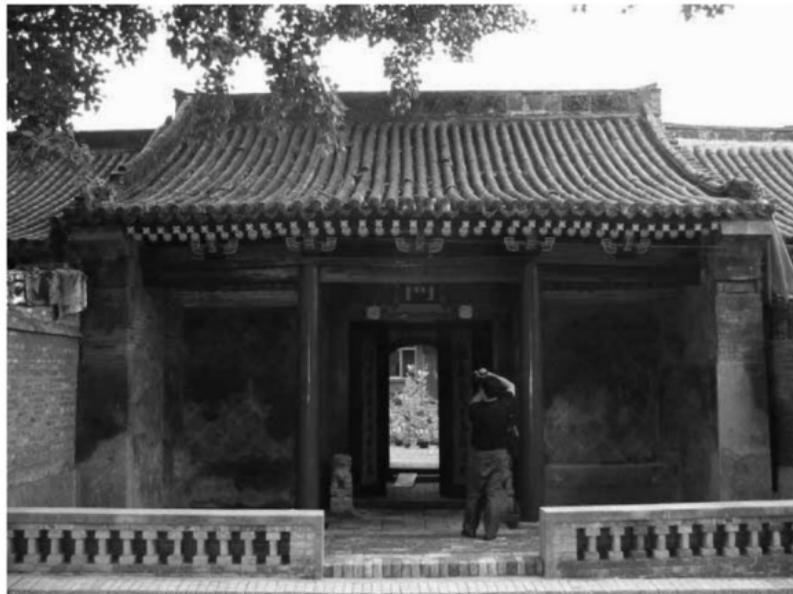


圖 4-1 竇璡宅院前門，房上的獸頭已經被砸掉

資料來源：本書作者拍攝。

6 根據維基百科的記載，「竇璡（1715 年—1802 年），字文貽，號欲誠，山西平定縣東關人。清朝軍事將領，官至提督。……出官江西鈴山營都司、福建陸路提標後營遊擊、臺灣城守營參將、浙江紹興協副將、山東登州總兵，歷任貴州、湖廣、廣東等省提督……竇璡返鄉後，捐資重修冠山書院。卒年八十八，葬於東關祖塋」。

7 竇璡的故事將被北京電影製片廠拍成百集電視連續劇《提督軍門竇大人》。見姚偉華，「一代廉吏竇璡的故事將搬上螢屏」，《陽泉晚報》第一版，2015 年 9 月 21 日。



圖 4-2 寶璣宅院牌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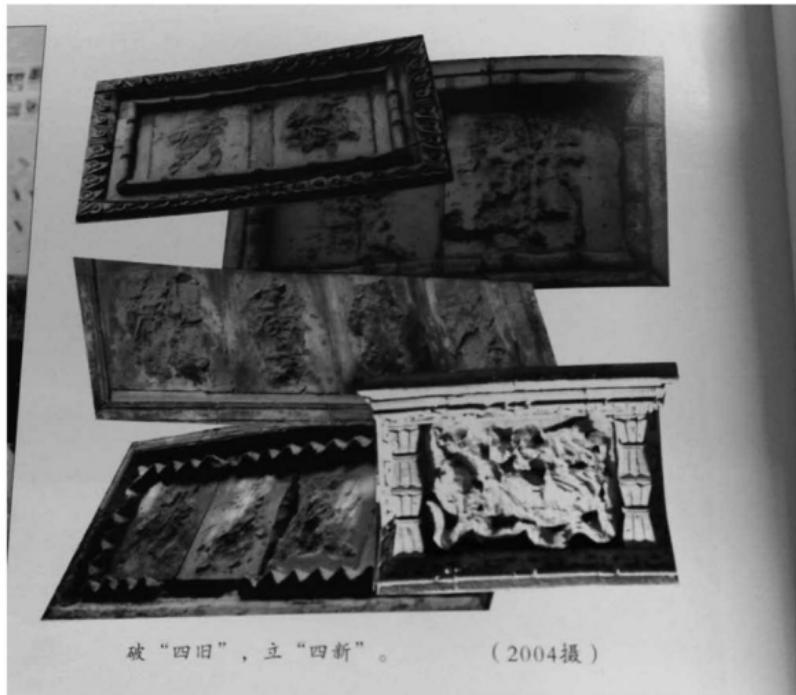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本書作者拍攝。



圖 4-3 寶璣宅院部分

資料來源：本書作者拍攝。

「破四舊」的平定中學紅衛兵還把縣人委會的那口鐘卸了下來，運回學校，因為相傳那口鐘是舊天主堂的鐘。許多學生上房砸掉獸頭和磚雕，拆掉門匾。甚至當時生產的「紅旗」牌自行車，是原來的「白山」牌，因有「白」字而由廠家改名的，但在商標設計時，紅旗的旗頭向地圖上西的方向，似乎與毛澤東「東風壓倒西風」的論斷相左，因而也被學生們注意到而撬掉。



破“四旧”，立“四新”。（2004攝）

圖 4-4 破四舊時被砸毀的磚雕等文物

資料來源：李俊瑞《一方水土》第 136 頁。

這種牽強附會捕風捉影，其實在文化大革命未曾開始時，就已經開始成風了。1964年，某期《中國青年》雜誌封面畫是青年人在割麥子，近景中的麥田畫著深淺不同的麥杆。忽然風傳這些麥杆如果橫過來看，有「蔣介石萬歲」字樣，因而在平定中學流傳甚廣。但由於過於牽強，這種謠傳便自行消散了。後來，某報在報導某位英雄「終於犧牲了」時，曾引起高四班一些學生的注意，認為「終於」二字有幸災樂禍之嫌，數人聯名給報社寫信，結果報社復函解釋。這種「左」的風氣，在「破四舊」中便成為學生獵奇和表現思想敏銳的動力了。

在「破四舊」中，改名成為風尚。許多學生隨意張貼「聲明」，將自己名字中含有「封資修」意思的字任意改換，不過終因太隨意，在學籍登記和戶口上改不了，隨後不了了之。這個風氣的起因，是由於前文提到的北京中學紅衛兵代表宋彬彬給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戴「紅衛兵」袖章時的一個插曲引起的。據當時報載，宋彬彬給毛澤東戴袖章時，毛澤東問她叫什麼名字，宋彬彬作了回答。毛說：「彬彬？文質彬彬，不好，要武嘛！」於是，據說宋彬彬便改名叫「宋要武」。此風一下傳遍全國，青年改名成風。平定中學受此風影響，一時成為風氣。但是，全校真正堅持改掉且沿用下來的，唯有高三班董鋼一人。平定中學的校名，也被改為「衛東一中」，並且還換了校牌。這種風氣在社會上流傳，街名也隨意改變，如上城街改名叫「向陽路」。當時是平定中學初中三年級的學生郝忠德這樣回憶：

文革剛開始，我家在城裡住，就住在姑姑寺附近，我母親是姑姑寺黨支部的書記。我老家是西郊村的，奶奶原來是以給百忍堂家（西郊村的富戶）洗衣服為生的，父親（郝耕卿／郝田）1937年參加了革命，在青海省工作，文革前退休回村。因為我出身好，屬於紅五類，還是共青團員，文

革剛開始了就表現的相當活躍。「破四舊立四新」那會兒，凡是和「四舊」有關的都不能要，比如說什麼土地爺、神主牌、鎮宅石等等。我白天上街鬥出身不好的地主富農，誰家那房上有獸頭就給他拆了，晚上開會決定明天鬥誰，有的時候晚上還去收古書。我主要參加的是姑姑寺街道的運動。還搞過一段時間的紅海洋，你們看我現在的門還是紅海洋那會兒的門。



圖 4-5 郝忠德家保留的紅海洋時期刷紅的大門

資料來源：本書作者拍攝。

馮拉科回憶說：

師範門口的牌樓和影壁都用繩子拉倒了，平定的旗杆院和排樓都拆了。「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是當時行動的理論根據。

「立四新」的主要表現是繼續之前的「紅海洋」運動和到處張貼毛澤東畫像、毛主席語錄、葵花向陽圖案、「忠」字剪紙圖案等。毛澤東的畫像被大批量發行，人們「請回寶像」，在屋內張貼，兩旁配以紅底黃字的「毛主席語錄」印刷品，成為時尚。剪刻的毛澤東頭像配以「葵花向太陽」圖案或以「忠」字衍變的圖案剪紙張貼在門窗玻璃上。毛主席語錄被譜成歌曲，在收音機和高音喇叭上不停地播放。

這些行為，一方面是青年學生和群眾「左」的幼稚和狂熱，另一方面，這也是自上而下的部署。中共中央「中發〔66〕507號」文件這樣指示：⁸

- (一) 改換舊商店的招牌，……繼續積極地有領導地進行。
- (二) 公私合營企業應當改為國營企業，資本家的定息一律取消。資方代表一律撤銷。
- (三) 大型合作商店有條件有步驟地轉為國營商店。

由於受「全國學人民解放軍」、「解放軍是個革命的大學校」影響，也由於北京和各大城市風氣相傳，紅衛兵的時興裝扮是一身草綠色軍裝，戴軍帽，無領章徽，腰紮皮帶。一時間，復員軍人的服裝成為搶手貨。如實在沒有，也得戴一頂軍帽，胸前配戴毛主席頭像像章。當時，平定縣城流行「搶軍帽」、「搶像章」的風氣，如同現時的飛車搶項鍊手袋。

⁸ 「中共中央轉發國務院財貿辦、國家經委《關於財政貿易和手工業方面若干政策問題的報告》的指示」，1966年9月24日。載於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

其實「破四舊、立四新」也包括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每天早晨，平定中學的教師們仍舊得到各教研組集中。上班的第一件事，是由教研組的造反派頭頭帶領全組教師列隊毛主席像前，揮動「紅寶書」即《毛主席語錄》，齊聲高呼「敬祝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敬禮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我們的副統帥林彪同志身體健康！永遠健康！」然後，齊聲朗讀幾段毛主席語錄。這個儀式叫「早請示」。下午下班時，也有相同的議程，名曰「晚彙報」。各班的學生們由於已經不再上課，到校離校各隨所欲，因而這種儀式不如教師們執行的嚴格。但每逢集會，這個儀式必不可少。

曾有一個這樣的故事：當時作為「革命幹部」的平定縣「紅色山鄉教師」張瑾瑤，有口吃的毛病，在講話中「三呼萬歲」時，在第二呼中喊「萬」字時口吃了一下，下面跟喊的群眾誤以為他喊的是「萬萬歲」，便隨之喊「萬萬歲」，被對立面的群眾揪住把柄，說他故意少喊一個「萬歲」，「罪該萬死」。

平定縣晉劇團的業務骨幹、後來成為造反派領袖的荊履榮先生回憶說：

咱當時，沒有想當官，就是發表發表意見。咱也年輕，61年在晉中編導班學習了半年。三個月學哲學，學了毛主席的哲學著作，《矛盾論》、《實踐論》、《改造我們的學習》、《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裡來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政治上進步很大，看問題就和他們不一樣了。當時晉中文化局辦班，就是從各縣調回來的有培養前途的優秀人才，

所以人的水準都比較高。學習編導，我們學習中國戲劇史、晉劇史、學了編劇、導演理論，又到天津看了小百花劇團，在北京看了戲劇藝術大師馬連良、袁世海等的表演藝術，又在北京聽了編導技巧。這個學習對我的提高很大，奠定了我的人生，真正學了很多東西，世界觀、人生觀、藝術觀的改造，怎樣編劇，怎樣導演，在原來的基礎上了一個臺階。我當時，初中只上了一年，對文藝、戲曲、沒有基礎，在這裡才學了戲曲史、晉劇史、打下了一個基礎。

1965 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破四舊時，劇團的道具行頭沒有動，當時的箱都是候得全在北京裝的，一副箱四五萬了，當時有人提出來燒了箱，我說那是歷史，歷史燒不了，他們聽了我的話，按住了沒有燒。到「一打三反」時，劉相奇給賣了。在批判我時，×××的老娘，劇團趙進給人家門上貼了大字報，說人家開妓院了，老人就自殺了。

大破大立的風暴刮向農村，也掀起了軒然大波。我們從郝志東、郝志剛所著《西郊村》一書中，摘錄了有關的段落，從一隅看全縣農村當時的情況：⁹

西郊以及其他農村的破四舊立四新

1966 年 5 月，正當西郊村農業學大寨運動轟轟烈烈地在進行時，「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展。大隊領導召開群眾大會，學習中央文件，傳達和批判彭、羅、陸、楊的「反黨罪行」。生產小隊的批判會由政治隊長主持召開，要求社員提高階級鬥爭意識，發言表態。

西郊中學領導積極回應《人民日報》「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的號

⁹ 見郝志東、郝志剛（著）《西郊村：一個華北農莊的歷史變遷》，2008 年澳門大學出版。

召，在學校張貼大鳴大放的大字報，揭發批判彭、羅、陸、楊，組織紅衛兵鬧革命。紅衛兵從學校「殺向社會」，橫掃「四舊」，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文化、舊思想、舊風俗、舊習慣，把學校的鬥批改發展到社會上來。

西郊中學教師帶領紅衛兵先從校園所在地蒼岩行祠（大廟）開始破「四舊」。他們把山門口的石獅、排樓上的大小石獅、房頂上的脊獸、香爐、香爐蓋全部推倒搗毀，把房檐上、木柱上的古畫圖案鑿毀。隨後他們組織紅衛兵小分隊進入村裡的大街小巷、村民住宅搜尋「四舊」物品。每家每戶房上脊獸都被推倒搗毀，房牆上「泰山石敢當」字樣被鑿沒，門樓上的磚刻雕畫也被鑿沒，土地龕、天地龕都被挖出搗毀，屋裡懸掛的舊裝照片也以「四舊」為由取下燒毀，歷史書、小說、古書也被視為黃色書籍燒毀，本族家譜、祖先名諱世系圖也都摘下燒毀，住房裡陳放的佛龕、神祖匣、木制臘臺、瓷香爐也都燒毀搗碎。雖然也有少部分遺舊物品被私藏下來，但大部分歷史書籍、文物古董、古老傢俱都被燒毀、搗毀。

西郊村村民思想一貫比較激進。早在剛解放時，就有村民編對聯挑戰宗教的權威。村民郝寶就編了兩副對聯貼在大廟的門口（由郝雨海口述）：

1. 舊社會燒香磕頭向你禱告，新社會把你打倒該你搗灶，橫批：不信這套。
2. 舊社會真奇怪，村民人兒把佛拜，橫批：明是泥臺。

所以，「文化大革命」運動西郊村依然走在前頭。在縣、公社工作組王忠義、張大海的領導下，西郊村民也展開了「破四舊、立四新」群眾運動：婚喪大事從儉操辦，杜絕大吃大喝鋪張浪費，婚事不請客收禮，嫁娶不坐轎不騎馬，用自行車接來勞動工地進行結婚儀式，糖塊瓜子招待在場喜慶社員，新娘新郎互贈勞動工具如籬筐、鐵鍬作為禮物，互唱革命歌曲，婚禮儀程結束後，夥同社員參加勞動。

喪事不設宴招待來客，以家常便飯作為接待客人飯食；出殯不請吹鼓手，靈棺不上棺罩（村貨鋪棺罩都被造反派搗毀），孝子不穿白不戴孝只戴黑紗，不拽靈；全村葬埋死人實行公墳，貧下中農和中農的公墳設在烽台嶺小峰壠，貧農賈智福為第一個葬於公墳的死者；地富反壞右的公墳設在西嶺，富農郝玉桐之妻為第一個葬於公墳的死者。

在政治隊長帶領下，墳墓全部被平整為耕地，墳內墓誌碑和家譜碑有的被推倒掩埋，有的被打碎壘了地墻；墳內栽種的樹木被砍掉；有歷史價值的明朝名人郝夔的四塊禦祭碑也被搗毀，龜駒碑的碑座和二龍戲珠的碑蓋也都被埋於土中。

有悠久歷史的文物韓信廟試劍峰也都遭到慘重的破壞。試劍峰匾額被造反群眾摘回家中改制成床板，廟門扇及廟房立檻、臥檻、板材也被拆除做了傢俱。試劍峰壁上翠綠柏樹都被砍掉。宋朝河東路平定軍宣毅第三十指揮、第一都長行董萬及教頭馮進於元佑龍年三月晉獻韓信的一臺香爐，也被推到深溝。韓信廟下兩座配廟二郎廟八臘廟的廟殿也被拆除，木料磚塊拉去修建了集體飼養場。試劍峰的圍牆也被拆除用作其他建築的材料。試劍峰作為有兩千多年歷史的罕見文物古跡，頃刻變成廢墟荒祠。大街中的東閣、當中閣、西閣，在破四舊期間也都被拆除。那一段時間西郊村流傳的革命歌曲是「革命的站出來，不革命的滾開，砸爛舊世界我們自己安排」等。這樣的歌聲在會前會後、田間地頭到處響著。

1966年6月，全村掀起學綱縣運動，由集體發放紅塗料（鐵粉），每戶都將院裡院外牆壁全部塗成紅色。村院一片紅色景象，時稱「紅海洋化」。

下面是兩段1969年歌唱文化革命移風易俗的街頭宣傳劇的唱詞。郝玉生提供、口述。第一首歌頌破舊，第二首歌頌立新：

天地土地龕都抹嚴，¹⁰門口不放黑大漢。

房上的獅都搬完，四舊東西一掃幹。

各種衛星齊上天，一天等於二十年。

穆蘭堂家孩把婚完，老漢（公公）不把財神接。

介紹人不提留來回罐，陪隨¹¹給了鑊、鐵鍬。

上地幹了整半天，拿一包糖給大夥散。

完婚折騰了整一天，一共吃了八斤麵。

郝德恥家他媽活了九十三，出殯打發這一天，

孩子們沒有穿孝衫，孫孩也不打引魂幡。

沒收禮沒上飯，打發出以後分遺產，閨女們還分下兩小布衫。

沒花錢還分下產，弟兄們也都沒意見，你看年（人家）體面不體面。

以後咱都要學習年（人家，他），打發老人咱不賺錢。

也有對「破四舊、立四新」運動不理解以致抵制而付出代價的。中共平定縣委〔66〕060號文件通報了一位黨員因抵制運動而被全縣通報開除黨籍時說：

（1966）8月27日，燕龕小學「紅衛兵」向廣大群眾宣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當日上午，紅衛兵史政蓮等三人到史亨寶家中說服動員，要求史消（銷）毀神像、神祖、舊畫、怪物，史說：「我家沒有什麼舊的啦！」紅衛兵第二次又去說服動員，史已把大門關閉，不讓紅衛兵進去。後經紅衛兵的強烈要求，史才不得不把門開開。

10 天地土地龕——擺放天地爺爺、土地爺的小窯窯。

11 陪隨：娘家陪送閨女的嫁妝。

紅衛兵進家後，要求史把牆上的舊畫和桌上擺的壽星背葫蘆的硯水瓶與孩孩騎魚泥的塑像消（銷）毀，史板起臉孔，生氣的說：「十六條哪有這規定，簡直是胡搞。」說著便把紅衛兵轟出門外。隨後，又有一些紅衛兵進去與史說理，又被史頂了出去。正在史氣憤萬壯（狀）之時，帶著紅衛兵袖章的史萬存（史的兒子）回家吃午飯。史一見火冒三丈，不分青紅皂白地揪住兒子腳踢拳打趕出門外，並大罵：「你們這是什麼辦法，十六條給你麼規定沒有？你們簡直和響馬〔平定方言，意即土匪——轉抄者注〕一樣，不管到誰家二話不說就這麼幹。」說著，便拿起壽星背葫蘆的硯水瓶和孩孩騎魚泥塑像，氣勢洶洶跑到學校，找到教師賈文新質問：「這是牛鬼蛇神嗎？十六條哪有這規定？你們的學校和響馬一樣，亂搞！」當時，賈文新同志向史做了耐心的解釋，史更反感地說：「不用給我講這些大道理，我什麼都懂。」史手持怪物，連吵帶罵而去。史的這種打擊無產階級革命的紅衛兵，和不滿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的行為，引起廣大師生和革命群眾的極大反對。這種粗暴野蠻的行為，是十分錯誤的，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絕對不能允許的。¹²

縣委文件在又列舉史的其他錯誤言論後，決定說：

為嚴肅黨紀，教育本人及全黨，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和保證國家、集體財產不受侵犯，縣委決定，同意支部意見開除史亨寶的黨籍。並建議行政給予撤銷該人的機工組長和降兩級的處分。並將此決定在全縣機關、廠礦、中等學校中，向全體革命職工和革命師生宣讀，認真討論。¹³

12 平定縣檔案館存「中共平定縣委文件〔66〕060號」。

13 同上。

這是平定「文革」史上第一個黨內因不理解和抵制「文革」運動而受到處分的中共黨員。這個文件，在「階級鬥爭」還沒有達到高峰時所發，語氣比較溫和，沒有「上綱上線」，而且描述相當細緻，活脫脫寫出一個身居偏僻之地且受傳統習俗薰染的人對這種暴力性的、侵犯私有財產權力行為的不滿和抵制。當然，在運動風暴初起時的鄉村，礙於舊有鄉村秩序的習俗，暴力也還沒有十分強烈。但是，黨內和行政處分並「宣讀討論」，應當說是在殺雞儆猴：不要和自己不能理解的政治運動抵抗，哪怕是為了保護個人人身和財產安全。

批鬥「牛鬼蛇神」

牛鬼蛇神，這些本來是神話中的人物，此時此刻，成了又一批被打擊對象的代名詞。紅衛兵的「向舊世界宣戰」，當然包括向「舊世界」出來的人的宣戰。這些人從「舊世界」過來的人，包括了家庭在土地改革中定成分時所定的地主、富農、在政治運動中被定為反革命分子的人，還包括了受過刑事處罰和雖沒有刑事犯罪記錄但因為道德品質、生活作風有缺陷而被定為「壞分子」的人，還包括了 1957 年「反右派」運動中被定為「右派分子」和已經摘掉「右派」帽子的「摘帽右派」，甚至還包括了一些從事或以前從事過打卦算命、看陰陽風水、和尚道士等「封建迷信」職業的人。這些人合稱為「五類分子」，或雖不是「五類分子」但屬於准五類分子的邊緣人物。在歷次運動中他們都是「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的人，是屬於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的人。儘管這些人似乎是「死老虎」，但在階級鬥爭的眼光下，他們是「人還在，心不死」的危險分子。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他們當然地受到了衝擊。

來自上邊的指示、支持和縱容，是歷次政治運動花樣翻新的根本原因。1966 年 5 月 18 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說：「革命的根

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有了政權，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¹⁴這是繼毛澤東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後，文化大革命初期從高層發出的階級鬥爭的指示。這也是我們在前面兩章所講的階級鬥爭的意識。根據這個指示的精神，1966年8月，時任公安部長的謝富治在某次會議上說：「過去規定的東西，不管是國家的，還是公安機關的，不要受約束」。「民警要站在紅衛兵一邊，跟他們取得聯繫，和他們建立感情，供給他們情況，把五類分子的情況介紹給他們」。¹⁵

在高層領導的指示、暗示和縱容以至推動下，「批牛鬼蛇神」成為文化革命又一浪潮。在北京，最典型的例證是：由民警提供情況，紅衛兵出面打鬥。僅大興一縣的13個公社、48個大隊，在三天之內，殺害「四類分子」及其家屬325人，最大年齡者80歲，最小年齡者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北京農業大學附中「紅旗紅衛兵糾察隊」在8月26日，一次毆打「非紅五類」師生約130人，占全校人數的三分之二。紅衛兵私設監獄，私自刑訊逼供一時成為風氣。僅北京一市，就有1,700餘人被打死或被迫自殺，33,600多戶被抄家，84,000多名「五類分子」被趕出家。¹⁶

在惡之花盛開之際，這一切行為都是在互相仿效傳播的，而且傳播奇快，創新更多。平定的鬥牛鬼蛇神運動，首先從學校開始，然後在社會上傳染。學校的運動政治色彩濃一點，社會上的運動則搞著搞著便搞成了鬧劇。

平定中學的教工中，來自大城市的多，高學歷的多，家庭成分非「紅

14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5月18日。載於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5 見前引 MacFarquhar 和 Shoenhals 著，*Mao's Last Revolution*，第125頁。

16 上述資料與資料，均摘引自高泉、嚴家祺《文化大革命紀實》，北方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版。

「五類」的多，自身在歷次運動中有過閃失的多，在舊政權下幹事的現在被「控制使用」的多。因此，鬥教工的名堂也多。批鬥剛開始，學生們以泄憤報復的心情，給自己的班主任和任課教師張貼大字報。儘管學生們努力「上綱上線」地批判，但沒有多少有批判價值的東西。時任初中班班主任的張福林教師，雖然身為「紅五類」、共產黨員、政治教師，但班裡學生仍給他貼大字報，儘管這些大字報的內容無非是管理方法等雞毛蒜皮之類的東西。

教師中也分開了「左中右」。文革一開始，便有教師組織起各種群眾組織。據時任學校教導主任的曹克倫回憶，「文革一開始，教工中由郭鳳英、李慕光、梁憲章、盧鴻珊等人組成了『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當兵回來的李濂領著教工搞『早請示、晚彙報』」。

學校貼大字報的用紙，一開始使用廢舊報紙。但由於用量越來越大，以至於把圖書館作為資料保存的豎排版式的五〇年代的報紙都拿出來用了。後來改用一種黑黃色的劣質包裝用紙。各班到總務處領紙，用多少領多少，不限量。貼大字報使用的漿糊，由學生食堂提供。由於細糧供應量少，漿糊使用量大，一天一袋白麵都不夠，學校號召使用黃土瀉成的稀泥湯貼，據說是北京經驗可以保持三天不掉，但是沒有推廣開。

大字報隨後開始向一些非「紅五類」家庭出身和平時表現不太激進的教師集中。這是由於學校領導層，主要是以蔡守惠為首的黨支部有意引導。平定中學的第一張大字報是 1966 年 6 月 19 日貼出的。據平定中學老教師荊械回憶：

咱們學校（指平定中學）大字報是 66 年的 6 月 19 日開始的。那時候，咱們學校正組織師生下鄉突荒。我記得那天上午回校，累的不行。那

時候學校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為什麼這一天記得這麼清楚呢？是因為 1960 年 6 月 19 日，咱們學校在徐峪溝下鄉割麥時因要水死了一個學生。1961 年的同一天，十五畝水池（水池名）要水又淹死了一個學生。老師們開玩笑，說這一天對咱學校不利。恰巧 1966 年這個月的這一天學校出了大字報，所以我記得很清楚。到第二天第三天，大字報就鋪滿學校了。

關於對老師的批鬥方式，翟全臣回憶說：

批鬥方式，現在叫隔離審查，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審查。沒有關起來但限制了一段時間，不讓出校園。學校裡分了好多派，有晉南派、北京派、浙江派等。對老師也進行了劃派，有個叫陶予的老師，是陳元才的妻子。因為家裡有海外關係，愛打扮，穿的時髦，說生活方式有問題，對她進行批判。

郝忠德回憶：

學校裡頭批鬥其實剛開始是黨支部作主的，最初鬥老師是蔡守惠帶著幹的。當時批鬥的方式是類似於隔離審查，就是自由上有些限制，不能隨便出入校園。批鬥老師發展下去就成了批班主任，當時我記得批過的班主任有張興意和李臨瀛。當時批鬥老師時，被批鬥者被勒令站在凳子上。後來，主要鬥的是楊乙榮、陳元才和陶予。楊是個物理老師，講課非常清楚明白，做人也很嚴謹，鬥他主要是說他有一些右派言論。陳元才是個音樂老師，很有才華，但是因為也說他有右的言論，所以文革一開始就批鬥他了，他的罪名是有港澳關係和一些歷史問題。陶予是陳元才的夫人，陶說陳受苦是因為他有才能看不起領導，同時歷史有問題。陶予是因為人長得

漂亮，家庭有海外關係，而且衣著開放，所以也成了批鬥對象。

陳元才後來跑了，學校報告公安局說是向蘇聯跑的，抓回來以後就把他們送到石窯勞動改造去了。當時我們鬥老師主要是以質問為主，不打人。

還有個事就是我有一次上廁所發現點紙團，報告給支部以後就開始打撈，撈起來弄乾淨後發現是外幣，一下就轟動了。到底是誰的也沒有查出來，但我認為這個事說明老師們已經有了危機感了。



圖 4-6 原平定中學校園主幹道

資料來源：本書作者拍攝。

據當時已是共產黨員、史政教研組教師的郭某某的回憶，是校黨支部書記蔡守惠派人去縣教育局查檔案，回來在教師和學生積極分子中有意傳播的。由於這個原因，一些出身不好、平時或政治上不太積極或只顧業務不問政治的教師，便受到衝擊。如英語教師黃徑秋、生物教師李淑琴、語文教師李鵬、歷史教師張家浩等。李淑琴老師高跟皮鞋的後跟也被學生打掉了。學生們喝令他們站在凳子上，隨意提幾個問題，在他們回答不能滿意時喊口號：「砸爛×××的狗頭！」，「×××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等。在一些激進分子的引導下，這些被批判者因其籍貫或友情而被冠以「北京幫」、「浙江幫」等等，造成「反黨小團體」的印象。

原高四班學生李金田在他的〈「文革」的回憶〉（未刊稿）一文中寫到：

大字報寫的五花八門，老師們互相揭底的多，什麼「李淑琴是資產階級臭小姐」啦，「李鵬是地主階級小爬蟲」啦，都是老師們先互臭，學生們跟著起鬨的。到後來，連「蘇繼秀是繼蘇修」之類牽強附會的玩意兒都出來了。

這天上午，我一到學校，就感覺不對勁兒。同學們成群結夥，也不按班級組織，像一股一股風一樣，在校園裡卷來卷去。我也隨大流來到校會議室旁邊的教研組排房。這時候，已經有人喊「揪出×××」來了。各個教研組都有幾個老師各自坐在辦公桌前，低著頭，個個臉色鐵青。我記得有瘦瘦的操北京口音的李鵬老師、老而瘦一臉嚴肅的黃徑秋老師、小巧秀麗的李淑琴老師，還有好多，我記不太清了。學生一喊「揪出」某人，那人便乖乖站起來，走到外面，聽從學生的命令站在凳子上。學生們一陣亂喊，一霎時站了十幾二十個。學生們圍著吶喊一會兒，見問不出個子丑寅卯，散了夥，再喊出一個來站上去。這會兒想起來，想必是有人在後邊指

揮著的。要不然，學生們那樣鬧，學校領導怎麼沒人出面阻止？到臨近中午，我返家時，老師們還東一個西一個站在凳子上，但校園裡已經沒有了學生——住校的打飯，跑校的回家，只有那些站在凳子上的老師們，還在那兒站著，誰也不敢下來。

另據戎崇璽回憶，當時高三班也有人揭發某老師有作風問題。

在一輪無目標的亂揭亂批之後，目標逐漸集中在三人身上：楊乙榮，本校高中物理教師，北京師範大學畢業，學問扎實，講課條理分明。因在「反右派」運動中擔任學生幹部時向領導反映「反右鬥爭有擴大化現象」而在運動後期被補劃為「右派分子」，摘帽後由北京下放到平定。陳元才，本校唯一的音樂教師，北京音樂學院畢業，學識豐富，對學校文藝工作獻力頗大，曾排演舞劇《搶親》、話劇《年輕的一代》及元宵街頭大秧歌等，並培養學校各種聲樂、器樂骨幹，組建演唱演奏隊。我們多少學生的音樂能力，包括本書的兩位作者的音樂能力，都是他給培養出來的。陶予，歷史教師，陳元才妻子，嬌小風韻，喜愛穿扮，有海外關係，親戚在香港定居。

對他三人的批判，由大字報揭發進而形成批鬥會，並掛紙牌，姓名倒寫橫寫並打紅叉，罰彎腰，「坐噴氣式」。給陳元才的大字報曾故意把他宿舍門封上，開門扯破大字報就說他「故意破壞大字報」，讓他夫妻及子女四人從門下往進爬。對楊乙榮曾派師生晝夜跟蹤監視。把他們的私人書信日記斷章取義披露，以證明他們的「狼子野心」。學生們在抄了陳元才的家之後，還把人家的相架拿走，回去貼上毛主席語錄，放在自己的課桌上。楊乙榮在筆記中摘錄李白「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澆愁愁更愁」的詩句，曾向校領導交心說過「運動過去就用我，運動來了就整我」的意見，這些都成為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狀。



圖 4-7 平定縣文教系統先進代表會議（1979）中楊乙榮（左一）與其他代表交流。
左後方站立者是原教導主任曹克倫

資料來源：照片由李俊瑞先生提供。

陳元才因忍受不了批鬥，躲回東北老家避難，被學校以「投蘇叛國」為名告到公安局。公安局將他從東北抓回後，儘管沒有證據而不得不交回學校，不能拘捕，但學校教工中的激進者仍然以大字報形式畫出「陳元才投敵叛變路線圖」公布，引導學生對他作更激烈的批鬥。陶予因文革前舞會時穿旗袍、燙髮，再加上和陳元才夫妻關係，便以「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批判和上臺陪鬥。後來陳元才和陶予被攆到東回公社的前、後石窯村下鄉。理髮員杜鵬泉因為是富農出身，被攆回老家。以上的批鬥，有時校領導出面，有時由教師中的激進分子和官辦紅衛兵主持。

在批鬥的同時，還對他們限制行動自由和人身監督。李金田在〈「文革」的回憶〉（未刊稿）中記述了他參加監督「黑幫」的一次經歷：

那段時間，班裡許多同學都顯得很神秘，早晨到教室時面帶倦容。一打聽，人家夜裡都有行動。找一位平時關係不錯的同學一問，才知道是在夜裡通宵監督那幾個被鬥分子，一來怕他們狗急跳牆搞破壞，二來也怕這些階級敵人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掛了大樑或抹了脖子。這天晚飯後，我謊告母親說學校安排我有監督任務，借了一支手電筒，硬下頭皮來到學校，找到班主任老師，說我堅決以實際行動投入到革命行列，積極與陳元才劃清界限，要求參加監督。老師起先不讓，說這是有組織的行動，不是誰想參加就能參加的。但當時已十點多，攆我回家已不可能，便勉強答應我參加監督楊乙榮的小組。

我們幾個人來到東邊教工灶房，這裡正對著楊乙榮的單身宿舍。我們眼巴巴看著他熄了燈，我設想著他會偷偷打開門或者在屋裡幹點什麼見不得人的勾當，我便可以發現他，明天我就可以立個大功，洗刷我身上被潑上的污水了〔見下面的解釋〕。但是，讓我失望得很，他什麼動靜也沒有。到深夜時，他的屋裡竟然傳出高低起伏的鼾聲。失望之餘，瞌睡蟲便附了身。大夥支撐不住，便顧不得餐桌上的油垢和醋味，躺下來酣然入睡。

天蒙蒙亮，有一同學發現楊的屋子亮了燈，大夥也都打過盹了，於是睡意全消。燈光裡，我看到了他映在窗上的身影，似乎在穿衣服。一會兒，他開門出來。這時天已大亮。由於停了課，所以大夥都在睡懶覺，校園裡空空如也。

行動小組的同學都回宿舍去睡覺，居然對我委以重任，讓我單人獨馬擔負監督任務。我像電影裡的地下工作者，遠遠跟在他的身後盯梢。然

而，我再一次失望了：這個「黑幫分子」竟然坦然地背著手，四處蹣跚看著那些在他名字上打著紅叉的大字報，還做著各種舒展的動作。我這次大膽而且破釜沉舟的行動，並沒有使我在老師和同學眼裡有什麼改變，純屬「公公背兒媳婦過河——費力不討好」，便灰溜溜地拉倒，不再枉費心機了。

在高中兩個班和初中的一些班級，曾有過學生鬥學生現象，主要是大字報批判，有個別面對面批鬥者。但學生對學生的大字報一般都張貼在本班教室，可以推斷是有組織有領導指示區別對待的。初中班的學生曾經圍攻批判過幾位女同學，說她們和某些老師有不正當男女關係。初中一位姓常的女學生，因為她的父親是一位比較有聲望的老知識分子，她是世家子女而被同班同學圍鬥，痛哭流涕。這些捕風捉影或憑空杜撰的批判，對這些學生的傷害之大，使她們終生難以釋懷。

李金田在〈「文革」的回憶〉（未刊稿）中這樣記述他被同學們大字報批判時的情形：

那一天上午，我一進教室，就見幾個同學聚在一起，在一張舊報紙上寫著什麼。從他們看我的眼神裡，我感覺與我有關。我的心狂跳起來。教室裡人不多，我們彼此都有點尷尬。上午放學時候，教室裡已經空無一人。我硬著頭皮，去看那張大字報。標題是「揪出反革命分子陳元才在高四班的小爬蟲」，三四張報紙豎著接起來，從房子的天棚拖到桌子。藍墨水列了幾大罪狀，有和陳元才不劃清界限，有白專道路，還有一些根本沒那回事的「品德問題」什麼的。這事對我打擊最大的，是挑頭的人，恰恰是我一個平時不錯的朋友。後來我才知道，我這算是輕的，別的班級挨鬥的都有。

大字報最厲害的，是說你是什麼你就是什麼。被貼了大字報的人，根本無法辯解，也不敢辯解。即使所說是謊言，貼出來就是真理。即使給你平了反，那些無中生有或捕風捉影的事，也會如影隨形，讓你終生受用。這也是許多在「文革」中受到衝擊的人對往事緘口不言的原因之一。

打人的現象其實也時有發生。據戎崇璽回憶，學校的伙食管理員張潘老師，因為平時管理較嚴，比如丟了飯牌要罰款，得罪了學生，所以被紅戰團的學生裝在麻袋裡，拳打腳踢後，拖到後操場，凍了一晚上。但批鬥會主要是戴高帽、遊街、喊口號，如「打倒封資修！」、「砸爛×××的狗頭！」等等。

身為中等專業學校的平定師範，其組織隸屬關係不在本縣。平定師範的黨支部書記王守政，是抗日戰爭時期參加革命的，行政級別高，處理事情比較溫和。但是，平定師範對教師也有衝擊，包括校長范雪野在內的許多人被大字報批判，對吳覺民、王鐵夫、張德光等舊政權時幹過事的人或家庭成分高的人批鬥也較激烈。

關於平定師範鬥教師、鬥群眾的情況，原平定師範學生馮拉科回憶說：

1966年「文革」開始時，我們即將在七月份畢業。首都紅衛兵參觀大寨時說：「全國都不畢業，你們是反動路線的受害者」。於是我們一行六人到晉中造反，王繡錦（時任地委書記）同意我們返校。1966年11月初，我們返校鬧革命，全年級都返校了。

文革一開始，老師就都有了問題啦，我記得那會有這麼幾個老師是挨批了。一個是吳覺民老師，他是給日本人當過翻譯；音樂教師王鐵夫是給日本人當過水兵。從這些老師身上就開始批鬥上了。當時平定師範有個教

師叫孫守珍，是個語文老師，可能是解放前也有點問題，所以「文革」開始就害了怕了，在師範柏樹院自殺了。有個老師叫劉夢白，是教育部打下來的黑幫，人家上廁所用了點備課紙，學生們抓住了非說是黑材料就把人家給鬥了。

這以後，同學整同學就開始了。其實俺們同學們感情很好，可是「文革」開始以後，思想和出身不好的同學都受了批判，我們同學分成了好幾個派，慢慢的的感情上也就有對立了。我還記得當時有個姓馬的同學，因為父親在國民黨裡幹過事，就成了受批判的重點。

時任平定師範圖書管理員的梁鳳鳴回憶說：

平定師範在「文革」開始階段有三個教工組織，出身好的是趙來柱、張曉峰他們的「赤衛隊」，一些出身不好不賴的組織了「紅旗」，毛英傑他們成立的組織叫「乾坤赤」。在「文革」鬥牛鬼蛇神階段，嚇死了一個教師〔可能指上文的孫守珍——作者注〕，他用剃頭刀抹了脖子。他是臨猗人，成分高，他女人還戴著地主分子帽子。他死後，馮拉科他們幾個學生們在棺材上寫「牛鬼蛇神」的字，然後就埋了。平師當權派王守政沒有多組織教師互鬥，教師們的歷史，都是從檔案中查出來的。

關於平定縣城裡的所謂「牛鬼蛇神」的批鬥，時任平定師範附小教師的趙成秀在〈我的文革歲月〉回憶文章中寫道：

隨著破四舊運動的退潮，橫掃牛鬼蛇神的浪頭又湧了過來。這牛鬼蛇神當時就是特指「地富反壞右」，按照毛澤東「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理論，他們是無產階級長期專政的對象。在農村，這五類分子早已是一

批再批的死老虎，而在縣城批鬥他們，則更能營造一種轟轟烈烈抓階級鬥爭的濃烈氣氛。

我記得，規模最大的就是號稱平定城「四大壞水」的街頭遊行，他們都戴著牌子，耷拉著腦袋，其中，一個外號叫「××」的中年女子，耳朵上吊著兩個番茄，胸前掛了好幾雙破鞋，圍觀的人，或竊竊私語，或輕蔑冷笑。我當時並不覺得這是對人格的侮辱，人權的踐踏，只是覺得熱鬧、好看而已。

平定師範的紅衛兵對批鬥牛鬼蛇神相當積極，給我印象最為深刻的就是批鬥「壞分子」葛東海。這葛東海在平定可是個出了名的人物，他家住上城，與平定師範和附小只一街之隔。說他是「壞分子」主要是因為他懂得點陰陽八卦，常在街上給人測字算卦，據好多人說，他的算卦還十分靈驗，因此到他家求籤的人絡繹不絕。即使在他被「管制」的那些年，他的生意也從未停止。

這次批鬥的會場設在我們附小的操場上，有社會群眾，有師範師生，我們附小師生大都參加了。葛東海似乎很有「大將」風度，神情自若，面不改色，對算卦騙人的那一套把戲侃侃而談，有根有據，嚴肅的批判大會變成了笑場。有些激憤的紅衛兵開始不耐煩了，逼近他推搡起來。也不知什麼時候，附小老師高忠明端來墨汁，給葛東海抹了個黑臉，人們哄笑着，擁擠著，批鬥會也就這麼草草收場了。

在破四舊和批鬥牛鬼蛇神中，我始終是一個看客。我還給兩個班的孩子們帶著語文課呢。¹⁷

葛東海，平定上城人，舊政權時期曾在北京天橋擺攤算卦，因小有名氣曾被北京某小報吹捧。解放後雖不公開設攤，但也私下有過這類活動。

17 見前引趙成秀《印象平定》。

葛東海屬城鎮居民戶口，歸上城居委會管轄。據時任上城居委會治保委員的石寶蘭回憶，批鬥葛東海是由城關鎮決定的。居委會因為居民都是女人、孩子、老頭，批鬥會開不起來，便與農村戶口的城裡大隊協商，借人開批判會。城裡大隊人口多、青年農民多，便與居委會合作開批鬥會。

批鬥會場設在上城平定師範大操場。批鬥會開始時，把從葛東海家抄家時抄出的舊政權鈔票串成一串掛在脖子上，把算卦家什端著，讓他邊走邊喊：「我叫葛東海，我是牛鬼蛇神！」城裡大隊的青年農民把一個「貢貨鋪」存著的「執事牌」拿出來，糊上白紙，寫上批鬥口號，舉著當作標語牌。隊伍前面有鑼鼓家什組成的「儀仗隊」。這次遊行從上城出發，到東門外，又返回上城大操場，在操場上開批判會。

年輕人出於好奇，有人勒令葛東海擺卦攤。葛東海身體較胖，一圈遊行下來，已經是氣喘吁吁，見有人問這個問題，一屁股坐在地下，嘴裡念念有詞地擺起卦攤來。事後，有人問他那次遊街累不累，葛東海一本正經地說：「苦重哩，苦重哩！」自此，縣城方圓便流行一個歇後語「葛東海遊街——苦重哩！」據有人回憶，晚上葛東海是被打了的，而且打得很厲害。

批鬥風很快擴散，批鬥形式更加激烈，鬧劇的成分也更大。這些大大小小的批鬥中，除了葛東海等人之外，還有其他所謂「牛鬼蛇神」。郝忠德回憶縣城以及農村裡的批鬥時說：

我記得剛開始批鬥是地主富農成分不好的。我印象裡第一個被批鬥的是城裡大隊的劉梅成，地主出身，後來被撵回老家了。還鬥過劉某某，說他在師範強姦了一個女生。還有一完小的校長張忠智，給他掛了個大牌子遊行，鬥他的壞分子。在西郊村，我記得 70 年以後還鬥過郝文科（何明，

百忍堂家的孫子，文革時從中央黨校被下放回村），把他的 70 多歲的母親劉卓先也拉上來鬥。他們（郝雨田一音）還拿針縫劉卓仙的人中，一下就疼暈了。當時運動比較厲害的村有西郊、上莊、南坳，這三地都是有名的運動村。

批鬥發展到後面了，連男女作風也就都成了問題了。比如說，城裡街道上李××的老婆當過妓女，就被批鬥了。有一個人家的媽媽是資本家出身，也被鬥。倒沒有死人，只是「坐飛機」（彎腰、背手），一鬥好幾個鐘頭。還有一個被人們誣衊起了外號叫「××」的女人，因為說她生活作風不好，就用爛番茄和一隻破鞋串起來給她戴脖子上，然後就遊街。還有就是 65 年在平定中學逮捕了高柏亭和褚孝雙，罪名是生活作風不好和反革命。但是涉及到的女生後來都翻案的，說他們只是師生關係。可黨支部寫的定案材料繪聲繪色。我看過這些材料，是王文書寫的。當事人也並不承認，不過高和褚還是被抓了起來。

城裡大隊社員郭某某，因據傳生活作風方面的原因，被戴「壞分子」帽子。她在遊街時，城裡大隊青年社員勒令她穿上旗袍，臉上口上都抹上顏色，在她脖子上拴了一雙破高跟皮鞋，強行讓一個風傳與她曾未婚同居的男子和她胳膊套胳膊遊街，遊街時也有「儀仗」等。

上述幾次遊街，因為都在縣城內進行，觀看人多，影響也廣，因而成為縣城批鬥牛鬼蛇神的造極之舉。此後，以城裡大隊批鬥最為激烈。城裡大隊位於縣城內，社員多為原住居民中的農業戶口者，社會成分複雜，有戴帽「四類分子」四十多人，還有眾多邊緣人物。除集中批鬥外，還輪流罰站街、義務掃街。站街一般由大隊的造反派發出「勒令」，「勒令×××於×月×日到大街上某個要道口或人流繁華處示眾」，這個「管制分子」便會自己戴牌子，到指定地點去，低頭站立，直至治保主任或造反派允許

他離開為止。其他各個大隊雖也有批鬥牛鬼蛇神之舉，但以城裡大隊為最烈。

李金田在〈「文革」的回憶〉中這樣說：

一天黑夜，我去城裡大隊去看批鬥四類分子。被鬥的那個四類分子姓戴，以前大概是開照相館的。會址是在用作大隊部的城隍廟裡。只聽得一名造反派頭頭一聲斷喝：「把戴××揪上來」，這個人便被扭著胳膊推進人圈。造反派問了幾句「為什麼想變天」之類的話，姓戴的不承認。造反派又喊「拉出去」，他便被人扭了出去。我們誰也不敢跟出院子去看，只是聽著院子裡「咕咚咕咚」的人體與地面撞擊聲和「哎喲」的慘叫。不大一會，他被人推回來，臉色慘白，腦袋上淌著血。

李寶光，平定縣二輕局退休職工。他回憶當年寫大字報以及被錯誤批鬥的情形時說：

我們一批城鎮戶口的青年，因為沒有工作，就被組織到城關鎮，成立了一個「勞動後備講習所」，負責人是城關鎮的張九崗。我們每天就是聽聽講話什麼的，當然沒有工資。其實就是怕這些青年人流落社會。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的時候，流行揭批什麼「黑線」，我們這十幾個人就合計著，給城關鎮領導們寫大字報。那時候年輕，大夥七拼八湊地說，我執筆寫，說的人當然是什麼得勁說什麼，上綱上線，一下子寫了二十七張紙。

城關鎮的書記是翟變成。批鬥牛鬼蛇神時候，他就把我們弄到城裡大隊去，讓那些農民戶口的人鬥我們。為什麼到城裡大隊？那時候，城裡大隊種蔬菜，歸城關鎮管。那時候，我媽教書，在石板坪，我隨我媽住在那裡。有一天，城裡大隊的風池和另外一個人把我叫到城裡大隊辦公的地

方，就是城隍廟那個大殿裡，批鬥我，還有李俊傑、郭紹康好幾個人，主要是我。還把我拉到街上遊鬥，戴牌子，拿繩牽著我。

那是在遊鬥葛東海以後，因為他們遊鬥葛東海弄得城裡人都知道，才把我們弄到城裡大隊鬥的。我那時候穿一件我舅舅的工作服，他們說我不是工人階級，穿工人階級的衣服，是冒充，就把我的衣服脫了。我記得董雲章的閨女正和我們一個人找對象，董雲章說了點抱不平的話，也挨了批鬥。

批鬥完了，就把我們這些人趕到陳家圪梁、花河峪去了。過了三個月，又讓我們回來，說批錯了，還搞了退還黑材料。後來我插隊回來，在二輕局當工人，有一回和風池碰上了，我們老早就認識，還常一起玩。他還說，我那時候也是幹了錯事，你不要計較。我說，運動麼，不是你我的事。

批鬥風還未平息，一場更大的動盪接踵而至，這便是「遣返」和「勒令下鄉」。平定師範職工關一之全家縮坐在陽泉火車站的候車大廳裡，已經整整三天了。在他們的身邊，堆滿了大箱小包。儘管家境不富裕，但窮家值萬貫，吃穿住行的家當，還是讓他們全家負重如牛。關一之是平定師範的中層幹部，他屬於那種被明裡重用暗中控制使用的人，因為他是原國民黨軍傳作義部的一名青年軍官，起義後被分配到這所學校，全家也跟隨他來到這個小縣城。他是滿族人，祖籍北京，祖上是跟隨愛新覺羅氏打天下的馬上英豪。他這會兒一直在為全家去什麼地方落腳而抱頭犯愁。三天前，紅衛兵一紙「勒令」貼上他家門前，「勒令『反動軍官』關一之和他的全家限三天滾回原籍去」。

說實話，若是真的能回原籍，哪怕是真的滾著走，他也願意。光景再不濟，那也是北京，比這個彈丸小地生活強多了。可是，回北京在當時是

件難事。莫說他這種身分的人，就是辦公事，沒有縣級以上政府的介紹信，也休想買到進京的車票。更何況，把戶口也遷往北京，那是如同伸著脖子上天一樣的難事。但是，紅衛兵「限三日內滾出向陽路」的勒令，儘管只是一張麻紙和幾行稚嫩的毛筆字，卻比蓋了官防大印的政府文告還厲害，他不得不晝夜不停地收拾家當，在第三天帶著一家老小，「滾」到這裡。幾天來，由於既買不上去老家北京的車票，又不敢再回工作地上城街的教工家屬院，他們全家只得賴在這鬧哄哄的候車室，在條椅上躺坐，聽任車站站務員的斥責和白眼。

平定縣城驟起的這股遣返風，也是從北京傳過來的。關家儘管如此狼狽，還算是幸運的。因為京城的抄家狂風，使許多知名人士和富裕人家片瓦無存、狼藉一片，珍貴古玩文物被沒收或毀壞。公安部長謝富治一句「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的話，¹⁸不僅表達了中央領導層文革激進派的態度，而且無異於中央文革小組和「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命令。在這樣的批示和引導下，國家憲法和公民權利皆成廢物，抄家遣送成為革命行為。全國各大城市都陷入一片混亂，平定這個小小的縣城，還算是比較溫和的。

196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轉發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頒布《關於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後返京人員的處理辦法》的布告，其中寫道：「首都廣大紅衛兵和革命群眾，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把一批堅持反動立場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和社會渣滓遣送回農村監督勞動，這對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具有重大意義。」中央要求各地參照辦理。¹⁹

18 見印紅標，「紅衛兵『破四舊』的文化與政治」，《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jsd/ljsj/article_20140506105563_4.html，上網日期2015年9月30日。

19 「中共中央轉發北京市公安局軍事管制委員會三月十八日布告」（1967年3月18日），

平定的遣返，擴大成為遣送。因為許多被遣送的人，原來就是歷經 1957 年的「上山下鄉」運動和 1962 年的「六二壓」從大城市返回來的，已經無處可返，只得遣送往偏遠的農村。地處縣城中心的城裡大隊，以四類分子人數多而著名，這次遣送力度也最大。短短十幾日，絕大多數四類分子被遷往古貝、岔口、馬山等艱苦偏遠地區。

市民戶口的居民組織上城居委會，就是前面提到的剛剛改名成「向陽路」的地方，由於聚居了一批平定師範的家屬，也由於這些家屬中家庭成分和個人出身背景複雜，「紅五類」很少，也成為遣返的重災區。就連平定師範的校長范雪野的妻子徐秀春，也因為丈夫家成分高，而被趕回五臺縣。平定師範的教師趙華峰家屬被趕回原籍，平定一中胡維馨一家被趕回大同。

李金田的〈「文革」的回憶〉（未刊稿）描述了他所親歷的勒令遣返的細節：

那天，我正領著一幫初中娃娃砸獸頭，一個父親是師範領導幹部的學生突然被街道居委會的一個女人叫走了。他走後不久，我多了個心眼，就到居委會去看，見他和另一個男孩正在往白毛邊紙上寫東西。我一眼瞥見「勒令」兩個字。再看地下一張寫好的，居然寫的是二狗媽（平定師範校長范雪野的妻子，家庭成分高）的名字。我趕緊出來告訴二狗。天擦黑時，我去二狗家看，見街門上貼著那張「勒令」，內容是「勒令地主狗崽子徐××全家三天之內滾出向陽路，滾回老家，否則砸爛你們的狗頭」。那天同時被貼了「勒令」的，還有王鐵夫家和別的幾家。那紙上既沒有落款，也沒有公章。第三天，他們就全走了。

中發〔67〕101 號，及「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安局軍事管制委員會布告」（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載於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由於有公安部門的配合，這種遣送和遣返在戶口辦理上卻一帆風順，很少有以往細緻入微的盤查和繁雜的手續。這股遣送遣返的狂風刮了幾個月後突然戛然而止了。據時任城裡大隊治保主任的張成身說，上邊傳達說，周恩來總理有一個講話，說「不能把污水撥到人家門上」，才制止了這股遣返風。周恩來的這個講話，巧妙地保護了一批人的人權。被遣送和遣返的人，除了關一之家因為無處可走被城關派出所所長張耀文領回平定而免於奔波折騰外，其餘被遣送下鄉和「勒令」遣返原籍的人，三個月後又被允許回到現居住地，白白受了一番折騰。

這僅僅是一種「看樣學樣」的風潮。嚴格地說，並沒有成文的指示。在文化大革命深入開展後，一批在批鬥牛鬼蛇神風潮中被不成文地定為「牛鬼蛇神」的人，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真正地遣送下鄉，而且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在平反後才返回原工作的學校。平定中學的楊乙榮、陳元才，平定師範的王鐵夫、張德光等一批人，儘管是學校教學中的骨幹，但都在其列。這次遣送，才是縣政權機構的正式作為，但卻帶著紅衛兵遣送牛鬼蛇神的作派。在「左」的思潮下，人權、人的尊嚴，是沒有位置的。

農村也不是避風港。前引郝志東與郝志剛所著《西郊村》一書這樣記述該村批鬥牛鬼蛇神、批判劉、鄧、陶的經過：

1967年縣裡派觀察員王如何進駐西郊，會同公社下鄉工作組，指導村裡的文化大革命，把有男女關係問題的人以及所謂不務正業者等都作為「牛鬼蛇神」進行批判。西郊小學校長范德生，因在某校犯有作風錯誤，調至西郊小學任校長。范德生是一名有教學才華、年青有為的共產黨員，此時被定為批判對象。五月下旬在西郊小學召開西郊村群眾大會，參加會議的有300多名社員，進行揭發批判，迫使范德生認錯，會後寫出書面檢查。



圖 4-8 平定縣西郊村的批判會（1971）

資料來源：李俊瑞《一方水土》，第 137 頁。

不久，西郊中學也揭批校長李某某同女教員某某有男女關係，司務長某某與女教員某某私奔到新疆遊玩等事。揭批大字報貼滿校園內牆壁上。西郊中學紅衛兵在學校部分教員（造反派頭頭）的操縱下，讓村裡有所謂不正之風的、歷史不清的群眾遊街示眾，並開批判會鬥爭。

村民趙端，參加過抗日遊擊隊，因負傷退役回家。他一貫不參加集體勞動，每日兩餐去全村家家戶戶輪流去討吃。如所到之處不給吃的便諷刺辱罵。他在大廟裡自己住的房門上貼的對聯是：「明了黑了，黑了明

了，這是怎回事；冷了熱了，熱了冷了，這是怎日得」，橫批是：「誰在作怪」。由於這些言行，趙端被認為是牛鬼蛇神，被紅衛兵定為遊街對象。

村民李子和，自幼熟讀易經，精通陰陽八卦，也被造反派認為是牛鬼蛇神而被遊鬥。貧家女子魏氏，由於從貧下中農家庭改嫁到地富家庭成為地富子弟之妻，被造反派指認為貧下中農叛徒，無產階級敗類，也作遊街對象。紅衛兵給三人戴高帽、塗抹臉，拉著遊街。

趙端因參加過八路軍的遊擊隊，認為自己是老革命，坐在地上不走，紅衛兵將其身後綁上紅土圪針，強迫他走。遊街時，紅衛兵高呼「打倒劉少奇」「打倒壞分子趙端」「打倒牛鬼蛇神李子和」等口號。當時的形勢是認路線不認人。

在 1947 年過激的鎮壓漢奸特務的運動中，趙端父親趙占祿是被鎮壓的九人之一。當時趙端也在群眾運動的隊伍中舉拳頭吶喊，參與鎮壓運動，並指責其霸道、嚴管自己的行為是特務行為。這種「左」的思想，在西郊一直相當盛行。「文革」遊鬥時，李子和之女在外地工作，當時回村探望其父，也加入了造反派，在遊街時也高喊打倒李子和。以後對幾名人們認為有男女關係的社員也戴高帽遊街批判。

「文革」發展到派性時期，一家幾個人，包括父子、夫妻對文革形勢及事態發展各持各的觀點，觀點不同便相互論辯。不過兩派沒有發生肢體衝突。

1967 年，中央各報刊發表文章將劉少奇定為中國的赫魯曉夫，展開革命大批判。西郊造反派緊跟形勢，在西郊村開始貼大字報、畫漫畫，展開對劉、鄧、陶路線的大批判運動。他們編排了小型節目「三句半」等批劉節目，以及由劉、鄧、陶、王光美四人自述罪行的活報劇。下面是郝玉生回憶的唱詞，劇名「劉鄧陶王哭靈堂」。前句道白，後句唱詞，劇尾哼哼（四人同時配樂器哼哼）：

我劉大鼻子反黨反中央，該我敗興（四人同哼），嗯嗯……

我鄧小平左跑右跑，也不頂用，嗯嗯……

我陶鑄一馬當先，是個大飯桶，嗯嗯……

我王光美桃園經驗被紅衛兵砸了個碎，嗯嗯……

.....

「長征」：為紅衛兵充電

大串聯是群眾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偉大創造。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一直是積極支持大串聯的，並且主張把這種革命行動大大推廣。

毛主席說：「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從大連步行到北京的學生，根據毛主席的教導，邊行軍，邊學習，邊宣傳，邊做群眾工作。他們走到哪裡，就在哪裡宣傳毛澤東思想，宣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宣傳黨中央的十六條，把毛澤東思想的種子傳播到沿途的城市和鄉村。群眾稱讚他們是「毛主席的忠實紅小兵」，「老紅軍、老八路的紅後代」，「毛澤東思想的宣傳隊」。

——《人民日報》社論，《紅衛兵不怕遠征難》，1966年10月22日¹

到1966年年底的時候，「破四舊、立四新」、批鬥「牛鬼蛇神」已經接近尾聲。也許是為了對紅衛兵進行整修、充電，以繼續革命、迎接更大

1 《人民日報》編輯部，「紅衛兵不怕遠征難」，1966年10月22日。載於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的挑戰，全國掀起了革命大串聯的熱潮。其實大串聯最先是從北京校際之間開始，是從北京傳下來的，是一波新的浪潮。

前面所談到的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並非隨意而為的所謂馬克思主義第一張大字報以及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表態，中央喉舌的號召，這些來自最高司令部的資訊，使得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等高校成為文化大革命如何開展的樣板，北京校際之間的串聯由此發端。天津大學的部分師生，因為「造反」受到壓制，決定徒步到北京取經。他們手挽手，高唱歌曲，朗讀毛主席語錄，向北京進發。其他各地，也都有學生赴京尋求「真理」，正如平定的學生到北京學習那樣。8月16日，中央文革小組召開「外地考察學生」群眾大會，陳伯達對他們的行動表示熱烈支持。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公開接見紅衛兵代表，掀起了學生進京的熱潮。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推動下，北京學生走出京城，「北上、南下、西進、東征」，到各地「煽風點火」，開始把北京學生的「造反精神」向各地傳播。

當時家在南坳公社南坳大隊的關樹仁回憶說：「1966年秋，北京學生到南坳村幫助秋收。主村共有六個小隊，學生每隊大約有八九人。每天學生派到社員戶吃飯。大約住了一個來月就回京了。有和我比較熟的，一個叫安崇德，另一個叫杜平懷。他們回京後還給我們寄回主席像章，給了我一個。以後有人還和比我歲數大的人通信」。

毛澤東繼8月18日接見之後，又於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0日、11月3日、11月11日、11月25日和26日，共8次（25、26日合為1次）接見紅衛兵。9月中旬，鐵道部北京鐵路局發出緊急通告，調整火車買票方式和時刻表，以支援「廣大革命師生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一時間，各地列車人滿為患，加開列車使貨運受到阻遏。1966年8月25日，大連海運學院15名學生，徒步進京。

10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紅衛兵不怕遠征難〉的社論，讚揚「大串聯是群眾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偉大創造」，「毛主席一直是積極支持大串聯的，並且主張把這種革命行動大大推廣」，「不坐火車汽車，徒步行軍進行大串聯，這又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創舉」，「希望各地的革命學生，在自願和可能的條件下，也這樣做」。來自中央的號召，使各地學生蜂湧而出，革命大串聯的熱潮開始掀起。²

平定中學同學們的「長征」

平定中學的學生們，雖然也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熱潮，但學校的權力機構黨支部仍在發揮領導作用，學生們也仍然服從學校的指令。因此，在「文革」前期批鬥的狂潮過後，師生們遵照學校的安排，仍然依照舊例在農村助農秋收。一九六六年又是照例的停課下鄉勞動。按照以往的慣例，即使學習再緊張，下鄉支農是必不可少的。這一來是培養學生的勞動觀念和道德品質，二來農村確實急需一大批勞動力。高三班下鄉地址在鎖簧公社立壁大隊，這個村的趙三虎是省內頗有名氣的勞動模範，曾受到當時紅極一時的大寨陳永貴的讚揚。全校的大哥大（最高年級）到先進典型村下鄉，意圖是明顯的。高四班下鄉地在張莊公社的寧艾大隊，這是一個大村大隊。其餘的初中共三個年級十八個班，也全部以班為單位，散布到全縣各村去助農勞動。這一年秋天，下鄉勞動的時間比往年長出許多。平定中學的師生們，並不瞭解北京和省、縣裡發生的這一切。他們仍舊在各個村子的農田裡揮汗如雨地勞動著。

這時候，北京大串聯的出京學生已經進入山西。他們專門來到立壁大隊，找到高三班的學生，把文化大革命的資訊帶給了他們。高三班的學生

² 同上。

率先行動起來。據原高三班學生常秀玲回憶：

我們聽說了大串聯的事，都想去串聯，可是學校不讓走，我們有的人就偷跑走了。劉希林（同班同學）他們幾個人坐車跑到白羊墅車站，想扒火車去北京，被學校派人截回來了。到後來，立壁的同學跑的幾乎沒人了。

據戎崇璽回憶，他們還在立壁下鄉時，就組織了十五個人回校，要求去北京學習文化大革命。他們和學校辦公室的王素雲老師要學生證，但是王老師不給。結果他們自己油印了一個學生證就去了，不過只剩下兩個人願意去。張銀寶老師說，如果實在想去，那麼路上就得當心安全。戎崇璽說：

我們在陽泉買了票，坐上火車，第二天早晨 3-4 點時到了北京。先去了天安門，後來到處找接待站。到工人體育場，人家要介紹信，我們沒有，不接待。把知道名字的地方都去了一下，結果跑到晚上 12 點，也沒有找到地方落腳。然後聽說宣武區陶然亭小學也接待外地學生，我們就去了。因為太晚了，沒有飯吃。但是給了我們毛澤東像章和乘車證。第二天早上吃了大米粥、兩個糖包，再帶幾個做中飯、晚飯，就到北大、清華抄大字報去了。每天都這樣。大字報抄了滿滿一本。但是轉了 20 多天，毛主席也不出來接見。正在我們準備回去時，聽說毛主席要接見紅衛兵了。於是給我們每人發了三個蘋果和一點姜米條，連夜走到了建國門外，坐在地上等。到了上午九點時，人們開始擠著、踩著往前走。

戎崇璽自己並沒有跟著遊行隊伍走，而是一直在天安門廣場上逗留，

在周恩來晚上 7 點鐘宣布遊行集會結束後，他又在人民英雄紀念碑那裡坐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才回到陶然亭小學，和已經在那裡的同學白寶長會面。之後他們決定坐火車回平定。回來後，學校給他們報銷了車票，每天還補助他們 4 毛錢。學生們還有貼大字報的，辯論他們自行去北京是否正確。

這種局面。在其他下鄉地方也有。據當時在初中三年級 55 班就讀的學生王新民回憶：

那時候我們在南上莊下鄉。我聽說大串聯了，就組織了我們班同學要去串聯。我們從住地回來和學校說，學校說我們年齡小，不讓去。我就和學校論理，說大串聯是毛主席讓的。剛好高三班岳陶祥、戎崇璽他們也組織了一個長征隊。學校說初中學生就王新民鬧的凶，讓他走了就沒事了，就讓我跟上高三班的人去。我們是蘇繼秀（政治教師）帶的隊，學校還開了歡送會，歡送我們步行串聯。我們串聯回來時，學校就走得沒有人了。我們就組織了戰鬥隊，叫「紅劍」。

這是自從學校「官辦紅衛兵」到北京之後，首開的大串聯行動。行動的引領者，是全校的「大哥大」高三班。

也有捂的比較嚴的。在寧艾下鄉的高四班同學，就消息很閉塞，直到學校通知下達，才一起返校。這時，已值深秋。毛澤東在北京接見紅衛兵已達四五次，報紙和電臺不斷傳來此類消息。大串聯之風已經使學校無法捂蓋子，學校便為外出串聯的學生準備必需的糧資。各班的學生只要按人數花名上報學校，便會每人領到一份糧票（戶口在家的是補助糧票，用來補足自帶口糧糧票的差額部分）和伙食補助款，每隊可領到一面紅旗，用以製作隊旗。

高四班劉兆麟和他的另 10 位同學組織了一個「衛東長征隊」。他們動作比較遲緩，是在同班別的長征隊已經出發後，才組織起來的。他們每人背著一個鋪蓋背包，斜垮一只帆布包。領頭的同學負責打旗。隊長劉兆義的胸前，用繩子拴掛著一個薄鐵皮印刷的毛主席站像。

路上南下與北上的學生串聯長征隊絡繹不絕。每當兩支隊伍迎面交會時，雙方都會搖著《毛主席語錄》，按行進節拍高喊「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隊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等毛澤東語錄，或高唱毛主席語錄歌。

他們按照自己能力和「紅衛兵接待站」的設置距離，每天行走 60 華里至 120 華里不等。每到食或宿的時間，沿途各村鎮城市一般都會有一個接待站，為他們提供食品或住處。早飯大多是玉米麵糊糊、窩頭和鹹菜，午飯多是窩頭和蘿蔔條，晚飯與早飯相同。

這些接待站的住宿，一般都是當地的禮堂、倉庫等空房，也有極少的小村是號住民房的。由於往來學生很多，所以以打地鋪為多，即鋪些麥草，上邊鋪席子。有的縣城的床鋪備有褥子。

因陋就簡地食宿，學校給他們發的伙食補助基本夠用，還能有一點富餘。劉兆麟他們的「衛東長征隊」是完全步行到北京的，共計行走了 13 天，其中在石家莊休息了半天，在保定休息了一天。到達北京後，北京有一個「紅衛兵接待總站」。在接待總站交上學校開出的證明信，接待總站便指派專人引他們到某個地方住下。

劉兆麟他們住在冶金部的禮堂裡。這個大禮堂住著大約五百多名赴京串聯的學生，一排排的席鋪下邊是比較厚的稻草墊子。因為燒著暖氣，所以不冷。住下之後，每人領到一枚紐扣大的毛主席側面頭像的像章，一張「外地革命師生赴京串聯乘車證」。憑著這張 128K 大的淡綠色小卡片，他們可以免費乘坐除通往十三陵風景點以外的任何市內汽車電車。他們這會

的伙食比起途中來好多了：每日交上 1.2 市斤糧票，每頓飯便可吃上 4 兩米飯或饅頭，中午的菜裡還有一些肉沫子。如果有了病，還可以得到治療。甚至他們還集體洗過一次澡。

在這個接待站的組織下，他們參觀了設在故宮後院的當時唯一可以公開展出的泥塑《收租院》組雕，參觀了革命軍事博物館，還自己相跟遊覽了頤和園。其餘的時間，他們便去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參觀，和等待毛澤東的下一次接見。但是，由於他們走得晚，又是完全步行，錯過了毛澤東 12 月 25 日和 26 日的接見，毛澤東自此不再接見紅衛兵。沒有受到接見的劉兆麟與他所在的「衛東長征隊」和成千上萬與他境遇相同的學生，被召集到工人體育場，由周恩來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江青等人接見並作了安撫講話。返回時，北京統一用火車送往各地。

比他們機敏的學生，也比他們幸運。高三班的常秀玲等一隊長征隊，就趕上了毛澤東 11 月 26 日的最後一次接見，她回憶說：

毛主席 11 月 26 日接見紅衛兵的時候，我們趕上了。我們聽說接見，就扒上火車。到了豐臺站被趕下來，下車後卻不讓出站。我們混著溜出車站，蘇繼秀老師引著，24 日黑夜趕到北京，住在外交學院。25 日和 26 日毛主席連著接見了兩次。25 日是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的，26 日是在西郊機場接見的，我們參加的是 26 日的那一次。我們早上 7 點就走開了，到了那裡一直等著，一直等到下午 5 點 13 分，毛主席接見的。我們那隊一共去了 23 個人。

以平定中學體育教師王學良為領隊的另一批以初三學生為主的長征隊，也是聞知毛澤東接見的消息後，坐火車趕往北京的。他們在天安門廣場受到接見。因為在被接見時他們這一片秩序比較好，還被記者拍了照，

刊登在報紙上。四十餘年後，平定縣縣誌辦出版了一冊《走過六十年》，專門尋找到當年的《人民日報》，翻拍了刊載的照片，並請當事人撰文記述。這是本縣紅衛兵接受毛澤東檢閱唯一的存照。



圖 5-1 紅衛兵受到毛主席檢閱，照片中有兩人來自平定

資料來源：照片由李金田提供。

參加者之一張汝秋描述了這張照片的由來以及她們串聯的情況：

這是一張刊登在 1966 年 11 月 29 日《人民日報》上的照片。那天早晨，縣誌辦的劉春生主任帶著一卷發黃的舊報紙來找我，讓我尋找我說的照片。沒費什麼事，我一下就找到了。因為，我對這張照片的印象太深刻了。它印在我的腦子裡，這輩子忘不了。

那是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的照片，時間在 1966 年 11 月份，是毛主席第八次、也是最後一次接見紅衛兵。我們那一批人，在毛主席的汽車開過來時秩序比較好，沒有擠成一團，所以記者就給我們照了張相。我們返回住地後，帶隊的解放軍送給我們每人一份報紙，報紙上的照片有我們。我一直珍藏著那張報紙，回來以後經常給人看。看的人太多，時間一長，弄丟了。劉主任四處淘換，最後好不容易，從平定師範圖書館才借出這份報。他說，這是平定這片地方唯一的一份報。

照片上看得最顯的是王美英，她在照片正當間。我呢，在照片的最右下角，還讓黃晉生舉起的語錄本擋了小半拉臉。她倆都是我的同班同學，黃和我還是最好的朋友。

1966 年秋天，我們平定中學初 58 班的同學在馬山公社梨峪大隊下鄉助農秋收。一般年頭，我們下鄉都是半個月。可那一年，一個多月了，還沒有通知返校。眼看深秋了，地裡莊稼早就上場了，可就是沒返校的動靜。我們看到村外大道上，有學生隊伍來來往往的，可是不知道人家在幹什麼。後來，通知終於下來了。梨峪大隊給我們每人發了一包核桃和棗，我們就回來了。

回到學校，才知道有大串聯這回事。我們的班主任叫王學良，體育老師，晉南人，是個說幹就幹的人。他立即把我們全班組織成一個長征隊，我們就出發往北京走了。

我們步行走到石家莊，走了三天半。一路上，來來往往都是學生串聯隊。大家一碰面，都舉起《毛主席語錄》，互相喊「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什麼的，作為打招呼。一路上，一點也不孤單，上來下去盡是學生串聯隊。到了石家莊，我們休息半天。方珍、馮春英她們五個人相跟去逛街了。

正在這時，北京鋼鐵學院來串聯的大學生告訴我們，說毛主席又要接

見紅衛兵了，想見毛主席得趕快去，坐火車去。我們王老師一聽，就趕緊去火車站給我們買票。票買好，開車時間快到了，方珍她們卻左等右等不見回來。我們只好給她們留下條子，讓她們回來趕緊去趕我們。

火車站擠得不行，車上也塞滿了人。王老師說，硬往上擠，上去幾個算幾個，上不去的隨後去。我們連拉帶拽，從視窗往上趴，總算上去了。後來，方珍告訴我們，她們回來後，看了條子，都大哭了一場。哭完，她們一商量，說上北京見毛主席的紅心永不變，就打起背包，步行往北京走。

走到豐臺，有解放軍的軍車見她們走得太累了，就捎了她們一段。下了車，不知誰說咱步行見毛主席去，坐汽車就是對毛主席不忠，得鬥私批修。她這麼一說，五個人就又返回坐車的地方重走。她們到北京，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已經結束了，她們沒有見到毛主席，只是在工人體育場見了周恩來，還有中央文革小組的江青那些人。

到了北京，是深夜。我們來到天安門廣場，坐在華燈下，看到天安門廣場那麼大，那麼美麗，那麼乾淨，從小沒有出過遠門的我們，高興極了。大夥也不覺得冷啦餓啦，光想坐到天明。可是不大一會，接我們的車就來了。我們被安置住到右安門醫學院。住下以後，有解放軍訓練我們排隊、舉語錄什麼的，我們也到街上、到各學校去。北京真大，真熱鬧，真好。

可是，我們也能聞到「文革」的味道，街上貼著大幅標語，寫著「血淋淋的×××事件」，看看就怪嚇人的。我們住在那裡，天天吃大白菜和肉，吃饅頭，真香，可香了，我從來沒吃過那麼香的東西。解放軍還組織我們去慰問炊事員，新疆來的學生給炊事員跳舞唱歌。我們也不會啥，反正跟著瞎熱鬧唄！

有一天晚上，帶隊的解放軍集合起我們，說毛主席要接見紅衛兵。給

我們發了雞蛋和乾糧，說吃這個不上廁所。第二天一大早，我們就排隊去了天安門廣場。我們被分別安排在大道兩旁，等著毛主席接見。我們在廣場上鬧啊跳啊，新疆來的維吾爾族學生在大道當間跳舞唱歌，那場面，真熱鬧。

過了好一會。帶隊的解放軍說毛主席來了。他從黃挎包裡掏出《毛主席語錄》，帶頭喊起「毛主席萬歲」。我親眼看著，他喊得太使勁，那血一下子就從他嘴角流下來了。我們使勁揮著《毛主席語錄》，使勁吶喊。

毛主席坐著敞篷汽車，向我們揮手。他後邊那輛車上是林彪，林彪揮著語錄本。再後邊，一長溜，都是敞篷車。我光顧著看毛主席，後邊的人，除了林彪，都忘了。

我們在北京，每人還給發了一個毛主席像章，扣子那麼大，比後來那像章小多了。我挺珍愛的，好多人跟我要，我都捨不得給。發給我的那張報紙，我經常給人看，翻得硬給爛了。多虧縣誌辦劉主任找到這份報紙，才勾起我那麼多往事來。

我們從北京坐火車返回的。本來是要直達太原的，但是俺班郭玉芝想他媽，大男人家的，哭了。我們只好都在陽泉下了車。後來，我們步行去太原，住在湖濱會堂附近，天天看批鬥省裡邊的領導。我見過門衛恒、王謙、王大任、賈俊，還有很多人，都戴老高老高的白紙高帽子，彎腰掛牌子，天天鬥他們。我們在太原時，就聽說衛恒自殺了，那時叫「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

那時候，我上初中二年級，才16歲。一晃，40年過去了，真快。

這樣的長征隊不勝枚舉。高四班的白敦誠、王龍祥等人組織的長征隊叫「風雷」，方向也是北上。另有一批已經在「官辦紅衛兵」階段作為紅衛兵代表去過北京的，則西進和南下。比如高三班劉振傑和他的同學，就

是先西進至延安，然後逆著紅軍長征的路線，向江西開進。劉振傑在四十多年後回憶道：

1966年11月15日，正當全國革命師生和紅衛兵進行大串聯之際，由潘佩經和我、董鋼、董成科、李喜柱、劉凱庭、58班的陳鐵牛，還有劉增芳老師，組織了平定中學二萬五千里長征隊，舉旗出征，開始了歷時98天的艱苦跋涉。我們經過5省30多個市縣，徒步行程近萬里，於1967年2月20日返回學校復課鬧革命。

我們的目標是徒步逆向沿著中國工農紅軍長征路線，計畫在1967年10月1日前走完全程。

我們的8個人的長征隊起名為「平定縣兩萬五千里長征隊」。先從平定到壽陽、榆次、交城、文水，看到了劉胡蘭的母親。後又到永和縣，我們坐著擺渡過了黃河，走到延安，參觀了楊家坪等革命聖地，並抓回了一把土。看到了周總理的衣服，想到了艱苦樸素的精神，大受感動。後來又到了志丹縣，再到了寧夏六盤山，臘子口，趕上了過年。與其他長征隊的紅衛兵打了場籃球賽。我們過草地，過了三天。在過草地時，我與董鋼先探路。走了一段，腳都凍麻了，差點和球鞋凍在一起脫不下來。後又換上了黑棉布鞋，晚上到了接待站。到了四川毛兒蓋，吃到了藏民的烤羊肉，喝了羊奶，還跟藏牧民一起敘了次火。

在近100天的行程裡，我們與當地的幹部群眾交談，瞭解群眾的疾苦。我們經常與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廣泛接觸，交流和吸取開展「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方法，為我們返回學校發動「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基礎。

一路艱辛一路歌。在中共中央國務院要求停止串聯、回校復課的通知下達後，1967年2月22日，我們乘汽車，又在成都轉乘火車返陽泉回校。98天的行程收穫是豐富的，我們磨練了意志，鍛煉了體魄，增長了見

識，體驗了當年中國工農紅軍艱苦卓絕的偉大壯舉。



圖 5-2 兩個長征隊在延安相遇時的合影：董鋼（前右二）、潘佩經（後右四）、岳智明（前左三）、劉振傑（前左二）、李文元（前右一）

資料來源：照片由劉振傑提供。

和劉振傑一起的潘佩經的回憶是這樣的：

到黃河的時候船少，只好住下，第二天早晨吃了碗撒子，就到黃河邊上看情況。黃河兩岸都結了冰，我們就從冰上過去，到了河中間上了船過河。過了黃河第三天到的延安，我們住在延安大學。當時有個任務是收集北京來的紅衛兵帶來的消息，然後整理成大字報和傳單，剩下的時間就去延安的各個地方參觀，包括原中央駐地，以及毛、劉、任弼時等住過的棗園、王家嶺、楊家嶺等地的窯洞。在接待站給我們發了一個毛主席像章並

免費給印製了一件延安留念的背心，在街上還有好多不同地方的紅衛兵交換毛主席像章。聽說另一個長征隊岳智明他們還參加了鬥延安地委書記的活動。

然後我們從延安出發。沿著紅軍長征走過的路往西北走。到了吳起鎮，這是當時三大紅軍會師的地方。當地有很多負傷的老紅軍，在吳起落戶。但是因為殘廢、撫恤金少，家庭生活都很困難，我們就和榆次農校的長征隊聯合起來把當地姓郭的民政局局長揪出來鬥了一下。局長承認自己的官僚主義，說一定改正。當時沒有打他。批鬥還沒有發展到這個地步。批鬥完後我把我的黃大衣送給了一個老紅軍。

吳起鎮接著往西就到了六盤山，接著到的臘子鄉。天黑以後，我們在臘子鄉一個林場的接待站住的，一人給了一個黑饅頭，第二天到的臘子口。臘子口那敵人的營房倒了，立著一個牌子介紹紅一軍團突破臘子口的情況。進入臘子鄉以後就是藏民區了，當地接待站的幹部能聽懂漢語，但是不會說。在那的紅衛兵有三十多人，我們在那過的舊曆年，接待站殺了頭牛招待我們。我們還打了一場籃球比賽。在當地的安排下我們參觀了一下藏民的住宅。

進草地之前的最後一站是巴西。我們瞭解了一下當地的狀況，準備了一些乾糧。進草地之後，到處都是路，不知該怎麼走，巴西給我們派了一個嚮導。早晨從一個村子出發，白天必須走到另一個村子，晚上有狗有狼，很危險。當時有十六個人到了藏民區秋吉拉哇，那裡有米有麵有油，可是沒有灶具，東西都是從縣城運過去接待紅衛兵的。當地人每頓都吃肉喝酥油茶，用牛糞火煮的，邊煮邊吃。吃了三天，我們都吃膩了，想吃點別的，董命長（董鋼）給我們做了頓搓條，只有鹽沒有菜。

在那裡我們主要是瞭解當地藏民的生活情況，收集一些資訊。大人們都不會漢語，和孩子們可以交流。藏民給找了匹溫順的馬讓我們騎了騎。

想騎犛牛了，但是藏民說犛牛不能騎，就沒騎。下一站到的是紅原縣，中央此時下了文件，不讓大串聯，我們就坐上車到了成都，到成都正好是正月十五，在火車站的廣場上睡的覺。紅衛兵接待站的人給我們買了幾張去新鄉的票，就這樣回來了。

岳智明的回憶是這樣的：

我們六個人組織的紅衛兵長征隊，背上鋪蓋、舉著「紅衛兵長征隊」的旗幟，從平定出發，渡過黃河，步行到陝西延安。一路走一路唱「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在永和縣時，聽說毛澤東要在延安接見紅衛兵，所以趕路，趕了兩天的路，第一天 90 華里，第二天 80 華里。晚上一點到了延安。結果毛主席沒去。到延安後，準備北上時，全國發出了復課通知後，我們就坐火車回來。此次大串聯大約一個月。

當時和岳智明一起去長征的還有戎崇璽、李文元、楊守文、李彥明、張錚。戎崇璽說他們在永和住了六七天，因為前幾天紅衛兵乘坐的渡船被黃河的冰塊撞壞了，那時過河不安全。他們在永和時還要求接待站給他們做和和飯吃，包子、米湯、鹹菜吃不飽，還起鬨要求人家管飽。在高三班大串聯的學生中，只有董成科逆著紅軍長征路線走到了江西瑞金。與他同行的是幾個外地學生。他們沒有按照通知返回，而是離開自己的串聯隊，單獨走了下去。郝志東他們的長征隊徒步去了延安、西安。在延安時，住在寶塔山下的一個接待站，晚上在草墊子上睡覺。第二天十點才起床，因為實在是太冷了。白天吃完飯後參觀革命聖地，交換毛主席紀念章，和其他紅衛兵長征隊那樣，進行著相似的革命洗禮。

劉振傑和他的同學這時已經翻越雪山，進入草地。藏民的糌粑已經嘗

過，雪山上因氣壓低看似熬熟而一點不熱的夾生糊糊也喝了幾回。在接到停止大串聯的消息後，因為再往前走食宿無著，他們只得快快而返。而隨一對兄弟一起到太原串聯的初中一年級學生劉斌武，因為每天在迎澤公園和五一廣場玩捉迷藏玩膩了，又想家，便打起背包回去了。那對兄弟中的哥哥，則一直在太原等到新年時才返回。



圖 5-3 平定中學的長征隊準備好了井岡山的路線圖

資料來源：照片由郭近臣、董美琳提供。

平定師範同學們的「長征」

平定師範的同學經歷也相似。馮拉科的回憶說：

我和周立業、張世紅、張銀昌、張廣熾是一夥，雄心勃勃的要走二萬五千里長征了。我們是從 1967 年的陽曆年開始的。離開學校先到了江西的南昌，到了以後那裡的武鬥就開始了。到了南昌，俺們就開始找全國走長征路的「紅軍大學」，後頭又去了瑞金，從瑞金到贛州，到贛州就被當地駐軍勸回來了。

回校後又聽說 42 班的女同學荊效華，一人也去走兩萬五千里長征了。

除了我們這一夥，李玉玲和劉生慧、郝福喜他們是另一夥。他們是到了河南駐馬店，去了以後遇上當地有人衝擊部隊，他們給駐馬店軍區的人解了圍，回來以後了我們就聯合成立了個「紅闖將戰鬥隊」。因為他們幫了河南家，人家那頭就給山西軍分區寫信說我們是革命左派，要求給予支持，省軍區就給平定武裝部下通知說他們是革命左派，要給以支持。所以，平定武裝部就支持了俺們。

李彥良（後來成為馮拉科的妻子）在其所著的「遠去的風煙」（輯入《平定師範校志》，選自其《三音集》）中，回憶了她當年大串聯時的情景：³

秋末，我班只留下十個同學了。先是我們七個女同學：馮維華、白平生、韓俊蘭、潘俊娥、董秀珍、高引弟和我組織了一個串聯隊，向黨支部請示進京。當時的書記王守政同志以「全是女的，出門不放心」為由讓我們再去做準備。後來我們聯合了另三個男同學李愛民、李志敏、王森運組成了「東方紅」長征隊，又去請示，才讓我們上路。

我們一行十人，步行到了石家莊。受火車站的紅衛兵進京潮所感染，我們也選擇了乘火車。理由是擔心步行進京晚了，見不到毛主席就遺憾

³ 李彥良，《三音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 年出版，第 305-306 頁。

了。到京後我們住東直門外的酒仙橋接待站，男女分樓管理，編制為團、營、連、排、班，有解放軍幹部帶我們軍訓。因為我們這支隊伍十分聽話，部隊首長允許我們兩次受閱。

毛主席第七次在天安門的城樓上檢閱紅衛兵時，我有幸作為代表，到東灰二臺上觀禮。第八次受閱時，我們接待站的紅衛兵是以列隊的形式從東向西走過天安門城樓前，接受檢閱的。在我們接受了毛主席的檢閱後的一天，解放軍送我們到天安門前向毛主席像宣了誓，而後，途經清華、北大、盧溝橋、狼牙山、西柏坡等地，沿著冀晉分水嶺行走，有時日經三縣，歷經了一個月的寒霜風雪後，又步行返回學校時，時已年根歲末，沒有多少人在校園內了。

當然，大串聯除了遵循革命先烈的足跡、緬懷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蹟、學習和交流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參加當地的文化大革命之外，還要落實到本地的文化革命中來。郝忠德的回憶提到了他們在平定中學的革命行動：

大串聯我們去了北京，到北大、清華等大學看大字報，瞭解了什麼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什麼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聯繫本校把鬥爭矛頭指向教師的現象，說明校黨支部是犯了方向性路線性的錯誤。返校後就燒了黨支部整老師們的黑材料，堅決緊跟毛主席革命造反。我積極參與組織「紅戰團」。所以說，經過大串聯，我們思想上受到外界影響，這是學生分成兩派的重要原因。

教師們的「長征」

趙成秀當時在平師附小當教師。他們是平定縣第一支由教師組成的串

聯隊。他們的串聯經過，他在〈我的文革歲月〉一文中作了詳細記載：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了來自全國各地的一千多萬紅衛兵，主席揮手，全國各地的紅衛兵組織立刻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起初的紅衛兵組織大多由黨團積極分子和三好學生組成，他們根正苗紅，風頭出盡，特別是像接受毛主席檢閱這樣榮耀的事，也都是非這些人莫屬。這令那些出身非貧下中農子弟、或平時行為上稍有瑕疵的學生心裡特不平衡，迫切希望在文化大革命的大潮中能爭得一席之地，革命不分前後，他們同樣可以幹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這樣，自發組織的造反派組織紛紛建立起來，這也就為後來的兩派對立埋下了隱患。

我們附小的老師雖然被禁錮在學校的三尺講臺之上，但思想還是很活躍的。他們面對近乎狂熱的紅衛兵運動，很想走出去，到北京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在曹富元、馮元利等老教師的發動之下，決定將全校教師組成一支紅衛兵隊伍，學習紅軍萬里長征的革命精神，到北京串聯。全校除「當權派」李有全、溫成立，絕大多數都加入了隊伍，年紀最老的是五十多歲的王永成。史文華相當積極，親自跑到陽泉為隊裡做了隊旗和袖章。

這是平定縣第一支由教師組成的紅衛兵隊伍。初冬時分，天氣有點寒冷。出發那天，微風吹動著寫有「紅衛兵」三個大字的紅旗，旗手是身強力壯的體育老師王德明。每個人臂上的紅衛兵袖章分外鮮豔，行軍被包打得像模像樣，水壺、揹包一應俱全，很像一個個紅軍戰士。大家都表示，要步行到北京，親自到天安門前接受毛主席的檢閱。

.....

〔在北京的幾天裡，每天回到駐地的時候〕我們談的最多的還是北京的文化大革命。有的談起在工人體育場所看到的批鬥北京市委某某領導大會，走資派一排溜站在鬥爭臺上，低著頭，彎著腰，戴著白色的牌子，上

面的名字都用紅筆打了叉。有的談起在東單、西單看到鋪天蓋地的大字報，上面揭露的大部分是「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罪行」。史文華在北京有他的姨媽和表哥，也曾多次來過北京，所以，他的活動多是自己單獨行動。他給我們談起北京的紅衛兵造反的情況總是滔滔不絕，引人入勝，什麼「天派」、「地派」，誰是北京紅衛兵的五大領袖，他們都做了哪些驚天動地的事情，講得生動有趣，活靈活現，我第一次聽到「蒯大富、韓愛晶、王大賓、譚厚蘭」這些名字，覺得這些大學生真是不可思議，怎麼知道那麼多高層領導集團的秘密，哪兒來的那麼大的膽量，敢鬥那些曾經的大人物。

清華大學也是我仰慕的中國著名高等學府，…… 在〔各個不同的〕建築上，都張貼著紙張大小不一的大字報，白紙黑字上多有紅筆點綴，以吸引讀者的眼球。「徹底批判蔣南翔的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等大幅標語張貼在最為顯著的位置。一些學生組織的論壇在櫥窗裡展示，還張貼著一些演講會、批鬥會的廣告。從大字報的內容來看，當時的清華師生已分成了兩派，即造反派和保皇派，或者叫「反蔣派」和「保蔣派」。蔣南翔是清華大學的黨委書記，曾擔任過北京市委書記彭真的秘書，當時，彭真成了混進黨中央的修正主義分子，蔣南翔自然也脫不了干係。大字報多數是批判蔣執行了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的教育路線，貶低、反對毛澤東思想。

……由於我們返程選擇的是火車，所以，一切都變得異常簡單。只須忍受多半天的擁擠和饑渴，便回到了我們的崗位。離開幾天，平定起了很大的變化。一些從北京、太原來的紅衛兵頻繁出入於學校，點燃了那裡的火種，學生已經不安分於課堂，他們紛紛走出去，到延安，到井岡山，到大寨，到韶山，接受傳統教育。特別是北京紅衛兵在人民食堂造饅頭「缺斤短兩」的反〔見下面〕，把年輕人的狂熱點燃了起來，開始關注社會問題了。

看來老師們關注的問題和學生們相比水準高了一大截。革命大串聯的終止是以中央號召為信號的。當年 11 月底，中央發出號召，到處張貼公告，宣布大串聯結束，並承諾來年春暖花開之時再進行大串聯。但到 1967 年 3 月 19 日，中共中央決定，取消春暖之後進行大串聯的計畫。這是因為，全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已經起來，革命大串聯的作用已經起到；另一方面，大串聯對交通運輸、各地接待能力等，都已造成了很大影響。儘管文化大革命是「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但當這種被損傷的經濟一旦影響到政治時，還是不得不考慮的。

平定縣糧食局原局長王增榮在他的回憶錄《糧食工作回顧》裡，從糧食系統內部的角度寫道：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地區糧食局購銷科長張守義電話通知，省糧食局陳廳長指示，凡來我省串聯和長征的紅衛兵，要大力支持，每天一般交糧票一斤二兩，如果交不夠或者沒有糧票，也要保證吃飯。一斤二兩不夠吃，將多吃了的部分，讓紅衛兵開下條子。紅衛兵接待站，憑條向糧食部門報銷。食油按一般會議標準供應，每日每人二錢。

大串聯在平定的「點火」作用

大串聯所起的「點火」作用，從一件事上便可以顯現出來，這便是「一個饅頭引起平定『文革』」的故事。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經過 1962 年開始的國民經濟調整，經濟開始有所復甦，市場也開始顯出一點生氣來。從 1958 年開始「大煉鋼鐵」等「左」的風潮所造成的經濟大衰退的後遺症開始得到治療。那個年代，白麵和大米被稱為細糧，在每人的口糧供應中，占的比例很小。尤其是廣大的農業戶口人群，一年好的可以分到 20

斤至 50 斤不等的麥子，差的幾乎沒有。大米更是珍如珠璣，只有在北方工作的南方人，才能配給到二三斤。在經濟開始復甦後，街上的飯店開始有饅頭供應，每個二兩糧票五分錢。城郊的農民，可以憑生產大隊開的外出介紹信，到糧食局耀出玉茭，換成糧票，再用糧票買饅頭來調節一下單調而粗澀的飯食。這種饅頭，名叫「二八饅頭」，即每個饅頭按照規格應是八成白麵摻二成玉茭麵，份量應當大於 2 兩，因為麵粉在加水蒸熟後的重量已經包含了水份。

但是，由於飲食企業的缺斤少兩，饅頭往往不足份量。老百姓雖有怨言，但由於這些飯店是地方國營性質的壟斷企業，因此怨歸怨，忍還得忍。大串聯開始後，北京來的紅衛兵到飯店買飯時，發現了這個毛病。一來這正是一個造反的理由，二來可能因為份量不足引得所攜定額糧票超額消費，使得紅衛兵慨然大怒，把一個饅頭用繩子串了，吊在縣城東門的城牆上，如同古代張貼緝捕文告或懸頭示眾一般，而且還貼了大字報。

這種行動，使這個小城的人們大開了眼界，原來是可以造國營部門的反的，造反不僅不會被抓起來，而且有理；不但有理，而且還有毛主席身邊的人支持。於是，一些大膽的人開始學著造起反來。據原平定中學初中畢業學生、返鄉知青胡彬回憶：最先被發動起來的人裡，有位在牛王廟溝大隊（後改名紅衛大隊）教書的教師，名叫王傑，他帶頭造了縣醫院的反，把醫院院長弄到奶奶廟的臺上鬥。黑白鐵社有個名叫「趴拐」的人，他孩子被醫院治病治死了，他還上臺控訴。

這樣的造反是平定縣城最初的面向政權機構或權威部門的文化大革命動作，政治色彩較淡而重於衝擊社會上不公平不公正現象。這樣的零散無組織而含有一定合理因素的造反行動，與發生在高層領導中的政治對撞和交鋒相比，儘管顯得單純、稚嫩，卻激發了平定普通人的膽量和見識。從

此，平定文革烈火便開始燃燒。這是革命大串聯過程中的一個插曲，卻也顯現了中共高層發動革命大串聯的作用。

小結

從上面的敘述來看，學生們通過革命大串聯，多多少少做到了人民日報編輯部所說的那樣，讓「學生自己教育自己」，在革命大學校中「熟悉社會、熟悉群眾、熟悉階級鬥爭」，「根據毛主席的教導〔即『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邊行軍，邊學習，邊宣傳，邊做群眾工作」，宣傳毛澤東思想、黨中央的十六條，「將毛澤東思想的種子傳播到沿途的城市和鄉村」。⁴ 當然利用這個機會旅遊、串親戚，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串聯後返回學校的學生們一邊交流各自的見聞，一面開始組織各種名字的戰鬥隊。一些政治意識較強的學生，開始從電臺、報紙上捕捉文化大革命的趨勢走向，結合著自己在大串聯中所瞭解到的動向，思考著文化革命的終極目的了。

1966 年的冬天，天特別冷，雪卻奇少。奇冷的天，尖厲的風，與街面上鬧鬧哄哄的景象形成巨大的反差，在這動盪和驛動中，新的一年來到了。

4 前引人民日報編輯部社論「紅衛兵不怕遠征難」。

鬥「走資派」：文革掀高潮

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1966年8月8日¹

通過串聯，紅衛兵們瞻仰了不少革命聖地，緬懷了先烈的英雄事蹟，交流了文化革命的經驗，之後的任務就是將文化大革命再向前推進一步了。根據上述《十六條》的意思，就是要鬥走資派，這或許本來就是毛主席原來的意思，儘管到底誰是走資派誰不是走資派現在大家並不清楚。平定縣的「饅頭事件」使得人們開始琢磨文化大革命到底要運動誰的問題。在外來紅衛兵的影響下，平定縣的紅衛兵隊伍也發生了分裂與重組，以適應文革深入進行的需要。重組之後，大家基本都稱自己為造反派，而造反的對象則是毛主席心目中的最終目標：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即

1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966年8月8日。見前引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走資派。根據《十六條》的指示，或許這才應該是文革的高潮。

紅衛兵的分裂和造反派的誕生

平定中學的官辦紅衛兵並沒有很強的生命力。因為官辦紅衛兵對家庭出身的苛刻要求，激起一批無緣當文化大革命積極參與者的學生的強烈不滿。在文革前，由於學生中對「紅」與「專」的態度及家庭出身的壓力，本來就已經在學生中形成了精英激進階層和感到壓抑學生兩個群體。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的形勢，仍然是精英階層出頭露面，一般學生跟隨大流，一批學生便感到了明顯的不公。於是，對官辦紅衛兵有對立情緒的學生，便開始自行組織造反組織，正如上一章趙成秀所提到的。據時任平定中學教導主任的教師曹克倫回憶，平定中學第一個「官辦紅衛兵」之外的戰鬥隊是高三班學生岳智明組織的。岳智明同意這種說法。據他回憶，當時學校放暑假了，他也回了家。開學以後，因為不服氣學校紅衛兵的組織成員，認為是保皇勢力，他便自行組織了另一個造反組織「紅衛隊」。當時，官辦紅衛兵的袖章是集毛（澤東）體字，其中「衛」字還是繁體的，而「紅衛隊」袖章則是一般的字體，尤其是那個「衛」字，寫作「卫」。

與此同時，戎崇璽他們也組織了「延安兵團」，並占領了教導主任曹克倫的辦公室。成員主要是初中二年級第 57 班的學生，如岳慧明等。他們刻了自己的公章，做了隊旗。後來加入了紅衛兵戰鬥兵團（即紅戰團），他們還出了一個常委。其他「紅戰團」常委有張存洲、翟全臣（作戰部長）、曹建中（宣傳部長）。參加紅戰團的另一個主要的組織是以董命長（後改名為董鋼）為首的「紅外圍」，也是非官辦紅衛兵組織。這些都是在紅衛兵們串聯回來後發生的事情。

關於當時非官辦紅衛兵的出現，正如岳智明再次強調的：

運動初期是學校領導下的「官辦紅衛兵」，參加紅衛兵的只有貧下中農、工人階級、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的子女，即「紅五類」出身才能參加。未能參加紅衛兵的同學看到這種情況很不服氣，而且認為紅衛兵是保皇派組織，再加上有的自己也是貧下中農出身，但是不能參加。這樣就成立了相對獨立的紅衛兵總隊（簡稱紅衛隊）。後來，群眾組織就發展起來了。紅衛兵組織多則幾十人，少則幾人。組織中有領導、章程、公章、綱領、袖章、宣言等。出現了很多名稱，如「井岡山紅衛兵」、「延安兵團」、「太行兵團」、「鐵流戰鬥隊」等等。有句順口溜叫「不出名的小將，成了革命的閻將」。

岳智明所組織的群眾造反組織「紅衛隊」的出現，以及隨後在學校內群眾鬥群眾混戰局面的出現，使教師和學生中觀點不同的人與「官辦紅衛兵」意見產生分歧。學生群起仿效，各種組織蜂起，原由學校組織的「官辦紅衛兵」失去了在學生中的精英地位和權威作用，出現了連學校領導層也不能控制的群雄蜂起山頭林立的局面。於是，在「平民階層」造反的狂潮中，在校領導層難以操控的局面下，「官辦紅衛兵」無形中解體了，代之以隨即形成的「保皇派」和「造反派」的兩種派別。不過平定並沒有北京那種「龍生龍，鳳生鳳，老鼠養兒會打洞」觀點的強烈辯爭，更沒有產生北京那樣的「老紅衛兵」幫系組織。

這時，讓許多學生感到心情舒暢的是自由了，沒有了功課的壓力，沒有了紀律的約束，沒有了教師的權重，沒有了精英學生的威壓，大家都如同水泊梁山的好漢們，平起平坐。成立一個造反組織，如同玩小孩過家家一樣輕易。以少不更事的心緒參加進一場激流狂潮的運動，如同吃飯就鹹菜那麼隨意。尤其是初中低年級的學生們，有許多人心理上還沒有從少年步入青年，更是問號少而感嘆號多，唯恐鳴不驚人。誰也不會想到，這以

生命、青春和熱情為代價的運動狂潮，帶給自己的將會是什麼。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像青年學生那麼狂熱和焦躁。趙成秀，平定師範附小教師，在他的回憶文章〈我的文革歲月〉中回憶了他們組織教師的戰鬥隊的情形：

我們附小的老師回到學校以後，起初還很平靜，隨著平定師範和平定中學紅衛兵的分裂，一些人開始秘密開會，策劃成立新的群眾組織。很快，一個名叫「風雷激」的戰鬥隊成立了。他們執行了一條極其純粹的「紅色」路線。史文華，他們是不要的，因為他有一個曾當過閻錫山團級軍官的父親；馮二醜，他們是不要的，因為他家是富農出身；王永成，他們是不要的，因為他做過國民黨的小職員，歷史上有小小瑕疵；曹富元，他們是不要的，不知怎麼的，把他杜撰成了一個走資派，其實他連教導副主任也不是。當然，我，他們也不會要，因為此前，在一次向黨交心中，我把四本日記交給了黨支部，他們根據我平時「只專不紅」的表現，斷定我的日記中有問題。

這樣一個純粹又純粹的組織，在校內，令人羨慕和敬畏，在社會上肯定也是響噹噹的，很快就在社會上闖出來名堂，當 1967 年「平定縣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聯合籌備委員會」成立時，「風雷激」戰鬥隊是發起的十三個戰鬥隊之一，並且參加了「三·二八」奪權。此後，該戰鬥隊中部分骨幹由此從學校走向了社會，個別人還逐漸走向了政壇。

當時，流行最廣、號召力最大的就是毛主席所講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曾經是親密同事的一些人的做法極大地傷害了我的自尊心，我不甘心讓人看成另類。我想，在革命浪潮洶湧澎湃的時候，誰都有權利去做一朵小小的浪花。你們有造反的權力，難道我就沒有嗎？帶著一種憤憤不平的情緒，我和史文華、馮

二醜、高忠明私底下商量，決定也成立一個戰鬥隊，毛主席曾於 1966 年 8 月 18 日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上檢閱了百萬紅衛兵，這個日子很有紀念意義，就取名為「八一八」戰鬥隊。並且加入了平定師範的紅三司，經常參加師範和附小的鬥爭走資派的活動。²

趙成秀所述「八一八」戰鬥隊的成立和他們加入平定師範紅三司的過程，也恰恰印證了兩派分流的原因之一：逆反心理。在一派人把他們推到「不准革命」的境地時，對立情緒也就成為兩派的一個思想上的蔽源。

鬥「走資派」

時過境遷四十餘年後，大量史料證實，1966 年文化大革命起始時，儘管矛頭似乎是對準「四舊」和「牛鬼蛇神」等所謂的階級敵人，但是，文化大革命最終的目標卻是清除高層領導內與毛澤東在治國方針或政見上有矛盾的其他領導人。我們在第二章已經引述了 1970 年美國資深記者、毛澤東的老朋友愛德格·斯諾在和毛澤東會面時談到文革要搞劉少奇。毛澤東還說，「那個時候的黨權、宣傳工作的權，各個省的黨權、各個地方的權，比如北京市委的權，我也管不了了。」³後來，斯諾通過當時中國的其他高級負責人證實，1965 年 1 月 25 日，而不是在此之前，毛澤東已經決定，劉少奇必須下臺。關於這個談話的詳細內容，當時，中共中央曾以「中發〔1971〕39 號」文件公開披露，⁴「打倒」的「最大」目標，就是劉少奇。但是全國其他地方的權力也要奪回來。

2 趙成秀，前引《印象平定》。

3 毛澤東，「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1970 年 12 月 18 日。載於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4 見宣傳家網，「中共中央關於轉發《毛主席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諾談話紀要》的通知」，<http://www.71.cn/2009/0108/515612.shtml>，上網日期 2015 年 10 月 1 日。

文化大革命發動之初，毛澤東放手讓劉少奇等人在北京以「四清」那樣的模式「運動群眾」，派駐工作組，矛頭對準牛鬼蛇神。應當說，這是自建國以來中央領導層在治理國家、駕馭人民上的共識和習慣做法。而劉少奇、彭真他們一開始顯然不知道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鬥爭目標是誰。於是，和他們想像的情況相反，在毛的強勢主導下，一場評「三家村」、「評海瑞」的運動，逼迫以彭真為領導的北京市委徹底交權。《五一六通知》明確指出，文化革命的鬥爭方向是「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要「清洗」這些人。問題是到底誰是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⁵

在派駐工作組問題上，雙方發生激烈的交鋒，劉少奇被迫檢查。如前所述，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公開了1962年和1964年雙方在治國方略上的分歧。⁶毛澤東開始「批右」，向以劉少奇為首的務實派發難。中央文革小組的建立，表現了毛澤東決心拋開當時的中央領導集團來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意圖。在林彪成為炙手可熱的人物和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達到一個高峰之後，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所通過的《十六條》對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任務、方法和指導思想都作了方向性規定。⁷這

5 所謂《五一六通知》，即1966年5月16日所發布的中共關於撤銷1966年2月12日批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黨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的通知。這個彙報提綱是彭真所主持的，所以《通知》的矛頭直指彭真。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及原件附件之二」，該附件詳述了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彭真如何力圖阻止毛澤東安排的對吳晗等北京市委的領導人的批判。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關於彭真力圖阻止毛澤東批吳晗等人結果自己被打倒的歷史過程，也見卜偉華（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六卷，《「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出版，2008年，第7-21、52-72頁。

6 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1966年8月5日。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7 《十六條》即「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966年8月

些過程、這些現象，已經清楚地表明：文化大革命的目標，是黨和政府權力機關中那些與毛澤東的主張相左的領導階層的人物，即被稱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人。

進入 1967 年，奪權的風潮已經蔓延開來。在學生大串聯還沒有完全歸校時，中央「打倒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已經完全喊響。這年的 1 月 10 日，北京新華書店已經在天安門廣場焚燒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的畫像，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已經被作為「黑修養」而受到批判。1966 年 10 月 9 日至 28 日召開的中共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和鄧小平受到來自中央領導層的正式批判。陶鑄作為中央剛剛調回的政治局常委、副總理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由於對文化大革命所欲清除劉少奇、鄧小平的不理解，而被迅速地作為劉、鄧之後的第三號人物被打倒、被清除。中央領導層面上的鬥爭對象基本明朗化。

自打學生大串聯返回之後，由於中央輿論方面的引導，平定的文化大革命開始步入這個軌道。那些一時一陣的風頭漸漸淡出，圍繞著領導權力問題的群眾運動，成為新階段的新特點。而這次的運動風潮，在一開始的目標方向上基本是一致的，那就是一律指向執掌權力的人，即當權派。至於這些當權派是否為人民幹事，是否領導的方向符合人民利益，則完全不去考核，也沒有一個可以衡量的標準，一律冠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平定中學的鬥走資派運動

在平定中學鬥走資派運動中，在前幾場揪鬥中，學校的主要領導，包括校黨支部書記蔡守惠、校長張有貴、教導主任曹克倫等，都受到了衝

8 日通過。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擊。到了後來，矛頭主要集中在了蔡守惠身上，說他是解放戰爭時期隨軍南下之後吃不了苦偷跑回來的。這樣，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先從個人歷史上搞臭，然後羅列「罪狀」。前一階段對待「牛鬼蛇神」的鬥爭方法，現在都使用到對待「走資派」上。對蔡守惠的批鬥，主要集中點除「走資派」外，另一個罪名是「挑動群眾鬥群眾」。當時的初三學生郝忠德回憶說：

我記得串聯回校後第一件事是鬥走資派，那是 1967 年年初的事。學生串聯返校後，部分學生和教師醞釀揪鬥蔡守惠。當時以蔡守惠為首，涉及到的人有校長張有貴、教導主任曹克倫、教導處教導員王文書和後勤主任張銀寶。第一步是揪鬥蔡守惠。學生們給蔡守惠掛上大牌子，讓他站在會議室的桌子上。人們質問，「老實交代，是如何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完了就將他定為平定中學的黑線頭號人物。鬥了蔡守惠之後，就燒了黨支部的黑材料，主要燒的是思想彙報、揭發材料和老師們的交代材料這些東西。

另外幾位也回憶說批鬥蔡守惠是在冬季。高四班的學生葛秉臣的回憶是在「一月紅色風暴後」。戎崇璽回憶說蔡守惠還被戴著高帽遊了一回街，批鬥會上戎自己還在東闢講了話，用的是普通話，而不是平定方言。

翟全成和郝忠德回憶說，當時砸學校機要室是紅戰團成立後的第一個活動。把陳元才、楊乙榮、荊域、孫壽的材料燒了，其他「黑五類」老師們的材料也燒了。主要是認為毛主席的意思不是鬥群眾，不是鬥地富反壞右，而是要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們要鬥蔡守惠，而不是別人。

郝忠德回憶說：

燒黑材料是苗祿的主意。這些材料裡有陳元才、孫壽、荊城和楊乙榮等人的材料。為什麼燒這些東西呢？當時苗祿給我們分析，毛主席發動文革的本意是針對黨內的走資派的，可是這些人卻挑動群眾鬥群眾。蔡守惠等人轉移了文化大革命的鬥爭目標，所以要燒黑材料，鬥蔡守惠。

學生們自發燒黑材料的行為，恰恰與當時中共中央的一個指示相吻合。只是這個文件當時並未公開，學生們並不知道。這個文件的編號為「中發〔66〕553號」，題目是「中共中央關於處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檔案材料的補充規定」，⁸文件摘錄如下：

- (一) 責成原工作組、學校黨委或者其他有關組織，必須將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後的各種整學生、整群眾的材料……全部集中，不許隱瞞，不許轉移，不許複製，不許私自處理。……
- (二) 除個人被迫寫出的檢查材料全部交還本人處理外，其他所有的材料，集中清點之後，在上級領導機關和本校學生代表的監督之下，當眾焚毀。
- (三) ……對於在文化革命運動中，因為給領導上或工作組提意見而被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革命群眾，都應宣布一律無效，予以平反，當眾恢復名譽，並按以上規定處理材料問題。……

在燒黑材料問題上，學生層中產生了分歧意見。這便是學生群眾組織開始分野的肇始。王新民回憶說：「我和岳陶祥、張瀘雲（二人為「紅戰

⁸ 「中共中央關於處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檔案材料問題的補充規定」，1966年11月16日。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團」派學生）他們辯論。我記得那是（1966年）6月2日，下著濛濛小雨，我在小會議室西邊搬椅坐在那裡和戎崇喜辯論，辯論完我就從他們中間分離了出來。我就加入了岳智明的『紅衛隊』。他說：「不過，這回分開，還不是分成『紅指』和『紅戰團』。」郝忠德說：

燒了黑材料以後紅戰團的影響一下就上去了，其他的地方也都出現了兩派。劉增芳、曹克倫、張有貴傾向紅戰團，王學良、張銀寶、王文書傾向紅指，張重林原來傾向紅戰團，後來傾向紅指。〔以上都是老師。〕後來各自派別掌權的時候，他們都被分別結合到了權力機關裡面。縣直機關裡連震玉是總站的，魏德卿是兵團的。在縣裡三·二八（即3月28日）奪權之後不久，學校也奪權了，成立了聯合領導班子。張有貴、曹克倫被結合進領導班子。

張有貴，時任平中校長。曹克倫，時任教導主任。其餘的人名，除特殊指「縣直機關」的二人外，均是平中教職員。

「燒黑材料」指的是燒毀在「文革」初期由校黨支部領導鬥爭一些教師時整理的大字報揭發資料。

在燒黨支部的黑材料之時，學生中產生了兩派不同的觀點。一派認為蔡守惠和他的領導班子雖然有「方向路線錯誤」，但在批鬥本校的「牛鬼蛇神」教師，尤其是批鬥楊乙榮、陳元才和陶予上，還是對的，因為他們三人確實「右」。另一派學生則認為，蔡守惠是「挑動群眾鬥群眾的罪魁禍首」，是在「轉移鬥爭大方向」。這兩派學生在對待蔡守惠——也就是對待當時的校領導的態度上產生了激烈的矛盾，以至於分裂成「保」派和「反」派。這個「保」派以文革前學生中班團幹部為骨幹，逐漸演變成後來的平定中學「紅衛兵造反總指揮部」（即「紅指」），而「反」派則另成

立一個造反組織平定中學「紅衛兵戰鬥兵團」（簡稱「紅戰團」）。兩個對立的學生群眾組織由此產生。



圖 6-1 「紅指」的袖章

資料來源：照片由岳智明提供。

教師中則組織了一個「紅色教師聯合戰鬥隊」（簡稱「紅教聯」）。「紅教聯」的基本觀點與「紅戰團」接近，可謂造反派教師的集合。這是因為，在前一段時間，在文革初期，受到衝擊的教師太多了。除了幾個以前歷次運動的「老運動員」尚心有懼意不敢造反之外，大多數受衝擊的教師認為自己是無辜的，以自己的出身衡量，也敢於起來造反。他們對學校領導層每次運動一來就「運動群眾」的反感，使自己站在了「走資派」的對立面上。在對待學校的「走資派」和「黑幫」的態度上，師生中原先的精英派和對「文革」的思辨派無論感情上還是思想上的分歧更加明顯，交鋒更加激烈了。從燒黑材料一事上也可以看出，這批對「文革」思辨派學生中，不乏思考者，不乏思辨結論，更不乏結論後的大膽行動。

平定中學的兩派分野，只是社會上群眾組織分裂的縮影。

平定縣城和農村的鬥走資派運動

與此同時，平定縣城以及農村，也開始了鬥爭走資派的運動。當時的平定縣領導機構，原任縣委書記郭存華剛剛調走，縣委書記缺任。縣委副書記、縣長朱永為縣領導一把手，縣委副書記鄭忠華主持黨的工作。奪權後，造反派喊出的口號是「打倒郭朱鄭」，其中的「郭」，即郭存華，是被從長治揪回平定的。當時在縣團委工作並任副書記的劉懷祿回憶說：

1965年縣團委組織群眾批判文藝界，根據上面報紙發表的文章，組織批鬥。廖沫沙是文藝界批鬥的主要對象。1966年文革剛開始，幹部不參加運動，只是紅衛兵參加。之後群眾運動也擴展到社會上，各單位都對準自己的領導，群眾對領導有意見都可以說。鬥走資派剛開始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揭露走資派的罪行。當時是在東關貼大字報，主要都是針對平定各個單位的頭頭的。鬥走資派主要針對縣長朱永，副書記鄭忠華，各單位都有自己的批鬥對象，縣裡主要是這兩個。鬥走資派中，隨時隨地都可以對走資派進行批鬥。平定在批鬥過程中，雖然沒有出現過抄家現象，但是，鬥得也很厲害。早晨一上班，大小「走資派」一人掛一個牌牌站在單位門口認罪。鬥走資派那會兒，好像就分了派性了，主要是兵團和紅總站兩家，我參加的是兵團。

張啟傑的回憶也說：

鬥走資派時，各單位門口都有戴走資派牌子的人在那站著，學習毛主席語錄，早請示、晚彙報。一開始是大辯論，主要針對郭存華、鄭忠華、

朱永、賈正杞（縣委專職常委，負責農業）、鄭子英（副縣長，賈的夫人）。貼大字報，把縣裡的領導一個個都進行了批鬥。

也有一位原機關幹部回憶說並不是每個單位每個時間都有走資派掛牌站立被鬥。她就沒有看到過。看來應該不是每時每刻都如此，儘管掛牌批鬥是免不了的。⁹ 至於這些領導幹部是否「走資派」，沒有人去思考和衡量。例如，關於郭存華的情況，他的兒子郭旭明說：

我的家在昔陽縣一個貧困的地方，處於昔陽、平定和河北三交界的地方。我爺爺有兄弟四個，且家裡生活小有起色，並購置了一些土地。土改中兄弟四個被定為富裕中農、地主、富農等不同成分。我父親郭存華生於1912年，念書念到高小，期間學了一些武術。抗戰時期做過武工隊隊長，在農民協會當過官。

1940年，〔我父親〕加入中國共產黨，背叛了家庭，與我爺爺決裂，斷絕了關係。我父親在省裡的一次會議中，即興發言，引起山西省省委第一书记陶魯笳的注意，被提拔為太谷縣委書記。當時土改就開始了。

1954年父親到榆次，得到山西省委書記王謙的提拔，1956年到王謙的老家平定當縣委書記，文革前被調到長治當市委書記。

父親文化程度不高。高小還沒畢業，但記性特別好，口才特強，而且非常善於學習，工作特別刻苦，從來沒有禮拜一說，沒有節假日。平時艱苦樸素，沒有一身像樣的出門衣服。我從小被教育要有艱苦奮鬥的精神。有一次我跟父親說：「把我捎到太原去吧。」父親說：「不管你步行還是騎

⁹ 陳桂芳對劉懷祿和張啟傑的回憶有所質疑。她說自己在縣委機關上班，每天從街上走過，沒有看見哪個單位的門口站著「走資派」。縣委機關的「走資派」也沒有在門口站過。或許我們可以說鬥「走資派」是肯定的，但是是否或者何時、何地戴牌子站街，頻率如何，只能存疑了。

車去太原，就是不能坐車去，車是給公家辦事用的。」

我結婚是 1966 年初。妻子是農村戶口。依我岳父的意見，跟我父親說一下，轉成城市戶口。但和他一說，根本不行。「群眾該怎麼說？這事不能辦。」

1966 年我由紅小兵變為黑五類，三·二八奪權之後，因為他們說父親隱瞞了歷史問題而被打成走資派，被從長治揪回來進行批鬥，被關進派出所，說是為了保護父親。

顯然，郭存華是革命得不能再革命的老革命。現在卻被當作走資派來批鬥了。翟治壁在回憶造反派和朱永「拼刺刀」（批判他，和他辯論）時的情況：

1967 年 3 月，我在農村下鄉。有一次回機關，遇上造反派和朱永縣長「拼刺刀」。我就到會場去聽。造反派們問朱永，「你為什麼器重翟治壁？」他說翟治壁忠厚、老實。造反派問對誰忠厚、老實。朱說對黨、人民的事業忠厚老實。造反派拍案而起，喝道，「這個回答不行！究竟是對誰忠厚？對誰老實？」朱回答說，「那麼就是對我忠厚、老實」。造反派說，「那就對了」。這個問題才沒有再追下去。

這顯然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和「文革」前期批判「黑幫分子」的「小爬蟲」一樣，好多一般幹部出於自我保護，避免當走資派「小爬蟲」的嫌疑，也不得不參與對走資派的批判。翟治壁說：

1967 年 3 月 5 日，縣裡成立了「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派我去鎖簧公社下鄉了。4 月的一天，我回來拿工資，在東門口碰到朱永。朱

永問我現在幹什麼，我說在鎮簧下鄉。他說，「前些時我見到了你寫的大字報」。我說，「都是事實吧？」他說，「那還能找不到點事實？」我說，「人家都要跟當權派劃清界限，我能不劃嗎？」朱一笑說，「你也要劃清界限，你能劃得清嗎？你就穩穩下鄉吧！」

關於平定縣其他單位鬥走資派的情況，王增榮的《糧食工作回顧》這樣記述：

此間，形勢相當緊張，到處是紅衛兵串聯、紅衛兵長征（實際上也是串聯），小道消息到處傳播，什麼北京來電、什麼靈通人士消息等等。有的單位開始組織戰鬥隊，個別群眾組織也開始揪鬥領導幹部，但不叫揪鬥，而叫勒令或者責令某某（領導幹部）什麼時候、到什麼地方、解答什麼問題，被勒令者必須按時到達。記得有個群眾組織的頭頭，把縣長朱永、工交局局長吳運載和我都叫到新華書店的辦公室，要求給他們辦公室、小汽車、打字機、糧票等。除小汽車外，縣長朱永都答應給予解決。維社公社王家莊大隊，將副縣長張子福（分管財貿）和我叫到該村，責令核減糧食徵購任務。鎮簧礦廠派職工二十多人喊著「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王增榮」的口號，把我揪到鎮簧礦廠，勒令解決該廠拉大車驟馬的飼料供應。我答覆，因涉及政策問題，必須請示地區糧食局才行。但其用連續不斷的口號，想逼迫當場答應解決，相持幾小時沒有得逞。巨城公社北莊頭大隊，因承包岩會糧站建庫工程，所得工資不高，也派二三十個農民，把我揪到手管局會議室，批判我的資本政治思想。

從王增榮的回憶中可以看到，即使是鬥走資派，許多訴求仍然是經濟上、局部利益上的，甚至不乏小當權派指使群眾鬥大當權派的。這也證實

了，群眾並沒有那麼大的目標和長遠的眼光，或者說，還沒有真正理解毛文化革命的意圖。至少到現在為止，他們還沒有找到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平定縣晉劇團演奏員荊履榮，回憶了他們單位的文革以及鬥走資派的情況。這才真的有了點造反派的味道。他的故事同時也說明了在文革早期他就要鬥走資派，但是縣委及本單位的領導反過來組織群眾鬥他。這一點很像北京學校的紅衛兵造了黨政領導的反，然後被劉少奇領導的中央派去的工作組「鎮壓」的情況。他說：

我在劇團，愛研究，緊跟中央的政策。聶元梓的大字報一出，我在〔1966年〕7月3日，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我這是在平定縣的第一張大字報，給毛主席的一封公開信，揭露當時平定劇團領導，在劇團執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文藝路線，工作問題、作風問題，他本身把劇團劃成好幾派，不搞團結，搞分裂。我的大字報一出，就震驚劇團了。當時趙興福、康同柱、李守珍、郝邦聲都來劇團解決問題。郝邦聲是西郊人，他後來病重我幾次去看望。他當文化局長就抓我搞文藝創作，在晉中取得的成績不小。

當時大字報的內容？首先是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平定劇團書記，在舞臺上是牛鬼蛇神、封建主義、才子佳人，資產階級占領，他得到了黑後臺的支持，上面有支持者，下面有吶喊的，上下一起。根據毛主席的指示，文藝黑線專政，執行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這樣的書記還得到縣委的支持，這說明上下一條線，沆瀣一氣，這樣上下一聯繫，從縣委到劇團一杆子批到底了。馮希士、文教局長楊貴醜，文化局長康同柱，從縣委書記、縣長、部長，一杆子打下去。

〔於是他們〕首先向我開刀。66年7月底，毛主席橫渡長江，劇團

文革也開展起來了。趙錫明、馮嘉冀等，劇團 80% 的人同意我的觀點，劇團執行了文藝黑線。趙興福是劇團的副書記，李守珍團長和他都表示支持我，李比較年輕，也能跟上形勢。一開始號召大家提意見，寫大字報，我寫了給毛主席的公開信，我堅決打倒文藝黑線，當時李守珍、趙興福都支持我。證明我代表群眾，敢和他們鬥了。文化革命要站在革命派一邊。

但趙興福和史桂英到縣裡彙報，到縣委給縣委書記郭存華彙報，郭存華聽了彙報後說：「革命支持左派，荊履榮不是左派。」聽了郭存華的指示，就回到黃統嶺鄉西家莊開的會，當時劇團在這裡演出。縣委書記郭存華、縣委副書記鄭忠華兩人親自坐車到黃統嶺，一批一批的接見劇團的群眾左派，這些都是平時跟領導的關係近的左派。我要求接見，遭到拒絕。¹⁰

一回到平定，劇團就開始批鬥我，史桂英、劉鳳蘭、黨團員，大字報貼滿了院。縣委派出陣容強大的工作組，楊志忠副縣長任組長、馮希士宣傳部長、郝邦聲、孫立榮、王九林劇團黨支部書記，組成的工作組。首先，大字報圍攻。根據縣委安排，劇團黨支部書記王九林和史桂英，回去就安排了大字報。定了左派 12 人，史桂英、劉鳳蘭、李秀珍、王寶蘭。反對派是我、岳吉昌、李保恕、馮嘉冀、趙錫明等大概 80% 的人。開批判會。

在劇團的排練室，組織圍攻批判，要我回答五個問題。我回答他們，我擺出問題，一個一個的解剖它，一條一條回答，一直到中午十二點也散不了會。當時李守珍是支持我的，現在李開始批判我了，說我是個人主義野心家，想把自己的上級幹掉。我給他起了個〔外號：〕平定的「八哥

10 陳桂芳回憶說，當時郭存華不在平定。郭 1965 年被調離平定，文革中被叫回來批鬥是 1967 年奪權之後的事情。荊履榮這裡的回憶似乎有誤。根據《平定縣誌》（1992 年版，第 347 頁），1965 年 6 月到 1967 年 3 月第四屆縣委會的縣委書記是王健，副書記朱永、鄭忠華。所以這裡的郭存華似應王健或者其他什麼人。

（鳥：鸚鵡）」。

李守珍看了縣委書記的態度，開始批判我了。後來我住監獄出來〔這個問題我們後面會介紹〕，我感到他是個人才，李很想革命，寫文章，看問題非常透徹，我願意爭取他，他和我很好，他認為我不念私憤。大家批判從五個問題開始，我不但不承認有罪，我還把他們駁倒了，大家啞口無言。

就開過這次大會以後，再沒有開會。因為，隨後頒布出了十六條，他們一看，派工作組，鎮壓群眾，是錯誤的。工作組對我一個一般群眾，這一段打的太厲害了，他們在七月底批判給我定了性，按反革命分子批判的，個人主義野心家、反革命右派按這個批判了。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他們撤了工作組。

另外，我們又從岳柱明所著《山陽一粟》一書中摘錄了另一個平定大村——張莊鬥走資派的情況。文中說：

1967年元旦，《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社論，宣布1967年將是全國全面開展階級鬥爭的一年，號召全黨全國人民「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全國掀起了造反派向黨政各級奪權的「一月風暴」，從此開始了「打倒一切」的大內亂，自上而下的「全面奪權」席捲全國。農村的造反派也緊跟形勢，開始鬥公社的和村裡的當權派。張莊公社被食堂做飯的二流廚師、外號「尖腦袋」為首的造反派奪了權，對李文科、穆聯堂、朱占溫等領導幹部開始了批鬥。

村裡的造反派也應運而生，從大隊到小隊都被奪了權，幹部們靠邊站，黨支部、村委會被砸爛，以「小日本」為首的造反派，成立了「張莊

村革命委員會」，天天批鬥「走資派」和「牛鬼蛇神」。大隊書記王德法、主任張寶，是村裡最大的走資派，挨的批鬥最多，地富反壞右都得陪椿。王德法是「六二壓」回鄉幹部，原在縣法院工作，「四清」後擔任村書記，是個忠心耿耿、工作認真、謹小慎微、不謀私利、一心為公的人，奪權受批判，實在是有點冤枉。

有一天，晚上去看批鬥，只見一個造反派跳到高桌上，指著低頭彎腰的「走資派」大吼：「你們這些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老爺，貪汙盜竊，投機倒把，流氓腐化，無惡不作，是披著人皮的狼，吃人不吐骨頭的傢伙。六〇年大饑荒，社員們是『五兩關』，餓死了許多人，你們卻殺牛宰羊大吃二喝，還大撈了一把……」。

批得錚錚有聲，入木三分，還真有點煽動性，直把這個「當權派」批得體無完膚，汗流浹背。在造反派的鼓動下，人們還很欣賞「造反有理，革命無罪」的批判大會。造反派天天批鬥「走資派」，還有點不過癮，就開始亂批亂鬥，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歷史上有污點的人都在劫難逃，敲鑼打鼓，喊口號，掛鐵牌，戴高帽，拉著「牛鬼蛇神」到處遊街。

和村幹部算六〇年大饑荒的帳，雖然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無關，但是至少是村幹部可能有以權謀私的問題。這在四清的時候，其實已經處理過了。不過這或許是造反唯一有理的地方。岳柱明在書中接著說：

一天，造反派正找批鬥對象，可好來了上馬郡頭村的馬傍（原文是上「山」下「東」拼字）小，此人是個光棍漢，每天遊手好閒，不務正業，在村裡也是造反派，天天叫喊他也要革命，這一天本來是想到公社造反，混碗飯吃，不料一進村就被「造反派」順手牽羊，給糊了一頂二尺多高的高帽，胸前掛了個二尺見方的牌子，上寫「打倒壞分子馬傍小」，用一根

麻繩牽著，敲鑼打鼓，在全村大街小巷遊鬥。馬儈小很不服氣，邊走邊喊：「我也是造反派，剛從北京回來，毛主席還接見了我，你們這些土小兵，我不尿你們，我要到中央告你們。」還拉開破皮夾克，從懷裡拿出塞得滿滿的紅衛兵串聯留下的傳單，沿途散發，高喊著「最高指示」，還真有點阿Q精神。臨近中午，馬儈小叫喊著：「夥計們，該吃飯了！咱遊鬥說遊鬥，吃飯說吃飯。咱吃飽再遊，只要管吃飯，咱天天幹。」從此就流傳下笑話，「馬儈小遊街，只要管飯，咱天天幹。」……

這種遊街，和之前我們敘述的葛東海遊街的故事非常類似。都介乎在認真和玩笑之間。不過，在他們「認真」的時候，是會出人命的。

「文化革命」中，張莊的造反派鬧得最凶，曾致死了革命幹部張萬祥。上面揪出了劉少奇，村裡的造反派頭頭「小日本」，也按圖索驥，找「叛徒、內奸、特務、走資派」，竟把和他有私人恩怨的革命幹部張萬祥揪出來，成了開刀對象。張萬祥是革命老幹部，當地有名的抗日英雄。歷任村黨支部書記、鄉黨委書記、縣農機局書記等職。因工作得罪了一些人，有的人借「文化革命」泄私憤、報私仇，造謠污蔑張萬祥參加過日本憲兵隊，出賣了革命同志，有血債大罪等等，極盡造謠生事之能事，製造了一起震動全縣的冤假錯案。

記得有一天，在村公所大院開批鬥大會，牆上貼滿了「打倒叛徒、內奸、特務、走資派——張萬祥」的大幅標語，會場稀落落，場外擠滿了看熱鬧的人群。突然，高音喇叭裡歇斯底里地嚎叫：「把反革命分子張萬祥揪出來！」、「打倒叛徒、內奸、特務張萬祥！」只見幾個打手把張萬祥揪到臺上，按頭彎腰，架起了「土飛機」，胸前掛著個大鐵牌，兩邊有幾個地富反壞分子陪椿。臺上兩邊站著的造反派振臂高呼：「造反有理，革命

無罪！」、「革命的站出來，不革命的滾開！」一群造反派隨聲附和，大有一犬吠影，百犬吠聲之勢。「小日本」用公雞噪宣讀了張萬祥的罪狀，幾個跳樑小丑又批、又喊，折騰了一陣，大有鎮壓反革命的氣勢，還真有點威懾力，令人毛骨悚然。

張萬祥在大會上連續批鬥，又採用刑訊逼供的辦法進行了「車輪戰」，硬逼他交代問題。一個深夜，受盡凌辱、萬念俱灰的他，難忍這不白之冤，喝了紅藥，縱身跳下了上街 20 多米高的石拱大橋，摔得腦漿迸流，血肉模糊，真是慘不忍睹，從而「背叛」了黨，「自絕」於人民，結束了他革命的一生。直至 1984 年，我回縣工作後，經張萬祥的戰友、大同軍分區司令員王紀英出面，才為其申冤，平反昭雪。縣委、縣政府在張莊大禮堂，為革命老幹部張萬祥同志召開了平反大會。

「文化革命」中，造反派為所欲為，猖狂一時，鬥人鬥紅了眼，害人害出了癮。鬥了幹部門群眾，害了幹部害群眾，以「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為幌子，挑動群眾鬥群眾，變本加厲地排除異己，喪心病狂地迫害無辜群眾，凡是反對過、得罪過他們的人，就要羅織「莫須有」的罪名，住「學習班」，私設公堂，摧殘迫害。被關起來，受過審查的人有 20 多名，搞得人人自危，雞犬不寧，一片白色恐怖。

顯然，在張莊的這種白色恐怖，比縣城裡要嚴重的多。或許當時的批判走資派運動的嚴重程度的確是因地而異的。在鬥走資派的同時，張莊的造反派也沒有放過他們心中的牛鬼蛇神。岳柱明接著說：

我有幾個好朋友都受到了迫害，我也差點被牽連。陳東心原是平定化肥廠工人，有文化，有思想，聰明伶俐，能寫會畫。因失戀受了刺激，患了神經病，每天瘋瘋癲癲，到處亂跑，砍了電線杆，砸了省運公司的

汽車，被公安部門逮走。造反派看有機可趁，大肆造謠：「張莊有個地富反壞右子弟組成的，打、砸、搶的反革命集團」，並寫了黑材料，上報了省、地、縣。晉中地區公檢法軍管會接到材料後，曾派王志鵬帶領專案組前來調查落實此事，可好王志鵬是我的同窗好友，在公檢法軍管會任領導，一看就知道是冤案，真是蒼天有眼，才免了這場殺身之禍。但「革委會」這夥人糾纏不放，結果把陳東心以反革命罪判了十五年，在獄中瘋病加重，後來釋放回家，瘋死故里。這夥殺人不眨眼的傢伙，連一個病人都不放過，又製造了一起令人痛心的冤假錯案。

人人被迫選邊站隊，不是革命派就是反革命派。

在那變幻莫測、「革命」與「反革命」瞬間即可顛倒的瘋狂年代，視殺人為兒戲，視人命為草芥。是壞人當道，好人受害，造反派要陷害一個人，是很隨便的。我拒絕參加造反組織，卻招來了無端忌恨。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派頭頭說：「人人都得站隊，革命的站出來，不革命的滾開……」「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為形勢所迫，我和魏世榮、郭厚文、陳勝、郭保福、王啟祿等幾個朋友商量了一番，決定成立個「紅閻將」組織，權當年輕人湊熱鬧，搞了個政治遊戲而已。……

時勢造英雄，壓力摧自新。我不是英雄，卻也滋長了革命氣概，開始關心政治，看了不少馬、恩、列、斯、毛的著作，使自己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發生了一定的變化。曾起草過一份告人民書：「張莊告急！張莊告急！張莊的上空烏雲翻滾，天昏地暗，風悲日曛，牛鬼蛇神紛紛出籠，鬼哭狼嚎，天陰則闇。這裡一片白色恐怖，迫害幹部、鬥爭群眾，人人自危，雞犬不寧……」結果有人告了密，說風悲日曛是污蔑「紅太陽」毛主席。

而如果被打成反革命，就要住學習班，被批鬥。而且還要翻家庭的舊帳，看家人是否有歷史問題。岳柱明繼續說：

被抓住了把柄，又是上告，又是批判，差一點就打成了反革命。……人常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郭文祥是一個20剛出頭的小夥子，有文化、有志向，為人仗義，有正義感的熱血青年。學校畢業回村，看不慣造反派的所作所為，編了個順口溜：「小日本，笛、笛、笛，開路坐著拖拉機。又耀武，又揚威，造反奪權真神氣。批幹部，鬥群眾，害死革命老書記。搞派性，排異己，張莊人民受了罪……」「小日本」是群眾給派頭頭起的諱號，一聽就惱羞成怒，把郭文祥關進了「學習班」，隔離審查了十幾天，私設公堂，刑訊逼供，晝夜派人看管，家人每天探視送飯，如同住了監獄一般。

一天晚上，在公社大房召開群眾大會，村「革命委員會」全班人馬坐鎮指揮，在疾風暴雨、鋪天蓋地的口號聲中，郭文祥被揪到臺上，「小日本」宣布了他的罪狀：「郭文祥的大爺當過頑固軍，歷史上有問題，他就是被管、關、殺的壞分子的子弟。他反對『文化大革命』，辱罵革命幹部，不滿共產黨，不滿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分子……」隨後，讓他坦白交代，低頭認罪。

當逼問他為什麼罵革命委員會主任是「小日本」時，他就說：「我聽咱村老年人講，在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人……」這一句話，像一顆烈性炸彈，「主任」被擊中了要害，頓時目瞪口呆，面如土色，大汗淋淋，癱倒在主席臺上。會場一片喧嘩，頓時就沸騰起來，群眾無不拍手稱快。從此「小日本」裝病不出，辭去了「主任」職務，落了個玩火自焚、自取毀滅的下場。後來，終因眾叛親離，走上了自絕之路。……

可見，平定的批鬥走資派，除了劇團菊履榮等的批鬥比較符合中央精神之外，其他都很牽強附會。頂多是批判一下官僚主義、以權謀私等問題。當然，文革之後返回來再看，即使是劇團的鬥走資派也很牽強。其實，文革的所謂鬥走資派、鬥牛鬼蛇神，本來就是一場無視人權、侮辱人格的鬧劇、荒唐劇與悲劇。但是，既然鬧起來了，就要繼續鬧下去。悲劇還會繼續上演。我們看下一章。

「奪權」：文革高潮與平定第一次奪權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一開始就是一場奪權鬥爭。這個文化大革命，就是發動億萬群眾自己起來解放自己，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只有展開這樣偉大的群眾運動，展開一個群眾性的全面奪權鬥爭，才能徹底解決無產階級奪權問題……這是毛主席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重大發展……展開全國全面的奪權鬥爭，勝利完成毛主席交給我們的偉大歷史任務。

——《人民日報》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1967年1月22日¹

我們在上一章已經提到了張莊的造反派奪權的故事。的確，批鬥完走資派後，或者在批鬥走資派時，順理成章的事情就是將權力從走資派手裡奪走並放到自己手裡。所以奪權運動就是必然的了。這正是上面《人民日

1 《人民日報》編輯部，「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1967年1月22日。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報》社論的精神。而且為了防止走資派的復辟，繼續批判他們，也是必須做的工作。所以說奪權和批走資派是交錯進行的。問題是由誰來奪權。本章講的「一·二二」（1967年1月22日）第一次奪權和下一章講的「三·二八」（同年3月28日）第二次奪權，都是這場奪權鬥爭的一部分。鬧劇和悲劇還會繼續進行。

奪權之風從上海刮起。北京隨後便發出一連串的號召奪權的信號。1967年1月6日，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發動了所謂的「一月風暴」，奪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全部權力。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上海市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為首的32個造反派組織發出賀電，讚揚他們「及時地識破了和揭穿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的反撲」。賀電說：「你們提出的方針和採取的行動，是完全正確的」。² 賀電說：

你們實行了無產階級革命派組織的大聯合，成為團結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無產階級的命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命運，把社會主義經濟的命運，緊緊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你們這一系列的革命行動，為全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為一切革命群眾，樹立了光輝的榜樣，我們號召全國的黨、政、軍、民各界，號召全國的工人、農民、革命學生、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幹部，學習上海市造反派的經驗，一致行動起來……。

2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1967年1月11日。載於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山西省「一·一二」奪權

對上海「奪權風暴」的肯定和讚揚，異乎尋常地擴大了上海以奪權為特徵的所謂「一月革命」的政治影響。山西省首先行動了起來。1月12日，時任山西省副省長的劉格平，根據中央指示，在山西領導了奪權。毛澤東對山西比較重視，一則因為山西是老根據地，是共產黨發家的地方，二則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羅瑞卿、楊尚昆、薄一波、安子文等均在山西活動過，在山西有關係。他們被打倒後，山西是否能夠穩定住，他很關注。劉格平當時是山西省副省長，而且是1936年在北平草廬子監獄（北平軍人反省分院）61個被捕的共產黨人中沒有按照中央指示自首出獄的兩個人中的一個。（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等自首出獄，在文革中被定為叛徒集團。這與劉格平1966年12月23日寫信給林彪、康生的檢舉揭發有很大關係。）³1966年12月，周恩來、康生找他談話，1967年1月4日，中央文革小組的王力和關鋒找他談話，要他在山西聯合革命組織、爭取張日清的支持（他們知道張日清是軍區12個常委中唯一一個主張支左的人），將山西的文革搞起來，將山西的革命和生產的大權掌握起來。⁴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劉格平如何運作了。

具體當然有很多細節，我們在這裡只能簡述一下。⁵首先，劉格平於1

3 見前引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第383頁。

4 余汝信、曾鳴，「文革『全國第一奪』：山西一·一二奪權概述」（下），載於華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館通訊（351），<http://www.cnd.org/CR/ZK06/cr351.gb.html>，上網日期2015年10月2日。

5 下面對山西省奪權的綜述，主要參考了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編撰），《山西通志（大事記）》，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99年；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編撰），《中國共產黨山西歷史》，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但是在需要的時候也補充了其他材料。見注釋。關於更多的奪權過程的細節，也可見上引余汝信和曾鳴的文章以及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第五章。

月 12 日在其住處主持召開了由 23 個造反組織頭頭參加的「山西省左派組織聯席會議」。在會議進行期間，他們調動人馬，抄了衛恒、王謙、王大任、賈俊、武光湯、趙雨亭、劉開基等省、市領導人的家，並宣布山西的文化大革命由「核心小組」領導。會議成立了「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由「山西革命工人造反決死縱隊」楊成效任總指揮。



圖 7-1 毛澤東接見劉格平（日期不詳）⁶

與此同時，山西軍區第二政委張日清下令撤走了在中共山西省委、省委擔負保衛工作的警衛部隊。在核心小組的支持下，楊成效等人帶領一

6 劉格平為河北省滄州市孟村回族自治縣大堤東村人，曾經擔任過中共各種重要職務。該照片見該縣縣委宣傳部官方微博，http://blog.sina.com.cn/s/blog_e740af100102vvlh.html，上網日期 2015 年 10 月 9 日。

萬餘人，分兩路到省委和太原市委查封了所有辦公室，完成了對省委、省人委和太原市委、市人委的奪權。史稱「一·一二」奪權。



圖 7-2 衛恒（1915-1967，山西省陵川縣人，省委第一書記），王謙（1917-2007，山西省平定縣人，省委書記），王大任（1916-1999，山西省沁縣人，省委書記）

資料來源：網路。

當時未參加「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的「太原市紅衛兵聯絡總站」（簡稱「紅聯站」，跨行業造反組織）則聯合別的造反組織，另立「造反總部」，也開始了自己的奪權行動。在此後半個多月時間內，各路造反派組織迅速奪取了以下這些單位的權：省廣播電臺、省公安廳、省委黨校、太原鐵路局、太原鋼鐵廠、太原紡織廠、團省委、省文化局、山西大學以及大同市委、陽泉市委、雁北地委、忻縣地委、晉南地委、晉東南地委、晉中地委等 40 多個單位，成為「山西一月革命奪權風暴」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此期間，劉格平、張日清、袁振（時任省委常委、書記處書記、太原市委第一書記）等聯名貼出題為《打倒以衛恒、王謙、王大任為首的鑽進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這些修正主義分子》的大字報，指控衛恒、王謙、王大任等多年來用特務手法統治山西，與彭真、薄一波、安

子文等是一條「黑線」上的人物。原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則是山西省委在北京進行特務活動的「接頭人」。大字報說省委設二線指揮機關是在搞「特務活動」。他們在衛恒家中搜出的臺灣空飄的傳單（這是省公安廳作為「敵特動態」報送給省委的）則是衛恒等與臺灣蔣介石集團有聯繫的證據。

當然，他們的奪權需要得到中央的支持。於是劉格平他們向「中央文革」報送了材料，羅列了山西省委「反革命陰謀活動的十二大罪狀」，指控省委「成立了地下黑司令部、設立了黑據點」，山西已成為「劉少奇、鄧小平、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囚禁革命者、保護反革命的保險櫃」，是他們的「戰略後方」，並指控「衛恒、王謙、王大任在他們後臺的指示下，跟蹤搜捕革命左派，正在加以殺害」。他們要求「中央文革」批准「對省公安廳、市公安局實行軍事管理」。的確，此後造反派便迅速奪取了省公安廳和太原市公安局的權，張日清還到場祝賀，劉格平向「中央文革」電話報功。之後，劉格平等又向中共中央遞交了《關於奪權前後十天工作的報告》，具體安排第二個奪權戰役（即向省城命脈部門如發電、自來水、鐵路交通等、工農業生產以及政法、財貿、銀行等領導機構和五個地委三個市委的奪權）以及第三個奪權戰役（向各個縣委奪權）的工作。張日清還以山西省軍區第二政委的名義向中央軍委報告了山西省軍區支持「左派」的情況，提出了軍隊參加地方「文化大革命」和支持「左派」的意見。1月15日，「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在太原五一廣場召開「批鬥衛恒、王謙、王大任、賈俊大會」，這幾個人脖子上都掛著「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牌子。

很明顯，山西的奪權是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指導與支持下進行的。1月17日，王力、關鋒代表「中央文革」接見山西造反派代表，說中央文革小組研究後決定支持「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的《第一號通告》，讚揚

了張日清支持造反派奪權的舉動。他們鼓勵山西的造反派將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掌握自己手裡，「要幹什麼就幹什麼，你麼可以依自己的意見去改組省委，造反派可以安排省委的名單，一句話：要奪權！」⁷在接見會上有組織有不同意見，結果被當作「保皇派」轟了下來。王力、關鋒的講話迅速被山西駐京的造反派以「特大號外」、「中央來電」等形式傳回太原，給造反派吃了定心丸。



圖 7-3 山西省領導被門時的情況

資料來源：石名崗（主筆），《文革中的山西》，第 89 和 162 頁。

山西的經驗很快被推向全國。1月16日，《紅旗》雜誌發表評論員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同日《人民日報》轉載。毛澤東批示：「寫得很好。」文章引述毛的話說，「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手裡奪權，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

7 王力、關鋒，「王力關鋒等接見山西革命群眾時代講話」，1967年1月17日。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即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⁸

與此同時，中央軍委表態支持張日清支持造反派的行動，這也成為了日後全軍範圍內「支左」行動的源頭。⁹



張日清少將

圖 7-4 張日清少將（1916-2004），福建省長汀縣人。

資料來源：網路。

1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指出「這是毛主席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重大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8 《紅旗》雜誌編輯部，「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1967年1月16日。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9 見前引卜偉華（著）《「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第385-386頁。

從一開始就是一場奪權鬥爭。這個『文化大革命』，就是發動億萬群眾自己起來解放自己，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只有展開這樣偉大的群眾運動，展開一個群眾性的全面奪權鬥爭，才能徹底解決無產階級奪權問題。」社論號召全國人民，「展開全國全面的奪權鬥爭，勝利完成毛主席交給我們的偉大歷史任務。」¹⁰

中央對山西的經驗評價甚高。這畢竟是繼上海之後，在省級單位奪權的第一個案例，為向全國各地的省委、省政府奪權樹立了榜樣。常言道，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1月24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全文廣播了「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的《第一號通告》。1月25日，《人民日報》也發表了這個《通告》，並配發了題為〈山西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的社論，社論宣稱：「山西『一·一二』奪權是繼上海市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奪權鬥爭勝利後，在一省的範圍內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鬥爭的偉大勝利」，「為全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的奪權鬥爭創造了新的經驗」，「山西省委內革命的領導幹部為全國的革命領導幹部作出了良好的榜樣。山西省軍區的人民解放軍部隊為全國人民解放軍指戰員樹立了鮮紅的旗幟」。¹¹

1月25日，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在太原市五一廣場召開了10萬人參加的山西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大奪權誓師大會。1月26日，省軍區和駐晉部隊在同一個地方武裝集會，支持「一·一二」奪權，會後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武裝遊行。被造反派組織控制的《山西日報》為此發表了題為〈敵人不投降就叫它徹底滅亡〉的社論。與此同時，前述「紅聯站」的奪權

10 《人民日報》編輯部，「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1967年1月22日，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1 《人民日報》編輯部，「山西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1967年1月25日，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被「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認定為不合法。張日清派出數十輛汽車，滿載全副武裝的解放軍官兵進入太原紡織廠，宣布紅聯站下屬的太紡紅衛兵是反革命組織，奪權非法，並逮捕其成員數十人。同時，又支持該廠的另一造反組織紅衛隊重新奪權。「紅聯站」在省廣播電臺的奪權也被宣布為非法，由「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重新奪權。「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挑選了 600 餘名骨幹，組成「造反奪權工作隊」，分赴全省各地（市）、縣進行奪權或對已由「紅聯站」、「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團」等組織奪權的單位進行重新奪權。至此，造反派內部的派系鬥爭的種子也已經種下。

1 月 28 日，以袁振為首的「太原市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這不僅是山西省成立的第一個「革命委員會」，也是在全國最早成立的「革命委員會」之一。2 月 1 日，「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發表《第二號通告》，要求全省造反派「迅速返回原地，把省城的奪權鬥爭情況廣泛地進行宣傳，配合當地革命造反派向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展開全面的奪權鬥爭」。「對假奪權或反奪權的要及時揭露，及時把權奪回來」。《山西日報》為此發表社論表示支持：「《第二號通告》是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全面奪權，徹底奪權的動員令和進軍號」，號召「向各地、市、縣進軍，把革命的烈火燒遍全省，解放全山西。」其實既然是只有「一小撮」走資派，為什麼要「全面」奪權呢？看來在狂熱與激情底下，人們是不需要邏輯思維的。其實所謂的「一小撮」是個幌子，「全面」奪權才是真實的目的。而且既然「一小撮」不好辨認，那麼「全面」打倒則不用思考，比較容易。

在山西的造反奪權運動中，勞動模範的參與成為了一個重要特點。尤其是毛澤東所支持的陳永貴的參與，使山西的文革產生了很多變數。1967 年 1 月底，陳永貴、李順達、解悅、牛發和等 4 名著名勞動模範發起成立了「山西革命造反派聯絡總站」，並很快加入了「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

部」，成為了奪權組織的一部分。

山西經驗在繼續發酵。2月13日，新華社播發了《人民日報》通訊員、記者評述山西造反派奪權鬥爭的文章，稱「山西省革命造反派奪權的重大勝利，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史冊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文章評述山西的奪權經驗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實行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實行『三結合』」。「徹底打碎走資派控制的資產階級專政機構，建立無產階級的革命權力機構」。「充分運用革命的權威，展開全面的奪權鬥爭」。1967年2月10日，「山西省核心小組」開會，增補陳永貴、徐志遠、劉志蘭、胡燁為成員，並報中央審批。

2月25日，中共中央來電同意中共山西核心小組組成人員：組長劉格平，副組長張日清，組員劉貫一、袁振、陳守忠、徐志遠、陳永貴、劉志蘭（後又增補曹中南為成員），秘書長劉貫一，副秘書長劉志蘭。「中共山西核心小組」成為中共山西省委被奪權後山西省黨的最高領導機構。3月12日至19日，山西革命組織代表會議召開，產生了「山西省革命委員會」，劉格平任主任。3月19日，慶祝山西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在太原五一廣場舉行，劉格平發表了講話。《山西日報》發表題為〈革命的三結合方針勝利萬歲〉的社論慶祝省革委的成立。與此同時，陽泉市於3月6日宣布奪權，雁北地區、大同市於3月17日奪權，並先後成立革命委員會；晉南地區於3月18日奪權並成立核心小組和地區革命委員會。此後，全省展開了全面奪權運動，各地、市、區、縣、人民公社和農村大隊，都相繼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這一「臨時權力機構」。

王增榮的《糧食工作回顧》這樣記載當時晉中地區的形勢：

1967年1月7日，我和副縣長張子福去晉中專署要求核減糧食徵購任

務。此時，糧食已收打完畢，糧食產量最後核實為 100,830,000 斤，比原報估計減少 27,740,000 斤，按政策規定，應該核減糧食徵購任務 246,000 斤。我們去榆次後，住在地專招待所。榆次的形勢比平定更為緊張。地專領導已處於癱瘓狀態，領導班子已形不成會議，主要領導也無法找到。地專辦公大樓的外牆上已貼滿了大字報。大樓內的走廊，除牆壁上貼滿大字報外，還橫七豎八扯著繩子掛滿了大字報。大樓的走廊、辦公室遍地都是破書爛報，灰塵滿地。我們只好去地區糧食局，找局長史修治彙報了糧食產量核實情況，要求核減糧食徵購任務。史局長答應，他找領導研究後再告。我和張子福商量去太原看看。太原的形勢更是緊上加緊，大馬路上寫著大幅標語，字體大的一眼看不到邊，一個字總有四五米長。要想看完一句標語，只能邊走邊看，才能看完。什麼「打倒鐵杆保皇派某某」、「打倒某某」等等。我們在榆次住了三天，史修治也沒有找到領導，沒有等到核減糧食徵購任務的答覆，我們就返回平定了。¹²

顯然晉中地區在奪權之前政權已經癱瘓，一片混亂，無人負責。山西的奪權運動得到中央的稱讚，也成為「文革」的一個里程碑式的事件。「走資派」被打倒之後怎麼辦，山西給全國做了一個樣板。甚至連上海，這個奪權最早的地方，也沒有得到如山西這樣的稱讚。這是因為，山西在走資派被打倒之後如何奪權拿出了辦法，其實就是如何再重新建立政權，即「三結合」。這成為了全國奪權的模式，也成為了衡量奪權是否合格的尺規。

12 見前引王增榮，《糧食工作回顧》。

平定「一·二二」奪權：一次不成熟的嘗試

平定的奪權運動其實並沒有按照省核心小組的步伐走，而是先行了幾步，而且有些反覆。在山西省奪權運動發生後 10 天，平定的一些造反組織，就發動了頗具爭議、不成熟的第一次奪權運動，這就是「一·二二」奪權。

當時，平定中學的學生們剛從串聯中回到學校。由於教師大多來自外地，由於學生生活環境相對封閉，對縣領導機構不甚瞭解，對「奪權」，尤其是奪縣領導的權，還沒有發生很大興趣。

但是，有人有興趣。1 月 22 日，平定縣委機關的「七一」、「紅旗」戰鬥隊和縣銀行的「盡朝暉」戰鬥隊以及由幾個工廠的革命造反派所組成的聯絡總部，對平定縣委、縣政府奪權。

在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的時候，平定縣的領導層基本上處在不知所措的窘境中。其所設計的運動方法，也不外乎是遵循慣例，站在領導的位置上，領導群眾，像以前歷次運動一樣，鬥爭一些「階級敵人」。因此，在中央「五·一六通知」下傳之後，平定縣在 5 月 23 日縣委擴大會議上通過並下發了《關於在全縣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安排意見》，對這次運動作了部署。這時候，不少平定縣直機關的人都在外地搞四清。原縣人事局幹部翟治璧的回憶，道出了不少縣領導在轉型期的被動與苦衷：

1964 年 10 月 11 日，平定組團去昔陽縣搞四清。當時帶隊的團長是由根棟，副團長之一是賈正杞。1965 年去介休搞四清，介休縣委書記王健帶隊。他本來要來平定，但未來成。¹³1966 年平定組織四清工作團去孝義搞

¹³ 根據陳桂芳的回憶，這時的王健應該已經是平定縣委書記。王健於 1965 年 1 月調任平定。當然也可能是在調與未調期間。

四清，賈正杞帶隊，有 800 人，其中包括整個劇團。當時晉中 20 個縣，分批進行四清。最早的是昔陽、榆次，然後是介休、孝義等。1966 年 11 月 9 日文革開始後撤回 300 人，回縣參加搞文革。剩下的近 500 人組成 2 個工作團。當時造反造的厲害，四清也搞不下去了，地委決定工作團撤離。平定團於 12 月 15 日和 18 日分兩批全部從孝義撤回。3 輛解放牌卡車將他們拉回來，先開到太原，晚上 9 點回到平定。回來以後全縣正在展開學習綿縣的活動，學習周明山，村村搞紅海洋，縣城裡也一樣。周明山當時是山西綿縣的一個村黨支部書記，後來當了縣委書記、運城地委第二書記。12 月縣裡成立文革辦公室，由張裕財、趙俊負責。下設若干組。我是農業組辦事員，負責對農村問題的處理。農業組負責人是史重。這個機構後來被造反派砸掉了，說它是官辦文革。

文革一旦發動，原先的工作就一概停了下來，以試圖跟上文革的步伐。這一年的 12 月，縣裡還成立了「平定縣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儘管他們上行下效地召開會議、建立機構，以示對這場運動的重視，但對運動的目標方向，其實是心中無數的。當奪權風暴來臨、運動風向大變的時候，他們也確實感到不知所措。奪權開始後，縣領導層為了不至於使機構癱瘓，曾經搞過一個「三線」機構，以應付未來之需。當時在縣政府機關擔任幹部的翟治璧比較瞭解其中的內情。他回憶當時的情景是：

朱永他們去地委開會，說文革來勢兇猛，你們書記、縣長是主要衝擊對象。為了保持上下級聯繫，你們回去安排一下，選擇群眾意見不大、社會影響小的中層幹部，抓日常工作。這些人是二線。不過，隨著運動的發展，這些人也會受衝擊，還應選擇一些能說會道、忠厚老實能幹的一般幹部抓日常工作，並保持和地委的聯繫。這些人是三線。

1967年1月4日、5日確定了二、三線的事情，6日工廠的造反派就把縣長揪走了，鬥了四五天後就把朱永搞病了，送到縣醫院。二三線的事情沒有搞成。在戲院開批鬥會時，把朱永用擔架抬到會場上批鬥。辦公室主任董會青給遞了碗水。臺下的造反派就喊：「保皇派滾下臺！」董會青說，「那還不讓人喝水了哩？」批鬥會結束後，當權派沒人管了。政府的幾個人才把他攏回人事局樓上。晚上我們幾個人偷偷叫上王寶壽大夫給縣長輸液。老幹部賈洪舉用八號鉛絲把通道的兩道門擰扎實，怕人來搶。

1967年2月20日，二、三線名單在造反派的傳單上披露。二線是張鐵鎖、張裕財，三線是連振玉，還有翟治璧、康雨春、韓有信等。造反派說名單是從當權派那裡得到的。傳單上說我是朱永的紅人，是張鐵鎖的掌上明珠，文革以來鬼鬼祟祟，心懷鬼胎，別有用心，不參加政府文化革命，鑽在縣委組織部不知道搞什麼。

這張傳單是專門弄我的，還配著三幅漫畫。一幅是「早就知道有我哩！」一幅是「人事局權力數我大！」另一幅是「局長也得聽我的！」至此，我就被孤立了。機關的人們也不敢同我接觸了。

根據這些回憶，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地委和縣委，對文化革命都心中無數，布置二、三線也很倉促，甚至連一個正式的任命都來不及，只能「把名單報上來」。因此，當突如其來的奪權到來時，平定縣的領導機構很快便被摧垮了，失去了運轉能力，翟治璧說：

1967年剛過陽曆年，平定機關內農業局的幹部造王慶榮的反。1月18日，縣委派我去地委組織部送報告，準備要撤王的職。但是省委在1月12日已被奪權，地委也被衝擊，無法工作了。等了幾天無結果。23日早上我回到人事局時，看到朱永睡在我的床上。我開玩笑說，「當權派得手（舒

服——平定方言）哩吧」！朱仲仲懶腰說：「這就好了。權被奪了，沒事了。讓他們日到圪哇〔糊弄去吧——平定方言〕」。

縣政府的主要領導「仲仲懶腰」，貌似無官一身輕，其實自然也是無奈。一場奪權風暴，頓時縣政府領導權力它移。而晉中地區所安排的一線應付運動、二線指揮日常工作、三線作預備隊的設想，也全被衝垮了。關於二三線的安排起源何在呢？郝鼎丞說：

「文革」後期，我見到以前的縣委組織部長張鐵鎖。我問他「文革」中把我們弄成二三線是怎麼回事。為什麼我們挨了整都不知道為啥。他說，那是省裡通知各地市縣的書記和組織部長在省裡晉祠賓館召開緊急會議，考慮到「文革」來勢迅猛，為了工作不受損失，讓各家回去迅速安排一下，如果一線的領導受到衝擊，二線的就出來堅持工作，三線也是這樣，以此類推。晉祠會議後，我們返回晉中，地區又作了安排。我們連夜趕回縣裡，開了常委會，確定了人員名單，第二天就報送地委了，誰也沒有來得及談話，而且哪一個領導也沒有給外界透露過這事。據說是晉中被奪權後抄了組織部長的家，發現的名單。

顯然，省、地、縣領導仍然在想著如何維持秩序，維持領導，維持工作。但是文革的發展遠遠超出了他們的想像。

那麼，「一·二二」奪權到底是怎麼回事呢？由於時過境遷，當時的很多細節至今不甚明白。但是從平定文革主要當事人之一、縣級幹部楊志忠的遺物中的一份傳單以及其他人的一些回憶中，我們還是可以看到這個事件的概略。根據楊志忠保留的這份由「平定總團資料組」於 1968 年 10 月 5 日所撰寫的《關於平定縣所謂一·二二奪權的真相》的傳單所述：

1967年1月18日，「《平定縣革命職工紅色造反兵團》（以下簡稱「職工兵團」）成立。他們串聯了當時平定地區除了《平定縣革命造反聯絡總部》（以下簡稱「聯總」）以外的五個兵團、七個戰鬥隊，即：「平定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總部」、「平定工農兵革命造反兵團」、「山西紅衛兵團平定分團」、「全國小學革命教師紅色造反兵團」、「山西兵團平定縱隊總部」、「平定衛東一中雄鷹戰鬥隊」、「山西紅色造反聯絡站平定分站」、「平定醫院紅岩戰鬥隊」、「平定醫院紅衛兵造反隊」、「平定紙廠赤衛隊」、「首都東方紅紅衛兵戰鬥兵團山西總部平定分部」、「平定衛東一中11.3紅衛兵」等組織研究確定於1月24日召開「控訴揭發」大會。

但形勢發展完全出乎他們所料，使得他們要提前採取行動。1月22日下午，縣委「紅旗」戰鬥隊郝××（汽車司機）為「聯總」去陽泉接「紅炮手」成員。在從陽泉返往平定的路途，郝××從「紅炮手」和「聯總」的議論中，得知了「聯總」當晚八點要奪權的消息。回到平定，郝××就立即告訴了「職工兵團」的連振玉等人。後者決定搶先一步奪權。他們立刻打電話、寫封條、藏公章。他們將縣委、人委上下兩院（注：指當時機關所在地，其時縣黨政機關使用的是平房。——作者注）的辦公室、宿舍，都用蓋有「平定縣人民委員會辦公室」公章的封條封閉了，當權派也安置在叫著方便又不易被人發現的地方，各個兵團和戰鬥隊的大部分負責人和部分戰鬥隊員也集中起來了。18點30分，「職工兵團」負責人連振玉等當眾宣布說：「朱永、鄭忠華一小撮，早已癱瘓，既不能領導革命，又不能領導生產，我們要奪縣委的權。」

接著他們就把副縣長以上、縣委常委、委員等在機關的當權派全部叫出來，讓朱永、曹黑小、賈正杞、張子福、張鐵鎖、高連冬、趙生堂、楊志忠（鄭忠華到了太原）等一個一個往他們準備好的一份「交權書」上簽了字。然後，把這些當權派們轉移了出去。

將近 19 點的時候，「聯總」的隊伍趕來了。「聯總」隊伍剛至現場，「職工兵團」的人就喊起來了，「我們勝利了！」「縣委、人委大權我們五兵團、七戰鬥隊從 19 時整正式接管了！」還有人喊「誰要再奪權，誰就是從無產階級手中奪權，誰就是反革命！」隨之立即讓有線廣播開始廣播。

但是「聯總」隊伍衝進大院，卡住大門，辦公室門口站上人，氣勢洶洶。兩家當時針鋒相對，從 19 點到 23 點，整整談了 4 個小時。談判的結果，總算達成協議：由兩家共同接管。23 時以後，由兩家各派的 6 名代表再行查封。

當時還發生了一個搶奪「中國共產黨平定縣委員會」鋼印的故事，足見當時造反派奪權時的混亂。鋼印是由機要員保存的。當兩家代表查封到縣委機要室時，「聯總」的代表突然增多，又發現鋼印是從機要員個人身上掏出來的，便就此爭吵起來，質問「為什麼把公章裝在個人身上？」這時，「聯總」郝生和、郭建芝等，趁大夥不備之際，一把將鋼印奪來，扭頭就跑。「聯總」把鋼印搶走了。人們可能以為只要鋼印在手，權就奪過來了。隨後「聯總」發表了《通令》和《告全縣人民書》，發出時間是 1967 年 1 月 23 日 3 時 50 分，也就是「聯總」奪權或者說搶權的時間。

「職工兵團」的人見鋼印被搶，也無可奈何。第二天（1 月 23 日），連振玉主持了五兵團、七戰鬥隊頭頭們開會，決定成立「總指揮部」（即「總指」），開始了兩個多月的對立。

但是奪了權誰去掌權，掌了權去幹些什麼，該設立什麼樣的「革命」機構……卻是一本糊塗帳。據文革中期流傳的一個故事，說縣委機關造反派的一個頭頭奪權後，把縣政府的銅印摟在被窩裡睡了一個晚上，卻沒有睡著，興奮得一個勁地念叨「可算當上縣太爺了」。故事雖說有些誇張，

卻並非空穴來風。下面是一些當時參與奪權的人的回憶，多少可以增加我們對這個混亂過程的瞭解。平定中學高三班的學生戎崇璽這樣回憶：

一·二二奪權，我奪了廣播站的權，李愛華是廣播員。〔我們〕把華沙車〔一種汽車商標名稱，縣委用車〕推回學校放在後操場。

這位當年造反學生的親身經歷，很能說明奪權運動的盲目性。另一位初中學生王新民也參加了這次奪權。他回憶道：

一·二二奪權我參加過，那是聽說人家奪權了，我們說奪權咋，誰想奪誰就奪，我們就去了。我從院牆上趴進去，見裡邊盡是人，我就去打開門，讓同學們進來，兩群人就混在一起了。至於誰拿走那章記不得了。奪權的時候，大串聯還沒有結束。我因為參加長征隊走的早，回來的也早，所以趕上了。

翟治璧形容當時奪權的草率：「機關院裡打了一晚上架後，成立了大聯合部，奪了權」。趙成秀在他的回憶文章〈我的文革歲月〉中寫道：

1967年註定是中國的一個多事之秋。……1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指出：「這是毛主席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重大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一開始就是一場奪權鬥爭。這個『文化大革命』，就是發動億萬群眾自己起來解放自己，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只有展開這樣偉大的群眾運動，展開一個群眾性的全面奪權鬥爭，才能徹底解決無產階級奪權問題。」強調指出，「展開全國全面的奪權鬥爭，勝利完成毛主席交給我們的偉大歷史任

務。」

黨中央的指示，上海的榜樣，推動了全國各地的奪權熱潮。平定的氮肥廠、印刷廠等十四個革命造反戰鬥隊迅速聯合起來，成立了平定縣革命造反統一行動聯絡總部（簡稱聯絡總部），並發表了「成立宣言」，明確指出，鬥爭的鋒芒就是指向平定縣委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並且於1月22日，奪了平定縣委的權。史稱「一·二二」奪權。

雖然「聯合總部」是以工人為主體的革命群眾組織，但由於領導者的急功近利，沒有充分發動群眾，沒有得到解放軍的支持，也沒有成立什麼權力機構，只是匆匆忙忙奪了縣委的一個印章，因此，註定是一場群架式的鬧劇。曾目睹過這場奪權過程的紅衛兵郝忠德對「一·二二」奪權有這樣的評價，他說：

一·二二奪權是以平定化肥廠工人為主體、聯繫農民及其他各個階層和縣機關造反派幹部，受上海「一月革命」風暴影響的一次群眾自發行動。它顯示的實際意義，是摧垮了舊的官僚機構，同時也給政治體制的革新創造了新的契機。但由於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準備不足，在奪權的過程中表現出認識上的盲目性和行動上的草率性，這次奪權只存在了64天就夭折了。但是，這恰恰又反證了這次奪權的群眾自發性，即不帶有任何複雜的政治背景，更不是「攜私篡奪」，純粹是群眾運動的必然結果。這次奪權更深刻的意義是對舊的政治體制的革新創造了新的契機。破舊才能立新。但它和歷史上那些新事物一樣，剛開始時，得不到認可，遭受指責譏笑諷刺挖苦以至仇視。畢竟，權力是和利益密切相連的。沒有現成經驗借鑒，沒有新的模式參考，奪權者遇到的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大課題。平定的一·二二奪權被又一股政治勢力進行了反奪權，致使它僅存了64天就夭折了。

這次的奪權被後來的「兵團」認為是氮肥廠的郝守映和機關的造反派搶章奪權。「一·二二奪權」後，「平定地區革命造反聯絡總部」發表了奪權的通令，要求「資產階級當權派在革命組織的監督下進行工作」。

但是，他們奪權的合法性也面臨著其他組織的挑戰。於是，他們從 23 日起到 2 月 21 日止，連續發布了幾個通告為自己辯護。他們發布的通令（1），無標題；通令（2），「告全縣人民書」；通令（3），「揭穿縣委的大陰謀」；通令（4），沒有標題，解釋了搶章的經過；通令（5），「告全縣人民書」；通令（6），「揭開『七一』隊的內幕，看保皇小丑們是如何為他們的主子賣命的」。

奪權的風潮，也刮到縣裡的大小單位。以縣糧食局為例，王增榮的《糧食工作回顧》記述道：

1966 年 12 月，縣局（指本縣糧食局，下同——作者注）研究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提名岳在華為主任，劉存厚為副主任，還有委員若干人，在職工大會討論通過，並正式開始辦公。當時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是執行中央指示，沒想到後來竟成為自己的罪狀之一，說這是「保皇的御用文革」。

1967 年中旬〔原文如此，疑是遺漏「1 月」之意，轉抄者注〕，改選了文化革命委員會，說：原來的文革是走資派一手策劃的御用官辦文革。名為文革，實為保皇機構，必須砸爛，改選後的文革主任為孫連義，副主任焦致富，還有委員若干人。

1967 年 1 月 10 日，即我們從榆次返回平定的第二天早上，在我的辦公室門上貼上了勒令，大意是：今天上午十點前，走資派王增榮滾出辦公室。我即移居在小窯洞內，王子召、蘆和也同時搬進。我們三人住在一起。第二天我的辦公室門上貼了封條，造反派隨即組織人員，清查「黑材

料」。

1967年1月22日晚，正是縣政府奪權的當晚10點左右，李魁綱去我們住的小窯洞和我們說：現在形勢很緊，政府正在奪權。咱們單位如果不組織奪權，外單位的群眾也要來奪。文革領導研究，今晚咱也組織奪權。全體總支委員都要在奪權書上簽字，所有的公章都交給群眾組織掌管。當時我想了一下，不奪權也無法工作。一些群眾組織，不管政策規定如何，無理要求解決糧食或糧票，喊著打倒走資派，又要讓走資派解決問題，實在無法對付。所以魁綱一說奪權，我非常同意。就在這天深夜，召開了職工奪權大會，並將住在機關的總支委員揪在會議室進行奪權簽字。在場的黨總支委員都在奪權書上簽字畫押，把公章當場交給群眾。

就在政府奪權的第二天晚上，據說是聯合總部又要搞反奪權，聯合總部和已奪權的群眾組織，雙方各有準備，全城氣氛相當緊張。已被奪權的副縣長張子福，怕奪權雙方爭執起來無法收拾，發生嚴重問題。怎辦？三十六計，走為上策。這天下午，他悄悄溜了出去，直到晚飯也未回機關。一些感情深厚的同志生怕出了問題、發生意外，便四出尋找。十點鐘左右，政府辦公室副主任董會慶來到我住的小窯洞問：「張縣長來過沒有」，我說：「沒有。」董走後不久，張俊祥又來到我住的小窯洞說：「現在政府在搞第二次奪權，形勢十分緊張。為了安全一點，讓張縣長在你們這裡住一晚上」。我想，我們已經奪權，現在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我建議，找孫連義和焦致富，他們一定會設法安排的。這才找到孫連義把張子福送到城關糧站站長張全璋的住處安歇。第二天下午天黑後，才把張子福送走。沒想到這樣一件小事，竟轟動了全城，引起了很大的風波，說糧食局包庇走資派，什麼「革命無罪，造反有理」、「保皇有罪，罪該萬死」的大幅標語貼滿了全城。

奪權以後，居住在城關範圍的職工，相互選擇觀點一致的對象，自主

結合在一起，組建了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隊。除了個別有問題的（如保皇派）職工外，大部分都加入了這個組織。原來的紅衛兵組織，也就自然消失，不復存在。……

奪權之後，走資派還是要被揪鬥。或許這是保證奪權勝利的措施吧。王增榮接著說道：

奪權以後，差不多每天不是晚上便是下午，我被揪鬥批判。批判會的形式和別的會不同。會場布置的森嚴壁壘，會標和標語口號，都用白紙墨汁書寫。一進會場就感到一股陰氣襲人。呼口號是揪鬥會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是提高會議威嚴的一種方式。它不僅能使會議開的嚴肅緊張，而且能使會議在激憤的時候，喊幾句口號緩和下來，也可以在會議消沉的時候，喊幾句口號提起精神。因此，呼口號是揪鬥會必不可少的內容。所以每次揪鬥會都必須在會前安排幾個腦筋反應快的人，專呼口號。

揪鬥會的程式，多數是在開會前，把被揪鬥的對象叫來，安排在會場附近的房間，或者在會場門口等著。會議宣布開始，首先是呼口號，即：「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某某揪出來」。口號在連續地、重複地喊，這時被揪鬥的人才能低頭步入會場。走資派進入會場後，其口號是：「走資派低頭認罪、抬頭示眾」，然後，繼續呼口號。

第一排口號是：從中央到本單位，一連串的打倒，即：「打倒劉鄧陶！打倒彭羅陸楊！打倒衛王王！打倒任王張！打倒郭朱鄭！」（這是簡化的口號，有時要一個一個名字地喊），打倒孟辛田！打倒王增榮！打倒保皇派！保皇有罪、罪該萬死！」

第二排口號是一連串的萬歲：「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我們最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

萬歲！萬歲！萬萬歲！」口號多得很，有時要喊十幾分鐘才能喊完。

口號呼完後，造反派要向走資派控訴、或者訴苦、或者揭發批判，然後走資派檢查。有時是直問直答，即：造反派揭一個問題，走資派答覆或者檢查一個問題，名曰「拼刺刀」。最後是造反派頭頭講話。揪鬥會的空氣始終是緊張森嚴。不論會議時間多長，走資派必須站在臺上的一旁，低頭直立。

走資派們自己如何應對這個老革命遇到的新問題呢？王增榮寫道：

奪權不久，郭存華（原中共平定縣委書記，文革前夕剛被調離，文革開始後被揪鬥回平定——本書作者）被捕，住進了他親自批准修建的監獄。這時我又產生了一種思想：走資派是不是都有住監獄的可能？自己也不得不做好準備。1967年的春節，是西曆2月9日。走資派不准回家過年。當時我已是六口之家，妻子是農村婦女，孩子們還很小。萬一住了監獄，這一家人該如何生活？無奈等待過了春節，才偷偷地捎了個口信叫來我妻，把可能發生的不幸，萬一住進監獄，一家人如何生活做了具體安排。這天我去廁所，正碰上回局參加會議的史守信。他把聲音壓得很低，幾乎無法聽清，對我說：「聽說你把我嬸叫來啦（我和史是一個村的，還有點親戚關係），現在情況如此緊張，你不怕別人又說你搞什麼通風報信？」我把意圖告了他，他說：「少住幾天快回去吧！」我說明天就走。就這樣他也沒有敢去我的住處看看。可見形勢是如何的緊張，走資派又是多麼的擔心自己的處境。

1967年1至4月是揪鬥走資派最緊張的階段。在這個階段，我除了參加揪鬥會和準備檢查材料外，就是參加勞動補麻袋。……

1967年2月28日，糧工戰鬥隊鉛印了近七千字的長篇傳單，據說印

了三千份。傳單的大標題為：「打倒保皇勢力，踢開前進障礙，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勝利。」……

1967年3月19日，縣局文革委員會發出通知，要求各站每三個人左右產生一個代表，回縣局參加商討大聯合會議。不久即召開了這個會議。通過討論協商，成立了糧食系統「三二八」大聯合總隊。原來的戰鬥隊仍繼續保留，作為「三二八」大聯合總隊的基層組織。在大聯合的基礎上，於1967年3月28日成立了糧食系統革命委員會，王子召為主任，趙晉如、岳在華為副主任，還有委員若干人。但由於當時成立革委會的條件還很不成熟，造反派內部的意見分歧很大，有的群眾組織根本不承認這個革委會。尤其是，掌握全縣黨政財文大權的縣人民武裝部和當時縣裡主持工作的臨時機構都沒有批准。因此，這個革委會既沒有掛牌，也未刻章。不管批准與否，這個革委會立即主持了糧食局的全部工作，並繼續沿用糧食局的舊章。由於主管部門沒有批准，內部又不統一，因此，指揮工作便成為「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

平定縣的第一次文革奪權，就這樣結束了。但是，當時間把這一切都歸入歷史後，當四十年雲淡風輕後，回眸再望，其幼稚、草率，是顯而易見的。和省裡的奪權相比，縣裡顯然沒有省裡劉格平、張日清那樣的組織與領導，也沒有上級機構的指令和授意，註定不會得到新的官方的認可。所以即使奪權了，縣政權仍然處於癱瘓狀態。這就註定了平定縣還要再來一次奪權。

再「奪權」：文革高潮 與平定第二次奪權

「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平地又是一聲春雷，在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切關懷和支持下，山西省無產階級的革命組織和代表們，聯合起來，把省委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竊取的種種大權奪回來了！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在山西省重新掌了大印，當家做主了！

這是繼上海市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奪權鬥爭勝利以後，在一個省的範圍內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鬥爭的偉大勝利，這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這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新的偉大勝利！

山西省的革命造反派，為全國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的奪權鬥爭創造了新的經驗。山西省委內革命的領導幹部，為全國革命的領導幹部作出了良好的榜樣。山西省軍區的人民解放軍部隊，為全國人民解放軍指戰員樹立了鮮紅的旗幟。

——《人民日報》社論〈山西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1967年1月25日¹

1 《人民日報》編輯部，「山西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1967年1月25日。

平定縣的第一次奪權之所以沒有被承認的原因之一是沒有解放軍的支持。如上面的《人民日報》社論所說，山西省奪權的經驗之一是在造反派和革命幹部之外，還要有解放軍的支持與參加。只是在平定「一·二二」奪權時，這個經驗還沒有鋪開。上面的社論是 1 月 25 日簽發的，平定奪權則是 1 月 22 日。就在平定第一次奪權後的第二天，即 1967 年 1 月 23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才發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解放軍的「三支（支左、支農、支工）兩軍（軍管、軍訓）」工作才正式拉開帷幕。這是因為，在進入 1967 年之後，從中央到地方，在奪「走資派」權之後，在權力配置與使用上一片混亂。原來的領導機關陷入癱瘓，而造反派派系林立，互相爭鬥，掌了權的人沒有能力控制局面和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平定的現狀就是這個問題的具體體現。再加上公安局、法院、檢察院這些國家機器也已經失靈，因此，打人、砸物、搶東西、抄家、亂抓人成風，當時的術語叫「打砸搶抄抓」，人民正常生活和社會正常秩序遭到了破壞。

當時的動亂主要是政治動亂，是政治上對人的侵害——這時候，如果沒有一支力量來穩定局面，局勢的發展將超出文化大革命發動者預期的軌道，「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將成為泡影。而自從 1964 年以後，在學習雷鋒、王傑、麥賢德、劉英俊等一批先進人物的運動中，在學「毛著」的熱潮中，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大樹特樹毛主席的絕對權威」的狂熱中，掌管著部隊的林彪作為「文化大革命」的「副統帥」的地位，也更加使得解放軍在社會上的威望日益提高。就連中央的指令，都是由《人民日報》、《紅旗》雜誌這兩個中共中央媒體和《解放軍報》聯合發出。這樣，由軍隊出面來對一時形成的權力「真空」進行彌補，對「好的很」的大亂局面進行控制，就在一些堂皇的辭令下展開了。

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平定也不會例外。1967年2月13日，一支荷槍但未必實彈的民兵隊伍昂然在平定城裡街出現。這支民兵，就是當時名顯於平定的石門口公社西郊大隊民兵連。在文革前，在「大比武」的1963年至1964年，西郊民兵是平定民兵武裝的標杆。而此刻，這支武裝還有另一個名稱，叫「紅色造反兵團」。「紅色造反兵團」本來也加入到社會上造反聯盟「聯絡總部」的，但現在，他們退出了「聯絡總部」，卻也並不去加入機關裡造反者的聯盟「大聯合指揮部」。他們遊行的口號是「砸爛聯絡總部」、「摧垮大聯合指揮部」，對兩家都不偏不倚一視同仁一律要掃而蕩之，似乎有另起爐灶的意思。而他們竟然能動用武器公開示威，顯然不是心血來潮就敢為之的。種種跡象表明，此造反兵團來頭不小。據經歷過此事的本縣文史學界人士敘述，甚至一些本縣公開出版物明載，此事是由平定縣人民武裝部支持的。

第二次奪權

西郊「紅色造反兵團」特立獨行的舉動，卻很快便形成一個新的造反組織核心。大部分的群眾造反組織立即起身向它靠攏。《西郊村》一書，記錄了西郊村民兵參加奪權的過程：²

1967年1月22日在上海1月風暴的影響下，縣人委機關的造反派組織奪權。縣委縣人委機構癱瘓。3月28日，村裡組織武裝基幹民兵，參加了縣人武部組織的三結合造反派，在縣裡再次奪權。40多名武裝民兵，在民兵隊長郝宏祥（兵團領導）的帶領下，身背槍支、全副武裝，林立遊行車隊，高呼「造反有理」等口號，坐車駛向縣委辦公大樓，向縣委奪權。五月，西郊生產大隊的黨支部和村委會，也由貧協和貧下中農造反派的共

² 見前引郝志東、郝志剛（著）《西郊村：一個華北農莊的歷史變遷》，第162頁。

同組織「紅色造反兵團」接替。他們從此領導大隊生產，領導西郊村文化大革命。大隊主任穆永生、書記趙廷瑞都靠邊站。從此，西郊大隊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和生產工作都由「紅色造反兵團」領導。

這裡的3月28日的奪權，就是本章要敘述的第二次奪權。3月5日，由西郊村「紅色造反兵團」、縣委機關「東方紅戰鬥隊」、「星火燎原」、「政法兵團」等13個組織發起，成立了「平定縣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聯合籌備委員會」。這就是在平定文革史上頗有爭議也影響很大的「籌委會」。

在成立後的日子裡，對它持維護態度的一派，稱之為「紅色籌委會」；而反對它的一派，以它名稱的諧音稱其為「臭歪壞」。它的成立，並非像「聯絡總部」和「大聯合指揮部」那樣，真正是由造反的人們自發自由自己組織起來的。儘管仍舊沒有正式的文件和當事人的親口敘述，但從其建立時的正規性和動作的緊湊性上分析，這是一個有指揮、有目的的組織。

2000年，平定縣史志辦公室編輯出版了《中國共產黨平定縣歷史紀事》，此書記載了1967年初發生在平定縣的幾件「文革」大事：

2月13日，平定縣人武部按照中共中央1月13日發出人民解放軍「支左」的決定，打出了「支左」的旗號。由於人武部的支持，以西郊農民為主體的「紅色造反兵團」從「聯絡總部」退出來，並在縣城進行武裝示威遊行，口號是「砸爛聯絡總部」、「摧垮大聯合指揮部」。各個群眾組織都想得到解放軍的支持，向「紅色造反兵團」靠近。一部分縣級領導幹部站出來作檢查，表示支持「左」派組織。

緊隨其後，3月10日，《平定小報》社、平定縣廣播站、平定印刷廠同時被本單位的造反派奪權。這是平定縣當時僅有的三家輿論單位，是縣

級政權的喉舌。如同現在世界上那些突然政變的國家一樣，平定縣的輿論工具，成為奪權優先奪取的目標，而三家媒體一日之內同時奪權，這決非是巧合。

在國家機器中，軍隊、警察、監獄、法庭，都是必不可少的構件，當時，流行著「副統帥」林彪的一句「名人名言」：政權政權，鎮壓之權。平定縣的「鎮壓之權」就是公安局、檢察院和法院。3月25日，這三家機構內部的造反派，也同時奪權。奪權之後，很快成立了「無產階級專政委員會」，三個法律機構合了夥。合夥後的這個機構，也不再是奪權前的「政法兵團」那樣的群眾造反組織，而是一個可以行施「鎮壓之權」權力的准行政部門。這個部門成立的同時便加入到籌委會中來。此時的籌委會，就不用再籌備，它已經具備了政權機構的力量。

在緊鑼密鼓聲中，1967年的3月28日，這個在平定文革史上占有舉足輕重位置的日子來到了。

三·二八奪權是在軍隊介入並且領導下進行的奪權。這次奪權，不再像前一次那樣小兒科，不再搶印奪章，不再接管舊的機構。據《中國共產黨平定縣歷史紀事》記載：

3月28日，平定縣「籌委會」在縣委大院內召開由各造反派組織參加的奪權大會，宣布奪了縣委、縣人委的「黨政財文大權」並批鬥了原縣委書記、縣長、副書記等領導。這次奪權否定了「一·二二」奪權，得到了晉中核心小組的承認和支持。奪權後，原縣委、人委領導被排斥在領導班子之外，副科級以上領導幹部一律靠邊站，強制他們參加體力勞動，接受批判、審查，……。



圖 8-1 平定縣無產階級專政委員會成立

資料來源：作者收藏。

奪權，包括奪取政權，也包括奪取黨權。以上海「一月風暴」為代表的奪權，主要指奪取政權。政權奪下之後，剛開始各地並沒有統一的稱謂。但在奪得黨權之後，卻有一個基本在全國上下各級都通行的稱謂，叫「核心小組」。這個名稱，前半部分「核心」來自《毛主席語錄》開篇第一句「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而「小組」則是因為在中央有一個權力非常大、大到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可以隨意發號施令而不必得到黨的領導層集體討論決議的、非臨時的「臨時」機構——中央文革小組。這就是中共黨的組織這個新的名稱的由來。

當時，山西核心小組的組長是劉格平，副組長張日清。按照慣例，要

奪取政權，沒有黨組織的承認是絕對行不通的。「一·二二」奪權沒有權威力量的指令，完全是一些先起來造反的群眾組織看樣學樣性之所致的行為，當然不會得到上級黨的組織——核心小組的承認。

而籌委會有這個能力。平定中學高三班學生潘佩經這樣回憶：

串聯回來以後，我在家住了幾天就到了學校。我就參與了三·二八奪權了。三·二八奪權是武裝部牽的頭，參加的有駐岩會 4757 部隊、駐娘子關 823 部隊，他們支持西郊農民的造反組織，和平定中學、平定師範、平定郵電局等一共十三個造反組織，一舉奪取了舊縣委、縣人委的黨、政、財、文大權。之後成立了籌委會，籌委會常委由 9 人組成，有武裝部的政委李金映、部長張光輝，革命領導幹部代表是楊志忠、李六孩，學生代表平定師範馮拉科、平定中學岳智明，公檢法代表曹銀福，民兵代表任芝。

楊志忠，時任平定縣人民委員會副縣長。李六孩，時任中共平定縣財貿政治部主任。三·二八奪權是由平定縣人武部牽頭，這一點潘的回憶得以證實。另外根據劉懷祿的回憶：

三·二八奪權是三結合的奪權，三結合就是有人民解放軍代表、革命領導幹部和革命群眾組織代表。晉中地委承認了三·二八奪權，這是 1967 年的事。奪完權就成立了籌委會。

據岳智明回憶：

解放軍不支持一·二二奪權，認為他們是保守派，認為我們這個紅衛兵總隊比較純，沒有原來的當權派插手。解放軍來找我，讓我參加三·

二八奪權，參加三結合的籌委會。

據朱存業提供《山西省平定縣兩年多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重要大事記》所述：

1967年3月28日，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粉碎了「一·二二」假奪權，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平定人武部、平定駐軍支持下，經晉中軍分區、晉中核心小組批准，一舉奪了縣委走資派郭存華、史蘇民等一小撮黨內走資派所劫取的黨、政、財、文大權。4月1日召開慶祝奪權勝利大會，晉中核心小組、軍分區、〇總司發來賀電，昔陽、陽泉、壽陽、盂縣等縣派代表參加會議並講了話。平定駐軍497、935、4757、1242等部隊派二百餘人參加大會，並進行遊行。經晉中核心小組、軍分區批准，建立了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平定縣籌委會，委員十七人，常委七人，由李六孩（原縣委委員、財貿部長）任主任，常委有虞建國（駐軍政委）、張瑾瑤（全國人大代表、模範小學教師、山西省革委會委員）、李金印（人武部政委）、陳啟思（人武部副部長）、楊志忠（原副縣長）。

兩派對立

趙成秀在文章〈我的文革歲月〉中，討論了兩次奪權如何造成了兩派的對立。他認為是造反派的受挫與保守派的得勢，是兩派真正的分裂與對立的開始。他說：

「一·二二」奪權，造成的是平定的權力真空和革命造反派暫時的挫敗。「三·二八」奪權則成為平定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轉折。早在這一年的

3月5日，西郊紅色造反兵團、縣委機關「東方紅」戰鬥隊、「星火燎原」戰鬥隊、政法兵團等十三個造反派組織聯合發起，成立了「平定縣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聯合籌備委員會」（簡稱籌委會）。值得注意的是，籌委會的成立竟然是西郊這樣一個以民兵為骨幹的農民組織牽頭，而且這個組織曾在「一·二二」奪權之後，主動退出了「聯絡總部」，還在2月13日，荷槍在縣城進行了遊行示威，一面喊著「砸爛聯絡總部」口號，一面又大呼「摧毀大聯合指揮部」。這種「卓爾不群」的超然架勢，聯想到西郊曾是縣武裝部樹立的民兵標杆，不能不讓人懷疑，這一切都是武裝部暗中支持的。

顯然，造反派一方也已經感到對立面是得到解放軍支持的。趙成秀認為從表面上看，籌委會「似乎已經做到了革命群眾組織的大聯合和權力機構的三結合，但實際上存在著很多隱患」。他認為：

首先，籌委會的成立是以扼殺以工人造反組織為主體的「聯絡總部」為其前提，特別是用專政的手段逮捕了他們的負責人郝守映、荊履榮等，因而，遭到了大多數群眾特別是工人群眾的強烈反對。

其次，武裝部沒有以「一碗水端平」的姿態去對待所有的革命群眾組織，而是支一派壓一派，以救世主自居，頤指氣使。還有，那就是所結合的領導幹部素質底下，群眾基礎較差，缺乏代表性。正因為如此，所產生的籌委會很快遭到大部分群眾組織的反對，逐步失去權威性。

由此，社會上擁護「籌委會」和反對「籌委會」的兩大派組織逐漸形成。當山西省形成以擁護劉格平的紅總站和擁護張日清的兵團兩派對立的時候，平定的兩派對立也水到渠成。一派是以平定一中紅衛兵聯合指揮部（簡稱紅指）、平定師範紅衛兵司令部（簡稱紅司）為骨幹，加入了山西

革命造反兵團（簡稱兵團），一派是以平定一中紅衛兵戰鬥團（簡稱紅戰團）、平定師範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簡稱紅三司）、平定工人決死縱隊等為骨幹，加入了山西的紅衛兵聯絡總站（簡稱紅總站）。兩派無論在山西的問題上，還是平定的問題上都鮮明對立，因而矛盾也越來越激化。

趙成秀這裡對兩派形成的分析是非常到位的。他接著說：

從「一·二二」奪權，到「三·二八」籌委會成立，我都沒有參與大的社會活動，對其中的內幕也不甚了了，只是在學校參加對當權派的批判。隨著社會上對「籌委會」的質疑和反對聲浪的甚囂塵上，我們也加入了反對的行列。學校停課了，但我們一直沒有離開崗位。史文華很少在學校，而是常奔走於平定、陽泉和北京之間，他的姑媽是北京的市民，表哥是一所中學的老師，這樣他到北京瞭解北京和中央文革的情況就十分方便，對於全國，特別是北京文化大革命的形勢瞭解最多，也常常將北京流行在社會上的造反派小報帶回平定，這些小報常常會披露一些有關中央文革小組某某大人物的最新指示，還有中央領導哪些人被揪出來，哪些人的罪狀是些啥，我和馮二醜便選些對本派有利的吸引觀眾眼球的，抄到大字報上，然後貼到平定城裡街東門口新華書店的牆上，因為我們的消息具有新、奇、特的特點，常會吸引學生和市民的圍觀，為此，我們還十分得意，總算可以為自己的組織做點貢獻了。

不過這一次奪權不是一哄而起，而是由人武部、西郊造反派這樣的造反組織，並扶起幾個「革命領導幹部」——原來在縣委縣人委擔任一定職務、但又不是主要領導職務、作檢討作得快的幹部三者結合而成的一次奪權。奪權之後，其權力核心是由軍隊幹部和「反戈一擊」的領導幹部執

掌，造反的群眾組織的首領儘管也在權力機構內占有一席之位，但他們既不熟悉領導工作規則，又沒有資歷，仍然是配角。而且，由於這次奪權相對比較正規，具備了上邊宣揚的「三結合」式的奪權模式，便很快得到了上一級黨的組織——晉中地區核心小組的承認。

1967年4月18日，晉中地區中共核心小組批准平定核心小組成立，組長楊志忠，成員楊志忠，張光輝、張瑾瑤、李六孩、任芝。這意味著上級黨委對平定「三·二八奪權」的認可，也意味著平定中共組織的重新恢復。同年4月25日，平定縣核心小組設立「平定縣鬥批改辦公室」、「組織部」、「宣傳部」、「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

這是中共黨的組織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平定縣重新建立的機構。批准平定核心小組，也就同時承認了「三·二八」奪權。

各地政權的建立

三個月後，同年7月27日，平定縣核心小組批准張莊等11個公社成立公社核心小組。平定縣在經過數月的權力混亂後，新的權力機構初具雛形。王增榮《糧食工作回顧》談到縣糧食局當時的狀況：

1967年6月，……社會上的兩大派（即紅總站派、兵團派）觀點已經明朗化、公開化。矛盾的主要焦點集中在省、地、縣三級政府領導班子的人選問題上。支持誰、反對誰各抒己見、互不相讓。各派都想要以自己支持的人建立領導班子，對立情緒有增無減、愈演愈烈。

由於受社會上兩大派的影響，糧食局的職工也成立了兩大派組織。1967年8月6日成立了衛東兵團（屬紅總站觀點）不久又成立了紅烈戰團（屬兵團觀點）。原有的六個戰鬥隊（即：東風戰鬥隊、糧工戰鬥隊、東方

紅戰鬥隊、紅旗戰鬥隊、反修滅資戰鬥隊、烈火燎原戰鬥隊）除紅旗戰鬥隊、糧工戰鬥隊外，其餘都屬衛東兵團的群眾組織，受衛東兵團領導。

基層糧站除石門口外，其餘糧站也都加入了衛東兵團。紅烈戰團只有一個戰鬥隊即紅旗戰鬥隊。糧站也只有石門口糧站參加。糧工戰鬥隊雖然未參加衛東兵團，但它的觀點是紅總站觀點，受紅總站領導，但在糧食局內部又和衛東兵團矛盾很大。由於社會上的矛盾加劇，內部矛盾相對緩和，對我的揪鬥大大減少。……

三·二八奪權填補了「走資派」「靠邊站」被奪權後形成的權力真空，使縣一級權力機構能夠再次運行起來，並帶動各公社一級權力機構以至生產大隊一級權力機構恢復運作，在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時期，起到了一定的穩定形勢的作用。至於這個「籌委會」會將平定帶往哪個方向，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沒有嚴格的可衡量的具體標準。正如我們下面要敘述的，籌委會的成立，遠遠沒有能夠解決政權問題。之後所形成的擁籌派和反籌派兩大派群眾組織，其支持或推倒的種種理由，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爭權奪利的另外一場鬧劇與悲劇的藉口。

儘管如此，「籌委會」的建立，還應該說是平定縣權力恢復運行的表現。在軍隊的保護下，政權機構建立，社會秩序的穩定已見端倪。這次奪權，全面地操控了國家機器和輿論工具，控制了財政支配權，得到了上級黨組織的認可，是一次嚴密的權力轉移。

兩派對立加深

對於這次在平定「文革」史上占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奪權運動，即使時過境遷四十餘年後，當時的參與者們仍然各持己見。郝忠德在評閱本書初稿時撰文認為：

正當全國在上海一月風暴影響下，各地群眾紛紛聯合起來奪取當權派的權力時，平定卻出現了向群眾組織反奪權的事件。群眾組織奪權後，縣裡一夥幹部不甘心群眾起來奪了他們的權力，他們跳出來要與群眾運動展開一場較量，把失去的權力要奪回去。

西郊大隊民兵武裝遊行，吶喊砸爛聯絡總部、摧垮大聯合指揮部，這是一個農村群眾組織公然向縣城的群眾組織用武力威脅。同時也是一次宣告平定群眾組織開始分裂、公開對立的行動。這支遊行隊伍全副武裝，帶著濃烈的火藥味，拉開了平定群眾鬥群眾的序幕。這也告示著，舊的權力勢力糾集起來了，反奪權的行動開始了。

其實，誰代表舊的政權，誰代表新的政權，是說不清楚的。兩派都不可能代表新政權。在那個時空下，不可能有新政權的。無論誰上臺，都是舊政權的延續。這是被後面的發展所證實了的。郝忠德繼續說：

籌委會的成立是以一個跨行業的組織出現的，但它卻帶著濃重的權力色彩，還未奪得權力，就公開調動民兵，行使專政職能，開動輿論工具，顯然是舊的政權職能機器又重拼湊組裝開動了起來。

為了使反奪權合法化，又在舊的政權機器上加蓋了新的外罩。因武裝部屬軍政雙重領導，不足以代表軍隊的支持，又拉攏平定駐軍出面，並籠絡一些群眾組織，便以「三結合」粉飾登場。

三月二十八日，一切準備就緒，宣布奪權，逮捕了群眾組織領導郝守映、荊履榮，這個政權以專政群眾組織開始了它的統治。

權力一到手，對支持他們奪權的群眾組織只給了一些虛名，沒分給一點實權。但這些依附他們的人也知趣，自我安慰地以為，自己確實沒資歷，又不熟悉掌權的「業務」。這些參與反奪權的領袖人物卻像《紅樓夢》

中的賈桂，靠邊站著。駐軍將「三結合」的門面擡起來，使他們奪得了權力，也就完成了軍隊的使命，駐軍也被請回了營地。一切權力又回到這些曾經掌管權力的人手中。

上面提到的被抓起來的荊履榮敘述了自己的經歷，原文來自於我們對荊履榮先生的訪談。他和郝守映的被捕，用郝忠德的話講，是舊勢力的復辟，也能講得過去。但是，什麼時候有過什麼新勢力嗎？

67年1月22日奪權，我沒有參加。67年3月28日奪權後，縣裡成立了專政委員會，4月7日對準了劇團，就逮捕了我。我的罪是兩條：一、偷聽敵臺。那是在盂縣演出，盂縣劇團拉胡胡的，人家很有錢，好幾百元買了個收音機，讓我聽了，晚上我突然收到了臺灣的廣播，對文化大革命進行攻擊。第二天我就告了李守珍，李說偷聽敵臺，危險了，是犯罪了。我所以把他當成自己人，我隨便拿了人家的收音機聽了一下，告了他一下，隨便和他說了，從盂縣回來，他就貼了我的大字報。二、說我反大寨，攻擊陳永貴。劉鳳蘭舉報說，我說：「陳永貴的嘴，大的和驢屁眼一樣。」這樣就把我抓起來了。

我被抓進看守所以後，我就唱國際歌，唱紅燈記中李玉和的唱段，我唱得筋疲力盡，我就開始寫血書，我扳下席米棍〔平定話，席子上的葦皮，較薄，較鋒利——作者注〕，割破手指，方方正正寫在了衣服上，又用席米棍在看守所給的紙上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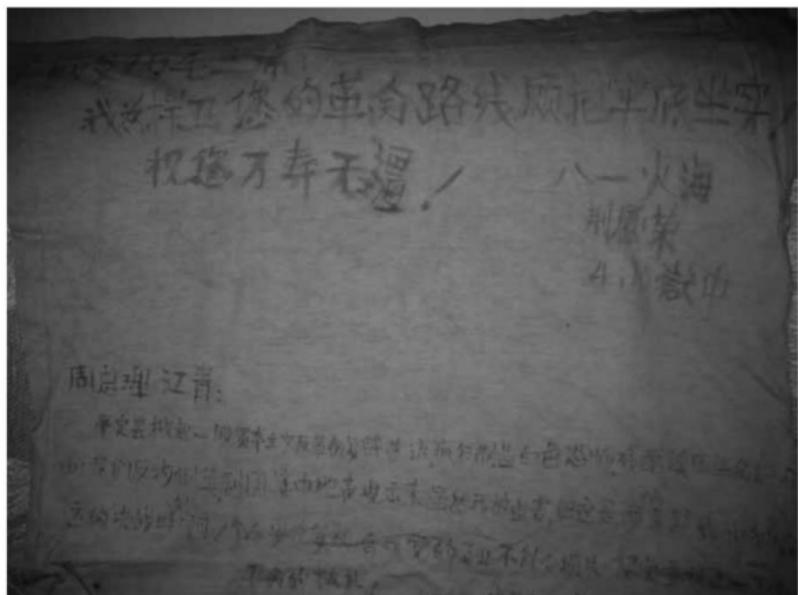


圖 8-2 荆履榮的血書 1

資料來源：作者自拍照片。

好幾天沒有吃東西，後來餓了。一開始早上一碗稀飯，中午一碗蘿蔔湯和一個窩窩頭，晚上一碗米湯。我出去一看，那些戴手拷和腳鐐的重刑犯人，早上是三兩面的飯，中午是滿滿一大碗飯，我向打飯的提出說：「我是造反派，要這樣對待不行，你要向上反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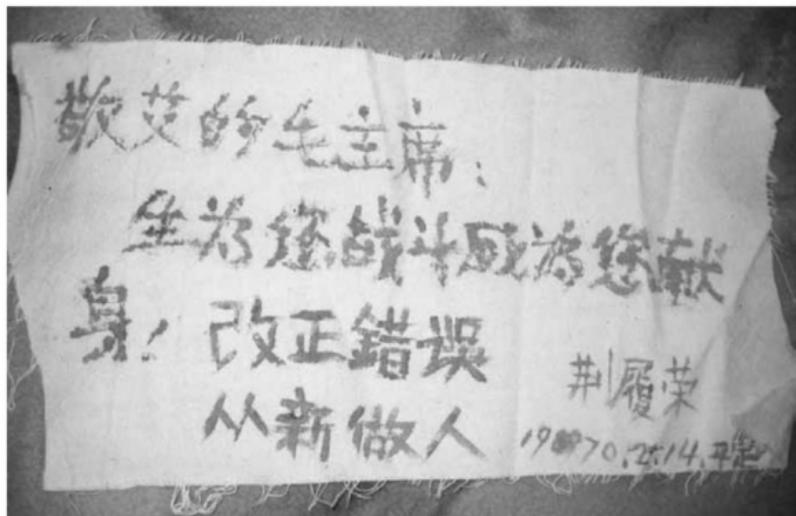


圖 8-3 荆履榮的血書 2

資料來源：作者自拍照片。

第二天早上，我過去一看，還是這樣，我端著打滿的稀飯，對著打飯的人的光頭，一下扣到他的頭上，只聽哇的大叫一聲，驚動了好多人，進來四個解放軍戰士，公安局的人也拿鎊子來了。我伸出兩隻手說：「鎊什麼了，來哇，我打他了。」

這樣的性格，這樣的脾氣，這樣的底氣來自於對毛主席和黨中央的忠誠。這一點，恐怕對立面也很難完全否認。他繼續說：

後來把我叫出來了，見了審訊科長，這個人是紅總站的，他說：「你這是弄什麼了？」我說：「餓的不行，不鬧就的讓餓死了。快給塊餅乾，給根煙。」第二天，給了我滿滿的一大碗，我高興的唱著：「為有犧牲多

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唱著起來走了。

在監獄裡我和郝守映互相傳遞消息，有一次，我們在廁所傳送時，沒有送出去，被發現了。就在全所都停了電，進行大檢查，把我的血書查出來收了。後來，砸爛專政委員會後，趙岐山才給拿出來，給了我。我拿著血書到大寨見了陳永貴。

荊履榮的觀點和郝忠德相同，認為三結合的籌委會是鎮壓造反派的。通過他們的話，兩派的形成也比較容易理解了。荊履榮說：

專政委員會是幹什麼的？專政委員會是籌委會的。省裡有張日清，成立專政委員會是代行公檢法，首先的任務是鎮壓造反派。平定專政委員會一成立，首先抓了我和郝守映。郝守映是「聯絡總站」的頭頭，我是「八一火海」的頭頭。當時聯絡總站的勢力，還不如「八一火海」的聲勢大。

67年，平定五家部隊，包括武裝部都支持紅總站。武裝部張光輝部長、李金印政委、這個人非常好，當時給我平反的話，說得都哭了，「我們確確實實錯了，真心給你賠禮道歉，你有什麼要求，我們都答應。我們盲目聽了別人的話，支持籌委會，成立專政委員會，支持三·二八奪權，支持錯了，犯了方向路線性的錯誤。」

錢團長、史政委，代表五家部隊在戲院為我召開平反大會。五家部隊和我、郝守映，共同到大寨，見了陳永貴，讓他們聽聽大寨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他們聽了都很感動。

成立平定縣核心小組，當時，晉中核心小組，認為就我熟悉平定，點我的名上晉中，我和郝守映、李守珍，一起上了榆次，面見了閻扣成，閻扣成是昔陽人，原來在內蒙當縣委書記，文革時回到了晉中。那時候我們

認為幹部梁子銘、劉志義這兩個人可以進核心小組，兵團是進了楊忠忠、李六孩。組長是閻扣成。搞派性時候，不是核心小組說了算。

核心小組的改組顯然是後來的事情了。上面也試圖將兩派撮合在一起。他對自己的評價：

當時有點不知所以，自命不凡，妄自尊大，傻二不愣，基本上是受家庭父親的影響，所以我們在混亂中，私念少，文化革命中，個人的欲望，貪財、貪權、貪利都有，〔但是〕人說我在平定 28 年，又當過領導，帶著一個小桌子回來陽泉了〔指文革後期〕。我認為，個人品質沒問題，主要是政治路線問題。

他再次敘述了和陳永貴的交往，對大寨的佩服。

為什麼見陳永貴？1964 年唱戲，我到大寨一看，從骨子裡頭服，把一個窮山村，建成一個新農村，從報告、講演中，我認為陳永貴這個人很不簡單。文革中，我知道他支持造反派，就去找他了。他還派人到我家裡找過我，我到他的辦公室，都是辦公室主任接待，在陳永貴家裡，我坐在地下，陳永貴坐在炕頭，我們是朋友的關係了。

1967 年 9 月 9 日，正好我家的在醫院生老二了，陳永貴來平定了，要見我。我馬上回去，陪老陳到了劇團，我們要求陳永貴給「八一火海」題詞，我先用筆劃出來，老陳照著寫出來，這代人也很可憐，大都是文盲。陳永貴和我們又開會，又座談，到下午四點鐘，陳永貴坐吉普車才走了。

荊履榮提到的解放軍對他的道歉、陳永貴對他的支持，都說明了當時

誰是左派、造反派，應該支持，誰是保守派，應該反對，並不是非常清晰。在「三支」「兩軍」中，最具體的工作應當是「軍管」「軍訓」，最不具有操作性的工作便是「支左」，因為誰是左派並不容易講清楚。與「左派」意見不一致的就必然是右派？毛澤東在「文革」中曾說過：「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派組織。」既然如此，「左派」的範疇劃定，就成為一個難點。因此，軍隊的這一次介入，也為日後的兩派紛爭埋下了伏筆。

平定人武部作為「支左」解放軍在平定的代表，之所以這樣顛來倒去、出爾反爾，並不是他們糊塗到了是非不分的境地，而是奉命行事：山西省奪權的兩大首領劉格平和張日清，原本是夥穿一條褲子的鐵杆兄弟。因此，愛屋及烏，陳永貴當然也就和當時平定人武部的觀點一致了。至於後來老陳和軍方各持己見劍拔弩張，應該是因為上頭兄弟反目所致。「兵團」和「紅總站」原先也是好兄弟的，奪權運動時他們一致對外對付「紅聯站」的。後來兵戎相見，也是大首領們間的明爭暗鬥的後果。觀點之爭，其實也是權力和利益之爭。

政治鬥爭，其實是權力鬥爭。政治制度成熟的國家的議會制是口爭、文爭，按既定遊戲規則爭。文化大革命是武爭、不按規則出牌的爭，因為沒有規矩。如若不信，問一下過來的親歷者，無論參加的是哪派，都對當時所作所為說不出一個確切的理由和立得住的依據。當時，上邊傳下的時興的、變幻莫測的各種指令，都很簡單明瞭，也很直截了當。只是，人在狂癲狀態中時，是很難冷靜地向自己提問的。

這時候，社會上不同聲音已經出現了。《楊志忠遺留傳單資料》中有一份紅總站新大兵團署名的於 67 年 9 月 8 日發布的《嚴正聲明》。紅總站

的一個組織喊出了打倒郭、朱、鄭、砸爛籌委會的口號。但是無論如何，走資派還是要繼續鬥的，而且是暴力鬥爭。越這樣，越能證明自己的合法性。

奪權後繼續鬥爭走資派

據翟治壁回憶，1967年中央7月會議之後，昔陽縣首先開始揪鬥地委、省委領導，開始背胳膊、彎腰、「坐噴氣式飛機」。然後，平定也這麼做了。批判當權派的運動開始升級。我們的被訪者之一、原副縣長鄭子英在回憶批鬥她的情況時說：

1964年我任副縣長後去昔陽搞四清，在那從事婦女工作。之後調入榆次檢查組，檢查各縣教育工作。回平定後已經〔1967年〕一·二二奪權了。那時，我懷著小兒子，造反派就讓我去餵豬掃院。後來，我請求去大寨，得到批准。在大寨的婦女會議上，我重複了與我同去的張子義的一句話，說大寨也有缺點，「就好像旗杆上長了蟲蟲」，因此我就在回平定途中的卡車上，被師範的學生揪了下來，讓我喊「打倒鄭子英」，而且要我說出是誰讓我去大寨的。我不喊，更不願意說出來。

學生們把我拉回黨校，後來又到流杯池被職業高中的學生批鬥。他們拿磚頭、棍子打我，問我「是誰支持的你？」我不願意說，學生就用板子打我的胳膊。不料板子上有釘子，打破我手臂，流血不止，子宮也被踢得出血。學生們害怕了，就把我送去陽泉醫院。

醫生兩次保護我，對學生們說「就算是反革命也要休息一下」。我當時三十多歲，後來閻扣成說我沒犯錯誤，就回來了。打我的是紅總站，閻扣成告訴紅總站說不能揪鬥了。當時紅總站有竇某、劉某、陳某某。當時有一個說法「挨不完的批鬥，請不完的罪、寫不完的檢查、站不完的

隊」。郭存華〔原縣委書記〕對我說：「子英，好好休息，把身體搞好，咱不能幹，還不能看！」。

鄭子英對大寨的評論，直接將她放在了總站的對立面。挨鬥就是必然的了，而且是暴力鬥爭。鄭子英接著告訴我們：

後來他們讓我去職業高中看門，說有問題就喊我們。兩天以後又回黨校，拉平車、拉東西，修路。西關的老頭幫我修。天天勞動，一直站不出來，孩子也挨鬥，出去被人罵，說是當權派家的孩子。後來分到二輕局才站出來，當了總支書記，幹了兩年。站出來以後無論如何也不想再當幹部了，但是人家說：「劉少奇路線時你幹，毛主席路線時你就不幹，是不是對文化大革命有意見？」

我到白鐵社蹲點，《人民日報》登了一大版，後來又選我當副縣長。其實，幹部之間是表面好，內裡互相拆臺，同床異夢。

她說的互相拆臺，或許就是權力之爭吧。鄭子英的老伴、原縣委副書記之一賈正杞談到他們的經歷時回憶說：

她餵豬掃院，我看茶爐。後來去副食加工廠勞動，捏餅乾、麵包。人家說「醬不香、醋不酸，做下的餅乾是耐火磚」，說我們是「假（賈）書記，真（鄭）縣長」。各公社大部分都揪鬥過我，戴牌牌，揪你走，只能鬥，不能打死。

鄭子英也曾經被平定中學的學生鬥過。據一位同學回憶，當時她是被從縣政府押下來的。脖子上還套著用大字報擰成的圈圈。鄭和賈在談到他

們的被鬥過程時，看不出來有什麼憤恨的情緒。或許這也是一種淡定，一種向前看的態度吧。

郵電局的董銀明回憶他們那裡鬥走資派的情況時說：

郵電局的文革是從批鬥高子清開始的，高子清是郵電局的書記，鬥他是因為有人說他有作風問題。在批鬥問題上因為觀點不同形成了兩派，紅總站暑伏天把高書記帶到街上，蒙上棉被用鐵條打，鐵條都打彎了。我們這派看不慣他們的作法，就算高子清有作風問題也不該打人，所以我們和紅總站分成了兩派，成立了自己的組織。

當時，學生們也批鬥縣裡的走資派。但由於對縣裡情況知之甚少，批鬥就比較空泛，形同過場。高四班學生李金田回憶一次他們班批鬥朱永的事：

有一次，我們班組織的「同心幹」戰鬥隊突然想起要批鬥縣長朱永，班幹部尹竣讓我和蔚鵬兩個跑校生吃過午飯順便去看守所把朱永押來。那時看守所在廟巷，朱永住在看守所辦公的一間屋子裡，不是關著的。我倆說明來意，一個人帶我們見了朱永。朱永聽了，站起來就跟我倆走。一路上我倆不敢跟他說話，他也不吭聲。到了東關八臘廟那兒，朱永看到路邊地裡的莊稼，扭頭和我說：「今年的莊稼長得不賴哩！」我沒敢搭腔，心想鬥你了，你還琢磨莊稼。

後來，還看過鬥張瑾瑤，是在學校小會議室西邊。鬥著鬥著，有人喊「張瑾瑤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該萬死！」張瑾瑤有口吃的毛病，但那會他一點都不磕巴，抬起頭一瞪眼說：「那是你說！」

朱永對莊稼的關心，張瑾瑤對鬥他的人的反駁，鄭子英和賈正杞的淡定與幽默，至少反映了當時被鬥的人並不想默認別人對他們的價值判斷，而是在內心裡仍然在堅持著自己的理念。一種幽默，儘管是黑色幽默，或許也是支撐他們走下去的力量。

1967 年後半年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們就被關在法院，這種關有保護性質。翟治壁去看過一次，並見到了縣委副書記鄭忠華和農工部長趙生堂。原平定縣委副書記鄭忠華在他的《我的回憶》（未正式出版本）中說：

……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說我是飛黃騰達，青雲直上，是郭存華的搗心錘錘，黑筆桿……

我的「罪狀」是：「反社會主義、反黨、反毛澤東思想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因為這個帽子太大，對我來說很不合體，完全離開了我的實際，我來平定不是有「罪」，而是為人民辦了好事的，因此我想不通，就這樣鬥爭了我三年多，批鬥過三百六十多次，用過十幾種刑法：什麼坐飛機、切西瓜、拼刺刀、照醜像、車輪戰、早請示晚彙報、舉磚頭、舉鋼筋、站板凳、曬太陽、烤火爐、嘴上貼封條等……死過七次。在這三年裡，我到過化肥廠做過工，到過藥林寺農場種過地，餵過牲口放過牛，在平定中學掃過馬路廁所，餵過兔，在縣政府機關燒過茶爐……這就是我所謂的青雲直上。

這裡，鄭忠華的憤懣可見一端。朱永、鄭子英和賈正杞私下是否也會表達同樣的憤懣呢？

其實，要鬥走資派，而不是在造反派內部進行內鬥，中央也是有精神的。王增榮在《糧食工作回憶》中說：

1966年12月，中央批轉軍委總政的緊急指示和中央補充規定。大意是：在文化革命中不准挑動群眾鬥群眾，矛頭必須指向走資派。這個指示傳達後，有的職工提出，前段寫的大字報就是挑動群眾鬥群眾，認為把大字報的內容抄下來就是企圖整群眾，完全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嚴肅批判。後來在文革委員會的主持下，召開了職工大會，當場燒掉了抄錄的大字報底稿，我自己進行了深刻的檢查。

老鬥走資派，似乎也很乏味，畢竟，他們手中的權力沒有了。老翻那些陳穀子爛芝麻，翻來翻去也就是那麼點事，也提不起人的興趣。按照中央的意思，奪權之後要鞏固政權了。可是，這正像毛澤東所言「萬里長征才走完了第一步」，大戲才剛剛開場。

下一章我們就來介紹文革的這個後續發展。後續的發展，基本可以看作是如何鞏固政權的問題。但是這個問題的難度，不亞於發動文革、破四舊、立四新、鬥牛鬼蛇神、鬥走資派、奪權的難度。而且，由於這時領導奪權的人物雖然得到上邊的暗示與首肯，但畢竟這權是「奪」來的，沒有上級委任的那個「印信」，因此，手中這個權的權威性就差勁，自己的腰杆不那麼硬，別人也不那麼服氣。數千年中國人的帝制傳統，即使老百姓也講究「正統」。在他們心中，皇上任命的官，那是名正言順的官。對官不敬，就是對皇上的不敬。至於奪下的官，則另當別論。就好比水泊梁山的好漢們，雖然在山上成了好漢了，但並沒有把自己推舉的首領當回事。可以捧晁蓋做老大，但也並不妨礙讓宋江坐頭把交椅。說不定心中還思謀著「皇帝輪流作，明年到我家」。有這樣的想法，下面的戲才能演下去，而且更熱鬧。所謂鞏固政權的問題，其實是兩派繼續爭權奪利的問題。

奪權之後：總站和兵團正式分派 以及陳永貴和解放軍的作用

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

——毛澤東「近四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決策」之一，1966年¹

晉中十幾個縣首先是陳永貴奪了縣委的權，奪地委的權他也參加了。陳永貴這樣的同志是共產黨員的模範。

——周恩來講話記錄，1967年5月3日²

張日清同志反對衛恒、王謙，支持你們造反派，我們讚揚他的革命精神，今天我們給你們亮明這個觀點。

——王力講話記錄，1967年1月17日³

1 毛澤東，引自於「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公報」，1966年8月12日。

2 周恩來、李先念，「周恩來李先念接見十四個省市夏季糧油徵購會議全體人員的談話記錄」，1967年5月3日。載於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3 王力、關鋒，「王力關鋒等接見山西革命群眾時的講話」，1967年1月17日。載於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王力時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共中央宣傳組

「三·二八」奪權是造反派奪權還是保皇派假奪權，時至今日，參加過兩派的人仍然各持己見、各執一詞。然而，什麼是造反派，什麼是保皇派，造反派造了誰的反，保皇派保了哪個皇，如前所述，在當時，並沒有一個衡量的嚴格尺度和標準。劉格平之所以「不平」，張日清之所以「不清」（傳說毛澤東批評「劉格平一格不平，張日清日日不清」），是因為他們除了有「捍衛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捍衛新生的紅色政權」的大目標外，也不乏自己懷中揣的「小九九」，而且在那個時代，正如我們在前言中所講，也基本談不上「平」與「清」。

因此，在標準含混的情況下，兩派觀點也很難分辨對錯。毛主席說「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但是沒有說當這兩者有矛盾、互不相讓時，應該向誰「學習」。能搞清楚誰對誰錯嗎？其實他們都有自己造反的對象，也有自己保皇的對象。運動發展到這個時候，誰在臺上，誰就是「皇帝」。這跟向誰「學習」已經沒有什麼關係了。所以說如果剛開始鬥走資派時有造反和保皇之分，在兩派都有人在臺上時，實際上兩派都在「保皇」。除此之外，大家都在保的、共同的、最大的「皇」是黨中央、毛主席，那些階級敵人都是被認為是反黨、反毛主席的。

無論是否「保皇」，回顧歷史，一個不能回避的事實是：三·二八奪權是平定「文革」兩派真正分裂的分水嶺。其實奪權之後本來應該是鞏固政權，但是現實是造反派開始分裂，互相攻擊對方，並正在走向武鬥。兩派分裂除了那些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外，權力之爭或許是問題的本質。無論誰在臺上，政權看來一時半會兒是鞏固不了了。

我們還回到平定「文革」的發源地平定中學——當時，它已經改了一個相當時髦的名字：衛東一中——來看一看兩派是怎樣分開的。

平定中學的分派

如前所述，平定中學高三班岳智明組織的「紅衛隊」，是平定中學最早自發成立的群眾組織。它一開始是與當時由校黨支部組織的官辦「紅衛兵」相抗衡的，是學生中的運動精英分子領導一些不滿的學生反抗的一種表現形式。這可以說是以平定中學為典型的最早的兩派對立。

然而，隨著運動的開展，矛盾開始起了變化：原來在校黨支部統領下整教師鬥「黑幫」鬥「牛鬼蛇神」的運動，隨著自上而下變為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改變了方向。一些原先處於挨整地位的教師，現在也組織起「紅教聯」，成為造反大軍中的一員；而原先的指揮者，現在淪為灰溜溜「靠邊站」以至批鬥的對象。許多學生在突如其來的變化面前感到無所適從，於是發生了紅衛兵造反派重新組合的情況。

這時，作為真正自發組織的群眾造反隊，岳智明的「紅衛隊」作為「革命造反派」參與了「三・二八奪權」。籌委會成立，縣權力機構的混亂狀況逐步得到改善，除岳智明本人作為學生代表進入權力機構外，造反學生仍舊返回學校。這時候，軍隊按照指示進入學校搞「軍訓」，目的是讓學生回到課堂「復課鬧革命」。在大串聯中和之後學生們自發成立的各種名稱的造反組織，也因軍訓的營連排班編制而喪失其存在的環境。於是，在駐校軍隊的示意下，以成立「紅衛兵總指揮部」的名義，以揉合的方式，解散這些山頭林立的組織。高三班學生潘佩經回憶說：

三・二八奪權後，籌委會成立了一線指揮部搞抓革命促生產。在教育方面就是開展復課鬧革命。部隊派了三十多個代表進入平定中學搞軍訓，武裝部的田成本是平定中學軍訓營的政委，軍訓營的營長是 4757 部隊的張適。每個年級是一個連，每個班是一個排，營長、政委、連長、指導員

和排長都是部隊的，副職可以是學生或老師。這樣全校的學生就開始歸校，復課鬧革命就開始了。同時全校的紅衛兵也開始了大聯合，在解放軍的支持下我們成立了紅衛兵總指揮部，我、岳智明、葛秉臣、劉振傑和王學良是頭。秩序穩定下來以後就開始買書復課。

潘佩經口述中的人，王學良是本校的體育教師，也是「文革」中為數不多的因出身好而比較活躍的教師之一。葛秉臣是高四班學生，其餘都是高三班學生。「紅衛兵總指揮部」便是兩派分裂後其中一派的主要學生組織，「紅指」。見圖 9-1。



圖 9-1 紅指部分骨幹合影，包括初、高中同學。第一排中間為教師王學良，後排右一為岳智明，左二為劉振傑，右二為郝志東，第二排右二為葛秉臣，右四為李文元

資料來源：作者自己收藏。

三·二八奪權之前，平定縣兩大派組織還未形成，在三·二八奪權之後，在解放軍的支持下，平定中學紅衛兵造反總指揮部（紅指）正式成立，並在後操場上召開了成立大會。由潘佩經任總指揮，岳智明任政委，一個年級一個常委。成立大會由解放軍組織。但是，一部分學生認為，這種和麵式的「大聯合」是無原則的大雜燴，對於促成這種「大聯合」的一

統局面的軍訓部隊，也「恨屋及烏」地產生了反感。他們要標新立異，但苦於找不到理論上的根據和現實中的依託。這時候，一個人物應運而生了。他就是陳永貴。

陳永貴在平定分派中的作用

陳永貴是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大隊的黨支部書記。上世紀六〇年代，他帶領大寨大隊社員，不屈不撓，艱苦奮鬥，改造土地，增加產量，在嚴重的自然災害面前，做到「三不要」（不要救濟糧、救濟款、救濟物資）和「三不少」（向國家賣糧不少、社員口糧不少、集體庫存不少）。周恩來代表國務院在人代會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把「大寨精神」概括為：「大寨大隊所堅持的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這樣，大寨就和當時的工業典型大慶一起成為全國的先進典型，陳永貴成為全國勞動模範，不僅受到毛澤東的接見，而且受毛澤東邀請，享受了與大慶勞模王進喜等一起與毛澤東進餐的殊榮。陳永貴成為了在「文革」時期由於毛澤東的垂青而沒有受到衝擊反而受到依靠和提拔的為數不多的社會知名人物之一。

關於陳永貴在「文革」中兩次受到毛澤東青睞的經歷：一次是參加毛澤東的生日宴會，另一次是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觀禮接見時又見到了陳永貴，便招呼問好，說：「永貴好！永貴好！」毛澤東的問候，被曲解成「陳永貴好，陳永貴是正確的」意思，成為當時毛澤東的一條「最新最高指示」。陳永貴的政治地位，便從勞動模範突升為毛澤東意志在山西的代言人。他關於農村中怎樣搞「文化大革命」的意見，甚至被當作重要文件由

中央轉發全國。⁴陳永貴也便成為「文革」中的風雲人物。他的命運大變化對於他個人是喜劇還是悲劇姑且不論，但他的舉足輕重的地位，便從此形成。

如前兩章所述，「文革」開始，奪權風勁，山西省已經成為繼上海之後率先搞奪權的省分。而陳永貴從一舉奪得昔陽縣大權開始，他的「造反奪權」的人生軌跡，便註定他的不甘寂寞，註定他會讓山西「文革」風生水起。但是這要先從中央文革小組對劉格平和張日清的態度說起。我們曾在前面提到山西的奪權是劉格平奉命行事的。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一書中提到了中央文革小組的作用：

1966年12月，江青發現1936年在北京草廬子監獄（「北平軍人反省分院」）只有劉格平一人不執行中央關於履行手續出獄的指示，認為此人了不起，就調他到北京來談話。劉格平來京後，江青一直沒有談話。上海奪權後，江青囑關鋒同劉談話，要劉立即回山西去領導奪權。劉格平約在1967年1月8日回到山西。1月9日，劉格平等五人貼出「揭發省委問題」的大字報。1月12日夜間，在劉格平組織下，各造反派採取聯合行動，「向以衛恒、王謙、王大任等為首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進行奪權鬥爭，占領了省、市委，省、市人委，後又占領了省市公安機關」。1月13日晚間，劉格平等三名領導幹部公開站出來，向造反派的代表2000餘人表態，「堅決和革命造反派群眾站在一起，進行奪權。」……1月19日，山西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劉格平任主任。⁵

4 這是陳永貴給中央的上書，要求不要批基層幹部，以免影響生產。見映泉（著）《陳永貴傳》，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195-197頁。

5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1949-1976）》，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頁。

當時在農村當民辦教師的胡彬回憶說：

山西為什麼打倒衛（恒）王（謙）王（大任）之後出來個劉格平？這與薄一波事件（指中央在「文革」初期爆出的「北平反省院六十一人事件」，當時稱這六十個人是叛徒集團。事實真相是：此事是中共中央為保存幹部而作出的集體決定）有關。當時出了「薄一波事件」，說北平反省院寫「自首書」出來的人，大都是劉少奇線上的，只有兩個人沒有寫，其中一個就是劉格平。「文革」開始時，劉格平是山西省副省長，造反出來。後來和省軍區張日清鬧矛盾，毛主席說他們「劉格平一格也不平，張日清日日不清」。

山西省奪權後，由劉格平擔任了省級黨的核心小組組長，而代表「三結合」軍隊一方的省軍區第二政委張日清，卻在一些問題上與劉格平意見相左（比如要不要炮轟核心小組成員之一劉志蘭以及各自在專政機關的許可權等問題）。劉張二人的觀點矛盾在社會上擴散，一派人認為劉格平執掌權力是合乎標準的，應當支持；另一派人認為張日清代表人民解放軍，劉是「反軍派」，所以他們反對劉格平。群眾造反組織因之形成兩個大的派別。支持劉的一派，成立了「山西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批劉鄧紅色聯絡總站」，這就是當時聞名全省的「紅總站」；支持張的一派，便是「山西省革命造反兵團」，這便是當時與「紅總站」齊名但卻是其對立派別的「兵團」。「紅總站」和「兵團」後來都從省城擴散到各地，平定縣後來的兩大派別也都冠以相同名稱，社會上各色各名的群眾造反組織非此即彼地加入其中。

「文革」開始後，1967年2月11日，陳永貴以勞模身分，在昔陽造反奪權，奪得了昔陽縣縣級領導的權力，成立了「昔陽縣革命造反總指揮

部」並擔任總指揮長。由於他特殊身分的影響和他有意的施壓，昔陽縣的造反運動沒有形成真正的兩大派組織。⁶

在「文革」開始前的「四清」運動中，晉中地區製造了一些針對領導幹部的錯案，形成了擴大化。當時晉中地區的兩名幹部任井夫和王振國對地區主要領導的作法提出異議，便被認定為「反黨」。昔陽從區委書記幹起一直幹了八年縣委書記、樹起大寨這面旗幟的張懷英公開站在任、王二人一邊，任王張三人便成為晉中地區「四清」中的「反黨集團」。⁷

陳永貴在奪得昔陽縣權力後，把時任文水縣縣委書記、被造反組織鬥得十分厲害的張懷英搶回昔陽。陳永貴對任井夫、王振國也採取了同樣的保護措施。陳永貴的態度，也便成為當時晉中地區兩派態度的一個分界標準，即「紅總站」支持任王張，「兵團」要打倒任王張。但是，當時兩派中的絕大多數群眾，基本上不知道「任王張」是哪裡人，什麼職務，只能根據省裡打倒衛（恒）王（謙）王（大任）、晉中打倒王繡錦（地委書記）而推斷他們是晉中地區的人。至於為什麼支持或者打倒任王張，好多人說不出一個子丑寅卯，是以陳永貴的好惡為好惡的。⁸

山西省兩派鬥爭最激烈的時候，陳永貴在省城太原的一次群眾集會上公開表態支持劉格平一派。這樣，他的表態使支持劉格平的「紅總站」一派有了倚靠，也使他站在了軍隊的對立面。自此，山西的「紅總站」派有了「毛主席的好學生陳永貴」為人物倚靠，有了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永貴好」為理論依據。而山西的「兵團」則有「三結合的依靠力量」人民解放軍為人物倚靠，有了毛澤東關於解放軍「三支兩軍」的指示為理論根據。各有所恃的兩派互不相讓，以至發展成全國聞名的武鬥事件，死傷

6 參閻映泉（著），《陳永貴傳》，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

7 同上。

8 同上。

無數，經濟凋敝，中央數次干預而未能解決問題。⁹

晉中地區有了任王張這個分野標準。平定縣和昔陽縣是鄰縣，當時同屬晉中地區管轄，相互交往密切，陳永貴又數次到平定作報告、表態、題字，公開支持一派。另一方面，平定毗鄰陽泉市，陽泉的工人造反組織又大多支持張日清，使平定的「支張」一派也有了外界支持。這樣，處於犬牙交錯地區的平定「文革」，也因著上述原因而兩派此起彼伏，此消彼長，錯綜複雜，撲朔迷離，上演了一場兄弟鬭於牆的悲劇。

當時是機關幹部的郝鼎丞回憶說：

一天，紅總站的一些組織召開會議，組成遊行隊伍，喊出了「學習陳永貴，支持任王張」、「狠挖二三線」的口號。

當時已從平定中學畢業返鄉成為民辦教師的胡彬回憶說：

「兵團」是後來成立的，在這以前有個「兵聯站」，全名是「山西革命造反兵團聯絡站」，是一個叫鄭永剛的人在平定先弄起來的，他是岩會駐軍的子弟。後來，劉林、陳愛祥（當時為社會青年）他們參與了「兵聯站」的成立，他們入駐縣委大院，還不小心燒了縣委院一個小木樓。後來的「兵團」是李六孩、劉懷祿他們搞的，與「兵團平定聯絡站」是兩碼事。平定縣的「紅總站」是從太原來的「四野」（全名為「革命造反第四野戰軍」，「四野」原是林彪在解放戰爭中統領部隊的番號）幫助成立起來的，洗澡堂的毛忠福和化肥廠的郝守映先組織的。毛忠福原來是「聯絡總部」的。王俊舉當時正在省裡頭學習，他是省「紅總站」在平定的聯絡人。

9 同上。

燒小木樓的歷史背景是：當時縣委大院有一座舊時修建的二層西洋式木樓，為縣委辦公用房，主要保存一些檔案資料。一些造反派入駐後，占據小木樓作為隊部。一天夜裡造反派燒烤紅薯，無意中點燃木樓，致使木樓及樓內所存資料全部焚毀。

總之，兩派分別圍繞著陳永貴／劉格平和解放軍／張日清正在開始形成。

解放軍在分派中的作用

平定中學「紅戰團」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成立的。如前所述，解放軍入校軍訓，讓學生的各色造反組織大聯合，成立「紅衛兵總指揮部」。一些學生中的造反首領成為入校軍隊的依靠對象，同時也成為學校中新的學生領軍人物，並且進入了權力機構。而同樣有領導能力也同樣造反積極的另一批學生卻被冷落，在權利的分配上分不到一杯羹，他們對入校軍人的作法當然不滿，他們將這種「大聯合」稱為不講原則的「大雜燴」。我們在時過境遷之後再去揣摩入校軍人的意圖，他們人地生疏、入校時間短而「復課鬧革命」任務重，也只能將學生們以軍訓的方式弄回教室中去，讓他們跑野了的心收一收，僅此而已。當時「紅戰團」的學生造反領軍人物之一的郝忠德回憶了「紅戰團」成立的起因：

我們剛串聯返校，學校已出現多個紅衛兵戰鬥隊，但沒有分成對立的兩派。三·二八奪權後，軍隊馬上進校軍訓。以班級為排、年級為連、全校為營的軍事化建制。縣武裝部的田成本為政委，4757部隊的張適任營長。隨即搞全校大聯合。當時有些戰鬥隊和部分同學提出質疑：全國運動轟轟烈烈，到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鬥爭權派，我校卻搞聯合復課，這是籌委會為穩固奪取的權力而推行的一條壓制革命運動、扭轉鬥爭方向

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當時王勝利是昔陽縣的革委會的副主任，兼紅代會的主任，他對平定中學的影響很大。他說陳永貴要接見革命群眾，張滬雲和董命長就騎車去了昔陽，帶來了中央不予支持類似平定這樣奪權的資訊。

顯然，平定中學的造反派也是奉命行事的，是聽毛主席、黨中央的話、照以陳永貴為代表的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辦事的，而不是按照軍代表的指示辦事的。郝忠德接著說：

於是，一部分同學自發的聯合起來，組成了一個全校統一的組織「紅衛兵戰鬥兵團」，簡稱「紅戰團」。紅戰團成立不久，在校軍訓的解放軍出面組建「紅衛兵聯合指揮部」，簡稱「紅指」。紅戰團的同學認為這是包辦代替，是不相信群眾，是壓制學生運動。

解放軍組織召開「紅指」成立大會那天，紅戰團衝擊了會場。我衝上臺講話，號召同學們不要受蒙蔽。當時就衝上幾個軍人扭住我的胳膊，押送去營部。我的衣服也被扯破了。

這時，學校和城內新華書店一帶貼出一批大字報，斥責紅戰團反對解放軍。從此，學校的兩派對立公開化了。兩派分歧不在學校內，因為沒有哪個學生組織和教師對待當權派蔡守惠的態度有什麼不同，兩派是對三·二八奪權的籌委會的態度不同。

郝忠德提到的王勝利，是個學生。他的弟弟王成功是平定中學初中班學生，在學生中小有名氣，後在招考飛行員時被選中，成為平定中學歷史上第二個後來去當兵作了飛行學員的（第一個高他二屆，名吳彥會）而名氣大振。他們兄弟皆為幹部子弟，其父親為南下幹部。王勝利是一名中專

學生，後被陳永貴所器重，成為他的秘書型的人物，在昔陽縣「三代會」成立時，成為「紅代會」首領。「紅代會」是指造反奪權後以縣級為單位成立的「三代會」之一。「三代會」分別是「工代會」、「貧代會」（農民有成分區別，地主成分、富農成分、富裕中農成分都是排斥對象，中農為「可以團結」對象，下中農和貧農為依靠對象）、「紅（衛兵）代會」。張滬雲和董命長（董鋼）都是學生，後來均成為「紅戰團」骨幹。



圖 9-2 紅戰團同學於 1969 年的合影

資料來源：耿忠榮同學提供。



圖 9-3 紅戰團同學於 1977 年的合影

資料來源：耿忠榮同學提供。

從他的回憶中可以看出，分裂出去的學生，是以陳永貴作為倚托的，正如兵團或紅指是以解放軍為依託一樣。翟全臣也是平中學生，「紅戰團」的發起者之一，他說：

我記得「衛王王」是被兩派共同打倒的，在打倒「走資派」上沒有分歧。平定的派性鬥爭和省裡都是連著的，在山西，張日清反對劉格平。左權的妻子叫劉志蘭，她支持的是張日清，紅總站就把她給打倒了。兩派到了咱這裡，觀點不同，我們就成立了「紅戰團」，我和忠德都是紅戰團的常委。當時紅戰團的常委還有曹建中、張滬雲和張存周。最開始的時候董鋼是總指揮，苗祿是政委，全臣是戰鬥作戰部部長，曹建中管的是政工，是宣傳部長，張存周好像沒有什麼具體的分工。我們那會兒是以年級為標準考慮的常委名單，儘量照顧到各個年級都有人能在常委裡頭。

究竟是「紅指」先成立還是「紅戰團」先成立，上述回憶有所差異。不過前後應該差不了多少時間。

雙方的分歧

除了在劉格平、張日清、軍代表等問題上的分歧外，雙方學生在「三結合」成立學校領導機構上也產生了分歧：「紅指」要「結合」的人是原校黨支部書記蔡守惠，蔡是以「走資派」被奪權的，現在要復位，擁護他的學生便被對方稱為「保皇派」。這便是「紅指」後來被稱作「保皇派」的初因。「紅戰團」則提名原校長張有貴和教導主任曹克倫。於是雙方各自推出自己的「革命領導幹部」。「紅指」一派由於是「大聯合」的起始者，得到入校軍隊出於穩定局面角度考慮的支持，「三結合」的條件已經具備。而「紅戰團」一方儘管得到來自昔陽縣方面的助力，但沒有得到軍方支持。按照當時革命造反派、革命領導幹部、人民解放軍「三結合」才能奪權的標準，畢竟「三缺一」，沒有搶占權力的條件。因此，他們對軍方的態度也就「不感冒」（有些腹誹）。這也是後來他們被稱作「反軍小丑」的起因。

平定中學「紅戰團」的成立，被「紅指」認為是「不搞聯合搞分裂」，於是便出面阻止，雙方發生爭鬥，這也可以算作「文化革命」朝武化發展的肇始。潘佩經回憶說：

當時紅戰團的人從紅指分裂出去，獨自成立了紅戰團。紅戰團成立的當天，我帶人去制止，劉振傑跳上臺搶了話筒，可是最後紅戰團還是成立了。後來社會上的紅總站也成立了，他們首先衝擊了籌委會，這樣兩派的矛盾就不斷地升級，後來部隊來軍訓的人撤走，兩派就正式對立起來了。



圖 9-4 紅指同學合影，「紅指小將」右上方的牆上依稀可見「打倒蔡守惠」的標語

資料來源：作者自己收藏。

平定其他單位的分派

平定中學兩派的形成，是平定兩派形成的一個縮影。由於社會上一些活動人士的串聯，兩派成型，漸成規模。馮拉科，平定師範學生，後來成為平定師範「紅衛兵司令部」（簡稱「紅司」，「兵團」派別）的首領。從他的回憶中，我們可以概括地瞭解駐平定的另一所主要學校的情況：

咱平定大的兩派就是兵團和紅總站，向下面就又分出來好多，比如說我們學校的「紅衛兵司令部」和「紅三司」，那會兒我是師範這頭的「紅司」頭頭，平定中學我們這派的頭好像是岳智明。接著就是成立籌委會，曹銀福負責籌委會組織。

在籌備籌委會的時候劇團又分成了兩派：「星火燎原」和「八一火海」。家庭出身好的就成了一派，吸收進籌委會。家庭不好或是有歷史問題的就成了另一派，他們這派人跑到昔陽見了陳永貴，陳永貴說「我支持你們」，這些人回來以後就到處說陳永貴支持他們。

李六孩在昔陽搞「四清」，說他反對過陳永貴，所以這夥人也反對李六孩，李六孩回了平定以後就倒了霉了。我當時在平定師範是學生會主席，有的同學說我是保皇派，也有同學推舉我下縣裡參加籌委會。下了縣裡以後我和張瑾瑤住在一個屋，張說他和陳永貴的關係不錯。

「紅三司」是平定師範屬於「紅總站」的另一個群眾組織。「劇團」指平定縣晉劇團。平定師範和晉劇團都屬文教事業單位，這兩個單位兩派爭鬥都十分激烈。平定師範「紅三司」和晉劇團「八一火海戰鬥隊」（這兩個名稱都比較奇特，怎麼叫起來的，現在沒有人能準確地述說緣由）。「李六孩在昔陽也反對過陳永貴」，指的是「四清」運動中的「十月事件」，即地委書記王繡錦遵照上級命令在昔陽搞「四清」時對幹部打擊擴大化和嚴厲化的事，「任王張」就屬於被打擊者範疇。李六孩和另一位平定縣女幹部鄭子英當時都是「四清」工作隊工作人員。這也就是我們在前面一章中所引述鄭子英的回憶中所謂「大寨的旗杆上也長蟲蟲」的事情。

平定師範兩派的分裂，據梁鳳鳴的回憶，除了觀點上不同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平定師範是駐平單位，既不歸平定管轄，又外縣人居多，對平定文革的局勢不甚了了，因此，一派人認為要參加平定文革，另一派人不同意，兩家在城南河發生了衝突，吵著吵著就推打起來了。分派後，「紅三司」的頭頭叫張懿（讀「義」），外號張四火，又叫「麻包」。在「農業學大寨」後期，他回昔陽工作了，還告過陳永貴虛報產量的狀，住過監獄。但是當時是平定師範支持陳永貴派的首領。

平定師範「紅三司」和晉劇團「八一火海戰鬥隊」是由陳永貴親筆題寫隊名的戰鬥隊，因此十分出名。他們的臂章，便是陳永貴手書字體（我們在前面提到八一火海的隊名是先由荊履榮畫出來一個線條，再由陳永貴描上去）。雖然陳永貴由於文化程度所限，字樣比較稚嫩，但由於他的聲

望和地位，使得這兩種臂章在平定身分很高。在此後的日子裡，這兩個組織成為平定「紅總站」派的骨幹組織，參加這兩個組織的人都感到威風陡增，腰杆更硬。縣人委機關幹部朱存業回憶說：

1966 年開始，大寨黨支部書記陳永貴以勞模身分多次到平定，支持反紅色政權。在此期間發生了兩件事：一是到平定師範給反紅色政權一派題字「紅三司」，平定師範的反派把它作為紅衛兵的袖章，十分厲害，無所不為；二是到平定劇團題字「八一火海」，反派群眾把它作為袖章，也很厲害，像國民黨的憲兵一樣。

其實無論是哪一派，只要戴上袖標，都和國民黨的憲兵一樣。1966 年以前陳永貴也來平定作過報告，那時，陳永貴的身分是勞動模範。他說的關於大寨人「不等不靠不要不少」的艱苦奮鬥的事實和大寨人現時生活水準的描述，還是很鼓舞和吸引人的。在平定兩派爭鬥白熱化時，他來平定作的講話，與 1966 年以前的官方請來作的報告，完全是兩回事。

另外的一個由陳永貴親筆題寫隊名的是城裡大隊農民組織的「永貴好兵團」，也屬「紅總站」派。「永貴好兵團」的成立緣於前面所述毛澤東向陳問好一事。城裡街村民孫樹仁回憶說：

一開始農民沒有戰鬥隊。後來，城關公社下通知，必須組織戰鬥隊。於是，就成立戰鬥隊，我、賈六小、祁德成、風池、和秀、樂小、葛璧成組織了一個戰鬥隊。後來，我們不願和風池在一起，就成立了「永貴好兵團」。為什麼叫這名字？是因為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陳永貴時說了這句話。我是團長，賈六小是政委，和秀是副團長，葛璧成是副政委。後來，和秀分了出去，和樂小、梁成富成立了一個戰鬥隊，叫「闖風浪戰鬥隊」。

但由於農民參與「文革」並沒有工資，所以這個「兵團」僅一二十個人。毛澤東向陳永貴問好一事又在國慶日之後，因此這個「兵團」成立時間也較遲。

這時候，一個位置在縣城南邊流杯池山上廟裡的耕讀中學學生成立的戰鬥隊「專摸老虎屁股戰鬥隊」也加入了紅總站，成為其中的骨幹。

差不多同一個時期，從榆次來了幾個學生，他們屬於一個叫「一把火」的戰鬥隊。這個戰鬥隊又隸屬於一個名叫「第四野戰軍」的跨行業組織。他們來平定擴大組織。這與平定一些沒有「資格」加入機關或工人戰鬥隊組織的社會青年一拍即合。於是，這些社會青年就參加了「第四野戰軍」，也就是後來名氣挺大但名聲不太好的「四野」。在第二次奪權後兩派紛爭不已的情況下，他們的組織便煙消雲散，他們大部成為「紅總站」的成員。見圖 9-5 他們的袖章。



圖 9-5 四野袖章，圖中編號為 059 號，藍色圖章為「第四野戰軍平定獨立師」字樣

資料來源：由關樹仁先生提供。

平定晉劇團原任團長的李守珍，這時也參與了「八一火海戰鬥隊」的活動。後來，在兩派組織社會化時，他成為「紅總站」一派平定的首領。荊履榮說：

他們批判我，然後十六條下來了，後半年文革開始了。文化革命轟轟烈烈開展起來，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紅衛兵，這時候全國是停產幹革命。劇團也鬧起來了，岳吉昌、李寶恕、趙錫民成立了「八一火海」戰鬥隊。另一派是劉相奇的頭頭，劉相奇是我的同學，他也愛好文藝，他想來劇團，我也歡迎他來，一來後，他就參加了省裡的導演培訓，培訓完後就回到劇團，就站在另一派，坐在史桂英、劉鳳蘭一派，成立了「星烈火戰鬥隊」，一共十二個人。其餘都是在「八一火海」。

平定劇團兩派形成。岳吉昌提出要讓我回來參加革命，66年底我回到了「八一火海」戰鬥隊。67年，3月28日造反派奪權，4月7日，我被逮捕了。當時「八一火海」幹什麼了？就是〔寫〕大字報。當時，66年底，批判了劇團黨支部書記王九林，67年1月份，我們批判了縣委書記郭存華、縣長朱永、縣委副書記鄭忠華，我們擺事實，講道理。

67年1月份，我們和「星烈火戰鬥隊」到了北京串聯，住在北京養蜂夾道，當時全國的文藝界串聯的都住在這裡，我們和「星烈火戰鬥隊」在這裡展開辯論，誰是保皇派，頭一天晚上，把「八一火海」辯倒了。第二天，我把過程完全的講了一遍，大家才支持「八一火海」，「星烈火」是保皇派。

上北京串聯坐火車，人挨人，站著到了北京，周恩來接見外地赴北京的造反派代表，「八一火海」是趙錫明去的，總理要求大家不要在北京滯留，取了經，要回去繼續革命，回去繼續批判走資派，不能再給北京找麻煩了。

兩派的進一步分化和鬥爭

掌權，當時的術語叫「黨政財文大權」。四個方面的權力，核心是財權。籌委會掌了權，先卡「紅總站」的經濟命脈。「紅總站」成了「在野黨」，急了，喊出了「要革命，要吃飯，要工作就是不要命」的口號。

關於「在野黨」為什麼喊出這個口號，郝忠德說：

籌委會成立初期，紅總站還沒成立，基層單位在籌委會的支持下，也相繼取得了本單位權力。但其中有些單位並沒有把本單位絕大多數的群眾聯合起來，而是對在前段運動中持不同觀點的群眾支一派、壓一派，尤其是對在運動初期給提意見或批鬥過自己的群眾，採用高壓政策，甚至停止工作、停發工資。這些群眾就上街遊行，喊出了要革命、要工作、要飯吃。這是籌委會在基層政權建設上犯的一個致命的錯誤。群眾能載船，也能覆舟。

那些日子裡，兩派人馬在街上你來我去，遊行辯論。郝忠德說總站後來的領導李守珍就是在城裡東門街口與人辯論時脫穎而出的一個人才。他以流利的口語、富有邏輯的雄辯，贏得眾人的喝彩。很多人也因此而站在他那一派一邊。

城裡東城門口——這個平定「文革」的發祥之地，成為辯論的集中地。那裡，人群一團一夥，有的站在新華書店的高臺階上演講，有的相互爭論，有的看貼得鋪天蓋地一層壓一層的大字報，有的看熱鬧。花花綠綠的傳單，不時在人們頭上飛舞。東門口有一家理髮店，外邊鬧鬧哄哄，裡面嘢哩嘩啦——大概由於是自負盈虧的「毫髮技藝，頂上功夫」行當，在各行各業都歇業「抓革命」之時，居然還在「促生產」。傳說有一天，一

個拉小平車運紅磚的人把車停在門口，入室清面理髮。理髮員一邊工作，一邊聽街上的論辯。聽到激烈處，大約是對立派占了風，一股光火，擋下理髮推剪，出去口頭革命，忘了椅子上正推著半拉的拉平車的。這一去，半個多時辰不見回來。拉平車的左等右等，不見理髮員，他倒也不生氣，思忖片刻，泰然起身，把圍布捲了捲，揚長趕驢而去。理髮員只辯得唾沫將乾，忽想起顧客，急返店內，卻見人去椅空。第二天，拉磚人又至，頭髮仍是半拉，而白色圍布，已成土紅。問之，原來將圍布當圍腰卸磚來著。二人相見，問及觀點，原來觀點相同，乃為同志。理完髮，款照付，土紅圍布留下，二人和氣告別。

那時，這種以「觀點」分敵友的事，不僅學校工廠機關，甚至進入家庭。一家之中，父子兄妹夫妻因觀點不同反目者，並不鮮見。城內各種戰鬥隊，臂章寬窄個個不一，字亦不相同。為了占理，即使對上邊以至中央的指示甚至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都能各取所需，曲解詭辯，為我所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確實「皆準」了。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見到陳永貴，一聲寒喧「永貴好？」被去掉問號，成為「最新最高指示」。當時城裡大隊的民兵連指導員，後來成為「永貴好兵團」政委的賈同茂回憶說：

我們成立「永貴好兵團」後，兩派鬧得就厲害了。我們去師範砸了「紅司」（平定師範兩派組織中，「兵團」一派為「紅司」，「紅總站」一派叫「紅三司」），搜走他們的紙和油印機，用來印戰報。

「戰報」，這是當時風靡一時的宣傳工具。與之前國家控制著輿論工具、人們經過幾次政治運動後噤若寒蟬不同，「文革」開始後，造反的人們熱衷於表達自己的觀點。大字報一次只能寫一份，貼的偏僻人看的少。

在通訊尚不發達、輿論宣傳紙媒工具全縣只有一份《平定小報》而且已經被造反派「摧垮」、全縣唯一的語言媒體縣廣播站只轉播上級廣播的情況下，油印的各種自辦傳單和小報就如雨後春筍。

「籌委會」成立，辦起了鉛印的《紅色戰報》，替代已經停刊的《平定小報》作自己的機關報。紅總站一派也辦起自己的鉛印報紙《平定風雷》。縣裡唯一的印刷廠的那套鉛字，兩家各為我用。平中「紅指」辦有同名油印小報，平定師範「紅三司」也有同名油印報紙。



圖 9-6 筹委會辦的《紅色戰報》

資料來源：作者自拍。



圖 9-7 紅總站辦的《平定風雷》

資料來源：作者自拍。

文的辦報出大字報大標語，武的就開始動手動腳。據當時在「紅總站」裡看廣播機器的社會青年大醜（乳名）的回憶：

「紅總站」常委有李守珍、趙岐山、郝守映、荊履榮，還有公路站有一個人，記不清叫什麼了。〔紅總站剛成立時，平中的紅戰團首領董鋼是總指揮。〕「紅總站」這邊的人，愛打抱不平。兩派鬧得厲害時，太原十三治來了一趟平定，是以參觀大寨為名，來平定聯絡的，一共來了九十多輛汽車。這以後，「紅總站」就力量大了。

群雄紛起，辯論也逐步升級，由論辯增添了諧音謾罵。比如：「籌委會」被罵作「臭丕壞」，楊志忠被罵為「楊雜種」，李六孩被罵作「李

六害」。「兵團」一派也不示弱，劉子義、梁子銘、閻扣成被罵作「六兩鹽」，「紅總站」被叫作「反軍小丑」。論辯高峰時，正值盛夏，街頭納涼的人們起鬨，組織起戰鬥隊，名曰「馬路兵團」，持「紅總站」觀點。



圖 9-8 平定師範紅三司辦的《紅三司》

資料來源：作者自拍。

「馬路兵團」公推自來水公司的工人李福盛擔任「團長」。這個組織，

沒有嚴密的組織機構，以觀點嚙聚，在街頭遊行喊口號。領呼者也人員不定，完全即興。有一夜，遊行者聚集已約二三百人，口號喊得震天響，很有威勢。忽然，一名領呼者不知是「敵方奸細」還是口誤，領呼一聲「籌委會不倒，氣死老保（保皇派）」，眾人齊聲應呼。呼畢，有人大喊聲一聲「錯啦」，眾人發覺竟然喊了敵方口號，一陣鬨哄，引起納涼者一陣哄笑。

郝忠德對「馬路兵團」是這樣說的：

「馬路兵團」是平定「文革」中在縣城出現的一種獨特的群眾組織。兩派剛開始分裂時，人們白天要幹活工作，只有晚飯後才有時間上街參加辯論。經過辯論，反對籌委會的人越來越多，後來就自發的排成長隊在街上高呼口號遊行。遊行的隊伍沒有專門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到後來參加人數達到三千多人。

平定「兵團」的骨幹隊伍、郵電局「郵電戰團」的發起人董銀明述說了「兵團」成立和擴大的過程，尤其是郵電兵團的作用：

咱們平定兵團起家了是靠的 56 個電工。當時來咱們郵電局串聯的是山西電力學校的學生。當時咱們成立的組織叫「紅色郵電戰團」，是 1967 年成立的，之後平定兵團的建立也是以郵電局為主的。「紅色郵電戰團」成立後我是第一任司令，那會也叫「一號勤務員」，幹了半年將權力移交給李田柱。郵電局的文革是從批鬥高子清開始的。〔見前面講過的鬥高子清的情況。〕

趙成秀在他的〈我的文革歲月〉中回憶了他是如何參加到總站來的以

及他對總站主要成員的看法。他說：

平定師範紅三司成了紅總站的骨幹組織以後，我便積極參加紅總站的會議。紅總站的主要負責人有總指揮郝守映、政委李守珍、常委趙岐山等，李守珍曾當過教育局視導員，指導過我的教學，趙岐山曾是我在平定師範任教時的學生，郝守映雖然認識不久，但工人的那種豪爽令我喜歡，他們正當青壯年，政治上比較成熟，做事幹練，口才也很好，我非常喜歡聽他們對山西和平定文化大革命形勢的分析。在參加會議的過程中，我也更多地認識了工人造反派中的朋友，如馮耀慶、蘇丙魁、牛增福、李振家、郝和森，他們樸實、堅定，還有股子義氣。

在相互謾罵之後，兩派之間的鬥爭便開始上升到了武鬥的層次。趙成秀繼續說：

由於兵團和紅總站觀點、訴求的尖銳對立，致使兩派的矛盾逐步激化。在江青「文攻武衛」的影響下，兩派的衝突時有發生，並且越演越烈。1968年4月，平定師範紅司頭頭馮拉科以搶槍為因被紅總站下屬組織的人抓扣刺成重傷；8月，兩派為搶奪油畫《毛主席去安源》宣傳、發行主導權，在馬車社大打出手；11月至12月，南關農民組織的頭頭張茂森被自稱為兵團的一夥人暴打，鮮血直流，不省人事，幸搶救及時，才免性命之憂；平定印刷廠工人、紅總站工人大軍頭頭郝和生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遭到一夥不明身分人的棍棒群毆，造成左腿股骨斷裂，雖挽回一條性命，卻造成了終身殘疾……到1968年年底，這種衝突逐步演變成一場武鬥。

趙成秀提到的一些主要武鬥事件，我們在下一章會敘述。為了顯示自

己的「革命造反」精神，兩派在對待原縣領導機構人員的態度上是一致的。比如喊口號，兩派都在喊「打倒郭（存華）（原縣委書記後調走，文革被揪回批鬥）朱（永）（原縣長）鄭（忠華）（原縣委副書記）」。而且奪權掌權一派和未奪權未掌權在野一派為了表現對走資派的激憤和自己派別的革命，對舊縣領導機構幹部的批鬥都逐步升級。

但是，陳永貴的參與，使動盪的因素渲染擴大了。1967年4月，陳永貴當了昔陽縣第一把手。7月3日，他在平定職工俱樂部給一派群眾成立「紅總站」的集會上講了話，這派群眾由於陳永貴的參會而豪氣十足。支持籌委會的一派對他心有不滿而又不能明言，便強調人民解放軍的支持，平定的兩派爭鬥貿然加劇。8月，陳永貴到平遙縣欲處理兩派武鬥，卻徒使兩派全副武裝大打出手，連他自己還是在解振華領導的69軍解放軍戰士的掩護下穿上軍裝才倉皇逃出平遙城。11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批轉陳永貴同志談農村的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下發全國。此後，他與省的核心小組組長劉格平站在一線，與省軍區司令員張日清抗衡，使兩派爭執成為混戰。¹⁰

1967年8月，平定縣籌委會這個政權機構由於與上級領導派別站隊的不一致，導致了上級的不滿，再加上對立派群眾的衝擊干擾，開始陷入癱瘓。擁護籌委會的一派整體加入省裡擁護張日清的「山西省革命造反兵團」，成立「平定總團」。兩派在山西已經是自上而下勢不兩立，平定縣的兩大派也就順勢正式成形。但誰能再次取得權力，就看誰的支持者根硬來頭大。用當時參加籌委會工作的平定縣「紅色山鄉教師」張瑾瑤的話說，文革過程叫「你呀下去，我呀上來；我呀下來，你呀上去」。據《中國共產黨平定縣歷史紀事》記述：

10 見吳思（著）《陳永貴：毛澤東的農民》，廣州：花城出版社，1999，第三部第三節；歐陽青（著）《百戰將星解振華》，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1967年7月3日，中央解決山西問題的「七月會議」指出山西駐軍支左中的錯誤。原來沒有加入「籌委會」的組織，認為形勢對本組織有利，隨即和外地造反派組織掛鉤，成立了「平定縣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批劉、鄧紅色聯絡總站（簡稱紅總站）」。陳永貴和安克（陽泉某單位領導）在成立大會上講了話，表示支持紅總站。平定縣駐軍主持的「專政委員會」釋放了抓捕的「造反派」頭頭，並召開大會平反。

1967年8月初，平定縣「籌委會」的負責人被上級點名批評。由此，縣籌委會、縣人武部受到群眾組織的衝擊，籌委會開始渙散、垮臺。其所屬組織同省市造反派相互呼應，成立了「山西無產階級革命造反兵團平定分團」（簡稱兵團）。平定形成了「紅總站」與「兵團」兩大對立的「造反派」組織。

參與「三結合」的軍隊受到中央責備，中央文革點名批判了張日清。張日清自己檢討了反對劉格平、陳永貴的錯誤（見圖9-9）。康生和關鋒表態支持山西造反派「打倒陳再道，警告張日清」的口號。¹¹籌委會失去支柱，工作陷於癱瘓，平定局勢驟然動盪。平定的兩派爭鬥，就又掀起一個高潮。

根據陳桂芳的回憶，7月3日，中央七月會議批評山西駐軍在支左過程中存有錯誤，這應該是我們在第八章所敘述的武裝部向荊履榮道歉故事的大背景。平定部分未加入籌委會的造反派受陽泉、昔陽的影響，重新成立紅總站，在職工俱樂部舉行成立大會，陳永貴講了話，支持紅總站。8月，籌委會領導受到上級批評，工作開始癱瘓，其所屬單位的群眾造反組織聯繫省市同一觀點的造反派成立兵團。至此，兩大對立派正式形成。

¹¹ 康生、關鋒，「中央解決山西問題擴大會議紀要（之四）」，1967年7月23日。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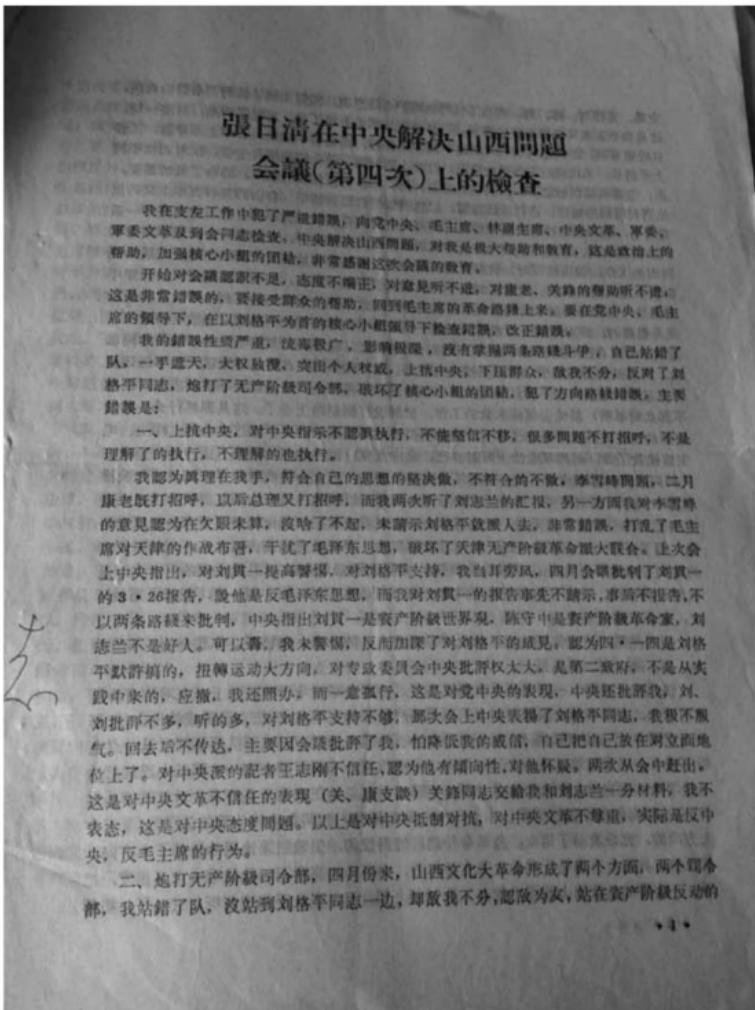


圖 9-9 張日清的檢討

資料來源：作者自拍。

那麼「上級」為什麼要「點名批評」「籌委會」的負責人呢？是他們領導不力嗎？是他們沒有下力氣「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嗎？表面上，都是。實際上，都不是。公正地說，誰當時坐上那個位置，都會去抓這些事。至於抓的好不好，那是另一回事。問題是，這個權力組織，坐在那個位子上，屁股還沒有坐熱乎，更談不上施展拳腳，就被炒了魷魚。個中原因，是「上級」在閭派性。

劉格平的掌權得到了更高一級的「上級」即中央文革的首肯和名人陳永貴的支持，但卻不被掌管山西軍隊的張日清買帳。兩人根子都很硬，就像兩頭砥角的鬥牛，誰也不肯後退一步。但是，從當時山西總的形勢來看，劉格平一方是占著上風的：奪權得到中央的首肯和高度評價，自上而下的奪權者基本都是他的粉絲。但是，偏偏在平定這個小縣，奪權的卻是張日清統領的那支軍隊支持的人。因此，就像一碗麵條裡摻著一根頭髮，咋看咋不自在。至於這個權力機構是否稱職，是否為人民服務了，當時的各級領導是無暇顧及這些的。

於是，「點名批評」就是順理成章的事。這當然還是輕的。「籌委會」很快就被否定了。上面派了閭扣成來。《中國共產黨平定縣歷史紀事》記載說：

1967年12月13日，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組和山西駐軍負責人在北京召開會議，肯定了解放軍「支左」的成績。晉中核心小組通知，改組平定縣核心小組，由6人組成，免去楊志忠核心小組組長，由閭扣成擔任中共平定縣核心小組組長。……成員有閭扣成、楊志忠、錢志超、尹廷魁、劉志義、梁子銘。¹²

12 《中國共產黨平定縣歷史紀事》，第137頁。

閻扣成是總站觀點，楊志忠兵團觀點、錢志超和尹廷魁為軍方代表、劉志義和梁子銘為總站觀點。閻扣成原籍昔陽縣，他的上任，是否晉中地區受陳永貴影響的作用，至今不得而知。但他作為一把手上任之後「紅總站」派的得勢與「兵團」派的失意，使得一邊倒的局勢起了變化，平定武鬥全面升級，卻是不爭的事實。

中共黨組織主要領導人的變更，就意味著領導方針的變化。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也就意味著「觀點」的變化。或者更乾脆地說，就意味著哪一個派別上臺掌權的變化。閻扣成的掌權，表示了晉中以至山西省掌權派對平定縣原先奪權並掌權一派的不滿和不信任。在執掌權力這個實質性問題上，兩派爭鋒，誰也毫不含糊。爭鬥，成為必然。潘佩經回憶了他們這一派和閻扣成交鋒的情況：

籌委會放了逮起來的郝守映和曹喜厚，他們反過來參與了衝擊籌委會的活動。籌委會〔被〕沖散後，平定就進入了權力的真空階段。當時武裝部很有權力，晉中一看不行，就派下來閻扣成。閻扣成來後住在招待所的小樓，我和岳智明去找他談話，問他「為什麼否定籌委會」，他說「路線錯了」。我們又問「都是毛主席的指示，怎麼錯了」，他說「慢慢再說，兩派要消除隔閡，要聯合起來」。之後他們成立了和籌委會對抗的核心小組，以我們紅指為主的一派衝擊了核心小組，燒了他們的牌子，封了他們的辦公室。這以後，平定就開始亂了。

兵團一派顯然對總站觀點的人掌權很不感冒且試圖將其推翻。潘佩經還回憶了走上社會成為兩派的過程：

我記得有一天，張鳳英找我和智明說，馬增聖是太原兵團的，通過馬

我們和山西革命造反兵團取得了聯繫，省裡就承認紅指成為兵團的下屬組織。後來又成立了山西革命造反兵團平定總團，總指揮是董銀明，常委是我、岳智明、張巨民和王占美。王新民是紅指住兵團的代表。

在執掌權力這個關鍵問題上針尖對麥芒互不相讓的兩派各自找到了政治上和組織上的靠山，爭鬥是難以避免的事。在一片混亂沒有遊戲規則制約還有中央文革小組的理論支持下，從打嘴仗到打武仗，就是一個必然了。

軍隊的尷尬

這個時期，是平定兩派鬥爭的發育期。這種愈演愈烈的對立，也並非心血來潮的隨心所欲，而是有著其深刻的背景的：除了劉格平和陳永貴，另一個因素是解放軍，即平定縣人民武裝部。

解放軍介入地方「文革」，就平定來說，以前面講過的人武部支持西郊村民兵造反組織起始，以成立「籌委會」為標誌。應當說，人武部的「支左」，是要建立一個權力組織，以使動盪的局勢穩定下來的。設身處地，作為當時代表軍隊的人武部，並沒有自己取代地方政權組織的欲望。這是因為，一來儘管「文革」已經大亂，但軍隊這條線上還是相對穩固的。沒有上級指示，平定人武部以及參與地方「支左」的駐地部隊，不敢也不可能擅自作主要坐地方政權的交椅；二來平定人武部的領導從當時級別來講，已經是縣黨政班子的重要人物，無意再攬一個燙手山芋在手裡。用歷史的眼光去評價，他們的行動，有缺陷，卻也實出無奈：兩派打得不可開交之時，軍隊部門不是法官或者球場裁判員，無法評斷是非，而只能挑人多條件具備的一方「扶上馬，送一程」。但不料想，這個揉團在一起的「籌委會」，卻是個扶不起的「阿斗」，一沖即癱。衝擊者氣壯如牛：除

了找到「毛主席的好學生陳永貴」的支持，大形勢對他們也十分有利。

在平定兩派公開對立的時期，在平定人武部和駐平軍隊一起介入平定地方「文革」遭受「紅總站」衝擊的時候，全國上下，軍隊正在「文革」的滾水裡受著煮熬。自打「文革」一開始，軍隊在人的心目中無疑是一方淨土。但是，隨著軍隊介入到地方「文革」，軍隊的神秘而美好的面紗被揭了下來。



圖 9-10 陳永貴和平定縣幹部在一起（日期不詳，但應該是 1970 年代）

資料來源：李金田提供。

在這個分裂過程中，有一個問題需要說明：軍隊為什麼介入地方的奪權運動，又為什麼突然撤出？背景是這樣的：

1967年，隨著「文化大革命」在全國展開，各地的派別鬥爭逐漸發展成為動盪和武鬥。在局面失控的形勢下，毛澤東派出軍隊「三支」「兩軍」，以穩定局勢。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要求軍隊介入地方「文革」。¹³「三支」「兩軍」中最關鍵而又最不好操作的是「支左」。為了建立政權機構，穩定各地局勢，軍隊採取支持一派壓住另一派的辦法。但是，究竟應當支持哪一派，在一些地方便與當地的領導產生了分歧，例如山西的張日清和劉格平。而他們的分歧反過來又會加劇兩派的矛盾。

1967年7月，「武漢事件」爆發，駐武漢軍隊與地方反軍造反派發生衝突，毛澤東指示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電支持反軍一派，並指示中央媒體大造輿論，致使全國出現一個「揪軍內一小撮」的高潮，「打倒陳再道（武漢軍區司令員）」、「打倒帶槍的劉鄧」成為一時流行的口號。¹⁴

自此，武漢軍區的司令員陳再道便成為「文革」以來又一個被「打倒」的軍隊領導人，也開了直接掌握軍隊的將領被打倒的先例。

「打倒陳再道」的口號在平定喊響，其意義並非是這個離平定幾千里外的城市的兩派與山西兩派有什麼瓜葛，而是意味著軍隊神聖不可撼動的地位的喪失——既然一個軍區司令員也可以被打倒，平定的軍方代表人物

13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1967年1月23日，中發〔67〕27號文件。載於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4 見「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軍區公告」，1967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對武漢軍區公告的覆電」，1967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一封信」，1967年7月27日。均載於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也就沒有什麼不可動的理由了。於是，「打倒平定的陳再道」，「揪出軍內一小撮」便把矛頭指向了軍方。一枚穩定局面的關鍵棋子喪失了。

這時候的山西，已經是兩派針尖對麥芒，太原鋼鐵公司、平遙、運城已經先開了文化革命武化搞的先河。陽泉市的兩派，也開始執起鋼管做的長矛，使用汽車內胎製作的巨型彈弓，打得不可開交。省城以劉格平為首的、由陳永貴表態支持的一派和以張日清為首的、由軍區和駐軍 69 軍「支左」的一派的鬥爭日趨白熱化。

在這樣的全國大局勢下，支持平定成立籌委會的平定人武部長張光輝和政委李金印也受到衝擊。「紅總站」一派不再有反對人民解放軍的顧忌，喊出「打倒張光輝」等口號。到 1968 年初，在國內愈演愈烈的武鬥中，在中央文革小組的示意下，造反派又打倒了軍隊的高級領導人楊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軍隊更進一步受到衝擊，軍訓部隊隨即撤走。當時在河頭村當民辦教員的青年胡彬後來回憶說：

「文革」中山西出了「平遙事件」，陳永貴回來在平定奶奶廟（即原職工俱樂部，現《平定》報社所在地）講話，說「平遙事件」。平定的武裝部長叫張光輝，戴眼鏡。在武漢陳再道出事以後，社會上要「打倒帶槍的劉鄧」，平定就開始打倒張光輝。

平定武鬥愈演愈烈的另一個外界因素，是與陽泉的聯繫。與平定近在咫尺的陽泉，軍隊支持的一派勢力很大，尤其在礦區。但是，位於市區的陽泉鋼鐵廠「紅總站」造反派首領叫梁寶貴，以硬和厲害出名。陽泉「紅總站」派的首領叫安克，是陽泉市的一名幹部。安克在梁寶貴的支持下，在市區形成了勢力。這樣，陽泉的兩派鬥爭便以城區和礦區形成了地理上的分界，而且雙方開始用全武行搶奪地盤。陽泉市區毗鄰平定縣城，陽泉

市區的「紅總站」派和平定縣城的「紅總站」聯合一起，使平定「紅總站」勢力越來越大。力量的變化使平定兩派的爭鬥從推搡打架開始升格。

占山為王、準備武鬥

1967年的秋天，天氣漸涼漸爽，但人的火氣卻越來越旺。「文革」進行到這會兒，一些真心要用「文化」進行革命的人，對日益轉樣的「革命」樣式迷惑不解，膽小的或不願用武力「革命」的漸行退出。喧鬧的平定縣城繁華地帶東門口那激昂辯論的人群、飛揚的傳單和長篇大論的大字報不見了。街上的人行色匆匆，不再去旁觀熱鬧，唯恐飛來橫禍，殃及自個兒。

在私下，因武鬥停產不去陽泉上班的工人們在傳著各自帶回的陽泉哪一派打到哪裡的小道消息。眼下的平定，一切似乎都很平靜，一切似乎告一段落。但是，這似乎在應驗著一部經典影片《南征北戰》的一段經典臺詞：「沒有動靜，就是快啦！」

1967年的冬天，寒風凜冽。眼看農曆新年將近，街上卻沒有一點過年節的氣氛。一來過新年也成了「四舊」，二來人們都沒有那樣的心思。兩派的仗，由嘴仗打成拳仗，又由拳仗打成棒仗。這樣打下去，還能用什麼呢？

這時，如前所述，平定縣核心小組已經改組。核心小組是黨的組織，但毛澤東說過「黨外有黨、黨內有派、歷來如此」的話，不幸還真應驗了。春天搞起「籌委會」的時候，成立過核心小組。那時的黨政兩套班子，可以說是「一邊倒」的。可是，好景不長，7月3日那一沖，「籌委會」散了架。這期間，陳永貴幾次來平定，又是題字寫袖章又是作報告，再加上後來揪開「軍內一小撮」，參與地方「文革」的軍方也弄得自身難

保。「紅總站」由小到大，像吃足肥水的苗兒，刷刷往起長。到這年的冬天，已經大成氣候。而這時候，陳永貴也不再把權力的影響限制在昔陽一縣。他所扶助的「十月事件」受害的任王張們，已經在晉中地區以致省上掌了權。在平定，操昔陽口音的閻扣成坐了頭一把交椅，其暗示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新的核心小組成立後，立即以與前一個核心小組相同的文件號〔67〕02號宣布新的核心小組名單，並且改組任命了下屬各公社的核心小組。兩個中共黨的縣級組織，前後相隔不過數月，也不用找什麼理由，卻「後浪推前浪，前浪倒在沙灘上」了。

上級領導的派性，是導致下面群眾派性的根源。這個時候的兩派，已經不是鬆散的各自為戰的組織了。不光是在社會上形成了兩個陣營，而且各自有了自己的領地。在某一派強大的某一個單位，他們可以把對立派打跑，占山為王，如同舊日落草的梁山好漢。比如，平定中學是「紅戰團」的天下，而相隔幾十米的馬車社則是兵團的天下。在城裡，「八一火海」可以在東門一帶逞威，但到了相隔一二百米的手管局，他們卻一點脾氣也沒有了，因為那是另一派的勢力範圍。

在平定中學，兩派的分裂也有特點：「紅戰團」的學生以男生居多，高中班學生占主導地位。如果說打架，其中也有一些能下的了手的。「紅指」呢？人多勢眾，但女的居多。女孩子的特點，助陣吶喊聲勢大，玩實的卻差一截子。因此，「紅戰團」叫她們「寡婦隊」，雖說刻薄了一些，但倒也算一語中的。

兩派分野後，一個學校分成兩半：「紅戰團」占了學校後半截，以體育教研組為指揮部，大喇叭用的是原來學校安裝的25瓦的大傢伙，又安在新建的大禮堂頂上，居高臨下，喊一聲全校齊響。「紅指」占的是進了學校門小會議室那一片，喇叭不大，但是集中了學校各排教室前那所有的

小喇叭，安在小會議室的房頂上，以數量居多，聲音也不小。這樣，在聲勢上兩家打個平手。要說聲音，還是「紅指」略勝一籌。人家女學生多，女孩子的聲音，即使是「警告」一類的詞兒，也顯得耐聽。相比之下，「紅戰團」粗聲大氣的男聲，就顯得不大受聽。

兩派分裂，各為其「觀點」。每一個單位都分成兩派。王增榮《糧食工作回顧》記錄的，是平定以及平定糧食局這個平定「文革」中比較突出的單位的情況：

1968年5月16日，平定縣核心小組組織縣級各單位人員去昔陽參加農業學大寨學習班，我也是與會人員之一。中共晉中核心小組成員、晉中革委副主任趙滿倉講了話。5月21日，昔陽縣核心小組副組長介紹了機關革命化的經驗。同日，閻扣成談了當前形勢的幾個問題。學習班搞了十來天就結束了。

1968年6月，平定也舉辦了毛澤東思想學習班。6月13日，閻扣成在大會上做了報告。他說，這次學習班規模很大，縣直各單位、各公社共有二千五百人參加。會議內容和昔陽學大寨學習班基本一樣，還請來昔陽縣武家坪黨支部書記作了報告。各糧站也派人參加了這次學習班。6月18日，梁子銘做了總結報告。

1968年7月31日，糧食局召開了一次會議，在會上王子召講了以下問題：一、現在平定是兩大派組織，糧食局也是如此。幹部是站在兵團一邊，還是站在總站一邊？我們的答覆是，要站在毛主席一邊。

二、站出來以後，怎麼辦？搞什麼？我們說，該結合的結合，該給工作的工作。

三、有些不是站不站的問題，而是需要認識的問題。有的把革命組織，說成是反對組織、國民黨。

四、幹部站不站，還是讓自己主動站。他接著說：昨晚經局「革委會」研究，確定了誰是站的對象。從我局來說，就是局長、書記。像國強、芝瑞就不是站不站的問題，而是安排工作的問題。咱局站的就是老王和老蘆（指王增榮、蘆和——原注）。

顯然，幹部要不要站出來，站在哪一邊，是個問題。另外，即使聲稱自己是站在毛主席一邊，在具體工作中，還是會碰到如何處理兩派的問題。王增榮接著說：

1968年9月17日，「局革委」在娘關糧站召開了北四站站長會議……王子召主持了會議並講了話，他說：這次會議，原計劃在城裡召開，為了迎接芒果，所以才開在娘關。會議計畫兩天，主要布置秋糧摸產問題。

會議沒有新的文件，把去年9月份某同志的講話學習一下，接著岳在華傳達了地糧局史修治局長的摸產安排。然後，王子召補充說：「摸產咱們是兩本帳。一本是能和公社聯繫起來的帳（指觀點一致的公社——原注），可以隊隊摸。另一本帳是，有些公社聽哩不聽哩（指不同觀點的公社），我們本著為了工作，能做到的儘量做到，做不到的我們就是送表任務，把表送到公社，由公社考慮。」

1968年10月中旬，解放軍4594部隊進駐糧食局支左，搞革命大聯合。當時的派性更加嚴重，糧食局的兩派力量懸殊很大，成為平定的特殊單位。全城共有職工156人，其中：紅總站派（衛東兵團）122人，占職工總數的78%，兵團派（紅烈戰團）25人，占職工總數的16%，而且多數是城關糧站職工。局裡只有1人是兵團派，基層也只有石門口糧站為兵團派。不但人數少，而且素質相當差。未參加兩派的其他人員，包括當權派共9人，占職工總數的6%。

解放軍進駐後，首先組織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但衛東兵團除了個別人外，都不參加學習班。只有紅烈戰團（兵團派）的人和當權派參加，基層糧站參加公社組織的學習班。

按當時駐城關單位的職工來說，共 96 人。衛東兵團 69 人，占 72%；紅烈戰團 20 人，占 21%；未參加派的 7 人，占 7%。實際上參加學習班的人數還不足城關職工總數的三分之一，還有三分之二的職工站在學習班之外。……

就是解放軍拿紅總站一派也沒有辦法。這裡需要說明一下的是，正如王增榮說的那樣，糧食局是「特殊單位」。在平定縣城，應當說，「紅總站」的力量是略占上風的。但是，這只是針對「群眾組織」而言的。在掌握著平定除黨權之外的「政財文」權力的幹部階層中，絕大多數是持「保籌」觀點的，這還不包括「靠邊站」了的那一部分幹部。

兩派成員的特點

不可否認，在「文革」當時，在一般老百姓的心目中，「兵團」是正統，「紅總站」是「旁支斜叉」。這除了中國人固有的封建正統意識認為誰當皇上聽誰的以外，還有另外一個原因：「紅總站」這個大組織裡，吸收了一些在人們心目中與眾不同的人。這些人，平常在街上就比較醒目。他們的標誌性裝束裝備是：穿洗的發白的「勞動布」工作衣，屁股上常帶著電工的「四大件」——鉗子、改錐、小板手、電工刀，一頂洗得發白的「勞動布」帽子的帽沿低低地壓在眉梢上，讓長長的頭髮披在後腦。自行車是一輛舊的但拾掇的十分精幹的日本「富士」，頂不濟也是「飛鴿」，取掉後衣架，有的甚至連刮泥瓦也沒有。車座高蹶而車把很低，如自行車運動員騎車狀。他們並非流氓或者阿飛。但在當時，一切都循規蹈矩謹小慎

微年代，任何社會越軌都為傳統所不容而被視為「另類」。

他們加入「紅總站」，其實也有與社會主流叫板的意思。除他們外，還有一些因家庭出身或父母是「黑五類」而在其社會圈裡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子弟。前面所談在「破四舊」中被遊街的葛東海的兒子葛懷義，便在隨後的戰鬥隊蜂起時加入紅總站某戰鬥隊，穿草綠色軍便裝，用皮帶抽打當年遊鬥其父的街道組織者。時任上城街居委會治保主任的石寶蘭在葛懷義被逮捕在勞改煤礦因事故身亡數十年後回憶說：

城關鎮讓門葛東海和他兒子葛懷義，後來文化革命轉了風向，開始鬥走資派的時候，葛懷義組織了一個造反隊，回來在上城門我和張雲蘭。那時候，張雲蘭是上城的居委會主任，我是治保主任。葛懷義鬥俺倆，拿皮帶頭抽我，打得可疼了。

不可否認，在「文革」前，有一些基層幹部，在對待人民群眾的態度上，確實過火。當時強調「階級鬥爭」，人與人之間本來就關係緊張，有的基層幹部再以一種極「左」的行為或挾私以權壓人的行為來處理事情，便更加劇了矛盾。這也是一些平時受到擠壓的人在「文革」中起來造反並倒向「紅總站」的原因。就是晉中的革命幹部任（井夫）、王（振國）、張（懷英），也是因為受到同僚的壓制而得到造反派陳永貴的支持的。居住在學門街的一位「四類分子」的兒子石鳴歧，只是因為其父在「反右」運動中曾戴過「右派分子」的帽子，便受到大隊幹部許多非難與刻薄。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他便加入了「紅總站」。他說：

我加入「紅總站」，主要是因為我在生產隊受壓。我父親本來是戴「右派分子」帽子後來摘了帽的，可是大隊又給戴上了帽子。我作為「可以教

育好的子女」〔毛澤東語，其意指「四類分子」子弟〕，很受大隊幹部的氣。「紅總站」的造反派都是年輕人，他們一點也不小看我，我和他們在一塊兒有話說。武鬥的時候，我沒有參加任何戰鬥隊，但是，我自個兒跟了「紅總站」。

時任「紅總站」常委的李守珍，當時是縣文化界的幹部。他思維敏捷，極具辯才。在 2007 年 9 月 6 日下午，距他去世僅有半年時間且身體極度虛弱的情況下，唯一一次接受撰文者之一的關於他參加「文革」的採訪，他說：

「紅總站」的人，受壓的多，造反的心態也不一樣。但由於受壓、受到社會不公正的待遇，一有機會就會鬧起來。其實在「文革」前，這種壓制在社會上就顯現了，只不過「老人家」（指毛澤東）利用了這種情緒。

當問及當時「紅總站」一些聲名很大的武鬥參與者與「紅總站」領導層的關係時，他說：

和秀、竇憲、劉林、陳愛祥他們，和我們並不接觸。「紅總站」那麼多人，又不是一個單位的，說是一派，歸咱領導，其實誰也管不了誰。我們和他們並不多接觸，沒有多打過交道。

「紅總站」的參加者這種與當時的主流社會思想相對抗的情緒，是兩派分野的動因之一。

兩派分野同樣傳染到農村，尤其是靠近縣城、比較激進的村落，比如西郊村。《西郊村》書中說：

1967年7月，西郊村的一些人在縣城造反組織紅色聯絡總站（簡稱「紅總站」）的發動組織下，加入了縣城紅總站，稱西郊紅總站，公社普通幹部郝秉和和村裡社員李璟、趙克明、李桂等人為主要成員。7月下旬，紅總站將原縣委書記郭存華、縣長朱永、副縣長鄭忠華從縣裡揪來西郊，在西郊廟地召開群眾大會批鬥。郭存華、朱永、鄭忠華脖子上掛走資派大牌，彎腰受批，民兵持槍助陣。

1960年郭存華蹲點西郊時，曾帶領西郊群眾共度「五兩關」，多次到營養食堂視察指導。批鬥中，造反群眾指控郭存華在「五兩關」時身為平定縣父母官多次去營養食堂吃喝，指示西郊村領導殺掉西郊村幾百隻羊吃。還指控他把西郊村書記趙廷瑞的兒子安排在縣武裝部工作，而老百姓的子女卻一個也不叫去當工人。

顯然，造反派的確對縣級領導的領導作風、多吃多占等是有看法的，其中一些也不無道理，儘管在困難時期讓老百姓宰羊吃，其實是為了老百姓好。

8月，西郊「紅色造反兵團」也加入縣城「革命造反兵團」（簡稱「兵團」），貧協委員會主任郝秀和及西郊村貧協委員15人為主要成員。兵團拉來公社原任書記主任魏惠、趙忠在廟底臺上進行批鬥。

造反群眾要魏對其在1960年任公社書記期間西郊村民郝萬宗被控縱使兒子偷盜麥穗的冤案負責，認為郝萬宗之死魏惠是主犯。對公社後任書記王建平等人都輪流批判。

兵團派對公社書記的領導作風也有批評，而且也不無道理。

當時「紅總站」派指責「兵團」派鬥走資派不堅決不徹底有保皇行為，而兵團則指責紅總站組織不純有打砸搶行為。從此西郊村兩大造反派別分裂，形成你鬥你的走資派、我揪我的當權派、你說他是保皇派、他說你是親皇派但同呼一個「造反有理」口號的局面。

儘管從上面的敘述來看，兩派在批鬥走資派時都有和後者算帳、要討回公道的意味，但是紅總站人員構成和行為作派，更像是造反派，而兵團的人員構成和行為作派，更像是保守派，或者說是總站的人講的「保皇派」。其實，由於個人的人生經驗不同，所以觀點不同，本來也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在大的方面，比如我們在本章開始所講的「保皇」問題，以及對幹部的領導作風問題，大家是沒有什麼分歧的。其實被 A 鬥的人是 B 要保的人，反之亦然。而且大家都「保」黨中央、毛主席，都是保皇派。但是兩派組織是在中國這個帝王統治數千年的土壤中生長起來的，有的是弱肉強食、勝者為王的傳統，缺的是遊戲規則的制定和遵守的習慣，所以也無法進行良性的競爭，去辯論誰對誰錯，因為沒有標準，或者說標準走了樣。毛主席教導的「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現在也沒有了神力，沒人聽了。講不通，那剩下的，自然就是武鬥了。武鬥的結果是當年的模範教師、當了幾個月縣核心小組成員的張瑾瑤那句話，「你呀上來，我呀下去」，如同幾千年來「推翻皇帝坐皇帝」的輪番上演那樣，還是沒完沒了的鬧劇、荒唐劇和悲劇。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平定縣裡不平定：山西省平定縣文革史 / 郝志東, 黎明著. -- 初版. -- 臺北市：致知學術, 民106.01
冊； 公分. -- (當代中國研究. 二；9)
ISBN 978-986-5681-73-9 (全套：平裝)

1.文化大革命 2.歷史 3.山西省平定縣

628.75

105023466

當代中國研究（二）09

平定縣裡不平定：山西省平定縣文革史（上）

No Peace in a County Named "Pea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Pingding, Shanxi

作 者／郝志東、黎明

執行主編／李佳燕

封面設計／陳宜伶

美編排版／菩薩蠻

發 行 人／陳俊彥

出 版 者／致知學術出版社

公司地址／思行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地 址：新北市永和區民權路53號8樓815室

電 話：(02)29490172

傳 真：(02)29490161

電子郵件：service@tec2c.com

出版日期／民國 106 年 1 月 初版一刷

定 價／新臺幣 920 元（上、下冊不分售）

感謝澳門大學支持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平定縣裡不平定：山西省平定縣文革史（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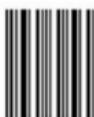
No Peace in a County Named “Pea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Pingding, Shanxi

2016年是文化大革命開始50週年、結束40週年。這個革命導致了約200萬人非正常死亡，讓近七億人生活在動盪之中。這個被稱為「史無前例」的大事件，以及它所彰顯的「文革思維」，至今都在制約著中國的發展。於是，研究文革的機理，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但是迄今為止的文革研究，通常集中在對大城市、大人物的研究上，很少有對基層文革、對小人物的研究。本書所探討的縣域文革以及在其範圍內活動的大、小人物在文革中的思想、行為與命運，他們與在全國發生的大事件的聯繫，對我們研究文革的機理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本書不光填補了一項文革研究的空白，其立足點和寫作風格對文革過來人以及後來人了解文革、了解中國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ISBN 978-986-5661-73-9



9 789865 681739 00920



致知學術出版社

<http://www.tee2c.com/>